



工人代表魏小妹 .....	206
工人代表范哥 .....	219
工人积极分子阿红 .....	225
配石部门代表邱氏珍 .....	234
工人积极分子刘超任（执模部） .....	238
工人积极分子李秀英（执模部） .....	242
第二批工人代表阿英 .....	246
第二批工人代表何家强 .....	252
工人活动家涛哥 .....	262
邻厂追讨社保 .....	273
公益律所指导记录 .....	280
后记 .....	294



# 前 言

· 陈 萌 ·

本书以珠宝行业工人追缴社保的抗争为背景，展现了珠宝行业这一“兴于百业后，衰于百业前”的风向标行业在珠三角地区的兴衰演变，是如何影响了珠宝工人对于“社保”这一问题的看法；而工人对社保问题从消极看待转为积极争取的演变，又是怎样反映了他们对自身阶级地位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本书试图从普通工人的角度理解一个现象：在当时还算宽松的国家环境下，永宝工人经过较长时期的磨合锻炼，形成了斗争核心，看起来比起搬厂、关厂抗争更具备建立工会的条件，但是工人最终并未选择建立工会，而是仅仅以“补缴社保”这一具体目标作为集体行动的起点和终点。

本书的事实材料，绝大部分来自于作者长期跟进永宝工人抗争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与工人的大量交流。这使作者能够身临其境地理解珠三角工人的处境，看到工人是如何从被动接受工厂管理制度，到向老板和官方提出要求，又在经历了资方、官方的拖延、欺骗和压制手段后，一步步地被逼上了抗争的道路，到最后，不仅自己敢于行动、也带动他人一起行动的过程。

当年介入和帮助过这起工人维权事件的劳工机构，两年前已遭取缔。出于保护当事人的需要，书中的厂名、人名都采用了化名，工厂所在地的地名则隐去。

## 永宝工人抗争的几点分析

2010年7月到2012年4月，某市永宝工人从了解到补缴社保的国家政策，到第一批工人成功补缴社保，整整用了一年九个月的时间。

永宝工人斗争的激烈程度，并不算很高。他们的维权历程中，甚至没有过像样的罢工。直到最后一百多人被厂里长期放假，补缴社保不得，又无法正常工作，工人才占领了公司的行政楼两天一夜。但他们在一年多的集体维权过程中，心理及行动的变化，反映了2010年以来珠三角工人集体维权的一些典型特点。

这次社保抗争的参与者，年龄主要在25-40岁之间，在珠三角工作了大约10-20年，是工业生产中的主力，他们的思想状态决定了目前珠三角工人行动的整体水平。他们来自于各地农村，没有社会大生产的经验，不了解工人斗争的历史经验。1990到2000年前后，虽然有国企工人对下岗失业的几轮反击，但社会整体的气氛是保守沉闷的，如何谋求更好的个人利益成为主流思潮。在这种大背景下，这一代打工者抱着赚钱养家的想法，从农村来到珠三角打工。多年来的工资收入确实改善了生活，积累了一些物质财富，所以绝大多数人虽对辛苦严格的工厂工作有牢骚不满，但整体上适应了打工生活，成为了珠三角产业无产阶级的一员。

近些年来，他们的主要思想特征是，随着年龄增大，自己工人身份逐渐固定，家庭经济负担加重，不得不更多地思考长远的生活保障，子女教育，父母养老问题等等。由于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他们不会轻易离职。常年的工厂生活，使得他们比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工人更遵守工业纪律，很少和管理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因此，他

们在集体维权中更懂得行动要有计划和纪律，同时又容易被社会规则、观念制约，不会轻易“越线”。另外，由于长期在同一个地区工作，有了稳定的社会关系网，能够通过这个人际网络交流信息。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永宝工人的抗争是珠三角至今所知不多的，由在职工人自发进行、时间较长的维权行动。据我们所知，提出补缴社保要求的罢工或集体抗争，大都有着工厂搬迁或者倒闭的背景，工人被迫将社保问题作为尽可能减少损失的“一次性”防守反击。某些关厂罢工中的老员工，为了跟老板算总账，斗得比较凶。而永宝厂还在正常运作，工人便提出补缴社保的要求，并与工厂管理层进行交涉。绝大部分永宝工人只想补缴社保，不想丢工作，很难一开始就跟公司严重对抗，这是永宝工人的抗争初始不那么激烈的重要原因。

从资方角度来讲，珠宝业的利润已经远不如从前，无意进行任何改良，不愿让利给工人。随着事态发展，工人发现只要自己想补缴社保，就必然面临公司的压力，被一步步逼上反抗的道路。正如某位积极分子所说：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老板逼出来的。

与关厂的“一次性”抗争相比，这种在职抗争可以在本厂工人中产生更长期的影响。一部分积极参与过行动的工人逐渐摆脱了资方主导一切，工人只能服从的状态，意识到工人的力量，以及可以通过行动来改变现状。

### 抗争工人核心的形成

由于补缴社保的难度较大，维权时间较长，永宝工人进行了多次集体行动。在这期间，他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分工：负责和公司谈判的主要代表，分析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的积极分子小组，分散

于各车间起到上传下达、统一工人行动作用的联络员，还有主管财务的人员等等。这期间因为各种原因有人退出，但只要工人整体还没有放弃，就会有人补充进来。即便最后工人占领办公楼的行动中，两位工人代表以“非法禁锢”的罪名被关押，其余工人代表和积极分子也没有完全退却，而是组织筹款、签署联名信，要求释放工人代表。这不仅是保护工人代表本人，也是对一年多来工人集体行动成果的保护。在那个关键时刻，这批工人没有被吓倒，而是坚持用集体力量继续维权，为永宝厂补社保事件能有一个还算成功的结果，起了重要作用。

永宝工人虽然在机构的建议下设置了首席代表，安排了一些不同分工，但集体行动的方向和策略，并不是由首席代表一人决定，而是由工人积极分子组成的一个团体而决定。在这个团体里，没有哪个人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一切都是讨论决定。而他们的讨论也并不局限于团体内部，是开放性的——所有关心这件事，愿意参与讨论的工人都可以加入。这种“平等”“开放”的小团体是自然发生的，他们还没有意识要制订严格的会议规矩，因为当时的工人实践还没走到这一步。大多数维权工人并没有长期抗争的心理准备，都是兵来将挡、被动接招的打算。

永宝的斗争集体是由一群看起来对行动犹犹豫豫，不被资方逼迫就很难做出下一步决定的普通工人组成的。他们当中锻炼出了一批又一批积极分子，原本有的是腼腆内向，下班按时回家的好爸爸，有的是在家贤妻良母，在工厂任劳任怨的传统妇女，有的是敢说敢干但是缺少思考的愣头青，有的是有社会阅历的老油条，也有活泼开朗小主意很多的机灵鬼。社保问题像一个套索，将这群人从原本平静、不需要思考的私生活中



拉了出来，让他们有机会真正了解自己的利益问题和工人地位。

为了实现自己补社保的想法，需要和其他人团结到一起，为了保持团结，便要有人站出来做组织工作。在永宝，这个自发组织的形成过程相对漫长，所以能够留在积极分子团体中发挥作用的工人，是其中最具有韧性的工人。因为参与集体行动，他们占用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很多无私付出却受到亲友的责备。由于直接面对资方和政府的压力，让他们更清楚什么是工人利益，以及如何坚持。作为代表的责任感和来自工人集体的压力，促使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快地从个人转变为集体。

对比一下其他集体案例，不难发现，在持续时间较短的集体行动中，因为抗争而影响到自己生活的人很少，也就更难有思想上的影响。很多工人在抗争中的个人变化、内部矛盾、对外部压力的反抗，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便匆匆结束。

## 工人集体维权与工会

### 上级工会消极无力

在维权初期，工人曾在某劳工机构的建议下，找过当地工会求助。不过永宝公司所在的地区工会没有帮什么忙，甚至没有像样的反应。它的表现，体现了当时珠三角官方工会的典型反应：根本不想卷入，也无力介入已经发生的工人集体维权。最后永宝工人评价“找工会完全没用”。直到现在，很多找过工会的维权工人仍然是这样的评价。

### 工人建立或改选工会

前文介绍过，永宝工人由在职工人发起且维权时间较长，比起其他进行数天即结束的罢工或一次性关厂维权行动，更有建立自我组织的基础。在永宝工人的抗争过程中，一些学者也曾建议他们在厂内成立或改选工会，利用工会的框架与资方开展正式的集体谈判。这样工人代表也可以获得一个法律认可的身份。对于这一提法，除了首席代表出于保护自己安全的本能，感到有必要以外，其他工人代表和工人都没有兴趣。对于补缴社保这个单一的要求，工人更愿意采取简单、直接的行动方式——写集体要求书，一起去跟公司面谈，通过自荐或推选代表去谈判等等，而不是通过建立一整套集体协商机制去和公司对话。另外，永宝想要补缴社保的工人人数在厂内不过五分之一，这些工人也没有信心发动全厂工人去搞工会选举。在没有外界足够的支持下，如果真的有工人代表把力气花在了了解工会法律，通过繁琐的程序，建立工会，成为工会干部，得到官方、资方认可的地位，然后再谈判，工人行动的力量反而会被分散，同时也会失去大多数追缴社保工人的支持。

不只是永宝工人，目前珠三角工人仍极少认真地追求以成立、改选工会作为改善处境的主要手段。这与工人争取的目标较单一，集中在经济领域，且资方较容易让步有很大关系。

此外，长期的繁荣，让工人离厂另找工作的压力比较小。某永宝核心抗争工人轻松的谈到“这个地方的珠宝作坊有上万家”，不愁没有饭碗。另一位核心工人后来当了快递员，收入也不比永宝差。这样一来，珠宝业也好，其他行业也好，珠三角工人普遍缺乏“无路可退，唯有组织起来跟老板打阵地战”的精神准备。

而且，哪怕只是建立一个能够维护日常利益的工会，也需要工人了解在日常生产中，如何与管理方周旋，在这个基础上如何把全厂工人团结起来。目前为止，珠三角工人既缺乏有组织抗争的传统，也很难学到这样的经验。

到底什么时候，工人会有动力组织起来？至少，当工人争取的



目标比现有的要求更多样化了，并且需要持续进行，建立工会以及其它工人组织的想法，才有可能被更多工人接受。那个时候，工人有动力去建立一整套与资方甚至国家抗衡的组织形式。

至于官方工会，对于工人自发成立任何组织的态度一直是消极对待。永宝工人接触的工会官员对建会的提议完全不支持，还告诉工人，如果搞工会，工人就得交会费。本来对成立工会兴趣就不大的工人听到还要掏钱，更不愿意成立工会了。工人的这个反应也很典型：他们通常争取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利益，并不想跟官方力量有直接对抗。而且一旦发现自己的行为遭到官方反对，便会趋于保守。

## 工会直选的花架子

还要说明的是，永宝事件发生在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略有放松，工人参与工会活动和集体协商相对活跃的时期。

2011-2012年正值“本田事件”后，广东积极推行企业内工会直选、改选的时期，随后还制定了《广东省企业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条例》。但这些动作并不意味着统治者真的允许工人进行自我组织。事实上，在了解几宗由官方、资方联合操纵的集体协商、工会直选的实例后，我们看到的是，这只是官方工会试图配合国家的维稳需求，以及大资本希望有效解决工人自发行动带来的经济破坏，而做出的所谓“让步”。这个“让步”实质是企图更进一步掌控工人情绪和反抗实践的一系列动作。

根据《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工会委员、主席、副主席的人选需要“报经同级党委和上级工会审查同意”或者“由同级党委与上级工会协商提出建议名单”。因此，事实上工会选举中能选谁，谁能入选，是完全可以从上而下把握的。

而在主导直选时，工会官员通常也会劝诫工人：有了工会，你

们就通过工会反映问题，不要动不动就罢工，那样会给公司带来很多损失。

这里，我们可以分析与永宝事件同时期发生的某个自上而下改良工会的案例，以便理解官方和资方是如何互相配合来压制工人自我组织势头的。

2010年，珠三角某日资汽配厂在地区官方工会的指导下，进行了公司内工会选举，资方不认可当时选举出的工会主席，最后还是由日方的总经理直接任命了一个公司元老做工会主席。2011年，该公司进行了首次员工工资集体协商，3个青年人作为员工代表，参加了由资方、公司工会进行的谈判。由于员工代表没经验及各种原因，第一年的谈判流于形式，员工工资只涨了100多元，很多人不满意。

2012年第二次协商时，员工们认真了，希望能够通过工资协商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新当选的年轻员工代表们也很认真地准备了谈判：搜集员工意见，搜集法律依据，与周边工厂的情况作对比，在员工中进行有关协商过程的宣传等等。同时还和公司内工会干部斗智斗勇，防止他们提前给资方泄露员工的协商方案。马上，员工代表们就面临了来自资方的压力。厂内员工的任何反抗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员工代表煽动。最后这场历经4个月的谈判以每月增加400多元工资，以及一些福利结束。相比第一次谈判，员工对这个结果都很满意。



而 2013 年年初，由于之前集体协商的一些福利还未落实，以及年终奖等问题，员工们自行发动了罢工，同时提出罢免不作为的工会主席，全体员工直选工会委员会等要求。公司却趁此机会狠狠打击了 2012 年参与集体协商的员工代表，指控他们煽动了罢工，将其开除。当地警方将两位员工代表关押了一个多月。虽然最后被无罪释放，但被关的员工代表却无法要到解雇赔偿。地方劳动部门、工会口径一致：公司这样解雇是合法的，无需赔偿。

由此不难看出，自上而下进行的工会选举及集体协商，刺激了工人尤其是一些青年工人的思想，但一旦工人认真起来，准备将这种形式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资方和官方，马上收拢拳头全力打击，压制工人任何“自作主张”的势头。

同时，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初步结论，至今为止，在单个工厂内进行工人自主工会组织的活动阻力都将是巨大的，即便工人的工会可以和资方在短期内抗衡，但如果它不能得到官方的认可，最后仍然会被庞大的国家吸收或者碾碎。

## 工人行动与民间劳工机构

珠三角不但是目前国内工人罢工最活跃的地区，也是关注劳工议题，直接为工人提供各类服务的劳工机构最集中的地区。

当时支持永宝工人追缴社保的劳工机构，属于 1990 年代在珠三角地区成立的第一批民间劳工组织。这类组织在以前都是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工人维权个案为主，往往是工伤、拖欠工资、离职纠纷一类的个人问题。在 2010 年之后，工人集体抗争形成一个小高潮，再加上关厂搬迁潮，去劳工机构咨询的工人，越来越多地涉及社保、

工龄补偿等等牵扯工人普遍利益的方面。劳工机构顺应这种需要，纷纷酝酿转型，逐步从服务工人个体转向推动集体行动。对这家机构而言，永宝是它协助的第一个真正意义的集体案例。当时这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于如何指导集体案例还没有完整的思路。机构领导者在最开始提出的“向工会求助”，以及鼓动工人“成立工会”的策略，很快都宣告无效。只有推选代表的建议，适应了当时维权的需要，被工人采纳。机构人员给工人的建议，也有比较实用的，比如劝告工人代表不要与公司单独协商，以免被资方套话而且容易让同事猜疑等等。

永宝的抗争工人通过去劳工机构学法律，与其他厂的维权工人、关注劳工问题的各类社会人士交流，开阔了眼界，建立了信心，参加机构活动的同时形成了固定聚会的习惯。劳工机构的存在，让工人感到自己的利益诉求可以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得到了经验、建议，也加强了信心。后来有的工人积极分子评论说，要是没有机构，他们坚持不了这么久，原因也在于此。

不过，这类劳工机构的立场和利益所在，与工人并不完全一致。劳工机构为了维持运作，需要争取项目资金，按照项目方要求“做活动”。咨询问题的工人，对于机构来讲是维持项目运作的对象。为了维持与机构的关系，维权工人会按照机构的要求去参加一些和自身要求无关，甚至不感兴趣的活动。某积极分子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工人都没文化，还非要参加什么‘工人文化节’”。对于某些工人来讲，这些活动可能开阔了眼界，扩展了社交面。但对于正在进行集体行动的多数工人，就显得耽误时间，浪费精力。尤其当工人遇到棘手难题，想到机构找工作人员咨询讨论，可工作人员却要先按部就班地把自己要做的文娱活动完成，然后才能跟迫不及待的工人们讨论他们遇到的困难，还不一定有什么结论。时间长了，大部分工人们便不愿再去机构讨论问题，而是选择自己讨论、自己解决。而工作人员考虑到集体事件的敏感性，也会跟维权工人保持一定的

距离。

此外，在我们所了解的案例中，机构由于项目要求，在推动工人行动中，也可能造成某些不良影响。最主要的，是表现在鼓动工人建立一个名义上的组织称号，而缺乏实际的组织动员工作。比如，让一些工人积极分子相信有了“首席代表”“某某厂工人委员会主任”的称号，就可以利用相关法律保护自己，有了合法谈判的权力，免受公司、官方的压力。事实上，真正能够给代表们提供保护的，仍是工人集体本身。这些称号以及所谓的明文规定，往往起不到多少保护作用。

其次，机构不顾工会疲软无力的现实，不断引导工人向工会寻求帮助，也浪费了工人的一些精力。

后来，在越来越多的集体案例中，这类机构逐渐积累了涉入集体案例的经验，也有可能得到了一些用于资助专职组织者的项目资金。在这些集体行动中出现的某些活跃工人代表，被机构吸收成为专职组织者。他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参与到了更多工人集体维权中，从自发参与斗争转变为自觉参与。这类工人出身的组织者，一般能够更准确的把握工人的心理，更灵活地处理机构活动与工人行动之间的关系。由于经历过与资方、政府的正面冲突，他们比之前的工作人员对各方面压力有更强的承受能力，可以更深地涉入到工人的集体行动中。

不过，根据对这些组织者的访谈以及日常接触来看，他们与维权的普通工人保持了一定距离。这种距离不只是因为工人数量多，无法接触所有工人所造成的，更由于他们对于组织者和被组织者之间关系的定位。在他们眼中，普通工人参与行动的时候大都是盲目的，只要跟着走就好，不需要知道太多事情。

组织者对于被组织者的态度，对于工人集体行动的认识，决定了他们会在组织过程中运用怎样的手法。一些操纵性的手法可能能够成功地实现具体目的，比如更快地补缴到社保，争取到补偿金等

等。但在集体行动过程中，这种手法能否提高工人整体的斗争意识、集体意识的作用却是另外一码事。

## 工人群体与地方政府

在永宝事件中，永宝工人对于政府的认识，反映了一般珠三角工人对政府的认识。在日常生活中，政府是一个冷冰冰管人者的形象。工人不会对政府感到亲切，甚至可以说有对立的情绪。一般情况下，十几岁从农村出来，在工厂里老实做工的工人，很少机会直接与政府机关打交道。除了在新闻中出现的官员形象，他们接触的“政府”，早年在农村，是严查超生的计生人员。后来到了城市，是追着人查暂住证的治安队员，现在是时常和小摊贩爆发冲突的城管。总之，在工人眼里，政府始终是社会的管制者，同时又是所有问题的裁决者。工人在维权过程中，上访——将与公司的劳资矛盾转化为面对政府的诉求，请求政府部门出面解决，是常用的手段。

也因此，当永宝工人维权过程中出现一个看似说话算数，或者同情工人的官员时，工人马上就会产生好感，很容易相信自己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好官，从而维权的诉求可以顺利解决了。当然，这种幻想，会随着工人诉求始终得不到满足的现实而破灭。工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经验意识到，看起来再好的“官”，也只是官僚体系中的一枚棋子。



# 某区珠宝行业及工人情况简介

## 一、某区珠宝加工制造业简介<sup>1</sup>

某区位于珠三角某市中南部，该地区的珠宝首饰加工制造业起步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香港珠宝制造商利用内地的开放政策，低廉的人工和费用，将珠宝加工业向内地转移，在内地生产产品，在香港等地销售，从中赚取巨大的差价。至今某区已成为全中国规模最大的金银珠宝首饰加工基地。据查，截止到 2011 年，全区有 400 多家大型珠宝企业，1600 多家小型加工厂，从业人员近 10 万。（《广东地区黄金珠宝行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其中，百人以上中大型加工企业以港资、台资为主，兼有其他外资企业。几十人的小加工厂则以内地老板居多。95%的产品以出口为主，主要经香港出口到世界各地以及返销国内市场。“世界珠宝，某区制造”的口号由此而来。

某区的珠宝行业伴随着中国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兴盛而兴盛。据公开资料以及工人介绍的情况，1990 年到 2000 年左右是珠宝行业大发展时期。这段时期大量外资涌入某区建厂，许多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珠宝产业链。

1991 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某区珠宝厂商会成立。商会是行业内老板们进行密切联系的纽带，同时也是和政府部门沟通的桥梁。各级政府制订了相关法律、经济政策之后，会有专员来给各个会员企业解读，手把手地教给他们如何操作，窍门在哪里。当然也

---

<sup>1</sup> 本篇资料结合了网络信息、统计数字以及工人口述。

会包括如何规避用工中产生的劳资纠纷（就是怎样钻法律空子）。另一方面，商会也制订了行业内的竞争规则，提高行业的准入标准，保持已有企业的竞争优势，约束彼此的行为。不用多说，在商会内，大老板永远比小老板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这段大发展时期中，逐渐形成了由少数几个大老板把持的行业商会。以至于某些新入行的老板想要和大老板共享资源、信息，减免应对政府各级部门盘剥的苦恼，就要缴纳“份子钱”，把自己的厂子挂靠在几个大企业名下。这也是某区遍地可见“某某珠宝公司第几分厂”和“某某珠宝公司第几加工车间”招牌的原因。

某区的珠宝商会除了行业内的协调作用，也交换有关工人的信息。比如，在珠宝商会的行业规则中有如下规定：“为了方便商会协调对员工的管理，会员如有必要可填报《员工动态表》反映员工的流动情况，商会并将员工动态通报全区各珠宝首饰厂，供各厂在招工时参考。员工因违法或严重违反厂规被开除的，会员应上报商会，由商会向其他会员发出通知。”这就是珠宝行业工人“黑名单”的起源。最初，“黑名单”主要是针对在厂内有偷盗行为的工人，但随着行业内个人和集体劳资纠纷的增多，“黑名单”把矛头指向了敢于积极维护自身权益的工人。

1996年国家开始降低珠宝行业的监管门槛后，某区珠宝业迎来第一个发展高潮。这段时间，珠宝行业的利润是丰厚的，市场似乎无限巨大。从原料加工到设计制作，加工设备制造到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各种围绕着珠宝生产的行业都逐渐发展起来。几年时间，一些只有一两百人的加工厂已经发展到上千人，产量翻了数番。原有的市桥、大罗塘、小平等地已经不能满足规模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的工厂需要。于是发展扩大到周边更多区域，相继建立了多个珠宝产业园。2000年后新兴的中小加工厂的老板，多出身于外资大厂的核心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他们掌握技术和一部分订单，或者给大厂做二级供应商，或者自己联系客户进行生产。他们虽然没有



像那些已经成势的大老板那样，有足够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政府、客户人脉资源，但通过偷漏税、压低工人工资，加强劳动强度等等手段，也获得了相当的利润。

2002 年中国加入 WTO 给对外向加工型经济发展打了一支强心针，以港商为主的某区珠宝加工业更因为 2003 年签订的 CEPA 协议而迎来又一次发展的小高潮。<sup>2</sup>但市场不是无限的，行业内的盲目扩张和激烈竞争不断摊薄着利润。2004 年以后，随着加工厂、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多，新技术的应用，生产效率的提高，某区珠宝对外加工市场趋于饱和，熟练技术工人也感到珠宝行业的工资优势远不像以前那样明显。业内人士已开始出谋划策：珠宝行业要转型，要从海外市场转向开拓内销市场。

2008 年的经济危机，使直接受世界市场影响的某区珠宝企业像服装、玩具等其他以出口为主的加工企业一样，受到巨大冲击。因为国外订单减少，利润下滑，大厂商们想出各种对策来维持利润。首先便是拿工人开刀：老板先向工人哭穷，降低工人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一些大厂逐步将各车间外包给个人，以便甩掉工人工资、社保等包袱。此外还用解雇不给赔偿、放长假不给工资、不安排加班等方式来迫使工人自动离厂。还有一些厂悄悄关厂、搬厂。各种侵害工人利益的做法导致个体、集体的维权案例增多。这段期间，不仅内地工人利益受损，珠宝公司的香港雇员也难逃一劫。因为 1 名香港雇员的工资大概相当于内地 5-6 人的工资，所以香港的贸易商不断地将原本在香港的贸易业务转移到内地，用内地人取代香港员工，以此降低用工成本。

2010 年后，经济有了起色，珠宝行业经过一轮调整又恢复了一些生机，但是珠宝厂商们却统统“忘记”了恢复工人们在经济危机期间失掉的待遇，只是忙于寻找新的市场，保持和增加利润。此时，

---

<sup>2</sup> 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该协议极大地降低了港资企业在内地的经营成本。

与电子、玩具等其他行业相比，珠宝工人的收入几乎完全没有了优势。

## 二、某区珠宝用工和工人情况简介

### 工人来源

由于珠宝加工的原材料涉及贵金属和宝石，珠宝厂最早都是以招收当地人为主，或者要有当地人担保的外地人。另一方面，工人之间。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用工需求急剧上升，本地人的数量就远远不足了。工厂于是放宽了招工限制，只要厂里有人担保即可进厂。再后来，只需要收取一定的押金便可进厂做工。到现在，珠宝厂的一些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的工种，招工和电子厂普工没有太大差别，各地的打工仔打工妹，有无经验均可进厂。因为一些工种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早期的工人来源也呈现地域性特点，老乡带老乡，亲友教亲友比较普遍。越到后期，随着工作选择性增加，培训学校的普及，这种老乡关系就越趋于淡薄了。



### 工人收入

一般人的印象中珠宝行业工人的收入很高，福利待遇也很好。直到现在，一些人听到珠宝厂的工作，还是这样的印象。但事实

上，珠宝行业的工人并非一直高薪，行业内生熟手、不同工种的工人工资差别也很大。

1990年代初期，某区珠宝加工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刚刚起步，普通珠宝工人的收入和电子厂、服装厂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有极少数熟练技术工人能够获得较高收入。1996年以后，行业扩张快，熟手稀缺，他们的工资水涨船高。刚进厂的生手只能拿到每月200块底薪的时候，熟手可以拿到600-700了。加速发展的珠宝加工业带动了配套产业的发展。大量想在正规珠宝厂找到工作的工人，主要通过在小加工坊做没有报酬的学徒磨练手艺，或者在短期培训班中学习实用技能来尽快获取资历，提升收入。同时，各类职业学校、技校纷纷开展相关技术培训，以满足珠宝厂商对较为廉价的大陆中高级专业人员的需求。

但随着工厂越来越多，行业利润逐渐被摊薄，大量技术工人的涌入，不断简化的加工技术，使得熟练工人收入增长的速度变慢，和其他行业的熟练工人收入不相上下。加上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不仅老员工的收入降低，对于新入行的工人来说，珠宝厂的工作和其他厂相比一点优势都没有了。参见表一。

珠宝工人的工资由于工位的不同也有不少差别。其中起版和执模是收入相对较高的两个部门。

珠宝加工的工艺流程一般有以下几个步骤：起版（制版），执模，倒模，研磨（滚桶），配石，镶石。其中，起版是珠宝加工中的第一步。工人需要将设计师的平面图转化成实际的金属模型，再由倒模工人将金属模转成一定数量的蜡模，执模工人将粗加工的金属首饰进行再打磨抛光，使之美观，镶石工人则按要求将各类宝石镶嵌在首饰上。

起版最初是纯人工制作，对工人的技术、经验要求较高，也是珠宝厂工人工资相对最高的部门。现在随着制作工艺的发展，利用

表一：1999-2011 年永宝厂配石科（非技术性部门）某工人的工资收入变化情况（单位：元）

年 月	底薪	加班费	其他	工资总额
1999 年 3 月	655	617	185	1457
2002 年 9 月	1130	1113（134 小时）	0	2243
2002 年 12 月	1130	0	315	1445
2003 年 9 月	1210	1415（159 小时）	347	2972
2003 年 12 月	1210	89	325	1624
2004 年 12 月	1300	163	241	1704
2005 年 12 月	1390	0	276	1666
2007 年 1 月	1390	961（94 小时）	636	2987
2008 年 1 月	1510	733（66 小时）	386	2629
2009 年 5 月	1000	0	719	1719
2010 年 1 月	1200	386	766	2352
2011 年 3 月	1300	357	522	2179

注：2009 年以后加班费才开始区分平时、周末。

电脑软件和制版机，可将设计图直接做成蜡模，大大降低了对工人手工技术水平的要求。很多培训班专门培训电脑起版的软件操作。一个初高中文化水平的初学者，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就可以入厂工作，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要入行好几年以后才能独立操作。当然，这样一来，减少了起版工人和其他部门的收入差距，本部门之间新熟手的收入差距也随之缩小。

由于金属加工中会有不可避免的损耗，一般的珠宝加工厂会设定一个损耗范围，比如 1000g 金加工成首饰，可以有 2 克的损耗。如果工人技术熟练，只消耗了 1 克，那么剩下 1 克金子便可以算作工人自己所得，称作“赚金”。相应的，如果工人消耗了 3 克，就要从工人工资里扣掉 1 克的钱，称作“亏金”。所以，熟练的执模工人

在金价较好的时候，可以赚到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但随着加工技术的进步和工人平均技术水平提高，工厂不断提高加工标准，严格控制损耗的克数，工人的“赚金”也越来越少了。

起初，珠宝厂大都实行计时工资制。2000年后，很多工厂逐渐改用计件工资，或者计时计件相结合。厂方采用计件工资可以不按劳动法的规定支付加班费。计件工资还造成工人之间收入差距变大，内部矛盾增多，使得不熟练的工人自离。

### 三、珠宝工人抗争概况

珠三角工人的抗争有着由个体冲突转向集体行动、自发性强、组织性较差的普遍特点，同时又有行业的自身特点。某区地区珠宝工人的抗争也不例外。

1990年代一直到2006年左右，是珠宝行业整体大发展的时期，压榨员工的手段也较为原始，主要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压低生手工资等等来获取额外利润。这一时期由于野蛮的管理方式，责骂、罚款、克扣工资加班费、栽赃工人盗窃、遗失珠宝等等，工人和管理发生的个体冲突最为常见。此外，一些技术岗位的大师傅因为各种原因离厂时，可能会带走跟随自己的一批员工，此时会和原来的老板之间产生较大的利益冲突。

前期，由于行业利润率高，工人整体收入和福利待遇相对其他行业优势较多。加之工人最初多由熟人介绍入厂，主要在本地区行业内流动，就业范围较窄，再加上行业黑名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工人可能的反抗。同时由于生熟手、岗位、计时计件产生的各种工资差异也使工人内部的矛盾较多，给工人的集体抗争设置了很多障碍。

越到后期，随着珠宝行业平均利润率降低，工人入行门槛降低，工资失去行业优势，工人在各行业间的流动性相对增加。之前珠宝行业普遍存在的诸多违法行为，比如不合法的工资、加班费、押金制度、罚款，遭到越来越多的工人消极或积极的反抗。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兴于百业后，衰于百业前”的珠宝行业已经感受到寒意。一些中小规模的工厂开始减产，裁员，工人工资被拖欠，直接导致集体劳资纠纷数量的增长。前文提到，2008 年危机爆发后，曾经靠工人们发了横财的珠宝老板们，此时要求工人和他们“共克时艰”。厂方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成本，维持利润：降低工人收入，减免福利待遇，放假、裁员，有些老板干脆一跑了之。不过，工人并没有全部买账。由于关厂、裁员造成的工人堵路、厂内静坐、上访的集体维权事件屡见不鲜。工人和厂方的个体冲突也变得更为激烈，直到现在很多工人都会说起 2009 年 3 月的血案。当时某珠宝厂工人因被厂方恶意解雇而拿不到应有的赔偿，在和厂方交涉时受到管理的辱骂殴打之后，捅死了人事总监和经理，自己随后跳楼身亡。出事第二天，附近邻厂的老板便赶忙给本厂员工发放了拖欠的工资。

## 某区地区珠宝行业工人社会保险概况

1999 年国务院制订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出台，虽然某区珠宝加工厂等外商投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均在此征收范围内，但与其他很多工厂一样，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并没有真正执行。2001 年 12 月，劳动部下发《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农民合同制员工缴纳、终止养老保险的方式。这以后，某区地区的一些大珠宝厂陆续开始为厂内小部分员工缴纳社保，一般以中高层管理及管理层的亲信为主。

随着 2010 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国家加强社保的推广力度，地方上也将社保和其他政策挂钩施行。除了养老金、看病报销的基本功能以外，在外地务工人员子女入公立学校的条件中，增加了父母一方需要缴纳社保的要求，外地人买车买房，甚至办理信用卡都要求有缴纳社保的记录。社保转移手续简化也让外地务工者有了更大的动力缴纳社保。政策环境的变化，也促使之前不关心社保的工人逐渐感受到社保的重要性。

珠宝厂商极少主动为工人缴纳社保，甚至直到 2012 年，一些看似正规的大厂在员工入厂时还要求他们签订一份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声明。这时期，由于行业不景气，工作不稳定的因素增加，一些工龄较长的工人比以前更为关注养老问题，再加上公立中小学对于学生家长社保的要求，工人对社保的需求明显比以前增加了。

与其他行业一样，某区珠宝工人掀起了一轮以争取社保为主要诉求的集体行动，永宝厂工人的行动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



# 永宝厂概况

## 工厂背景

永宝厂前身永义厂，于 1991 年在某区的市桥镇建立，产品以金饰为主，主要给欧美的珠宝商代工。和其他三来一补企业一样，为了享受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几经更名。2004 年由“永义”改为“永宝”。伴随某区珠宝业的兴旺，十年时间永宝厂由最初的七八十人发展到最兴盛时的两千余人。2000 年 10 月，搬至岭辉镇。老板用十多年来通过工人辛苦劳作赚到的钱，在岭辉购地皮、建厂房，同时做慈善，捐钱办学校，树立自己的形象。成为岭辉镇最具影响力的几个大公司之一。

据相关官网信息显示，永宝厂的法人是某区珠宝商会的理事，也是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的常务理事。和其他几个大珠宝厂的老板不是亲戚兄弟，就是朋友熟人。他们或是香港人，或是移民香港又回来投资的大陆人。几个大老板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共同维护着某区大珠宝加工商的整体利益。

永宝厂的老板究竟有多大势力，工人们其实并不清楚，很多也是传闻。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一个拥有两千人的加工厂，在珠宝行业已属凤毛麟角。在工人们维权之初，几乎没有人认为凭工人自己的力量能够与这个大公司抗衡。



## 工厂物料管理

90年代初的珠宝厂管理相对比较松懈。工人们刚出来打工，对于所生产的物品知之甚少。管理骗大家说金子是铜块，员工就信了。工人们有的甚至拿着金子当石头扔来扔去地玩。后来厂外面出现了专门收金子的人，工人才逐渐知道这是值钱的金子。开始有人想办法偷金出去卖。老板当然不能忍受这种损失，珠宝厂的管理也日渐严格起来。

根据自身规模以及加工产品的对象和环节的不同，珠宝厂的物料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有些大型珠宝厂，出货量很大，除了平时生产严格计数，控制损耗以外，对工人从头防范到脚。过安检门时，全身不可以戴任何金属制品，包括腰带、女性内衣不可以有金属物，手机严禁带到车间里。如果警报器响了，还要脱衣检查。甚至进出一些重要的部门时，还要张开嘴巴检查一遍。

永宝厂主要是靠生产中的计数来控制。比起其他一些珠宝厂来说比较宽松。这也是一些老工人在收入变差之后仍选择在那里工作的原因之一。工人可以带手机、钥匙进出车间。在车间工作时一般也比较宽松。生产淡季，大家没货做的时候，说说话聊聊天都可以，甚至有人上厕所的时候带份报纸看半天，师傅也不会说什么。

## 珠宝厂的罚款

珠宝厂的罚款现象比较普遍。永宝也不例外。厂牌丢失会罚100元。漏刷考勤卡，第一次口头警告，第二次扣半天工资。假如货品丢失，罚款就更严厉了，根据货物价值，几百到几千不等，按月从工资里扣除。访谈到的工人几乎都有因为丢失货物而被罚的经历。曾经有人被扣了一年多，直到自己辞职都没还清罚款。此外，吸烟、



迟到、不听从管理安排等等，都会被罚款。

## 永宝厂的管理层

生产部门的管理层级是：工人  
→组长→师傅→部门主管→厂长  
经理

组长一般由师傅从员工里提拔挑选。主要负责物料和生产安排，有时也会从事一线生产。

师傅大都是香港人，虽然号称师傅，但跟工人并非师徒关系，更多的是上下级关系。他们并不真的教授工人技术。有些师傅自己掌握一些关键工序的技术，工人做次要的工序，要想提高本领只能靠偷学。

部门主管也大都是香港人。

管理者的风格，有的很严，有的比较松。但凡工人觉得为人还可以，能够帮工人说几句话，争取些福利的，最后都被老板以各种理由辞掉了。老板曾经教育这些管理：“对工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在社保维权中，工人们给他们经常要应对的几位管理，起了五花八门的外号。

“奶妈”：工人们刚开始维权时的人事主管是老板的熟人，来厂里之前据说是在酒楼里做经理。永宝搬到岭辉镇后，便安排到公司做人事。她是个说话狠毒又没水平的大嗓门婆娘，对工人很不客气，什么事情都是脸难看事难办，以此来压制个别工人的要求。因为和老板的暧昧关系，大家背后都叫她“奶妈”。社保维权开始后，

面对团结起来、了解了自身权益的工人，奶妈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就失去了以前的效果。讲法律甚至讲不过工人，只会含糊其辞：公司会安排的，会考虑的，回去等消息啦，诸如此类。

**“何公公”**：眼看威风不在的奶妈招架不住一波波工人，老板找关系新安排了一个人做人事主管。这个主管据说挺有来头，之前在政府部门做事，精通法律，谈判技巧娴熟，很会处理各类矛盾。他说话不温不火，头头是道，对待工人的要求，往往打着官腔说：“这个我们会按照法律程序办理。法律怎么规定，我们就怎么处理。”可是事情还是照样不做，能拖就拖。工人开始还真不知怎么应对这类人，直到最后被拖得忍无可忍了，才跳出他话里的圈套。对于这么一个看似软绵绵其实难对付的中年男，工人们送他“公公”（太监）的外号。

**“大水牛”**：工厂后勤总管兼工会主席，老板的妹夫。因为身材高大，脸短嘴长，为人凶狠，故有此雅号。开始工人并不知道他还是工会主席。社保维权之后，因为几次找上级工会投诉，公司的这个挂名工会才被人所知。他常代表厂方和工人谈话并发生冲突。

## 工人收入待遇情况

从工人们的整体印象看，永宝厂在搬到岭辉之前的福利待遇还算可以——每年有旅游、聚餐，过节发慰问品，有饭补，熟手的工资在同行业也算不低。搬厂之后，老板通过惠东老家的相关部门，招了一大批工人。员工人数由原来不到 1000 人迅速扩展到 2000 多人。中高层管理也换了一批人。新上任的奶妈（人事经理）和大水牛（后勤部长）联合发力，两年之内，很多福利逐渐被取消。公司没有旅游了，过节也不再发东西，女员工妇女节福利，由多发一天工资减为半天，后来干脆取消。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永宝厂和

其他工厂一样，把工人的底薪降到最低工资水平，减掉的部分变成岗位津贴或者奖金。这样操作既不明显违法，还让根据底薪基数计算的加班费少了一大截。同时取消全勤奖，宿舍也不再免费。

社保维权以前，永宝厂实行计时工资制，但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同一部门内部的工人之间，收入差距仍然很大。前文介绍过，由于起版部的重要性，在一般的珠宝公司都是工人收入较高的部门，永宝厂也不例外。起版部员工的平均工资大概能高出其他部门一倍。比如起版部员工的底薪在 2008 年以前都在 3000 元以上，而其他部门 1500 元算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部门只有 800 多元。工厂要求工人之间工资保密，而起版部内部员工因为技术水平和分工差异，工资也能相差将近一倍。这样工人之间容易产生隔阂，相比那些工资标准一致的工厂，工资问题往往容易分散为个人诉求——要么靠关系，要么靠能力。

2008 年以后，随着工资底薪的调整，各种福利的削减，部门之间的差距、部门内部员工的差距都变小了。起版部员工的工资受的影响最大，也是追缴社保中参与程度最高、最积极的。生熟手的底薪也调整到同一个标准。新进厂的员工和做了十年的老员工拿一样的工资，这尤其让一些老员工感到不平衡。

2009 年公司还采取了把部分订单外包，给自己员工放长假而不给工资的做法来降低经营成本。经过这些变动，很多员工都选择离厂，工厂人数锐减到 1000 人左右。

但是绝大多数老员工（5 年以上）还是选择忍受公司的这些苛刻条件。原因主要是，当时整个行业都是这种状况，去别的厂也是差不多的待遇。对于一些中年技术工人来说，珠宝行从业时间长了，其他技术不会，转行并非易事：要么从头学起，要么就是做没技术含量的普工；而且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生活圈子，新换一个环境对于家庭生活来说将是巨大的变动。不到迫不得已，不会愿意做大的变动。

工人由于收入、待遇下降的不满，被生活中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暂时压制住了。不过，矛盾并不会就此停止，终归在继续积累，最后还是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

## 永宝员工社保情况

这种背景下，永宝厂越来越多的老员工开始关注社保问题，并由此进行了长达一年半争取社保的维权行动。

整个维权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要求厂方给从未买过社保的老员工缴纳社保。第二阶段是要求厂方补缴员工入职以来的社保。

第一阶段的维权过程相对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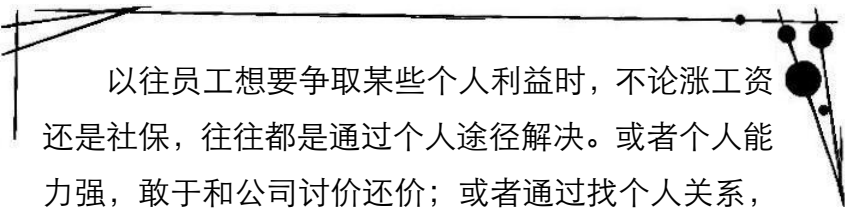
# 工人维权始末

## 管理被炒工人传递法律信息

凡是大点的事件，一般都有一个导火索。最先激起永宝工人集体要求厂方缴纳社保的想法的，是发生在厂内的一起劳资纠纷。


2009年永宝厂炒掉了一个在老板眼里“无所事事”的管理。这个人咨询了律师，和公司谈判后，要回了经济补偿金，几年没买的社保也折算成现金，赔到了一些钱。管理的一个亲戚和起版部的同事吹嘘此事，大家听说后纷纷议论：“他赔都可以赔几年的社保，我们却连买都不能买。”

工人们在平日里看新闻、跟亲友交流的时候，了解到法律规定公司必须要给员工缴纳社保。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酝酿，2010年7月，起版部工人写了一份要求厂方缴纳社保的集体签名信，交到人事部。当时人事主管“奶妈”的态度比较恶劣，和工人们发生争吵。但因为不缴纳社保已属明显违法，公司权衡利弊后于8月份贴出通知，为所有自愿提出申请的员工缴纳社保。不过还附加了一个条件，如果不缴纳社保，工资可以涨100元，要求买的只能涨20-30元。厂方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尽量减少在工人社保费用上的开销。而且每年的8月份是永宝厂涨薪的时候，这样一来，一方面厂方将自己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转嫁一部分到工人身上，一方面又让那些还没下定决心缴纳社保的工人，因为眼前既得的好处而放弃缴纳社保的要求。



以往员工想要争取某些个人利益时，不论涨工资还是社保，往往都是通过个人途径解决。或者个人能力强，敢于和公司讨价还价；或者通过找个人关系，讨好管理求得解决。可这些做法只有极少一部分人的问题能解决。涉及大部分工人的问题只能通过集体的方式才有希望解决。

集体签名是一种比较温和的集体行动方式。工人用书面的形式把共同的要求传达给厂方，署名表示支持，并不影响生产。对于缴纳社保——这种厂方应该履行的基本法律义务而言，一个关键部门的员工集体签名已经有足够的压力让厂方作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厂方顺势答应员工的要求，也可以避免矛盾激化——既然缴纳社保逃不掉了，也完全有能力购买，何必让工人更加不满呢？



这一回合，工人轻松小胜。但员工再进一步要求公司补缴入职以来的社保时，就没那么容易了。

## 七人仲裁引发工人进一步行动

2010年底，厂里陆续解雇了一批员工。起版部是技术部门，平时很少有人变动，员工的工龄都在5年以上，这回却一口气炒掉

7 个合同到期的员工，而且支付给各人的离职补偿金并不合法，只按照最后一次合同签订日期支付。这样使得一个工作了 5 年签过两次合同的工人，可能只拿到 2 年的补偿金。被炒掉的工人认为厂方极有可能是因为社保的事情在报复。他们想拿回来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每个人的账都应该怎么算呢？工人们长年累月地在公司工作，和外界交流有限，虽然对于一些热点的劳动法律知识，比如经济补偿金、社保有所耳闻，也常会在亲友间流传某人打官司赢了，公司赔给多少钱一类的消息，但真的遇到事情了，具体的法律规定是什么，怎么理解那些术语成堆的法律条文，怎么走法律程序，大都并不清楚。

前文介绍过，珠宝厂之间的老乡、熟人网络比较发达，除就业信息以外，维权信息也会通过这个途径传播。起版部被炒的工友通过熟人介绍，来到某劳工机构进行法律咨询，了解清楚自己在辞职时能够享有的法定权利之后，提出了仲裁申请，要求厂方按照法律标准支付离职补偿金，并向社保部门投诉，要求厂方补缴员工入职以来的社保费用。

通过 7 人的官司，其他工人了解到：只要社保未缴满两年，之前未买的还可以向公司追缴。起版部有一半多的工人工龄在 10 年以上，如果能够补到之前的社保，他们很多人就可以达到或者接近 15 年的社保，即可在退休后享受养老金。这正是工龄比较长的工人们最希望实现的结果。

有了上次集体向厂方要求缴纳社保的成功经验，工人们想要进一步争取补缴社保的想法更强烈了。但要怎么补缴呢？工人们能够想到，补缴社保将更为复杂、难度更大。工人们需要了解更多的法律依据和现实情况，来增加自己的信心和底气。这样也才能知道自己的社保费用怎么计算，有更明确的争取目标。于是，2011 年 5 月份，几个积极工人通过同事介绍来到了某劳工机构，想要弄明白法律究竟是怎么规定的，补缴社保的可能性有多大，如何去做。



经过一番咨询，工人们了解到只要准备好工资的银行流水、劳动合同，能够证明他们在公司做了多少年，就有可能追回这些年的社保。此外还有年休假和高温津贴等等都可以争取。经劳工机构建议，工人们回去后将这些消息告诉其他同事，争取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除了法律学习，工人要树立维权信心还有一个重要方式——与其他维权工人交流。劳工机构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通过组织各厂工人在一起交流，由维权工人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其他工人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案例，能够有效增强工人的信心。活动时安排了律师一同参与，这也让工人感到自己通过劳工机构可以得到法律支持，而不是孤身奋战。

## 公司答复无果转向工会

通过各类学习和劳工机构人员的讲解，工人们认识到仲裁庭和法院都不受理社保方面的申诉，不能通过打官司解决。

最后工人们决定接受机构人员的建议，在厂内通过熟人朋友各类关系，宣传社保规定，尽量让更多的工人参与进来，通过集体行动去争取社保。2011年5月，来自三个部门的38名工人——他们也是后来维权工人队伍中的核心力量，很多代表、积极分子都出自



于这 38 人——第一次向厂方提出《工人的书面要求》（见附录一）。《要求》中提出补缴社保，补发高温津贴，休年休假，以及拿回一直被厂方扣压的劳动合同，等等，明确限定了公司应回复的日期，还有公司不得打击报复员工的声明。

面对工人这样一份涉及金额较大的“正式”书面要求，人事部主任不敢马上答复，而是以老板不在公司为由，要工人们等老板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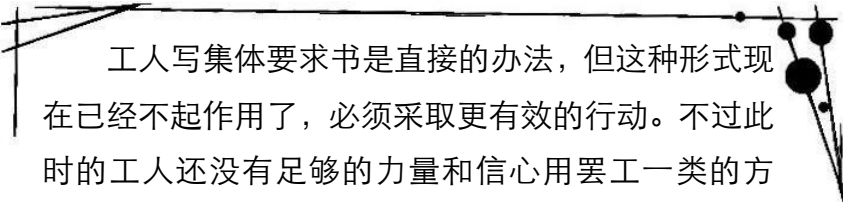
6 月 8 号，老板回来了，要求的答复期限也到了。三十多名工人们一起来到人事部询问。人事部主任面对着众多工人，几句话便推卸了公司的责任，又不在关键问题上给工人任何实质性的答复：

“没有为员工缴纳社保这件事情上，政府、公司和员工都有责任。因为之前公司一直都是按照政府给出的配额购买，如果员工对公司的行为有意见，按法律途径处理就行了。法院怎么判公司就怎么做。至于合同，公司是代为保管，如果员工想拿回就返还。高温补贴，年休假是公司的一种福利，可以给可以不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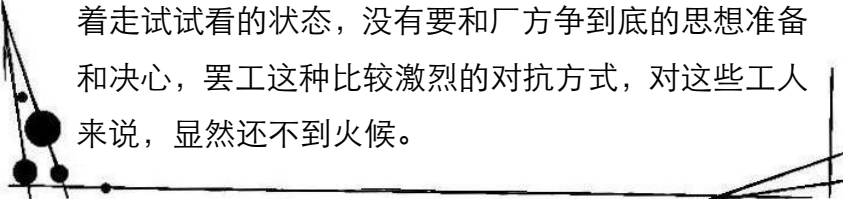
等了好几天消息的工人得到这样的结果，感到十分气闷。如果就此罢休，肯定什么也得不到了。工人们没有放弃，一些积极的工人做起了部门间的联络员，一方面参加机构的活动，学习法律知识，一方面在自己部门内宣传，给其他工人讲社保的好处，争取更多的人参与。后来这些联络员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各部门的代表。逐渐地，其他部门的工人陆续加入到追讨社保的队伍中来。6 月 10 日，另外 51 名工人再次向公司提出了《工人的书面要求》。6 月 14 日，又有 28 名工人加入进来。截止到 6 月中旬，形成了第一批追缴社保的工人队伍。

但无论几拨工人轮番去问，公司总是那几句话。看来，不给公司多施加些压力，社保的事情不可能有进展。

怎样再给公司施加压力呢？办法无非两种，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



工人写集体要求书是直接的办法，但这种形式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必须采取更有效的行动。不过此时的工人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心用罢工一类的方式与厂方正面对抗。一是追缴社保的工人往往都在厂内工作了比较长的时间，习惯了严苛的工厂规矩，再加上年龄偏大，家庭的负担让他们平时在厂内的表现倾向于温和保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工人追缴社保的队伍刚刚形成，彼此之间并不熟悉。除了几位一直表现比较积极的工人以外，其余很多人还是处在跟着走试试看的状态，没有要和厂方争到底的思想准备和决心，罢工这种比较激烈的对抗方式，对这些工人来说，显然还不到火候。



劳工机构建议工人去向政府相关部门投诉。工人们也倾向于求助政府给公司加压这样一个间接的办法。而在之前的交涉中，厂方也已经把一部分责任推给了政府。但补缴社保不同于一般的劳资纠纷，先找哪个部门投诉呢？当时劳工机构的负责人由于自身工作导向的原因，极力向工人介绍工会，并解释说找工会解决问题是维权必须走的程序。

工人们并不清楚找工会有什么用处。即便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也往往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在工人的印象中，工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并且不像劳动局、法院是能够办事、解决实际问题的地方。

但既然劳工机构的负责人都这样说了，他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工会求助。6月24号，工人们向省市区三级工会同时递交了《请求书》（见附录二）。并收到回复说将在几天后到公司调查。

7月4号，在等待了10天之后，区工会终于派人下来了解情况。但座谈会的结果让工人有些失望。工会说话的态度是偏向厂方的，只给工人一个官样回复：“我们会尽快了解调查，你们等消息吧。”次日，心急的工人致电区工会询问进展，得到的答复一如既往：“我们会跟进。”7号，工人直接打电话到省工会，要求工会应该在给予的时间期限内给出正面的答复。省工会的答复是：“我们工会很关注，很重视你们的请求，但凡事也有一个过程……”接着又把工人推给区工会和当地的镇工会。当日下午，区工会打电话来，语气有点重，说工人不要在事情没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就向省工会汇报，感觉像在投诉他们。但半个月过去了，得到的答复仍然还是调查，调查。工人们很怀疑找工会到底有什么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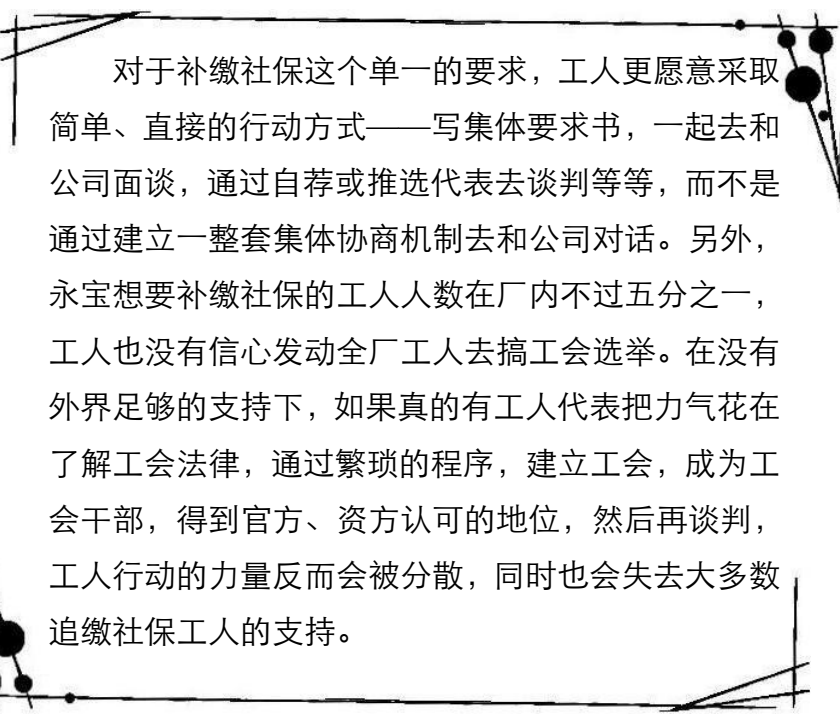
2011年7月13日，在镇工会办公处举行了第一次工人代表座谈会，比起上一次的座谈会，工人感到这次工会的人友善了很多。不过，除了厂方早先已经口头答应返还的劳动合同，其他工人的要求，工会并没有直接支持。工人最关注的社保，工会也只是建议走法律程序。工人们向工会求助的结果，和公司起初的口头答复简直没什么两样，只是又被拖延了20多天。有了这个教训，当后来永宝工人给其他厂的工人介绍自己追社保经历时，提起工会，工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不要找工会，没用！**

事情进展到这里，工人得到的结果是很多维权案例中都可以看到的。工人们有了一些行动，但还没有触及老板痛处，工厂往往只是将之前明显违法的地方改一改，其他法律规定模糊或者厂方不愿直接回复的要求，就以各种借口推脱，或是让工人走法律程序。

说起工会，还有一个插曲。永宝的工人代表在参加某次劳资话题研讨会的时候，有一些教授学者建议工人先成立工会再维权。当

时工人代表听到建议之后，觉得可以一试，因为专家们说成立了工会，工人代表们便可以以工会的名义去做事情，这样比现在更有合法的身份。可是回来和其他人一说，大家反应很冷淡。大部分工人不清楚成立工会、改组工会和自己追到社保究竟有什么实际关系、好处。和工会打交道的经验更让工人觉得工会这东西什么用处都没有。最关键的，第一批追社保的大部分工人肯站出来，替大家出头，与厂方对抗的，多少都抱有“大不了不在这个厂做下去”的想法，没有兴趣花费力气建立工会这种维护日常利益的组织。

当听到相关部门对工人改组工会要求的答复时，工人仅有的一点热情也被打消了：“现在你们厂有工会，你改组工会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要交工会会费的？现在都是老板替你们交会费，老板的人做工会主席那不是很正常的吗？”



对于补缴社保这个单一的要求，工人更愿意采取简单、直接的行动方式——写集体要求书，一起去和公司面谈，通过自荐或推选代表去谈判等等，而不是通过建立一整套集体协商机制去和公司对话。另外，永宝想要补缴社保的工人人数在厂内不过五分之一，工人也没有信心发动全厂工人去搞工会选举。在没有外界足够的支持下，如果真的有工人代表把力气花在了了解工会法律，通过繁琐的程序，建立工会，成为工会干部，得到官方、资方认可的地位，然后再谈判，工人行动的力量反而会被分散，同时也会失去大多数追缴社保工人的支持。

## 多次交锋积累经验，工人缓步向前

面对工会含糊的态度，工人只能再去尝试其他办法。7月19日，多位不同部门的工人一同到人事部再一次询问合同、年休假的问题。经过前几个回合，这次和厂方的交锋，工人比起以前更有经验，底气也更足，并用手机拍视频留证，以防厂方再耍赖。但在精通各种手段的人事主任面前，辩论中总体上仍然处于下风。对工人和厂方的对话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厂方对付工人时惯用的伎俩：一是颠倒黑白，二是尽量推卸责任，三是想方设法拖延，四是以厂方管理者的地位进行威压。简单说是一骗，二推，三拖，四压。

工人要工厂给回扣押的合同，人事主任马上狡辩“那些是你们放在我们这里，不是我们扣留的”，虽然答应给工人退还合同，但要工人等通知，且不回复具体时间。

工人提到年假问题，人事主任振振有词，先是说以前过年的时候已经白给工人多放了好几天假，工人还跑来要求什么呢？却闭口不提这些因工厂停工待料而给的“假期”从没给过工资的问题。然后又说，年假要怎么放由公司规定，不是工人想什么时候休就什么时候休，最后强调，要以生产为主。总之，一切要听公司的，工人没有发言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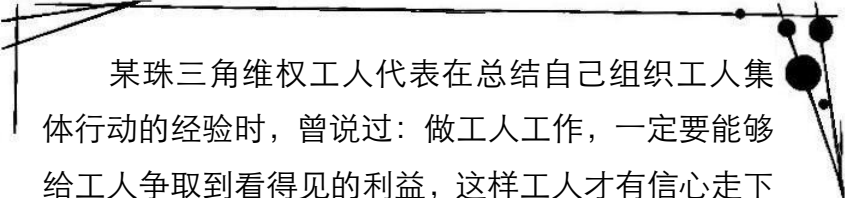


工人则认为在自己需要休假的时候就可以申请年假，并举例说香港师傅就是这样做的。人事主任一句香港人是由香港的法律来管，便把工人堵了回去。工人一时找不到话还击，问道：请假超过一个月还有没有社保。人事主任马上跟工人们说诉苦，说好多员工不守信用，之前某个工人，这边和公司请假

买着社保，那边给别人打工，到最后人说走就走了，公司亏了的钱到现在都还没找回来云云。工人问到之前的社保给不给补缴，人事主任没好气地说：一切依照法律办。

而年休假问题，也是在工人们和工厂周旋了一番之后才终于得到正式的通知。工人记录道：

镶石部某女员工辞工。她也是我们追讨社保的员工，她向人事部要求拿回她未休的带薪年假，遭到人事部主任的拒绝，并且告诉她：“你都辞工了还有什么年休假？公司已经在过年的时候给了你们年休假！”这位女工 1997 年入职永宝公司，已有十多年的工龄，她的年休假绝对未休完，应该给予经济补偿，但却遭到拒绝。她的权益也关系到我们其他 131 位员工的权益。当日下午两点，我们鼓起勇气，七十多位工龄超过十年的员工直接找老板协商，询问如何解决我们的年休假问题。经过四十分钟的商讨，终于达成协议，老板答应尽快处理我们年休假的问题。不到一个星期，公司就贴了通知，说明如何安排工龄在十年以上的员工的年休假。我们的成功有赖工友们的勇气和智慧，而更重要的则是团结，因为团结才能产生力量！



某珠三角维权工人代表在总结自己组织工人集体行动的经验时，曾说过：做工人工作，一定要能够给工人争取到看得见的利益，这样工人才有信心走下去。社保补缴涉及到的钱数较大，牵扯很多部门，工人队伍自身要聚集起力量去对抗厂方、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也需要一个过程。这些都决定了永宝工人补

缴社保之路不会很快走完。拿回合同、争取到年休假，这些利益虽小，但都让工人们看到通过大家的行动，可以争取到实实在在的东西，从而建立信心。工人们之间的了解、信任、联系也在这些集体行动的过程中逐渐加强。



7月26日，工人向市、区两级社保局递交《劳动监察投诉书》，期望通过向劳动部门投诉，给厂方施压，促使社保的事情尽快有着落。

8月15日，工人们在等待了半个多月以后，五位代表来到了区劳动监察大队上访。可是，遇到的工作人员态度并不友善，只是开了一份回执，冷冰冰地叫工人们回去等消息。工人遇到这种办事人员，也有些火：“我们已经等了三个多月了，到底还要等多久？起码也要给一个期限。”后来有个貌似级别比较高的工作人员过来解释说，这个事情已经交给了社保部门跟进，让工人们拿回执去社保局跟进情况。工人便去社保局询问。社保局承认已经收到《投诉书》。接待员向工人询问了相关情况，说如果工人讲的情况属实，并能提供相应的材料，应该可以取得之前的社保。有了这些话，工人心里觉得踏实多了。因为之前只是劳工机构说可以补缴，现在政府部门也给了比较明确的回复。工人们从社保局出来时，遇到一位好心的领导，他听到工人们的诉说后，教了工人一些方法：交了资料，有时间就要打电话询问情况，不然办事人员会一拖再拖；还说，打工者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政府会依法办事，但打工者必须对自己的权益有一定的认识，不然谁都帮不了；并劝工人们有时间就要多学习一些法律法规，会有帮助。

社保局的回复，领导的几句指点，让工人感到有了希望——毕



竟政府的领导都表态支持了啊！几位代表回去以后赶忙向其他工人讲述进展，并按照规定收集、上交了各人的材料。

2011年9月7日，区社保局的书面回复上清楚地写着永宝公司的回应。公司方表示，首先要确定员工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然后尽量在10月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为投诉员工进行补缴。区社保办稽核科将继续跟进该公司的补缴情况。工人代表把书面回复的内容通报给了其他工友，开始等待公司履行承诺。

从向厂方提出补缴社保的要求到现在已经4个月过去了，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答复，这不仅给正在争取社保的工人们增添了信心，也促使其他处在观望中的工人们开始躁动起来。这些工人也想补缴社保，但因为各种原因，之前没有站出来争取。或者是还不了解社保对自己到底有多少用处，或者是在公司工作年限不算很长，争取补缴的动力不足，或者是认为公司肯定不会给，闹了也是白闹，还有很多人是等着看前面的人能够得到什么结果的心理。此时，看到第一批工人拿到了社保局、公司这么一份书面回复，他们动心了，于是形成了第二批争取社保的工人。

## 追缴人数增多，劳资矛盾升级

事实上，只要社保还没补缴，这事就还没算完。工人们需要持续发力，否则即便是书面的回复，即便是有厂方、政府的公章，终究也只是白纸一张。

果然，等到9月底，仍然没什么消息。两位工人代表去到社保局询问补缴情况，却没有明确答复，只说一定会按照法定程序帮工人补缴，要工人回去耐心等待。又过了半个月，第一批追缴社保的一百多名工人一起到公司人事部追问社保问题的进展情况，要求给

一个正面答复。人事部主任说他做不了主，最后通知工人说，要等下周二（10月18日）香港的董事会开会后才有答复。于是工人们又要多等几天，多受几天的煎熬。

10月18日一上班，第一批追缴社保的一百多名工人仍然没有等来公司的正面答复。大家很不满，集体出了车间去到办公楼，要找老板问个清楚。另外还有两百多名此前一直在观望进展的工人也受到感染，跟着他们去。这样全厂有三百多人停止了工作，去办公楼要说法。人事主任反问工人要递交劳动关系的证据。工人们也不含糊，回答道：证据已经交到社保局了，公司自己也应该有一份，工人没义务提供给公司；公司要想核对信息，自己去社保局要。

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定的争取社保的工人，公司赶忙使出各种招数来应对。

10月19日上午，公司跟各车间代表们说，工人昨天的行为扰乱了生产秩序，下次不能这么多人一起去，而且要经过车间主管批准才能出去，否则车间里丢了东西要工人负责。下午，工人代表听说有两位执模部的积极工人被解雇，当时工人们很担心，没想到会突然发生这种情况。几个工人代表下去人事部理论。人事经理说他们是因为合同期满，公司与他们终止合同。要补偿的话，公司会补偿给他们。但事实上，其中一位要到明年二月份合同才到期。人事经理又改口说，公司有权提前跟工人终止合同，有什么争议工人可以去走法律途径。

后来，执模部几十位工友也下来讨说法：因为今天是这两个人被炒，明天可能是其他人，大家都很担心。公司见工人越聚越多，叫了部门师傅来镇压，让工人回车间工作，说没有



经过师傅同意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人事经理也赶工人代表走，结果双方言语冲突起来。工人对人事经理说：“你是工会主席，为什么不帮工人只帮公司？那做工会主席干嘛？”大家喊着要撤销他的工会主席的身份。人事经理听到这些就拍桌大喊，说：“你们的事去找工会，不要在这里吵，叫他们帮你们解决。”工人回敬道：“大声解决不了问题。”人事经理竟然又把责任推给工人，说：“公司都没有说要炒他们，现在你们下来大闹一场，现在不炒也没办法。”工人就说：“你说炒就炒？那可以炒掉我们全部人。”经理就不出声了。后来，又有管理出面调解，说炒掉他们是公司的事，他们合同期满，该赔偿的公司会计算。然后要求工人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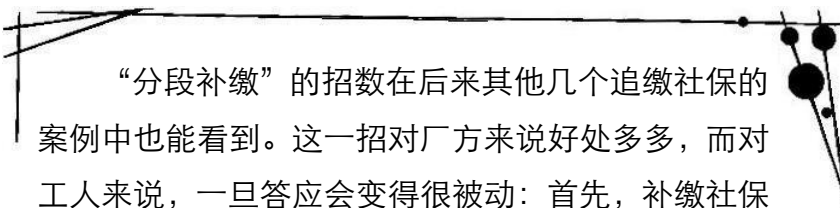
第二天，工人打电话给镇工会求助，希望能帮助他们。不知道这个电话有没有起作用，只知道打完电话一段时间，工厂的管理层内部开会。两位工人代表在会后找部门师傅问话：“我们是不是被炒了？”他说：“不是，只是对你们例行检查，公司不是解雇你们。”十一点半，135位工友得到通知，到饭堂开会。这是第一次全体工人与厂方正式坐下来谈社保补缴的问题。公司的人事主任、经理说：公司现在有一个方案，工人的社保先补两年的，由2008年至2010年8月分时段购买，即是今年在职一年买一年，连续买三年，其他的以后慢慢补。

135位工友当即反对这个方案。大家担心，公司补缴两年之后会找理由不再补缴其他年份的。工人坚决要求从入职之日起购买，如果补缴的起始时间跟工人入职时间不符合，工人不会接受。公司一方面推脱说资金紧张，不能拿出那么多钱，一方面又说社保局说2008年之前的不能补缴。可无论公司怎样说，工人代表和工人都很坚定。公司方又转移话题说，工人有什么意见、要求，可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提出，公司会归纳，再作出答复。工人回敬道，书面的要求早就提交上去了，不用再交了。

这次会开下来，工人感到公司显然没有诚意解决补缴社保的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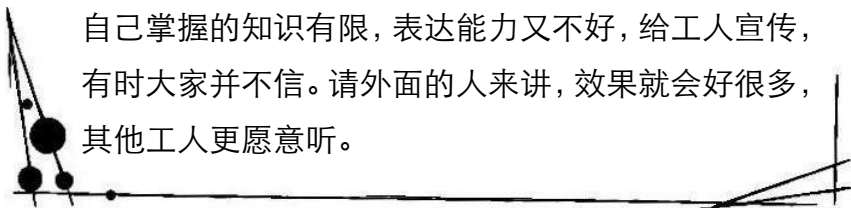
题。会议过程中又问到那两个代表被炒的问题，厂方非但不承认，还语气蛮横，气氛变得紧张。后来工会主席“大水牛”扬起拳头差点没和工人代表打起来，最后双方被拉开，不欢而散。

到了下午，倒模的一位工友被放假了。师傅口头上说放3天，但等到放假通知书下来的时候就变成了18天。上面写道：“因你所在岗位暂时没有货做，放假18天，待公司安排相应工作岗位通知返回公司上班。放假期间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支付停工待料工资。”那位工友所在的部门每晚加班至11点，现在说因为没货做实属无理。134位工友随即写了一份声明书到人事部，说：“我们的工友没有违反厂规，公司方不得无理对我们放假、调动职位、解雇等。不然我们会有下一步的行动。”公司人事主任却说：“你们写了声明书也无用，公司有权放假、解雇等，如果有争议可去劳动仲裁。”工人听了气愤又无奈，很担心下一个被放假的是不是自己。几位工人代表赶忙去劳工机构寻求法律援助，希望能够帮他们出主意解决问题。



“分段补缴”的招数在后来其他几个追缴社保的案例中也能看到。这一招对厂方来说好处多多，而对工人来说，一旦答应会变得很被动：首先，补缴社保的期限延长，公司减轻了自己的经济压力；然后，拖延的时间越长，公司可以耍的花样便越多，工人代表们越有机会被一个个对付，处理掉。这样，工人的队伍被越拖越散。究竟有多少人能坚持到最后让公司把社保补缴完，会成为一个未知数。永宝工人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让步，一直坚持原则，是后来实现全部补缴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几位主要的工人代表一直在坚持。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如何更快更好地补到社保。除了在厂内宣传，他们还想办法给不断跟进的工人“打气”——找有经验的人、懂法律的人来给其他工人们讲解社保知识。对此，工人代表们解释说，自己掌握的知识有限，表达能力又不好，给工人宣传，有时大家并不信。请外面的人来讲，效果就会好很多，其他工人更愿意听。



### 公司工人拉锯战，代表应运而生

追讨社保的队伍从最初的几十人扩展到一百多人，还有一些犹豫不决的人在观望，随时有可能加入进来。积极争取社保的几个核心工人有热情，但缺乏经验。工人们也不想和公司直接对抗。公司方则一直在拖延。很多方面都显示工人们不大可能在短期内追到社保。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自从工人追缴社保一开始，便出现一些积极工人。这些工人或者是因为自身对社保比较关注，或者是比较热心，会主动找人、找途径了解社保的政策，在与厂方集体交涉时也冲在前面，据理力争。另外，他们还主动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身边信任的人，将更多的工人带到机构去学习法律知识，进行了最初步的宣传、组织工作。

然而，随着事态进展，工人们要和公司、政府进行越来越多的交涉：和公司对话，向各部门投诉，递交各种材料。这些具体的事情不可能每次都出动全体工人去做，需要有代表代为执行。同时还面临着要更有效地在工人中宣传，扩大追缴队伍，联合更多工人起来行动的需要。之前靠一两个人打电话的联络方式就变得很低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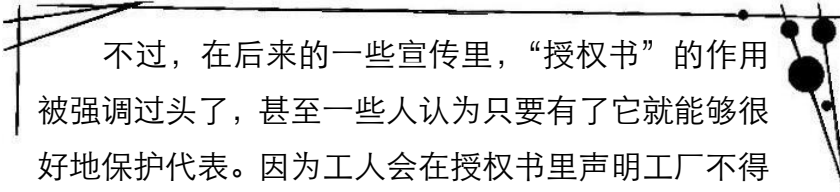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人多固然力量大，但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工龄有长有短，工资有高有低，有人除了社保还有其他要求。怎么把这么多人的想法统一在一起，如何统一集体行动，让大家把劲儿往一处使，是个大问题。

一般的情况下，让工人选出代表，对厂方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如果每次和工人谈都是一堆人叽叽喳喳地你一句我一句，谈判效率会很低。而且很多人都扔下手头的工作去谈的话，和罢工没什么区别，势必影响生产。所以，厂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力求避免混乱无序的工人集体抗议，改为几个人在会议室和公司座谈，剩下的工人继续老老实实工作，等待会谈结果。另外，每次都是一帮人来谈，厂方负责人面临的压力自然会比只是几个工人代表来谈要大得多。将工人人数缩减为几个代表，公司要耍各种手段，收买、施加压力等等，方便操作。何况，如果能将代表（无论是不是真正的带头人）各个击破，还能有效压制工人集体行动的势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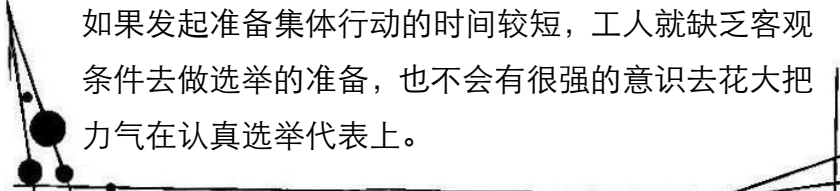
不管是工人行动的内在需要，还是厂方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都促使工人产生代表。对工人来说，如何产生可靠的代表，如何保证代表能够持续为大家做事，代表大家的利益，是应当严肃考虑的问题。这不同于维权初期，往往靠几个富有责任感的工人主动承担就够了。

在永宝工人中，代表并不是由工人在一开始就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维权行动中出现的积极分子们自愿担任的。这种代表产生的方式和工人内部的熟悉程度以及维权发起的过程有关。前文提到，工人追缴社保队伍是从起版部开始的，通过老乡、同事等各种关系将信息传递给其他部门。各部门关心社保并愿意行动的人成为“联络员”，向本部门的工人传递了解到的社保信息、法律常识，传送各类资料、材料。最后，这些联络员自然而然地成为部门代表。后来在劳工机构的提议下，工人们出具了一份书面的授权书，明确了代表们的地位，同时希望能够像机构说的那样，有了工人代表的身份

便可以有更多的法律保障。



不过，在后来的一些宣传里，“授权书”的作用被强调过头了，甚至一些人认为只要有了它就能够很好地保护代表。因为工人会在授权书里声明工厂不得有任何迫害工人代表的行为，否则会怎样怎样。事实上，厂方真要对工人代表耍弄任何手段的话，是不会受授权书约束的。在你来我往的对抗中，资方的动作都是在估量当前局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如果以较小的代价便可以搞掉几个工人代表，打击工人士气，那么，资方会很乐于随时以各种理由破坏授权书里的条款。所以，要有力地保护工人代表，关键在于有组织有决心的工人集体的支持，而不是授权书的魔力。甚而至于，授权书还可能让资方报复的矛头更集中于首席代表、代表身上。



真正由全体工人直接投票选举代表的情况，在实际的维权案例中还很少见。这主要是因为工人流动性较大，又分散在各自部门，很少有交流的机会，如果工作中没有接触，彼此往往并不熟悉。而维权过程中，如果发起准备集体行动的时间较短，工人就缺乏客观条件去做选举的准备，也不会有很强的意识去花大把力气在认真选举代表上。

## 工人代表正式亮相，威胁随之而至

2011年10月28日，工人们听从了劳工机构的建议，拟出《代表告知书》、《意见书》，另外带上10月20日协商的协议书前往人事部。《告知书》列出了几位工人代表的名字，要求以后公司要找人谈话一定要找工人代表。

《意见书》有五项内容：一，社保从入职之日补缴；二，不得对135位工人无理地放假、解雇、调动职位等；三、公司不得对工人代表采取歧视性行为，不得违法解除或变更其劳动合同；四，公司要在2011年11月7日之前给工人一个正面的答复。

2011年11月1日，公司还没有任何回复，早上镇政府却打电话来约一位代表下午过去“了解情况”。因为之前已经和政府的人谈过好几次，工人们开始并不敢拒绝，但因为和政府人员的谈话总是没有结果，工人们不想再浪费时间，而且这次只叫一个人过去谈话，有可能会产生误解，让工人对代表起疑心。那个代表也觉得压力很大，有些害怕。工人坚持说不能一个代表去，要两三个人才行。镇政府的人就说：“我只负责传话，其他情况不知道。”到了下午，人事部打电话来，又叫起版部的两位代表自己去镇政府谈话。两代表就说没车不去。后来镇政府的朱主任打电话来，要求一位代表到镇政府来。工人干脆提出条件说：不能一人去，要去就派车送三个代表一起去。最终在工人的坚持下，公司派车送三人到镇政府。

到了镇政府，代表们听到的始终是那几句话：政府是员工与公司之间沟通的一个平台，有什么困难尽管向他们申请，会帮忙转达。还说如果工人一定要公司从入职起一次性





补缴社保，在现今经济的调控下企业会有困难，到头来只会逼到公司倒闭卖厂。一个主任还批评代表，现在是在和公司进行协商，工人必须要有所让步，一步都不让，这不叫协商。又问到代表们为什么会知道写劳动法里的条文来追社保，是有高人指点，还是有不法律师教唆，警告工人不要被人利用。代表们也没中圈套，说这些法律法规只要上网一查就清楚，而且现在某区那么多工人追社保，向外面的工人借鉴就行了，不用教都知道。代表们还反问主任：“我们追社保合不合法？”他只好说：“合法。”工人们一直相信，只要做的事合法，不闹事，政府就不会为难。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地方派出所的警察来了。他们留下一位代表，好像审犯人一样，手不停地指着代表问话，态度非常不友善。原来，这是因为工人曾要求公司在11月7日给一个正面的答复，而劳工机构恰巧在这个时间组织了一个大型活动，被公司的人知道了。公司担心工人会在这段时间搞事，就把信息报给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恐吓代表：“如果在这段时间有什么事发生，就找你们三个代表，你们是带头的。”

三位代表临走时，那位主任又告诫工人，有困难就找他，不要轻信外面的团体。然后把社保问题引伸到了政治层面，说道：现今全球动荡，像美国华尔街罢工，超过一百多城市加入游行，影响深远；现在一些有企图的人在中国找目标，煽动群众，策划行动；工人要相信政府，政府是会帮工人办事、解决问题的。代表们回答说：“我们的事没有你讲得那么严重。我们只想追缴社保，其他犯法的事我们不会做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威力。”

经过这次谈话，工人代表感到，在劳动市场，除了看不见的手，还有看得见的官员的拳头。社保的事搞到现在，公司变成了配角，政府倒成了主角。公司只找工人正式协商过一次，政府却已经找工人谈了无数次了！

不管工人怎样催问，公司还是老样子，尽量地施展拖字诀。拖

时间有利于公司考虑对策，去打通各种关系。工人则有点不耐烦了，所以两天后，也就是 2011 年 11 月 3 日下午，两位工人代表和第二批的代表又去社保局了解情况，同时把第二批工人的资料交过去立案。工人从社保局主任那里得到了明确的回复：现在社保正在和地税核算工人的金额，如果工人协商不成功，两日内司法就会介入，强制执行。听到社保局如此肯定的答复，工人们非常振奋！

2011 年 11 月 7 日，是工人的《意见书》里要求公司正面回复的最后期限。有人认为，已经从社保局得到明确回复，就不用再跟公司谈了。但商讨之后，几个工人代表还是决定去人事部问问。开始人事主任说老板没回来，下午 3 点再跟工人谈。后来到了下午两点多钟，人事部又打电话来要工人代表到镇政府谈。工人代表都不同意再去政府谈，认为去那边谈来谈去没实质的结果，只看政府和公司演双簧戏。工人们咨询劳工机构的意见，那边也是建议：“没什么好谈了，督促社保局尽快处理。”

但政府那边一定要代表去，三位代表无奈之下还是去了。到了政府那边，除了公司的人事主任、主管，还有法律顾问也在，派出所、劳动局、工会、司法局的人也到场了。十多号人坐在一起面对三个工人代表，场面真震撼。

一位官员开场说：“这次谈是为了给公司和员工一个沟通的平台，是政府第一次介入该案件。”代表们很奇怪，反问道：“谈了那么多次怎么还说是第一次？”那人又解释说政府正式介入谈判才第一次，之前的都不是，工人有什么要求、意见，现在可以提出。公司也可表态，政府给意见，提供法律知识。

公司和工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始终无法协商一致。公司在补缴社保方面抛出一个新方案：按不同人的年龄、工作的年限、户籍来补缴。例如，来自湖南的就按湖南当地的社保基数补缴，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分批补缴，年纪大了的那批则按其它不同的方案补缴。总之将工人各种情况拆散开来。

工人代表不同意这个方案，认为没有公平对待。工人经济困难，公司不用操心，需要一次性补缴的钱，借钱都会交上去。工人只按社保局的方案，社保局认为工人要买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而且老板当初也拍板答应说，按照社保法规来，该买多少就买多少，他一分钱都不会少给。工人说道：“是老板的话给了我们信心走法律途径的。”

公司的人事主任赶忙辩解说：“老板是香港人，不了解中国大陆的法律，乱说的。”

工人亮明底线，最迟要从1999年当地市政府要求企业缴纳社保那时起补缴，一天都不会让步。政府的人这时站出来说工人的态度太强硬了，不肯退让是不行的。公司方则不停地声称自己经济困难，到时只会两败俱伤，一个失业一个倒闭。

代表们并不理会这些听了几百遍的说辞，说只想拿回自己应得的。公司最后说会在这周内列出几个方案来，给工人看看是否接受，工人有意见再列出。其实工人早已说得很明白了，什么都不用多谈，公司再多的方案也是多余。公司只是不断想着拖时间，想办法如何省钱。当天还有一位工人代表去了社保局，咨询补缴的情况。社保局那边说，这个案件进入了监察科，地税局已算清了数据，等监察科核实资料，就可强制执行。

不过，三个工人代表毕竟说不过十多张嘴巴，虽然没有答应公司的方案，但还是被人家给顶住了，没占上风。11月8日晚上，十三位工人代表冒着倾盆大雨，去劳工机构寻求帮助。机构一位社会经验丰富的老义工接待了工人，帮助工人分析了情况，说工人还是太嫩了，谈判的底气不够，一句话就被人家吃住。跟厂方协商一定要一句话就说出重点，提出的问题要尖锐合理，让对方兜不住；对方说的话不一定要回答，思维不要跟着对方走，否则会说多错多，被抓住弱点；谈话内容不用太长，说出核心就行。工人自己也总结了经验：谈判一定要三个以上的代表。谈判之前也要尽量通知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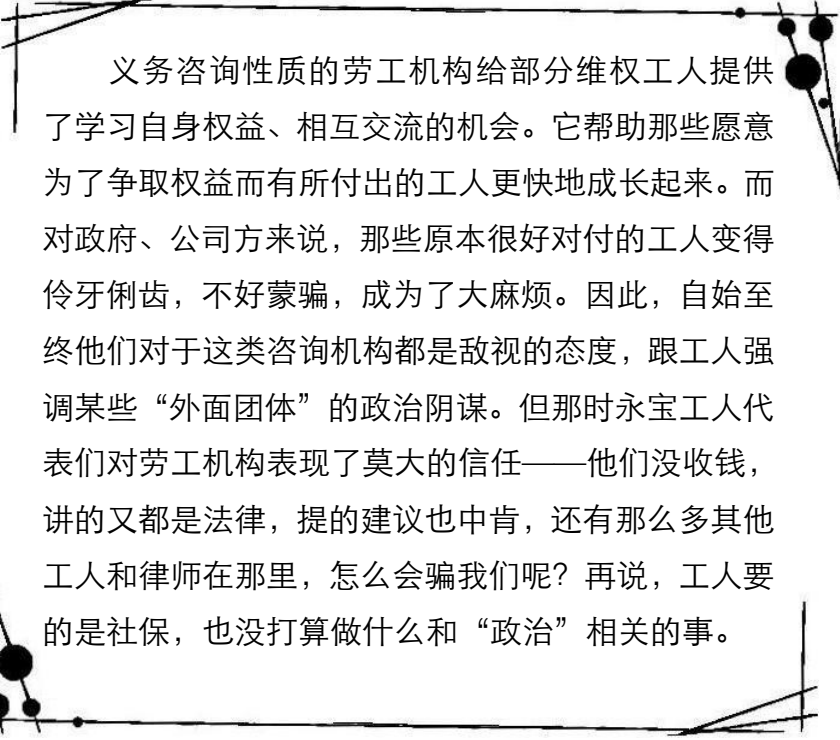
工友，不然都不知道代表为大家做了这么多事。

11月9日，第二批追缴社保的手链部员工还没有拿回劳动合同。几个代表和一些工友建议他们一定要拿到，因为这是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的重要证据。但是手链部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原本是公司的一个加工部门，后来是包给了老板的一个亲戚做，等于是同厂不同老板。他们几个员工去跟他们的老板拿合同的时候，后者说合同就没有，如果要就立刻给工人“放假”。外包老板语气很重，态度很不好。员工跟他说：“如果放假就要‘放假通知书’，没通知书就不会走。”那老板就指着他们说：“放假通知书没有，现在你们立刻走人。”员工也没有被他吓住，理直气壮地跟他说：“我们合同也要拿，放假通知书也要，没有我们就不会走。”最终那老板也没办法，叫他们到人事部去拿放假通知书。这些工人叫上了几个第一批的代表，帮忙一起去找人事主任：“之前你在政府那边说如果我们要合同，你就一定给，为什么他们几个拿不到。”说得人事主任也心虚了，最后答应给工人合同。

11月11日，工人听到消息说，厂方准备每个部门放一批人的假，但谁也没有收到正式通知，谁会被放假也不知道，每个人心里都在猜疑会不会是自己。有代表去社保局那里了解进展，得到回复说：“社保的基数核算出来了，但只是作为一个参考，要跟地税局那边核对。现在事情已经转到了监察科。监察科还要我们再与厂方沟通、协商”。代表急了，说：“我们现在跟厂方没的协商了，你们赶快进入程序办事。我们再跟厂方、政府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只会拖我们的时间。你们不是说我们的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很快要厂方强制执行。为什么到现在又走前面的路再去协商？我



们已经跟厂方谈了几个月了，根本达不到我们基本的要求！”社保局的人总是说急不来，要按程序办事。但是立案已将近三个月了，至今没一个正面的结果，还说要等第二批的人一起办理，那更不知要等到何时了。公司要放假，这边社保的结果又变得不明确，工人都很沮丧，不知该怎么办好。



义务咨询性质的劳工机构给部分维权工人提供了学习自身权益、相互交流的机会。它帮助那些愿意为了争取权益而有所付出的工人更快地成长起来。而对政府、公司方来说，那些原本很好对付的工人变得伶牙俐齿，不好蒙骗，成为了大麻烦。因此，自始至终他们对于这类咨询机构都是敌视的态度，跟工人强调某些“外面团体”的政治阴谋。但那时永宝工人代表们对劳工机构表现了莫大的信任——他们没收钱，讲的又都是法律，提的建议也中肯，还有那么多其他工人和律师在那里，怎么会骗我们呢？再说，工人要的是社保，也没打算做什么和“政治”相关的事。

### 公司出毒招，工人成批被放假

11月14号下午四点多，配石部的员工有十几人接到了“放假通知书”。到下班时，一共有89人接到了通知书。工人们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生产旺季是过去了，但真的没订单给工人做了吗？当然不是。放假的 89 人全都是要求公司补缴社保的工人，所有的工人代表全部被放假，有第一批也有第二批。他们作为工厂的老员工，都是各部门的熟手。就在前几天，他们还在公司加班，有些人甚至通宵赶货，今天却突然被放假了。而且那些比他们做得慢、做得差的新手都没有放假，还在加班呢！

工厂拖延这么久，早已为放假做足了准备：进入生产淡季仍然招工，同时大量转移订单，外发给别的厂做。这样公司便能在既不影响自己生产的情况下，又狠狠打击这些工人——首先，工人不能再在公司做任何行动，对生产无法造成威胁。一旦放假，工人就会分散在厂外各地，各忙各的，不会再像在公司那样有什么突发的事情，发个 QQ 信息便可以召集不少人。其次，放假时间长，工人收入降低，工人有可能降低要求，以尽早解决社保问题。

被放假的工人们，连同担心自己将会被放假的工人，下班后聚集在公司一楼大厅，向老板讨说法。老板说：“现在没货做，肯定要放假，工资按法律法规补偿给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就去找人事部问清楚，不要在这里闹事。”大家又找人事主任，回复说：“现在公司没活做，放你们假，待遇会按法律法规来补偿。有什么不明白的去问律师。”

有些工友很气愤：“昨天还加班，今天手上还有很多货做，这一下子就说没货，要我们放假，根本没有道理。我们不认识什么法律法规，要以书面形式写出来给我们。”

问到放假待遇问题，人事经理便说：“你们背后肯定有人支持，不然不会走到这一步。你们回去找你们的律师问，不用在这里闹。”

工人代表问她放假工资如何支付，人事主任说按法律法规，按当地最低工资的 80% 支付。工人代表说不合理，人事主任说，有争议你们就去劳动仲裁，如果判该支付就给你们。

大家因为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答案都不肯走，留在公司一楼的大

厅里。部门师傅出面轰赶工人，工人反击：“你们没资格这样做，你们也是打工的，迟早有一天轮到你。”公司见工人不肯走，便报警。但工人们认为，自己不是闹事，只是讨说法，也没破坏公司里面的东西，叫警察也不怕。

后来劳动局的人也来了，跟工人讲：“公司按最低工资的 80% 发放工资，符合工资支付条例。”工人不答应，认为公司在没事先通知工人的情况下，以没货做为由，一下子放了 89 个人的假。可现在公司上面还有人在加班，这根本不合理。

学习过相关法律的工人们跟劳动局的人讲起了“三方四家”：即如果用人单位发生劳动者集体停工、怠工事件，当事人未提出调停申请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所在的区、县、市三方协商进行调停。工人问劳动局主任：“公司如果无理放假，且带有针对性，这合不合法？要不要申报？”劳动局主任不回答，甚至说不知道什么是“三方四家”。工人们嘲笑劳动局的主任没有与时俱进。劳动局的主任发火了：“既然公司也说了按相关法律不给你们，你们那么多人在这里闹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大家都没吃饭，回去吧。”工人说要公司提供书面的解释才会走。后来劳动局主任干脆带着政府部门的人走了，公司的人事主管也走了，只剩下一百多个工人在大厅里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工人们不服气，但也找不到其他办法，因为咨询了很多人，包括律师，都说厂方有权放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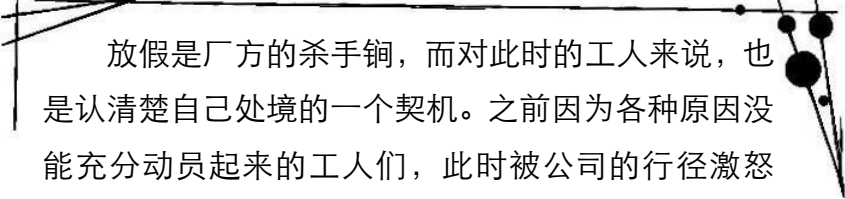
工人从六点多钟开始打电话找记者，但没有联系到一家媒体愿意来。工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别人报料那么容易，他们这么大的事情就无人理会呢？有工人说，对方一听说“永宝”的名字，马上找个理由挂掉电话。之前公司方一遇到工人在厂内集体抗议，便报警求助，




“请问您打算失业多久？”

这次也不例外。公司报警，警察很快出动，劳动局的人也跑得飞快。可是工人遇到问题时却是求助无门，谁都不应。

大家心里很急，也很气愤，但直到晚上九点，一百多工人仍然找不到任何有效的办法。大家只好相约明天再回公司讨说法。就这样，工人们怀着愤怒和不甘的心情回去了。



放假是厂方的杀手锏，而对此时的工人来说，也是认清自己处境的一个契机。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充分动员起来的工人们，此时被公司的行径激怒了，被逼行动起来，挽救自己的工作。永宝维权工人的整体状态是温顺而又坚定的，正如一个代表所说：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老板逼的。”代表们说：“以前有些人，叫他们去机构开会、听课、学习法律，他们从来不理。现在一放假，都慌了，自己跑来找我们问该怎么办。”

### 被逼走出厂门，工人逐级上访

11月15日，早上八点半，被放假的员工全部都到公司的饭堂集合。大家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地想办法。各代表先给区、市、省工会打电话求助，向新闻媒体求助。但全部的答复都是先了解情况，情况属实再安排。工人感到这些人不过是在敷衍，根本不想帮忙。大家又打电话到镇劳动局那里，对方一会儿说等一下会安排人过去跟工人谈，一会儿又要工人派三个人到局里谈，多几个工人去都不行。最后大家干脆对劳动局的领导说：要谈就请领导们到公司来谈。



局里的主任说很难办到，又搬出信访条例来敷衍工人。求助劳动局不成，工人又打市长热线求助。接听热线的人听完工人的讲述就说：“既然社保局接手了你们的案子，那就等他们来处理吧。”一句话就把工人顶回去了。

看来这样打电话求助是完全没作用了。大家一商量，干脆下午全部都去区政府信访，看看能有什么结果。已经有多次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历的工人们，讨论了到区政府之后如何提问题，如何不会自乱阵脚，并收集整理了几个诉求。

下午两点多钟，有 75 名工友在某区广场集中，浩浩荡荡地向区政府信访办走去，大家守规矩地走人行道、斑马线，不闹事、不喊口号，因为大家之前向机构询问过注意事项，不想有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这样就不会有人说他们聚众闹事，抓人了。

到了信访办门口，工人们一拥而进，把信访办坐满了。事先商量好并向信访办递交的几个诉求是：一、公司有针对性地放工人的假，且待遇不明；二、员工休产假的待遇（之前有女职工休完三个月产假之后被逼重新填了入职表，工龄清零）；三、要求让放假的员工复工。

工作人员要求安排五位代表跟他们谈。工人选了五个人（其中一个不是授权书里的工人代表）进去谈。区政府的人按照工人列出的三个要求逐一提问，工人进行解释。谈了没多久，镇政府的人来了，还和工人打招呼。工人心想，区里真是官大一级，镇上的那么快就被叫来了。

区政府的办事员跟工人承诺说：“现在区里给你们搭个平台，明天九点你们几个人到镇里，跟政府、公司的人一起，三方协商。”工人立刻回答：“不用去镇那里谈了，社保的问题谈了那么多次都没有实质的效果。我们觉得镇政府跟厂方是一个鼻孔出气，偏袒厂方。既然我们来到这里请求你们的帮助，你们就要马上处理，不要推来推去。”办事员说：“你们来到这里就应该相信政府，现在区给你们

搭了个平台去沟通，为何不去？如果谈成了不就好办事了？如果按信访条例来给你们办，程序比较麻烦，也没那么快有结果，只会拖得更慢。”经过多番的交涉，工人只好答应决定还是回到镇政府那边谈。

在外面等候结果多时的工人们，听到这个结果，期望着明天在区政府的压力下，政府和老板也许就不会那么嚣张了。看时间还早，工人们又去社保局走了一趟。监察科的主任没有在。约了明早八点再去谈社保方面的问题。

第二天，五个代表在镇政府那边谈放假的问题，另一批代表去找社保局监察科。两边的协商同时进行。

在镇政府的会议开始前，信访中心的主任说：“如果你们相信政府，有诚意谈的话，那就不要录音。会议要在相互信任的情况下进行。”工人照做了。政府按照工人向区信访办提的三个问题来提问，先就工人的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有针对性放假，要求厂方答复。厂方代表（厂长）说：“不是，以往公司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放一批人的假，今年也是这样，会轮流放的。”工人反问：“为什么只放我们追社保的人？如果到了通知书上的日期回去上班，还会不会继续被放假？”厂方代表说：“按厂方订单而定，如果公司接不到订单，货量减少，你们这批人有可能继续放假。”工人说：“那不就是无限期的放假，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复工了？如果我们工作的岗位是同一工种，为什么旁边的工友还在加班，却说我们没货做？我们放了一次假，也应该轮到其他的工友，为什么放来放去总是我们这一批的人？这样不是有针对性、打击报复我们这一批工友又是什么？”



政府的人听完辩论也觉得厂方是有针对性的。厂方的人说不是针对，放假是轮流的。中心主任就抓住厂方说的“轮流”说出了一个具体的轮流放假方案。他说：“如果这一组有十个人，这一次放了三个，下一批放假就不能放这三个，而是在另外七个里面选。”厂方代表说：“这个我们说了不算，要请示董事才能下定论。”政府的人就给出了两天的时间要厂方给答复，重点说明如何轮流放假。事实上，如果是因为没有货做要轮流放假，部门师傅就可以安排，哪里用请示公司“董事”？这种答复不过是公司的缓兵之计。

第二个是产假的问题。工人要求厂方回答：为什么休完三个月的产假回来，却要求员工离职，然后马上重新入职，导致员工的工龄归零？而且产假的工资也没按照劳动法来支付。厂方就说：“这方面的问题不清楚。你们讲的不知道是否真实。回去查清楚之后才可以有答复。”政府要求厂方在下个星期四有书面的答复。劳动局的人也向工人介绍了产假的劳动法规。

第三个问题是工人要求复工。厂方说：“现在公司都没活做了，你们回去干什么？”工人说：“公司有货外发，为什么就没货给员工做？公司每天都在加班。”厂方说：“你们的岗位没货可做，如果有货做还放你们假干嘛？你们现在放假是按法律法规支付给你们的。”政府人员也没有支持工人的要求，看起来工人复工无望了。

最后谈到社保方面，政府的人要求厂方作出一个回应。厂方代表很不高兴地说了一句：“厂方提议了由 2004 年 9 月开始补缴。”工人立刻拒绝：“不行，做了十年的员工还差了几年，要补就要从 1999 年 1 月开始买。”厂方代表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多说，假装听电话便离开了会议室。信访办的主任这时候出来帮着厂方说话，跟工人讲：“现在已经解决了一大部分人的社保问题，只是在零四年之前入职员工的社保问题还有争议。”这样看来政府也要把时间定在 2004 年。

再看社保局这边的会议，监察科一直踢皮球。本来这边是去谈社保问题，他们却推给政府那边谈，说了一大堆废话。问到放假的

问题，又说放假第一个月有基本工资，第二个月只有最低工资的80%。

虽然没有得到理想结果，工人代表还是觉得有所收获，不算白谈。至少，有了区一级的压力，不再像以前镇政府的会议那样总是有什么结果都没有。至少产假一类的问题，厂方在规定的时间内要给出书面答复。只是最重要的社保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1月18日，厂方贴出了通知：“由于今年受各方面环境因素的影响，现在各部门货源减少，公司经营困难，公司为了大家能够享有最低保障，因此从2011年11月17日开始计划一批员工放假，届时公司将组织各部门师傅及组长将会讨论如何安排员工放假问题，放假1至6个月不等。放假期间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支付停工待料工资。停工期间工资发放方法：第一个月周期工资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以后的生活补助金在每月的20号至25号以现金方式支付。”放假的员工看到这份通知后都人心惶惶，要放那么长时间的假，补助金还要以现金的方式来发放。不知道公司在打什么算盘。

## 放假问题悬而未果，工人向各方求助

11月19日，应机构邀请，某律师所派人过来跟工人讲解放假的问题。律师解释说公司的行为不是“放假”，是“停工待料”。不过法律关于停工的规定并不明确，停工待料不犯法，如果走法律诉讼程序会很乐观，只能通过和公司谈判。工人的诉求从法律层面上讲比较勉强，工人可以尝试驳斥公司放假的理由，证明公司不是真的没订单可做。但同时，公司也可能以原材料价格上涨，经营有困难等理由逃避问题。

于是怎样给老板压力，成了目前工人面临的重大问题。专业人士讲解道，放假不是老板一个人便可以说了算。放这么多人的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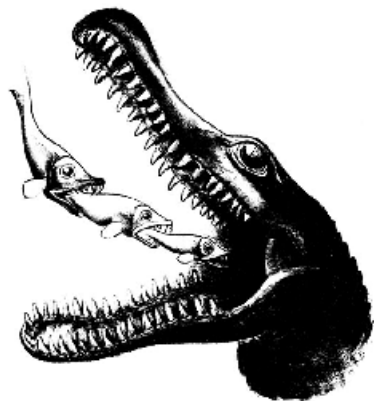
需要得到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认可。公司是有权停工待料，但不妥当。工人们可以写意见书，将不同意公司放假安排的意见反映给各级政府部门，向政府相关部门指出，公司这样将工人推出工厂外，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借此通过政府部门给公司施加压力。

11月21日，经过集体讨论，工人们写了“关于永宝公司2011年11月17日《放假通知》的异议书”（附件三），向各省、市、区、镇工会和劳动部门相关领导反映。工人的要求很简单：社保和复工。同时写道，希望工人提出的诉求得到各部门的支持。如果工人的合理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会采取自主的方式解决。

除了找政府，工人们希望能通过媒体扩大事件影响，得到舆论支持，引起政府更大的重视。通过多方协助，终于联系到了《南方工报》的记者。这是永宝工人第一次联系到了媒体记者进行正式报道。不过，当几天后工人读到报纸的时候，报道的内容却让他们大失所望。本来是工人们被公司放假停工，结果报道却写成了工人们主动停工要求补社保。工人们搞不清记者这样写的用意，但因为报道本身也没有引起什么影响，没多久便被大家遗忘到角落里了。

11月24日，工人代表去镇政府拿了公司交给政府部门关于产假和放假问题的回复。回复中说：“产假会按照相关的法律补回，过两天就可以回公司拿产假的工资。有关员工放假的问题，公司不需要向员工交代理由，不需要解释。”政府的人说公司有权利这样做，他们也没办法。工人们又一次被公司蛮横的态度刺激了。

11月28日，今天155人又来到区信访办申诉，有些人在路上已被镇政府的公安跟踪。还没到区信访办，那里已经有人守候着。但他们没有对工人怎样，工人也假装他们不存在。工人拿着《诉求书》向信访办的主任申诉：第一，强烈要求政府部门立即给出工人有关追讨社会保险事项具体的书面处理意见；第二，要求立即查处永宝公司以停工放假的方式打压184名依法主张正当权益的工人的严重违法用工行为；第三，184名工人强烈要求立即复工。



主任听了工人的要求，但又是那句：“当地的问题当地解决。这里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工人说：“如果当地真的能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就不用这么多人再次上访了。”

随即社保局的主任、监察大队的队长带着厂方《关于员工要求补交社保事宜的处理方案》来了。工人们一看处理方案，里面很多说法都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一，在职期间应参保但未参保的时段如何确定；二，员工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如何确定；三，公告后的7天内各员工若不向公司缴纳的就视为自动放弃追讨的权利。

社保局的主任就工人提出的问题一个一个来解释。他说，“在职期间”是进厂工作一个月到发工资的时候就是在职时间，发工资的第一个月就是确定劳动关系的时间。但说到“7天内补缴社保”时，工人最大的疑问是，如果社保局公布了这个解决方案，厂方和工人在前两个补缴时间段和入职时间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7天内解决不了怎么办？

社保局让工人去问镇政府。工人们说回镇里一点用处都没有。这之后社保局便不理睬了，任由工人在外面干等。

工人代表出去跟其他工友说信访办又要他们回镇政府谈。工人们都说：“不行。要在这里解决问题，不解决就不走。”一百多人就这样漫长地等待着奇迹的出现，但等到他们下班的时间还是这样的结果。工人们开始有分歧了，有些说等了一天都没有结果，不如回镇那边谈一谈看情况。另外一些工人又说回到镇上去谈的结果都不用问，反正最后就没结果。区信访办的人催促工人：“这里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现在给了你们去沟通的平台，是你们放弃了争取的权

利。反正如果你们想谈，我们可以跟镇那边打招呼，他们就算加班也会跟你们解决问题的。”工人们等了一天都没结果，也不耐烦了，就想不如就去镇那边谈一谈，看他们要什么花样。

## 社保问题突然“解决”，工人代表提起警惕

到了晚上7点钟，工人们再次来到镇政府的信访维稳中心，马上感到被骗了：说好有区社保局、监察队的人过来四方谈判，但最后却说不能来了。工人们强烈地抗议：不要谈了！没有区那边的人来，谈的意义不大。后来，在工人们的强烈要求下，社保局和监察队的人终于来了。厂方是人事主任、律师顾问还有新来的人事经理。新人事经理看起来很嚣张，一副了不起的样子。镇那边有副镇长，中心的主任。工人们还是提出以上的问题，对方的说法还是像今天在区那边说的一样，最早从1998年7月帮我们补缴，也希望工人在收到公告的7天内向公司补缴，人事经理还要工人代表在那份《方案》上签名，表示工人收到了通知。工人不同意，不愿意在上面签名——法律规定没有要求工人必须在这种通知上签名。工人对他们定的这个7天的限期充满了疑问。工人说：“你们说的每一样都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做，为什么这7天时间不按法律法规来做，这7天当中会不会有蹊跷？”

对方嘲笑工人，之前那么迫不及待地想拿回社保，现在可以拿到却又说7天太快，是自打嘴巴。工人也理直气壮地讲：“如果厂方给出的补缴方案是我们满意的结果，7天补缴肯定没有问题。如果不是的话，这7天就变成大问题。”厂方又说：“你们结果都没拿到手，怎样知道结果合不合意呢？”最后，厂方要求工人30号下午两点半到厂方拿结果，镇政府也会去现场，如果对结果有异议就当场登记，然后再作处理。没异议的就赶快签名交钱。工人代表当时也

相信了镇政府，但很怀疑公司会顺顺利利地给出一个真的能让工人满意的方案。谈到晚上十点多，工人代表出去把消息告诉其他员工，大家都很兴奋、开心。一个工人代表回忆说，大家听了以后全部都拍着手走了，以为这次谈判成功了，可以拿到社保了。不过，与公司、政府官员打了多次交道的代表们还是保持了警惕性，认为厂方没那么容易妥协。

11月29日，几个工人代表开了个小会议，针对昨天厂方和政府的表态。大家都认为厂方肯定是从2004年补起，不可能从1999年。这样有21个工友符合他们的条件，将其余的人推到仲裁。这样一来，社保局解决了一部分人的问题，也就可以交差了。如果走到仲裁这一步，就会将案件分成一个一个的来处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大家决定要想办法说服那21个人，不要有个人的想法和行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解决的时候也应该大家一起解决，不要给厂方分化瓦解工人的机会。

11月30日，下午两点半，大家准时到达了公司。到了公司门口，却不给一百三十多工人进门，一直等到四点多钟，人事部、镇政府的人才到位。人事部的新主任拿着大喇叭跟工人讲话，要求工人4人一组，每组按顺序到办公楼，先在签到表上签字，然后再给个人发放关于补缴社会保险的通知书。虽然看起来厂方安排得头头是道，但是工人代表对这个程序充满疑问，担心签完字就表示认可方案，再提出异议就晚了。于是代表在人群中大声要求人事主任先发补缴通知书，看了之后再决定是否签字。其他工人也都表态支持。

公司见压不住工人的要求，只好把早已准备好的通知书拿了出来。工人们对照各自通知书的内容，感到全都被公司耍了。工人收到的通知书里最早的从2004年补起，而有些做了十多年的却仅从2008年、2009年补起，不知道公司是依据什么写的通知书，真是好大的一个骗局。厂方实在够阴险，这下工人算是看清楚他们丑恶的嘴脸了。工人们在愤怒中拒收了那张通知书。镇政府的人还在旁边



劝说：“你们有异议的就来这边登记，没异议的赶快签名拿通知走。”工人代表提醒大家，如果去登记了，就等于把自己推到“仲裁”诉讼这个深深的陷阱里了。工人们醒悟过来，这是公司和政府联合起来设计的圈套，就等着工人往里面钻，幸亏几个工人代表清醒，不然的话，就上了那些人的当了。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做法激起了工人的极大不满。大家带着愤怒和失望离开。

### 聚集市府请愿，工人终得承诺

经过反复讨论、商量，大家决定要向更高一级的政府部门反应诉求，找市政府请愿，市里不行找省里，总之社保一定要争到底。12月5日一早，工人们从自己的家里出发，或坐地铁，或坐公交，一起到了市政府门前。工人打出了准备好的横幅“我们要社保，我们要复工”。维稳的警察赶到现场，让工人将横幅摘下。工人们在市政府门前站着不肯离去，后来信访办允许五个人进去谈话。他们还在里面谈着，区政府的领导便赶到了市府，领头的一个是区政法委



的领导。这个领导了解了工人的诉求，当即表态会解决工人的问题，还留了他的手机号。他劝工人回到镇上。工人们回忆说，当时并没有想为什么政法委要出面管这件事。那个领导看起来一身正气，说话也有分量，和以前那些只想拖延时间、推卸责任的官员好像不一样。工人商量之后，决定回去跟他们谈。

没多久工人便发现，这位看来说话算数的政法委书记也只是政府部门用于缓兵之计的，社保问题仍然处于僵

局。几位工人代表商量：既然现在有专人答应负责，我们就咬定这个专人。十几个代表开始轮流给这个书记打电话，你上午打，我下午打，每天都有人找他催问社保补缴的进展。书记被催得不耐烦了，斥责工人骚扰他。工人回敬道：“我在你工作时间，问你工作的事情，怎么叫骚扰？当初可是你答应给我们负责到底的啊！不找你找谁？”

12月9日，对这一百多位工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公司终于发出书面通知，同意给141位工人补缴从入职之月起的社保了！可公司还留了一手，要工人三天之内把自己需要补缴的社保钱交到公司，过期不办！因为大多数人都要补十年左右的社保费用，一个人少说也是几万块钱，平时生活并不富裕的工人们，怎么可能三天之内凑得齐这些钱？这分明是刁难！工人们对此意见很大，工人代表们去找厂方交涉，最后公司让步，答应工人12月20号到30号之间把钱交齐即可。

第一批工人把钱和社保局要求的个人资料如数按时交给了厂方。公司的其他工人看到补缴社保真的有了结果，也去找人事部门要求补缴。公司答应他们，第一批的社保办完以后，就给他们办。不过由于第二批工友并没有自动享受到第一批工友争取来的结果。他们的合同厂方仍然未给，只是让他们慢慢等待。大家的钱已经交上去了，为了尽快有个结果，工人代表们一直在几个部门之间追问，催促。但这段时间，公司仍然没有安排这些员工回去上班，大部分工人去做临时工贴补家用，只剩几位工人代表一直坚持着为大家的事忙东忙西。

## 补缴频生变数，工人聚集讨说法

过完春节，大家陆续从老家回来。工人补缴社保的钱已经交上去两个多月，可社保还是没有着落。各部门之间还在扯皮：社保局

说地税的资料不全，地税又说社保局的资料不全，还说原来厂名叫永义，这个厂已经注销了，2004年之后改名叫永宝，所以社保只能补缴到2004年。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很生气：钱都已经交上去了，公司也答应从1999年补了，竟然又拿这种理由来拖延！但要堵住相关部门的嘴，工人们还是要搜集各种证据，证明永义和永宝是一个厂，让他们没有理由再拖！

终于，厂名的问题解决了。3月27日，按照社保局要求，工人们把补充资料交给公司人事部，但是公司却对工人的材料置之不理。公司借口没有货做，给追社保的工人放了快六个月的假了，每个月只发几百块的停工待料工资。工人平时只能自己找些零工做，不然上有老下有小，日子没法过。可没放假的工人们却还在加班。工人们感到不能再被公司这样拖延耍弄，必须要一个明确的书面答复！

4月1号，工人们先到地税局回复社保问题的进展。地税局答复说，4月30号员工资料会全部录入电脑。会责令公司4月5号-30号交钱，不交钱就会把这件事移交法院。

有了地税的答复，4月2号，一百多名工人上午8点半聚集到公司人事部，提出3个要求，不给书面答复就不离开办公楼：一，由厂方缴纳的那部分第一批工人的社保钱，什么时候交到地税；二，第二批工人的资料什么时候交到地税局；三，要求把第一批工人补交的资料马上发到地税局，不能再拖延。

有工人看到，永宝老板也来到厂里。不过老板根本不敢走近办公楼，而是躲到他的宿舍里不敢出来，打电话指挥人事主管。有些人想去老板的宿舍直接找他问回复，但有的代表认为，那里毕竟是老板私人的地方，还是在办公楼等着比较好。

而公司第一反应仍然是报警。警察和辅警马上到齐，镇里维稳办也到场，但因为工人们除了不断联系媒体之外，便是在公司大堂等待，而且人数众多，警察也没把工人怎样。

这期间工人们一直在给各路媒体打电话。晚上9点多，有记者



来了，采访完走了。夜里 12 点多，社保局和地税局的人也来了，问完情况也走了。

一切毫无结果。辅警们看着工人在公司待了一夜。

期间，走不出办公楼大门的人事主管在办公室和几位工人代表聊天，诉说自己夹在老板、政府、工人三者之间的难处，想争取同情理解。这时候，代表才知道，原来

公司拖着不去补缴社保，并非只是公司的原因，原来还有地方政府在控制进展，不愿处理此事。毕竟，永宝工人长期不间断的行动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仅在岭辉镇，周边的几个工厂工人都在关注永宝工人的结果，甚至连镇政府附近卖菜的摊贩都知道永宝工人补缴社保的事情。他们一旦补缴成功，必将刺激更多的工人提出类似的要求。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在养老金方面的支出将是一笔难以估量的庞大数字。

工人代表意识到，原来补缴社保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公司，而是来自政府。可事已至此，无论对手再强大，也得要一个结果才行。（详情参见“首席代表”访谈）

## 事成之时出意外，工人援救代表

4 月 3 号，下午 3 点，很多工人已经守了两天一夜，大家决定轮流回去休息，和公司耗到底。下午 5 点，公司终于松动了，答应给书面通知，要工人们散去。工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厂方答应 6 号把工人们的资料都交到地税，4 月 30 号以前公司把钱交齐，第二

批的资料交到地税。为了保险起见，工人们要公司出具一张每个员工的入职时间表。

在人事主管答应了这些要求，给工人书面通知的时候，盖的章是永宝的。但因为之前公司曾想赖账，只从2004年以后补缴，所以有工人就要求把永义的名字也写上。因为这件事，工人和人事部经理发生了争执。人事部经理和保安出手打人，把一个女工推倒在地。

这次工人们报了警，警察来以后把被打的工人和人事部经理都带到了派出所，说是要录口供。被打的工人明明是受害者，警察对她的态度却很恶劣。后来派出所的人出来把两个代表叫进去，说是要他们口供。工人见到老板也进到派出所。大家都在派出所外面守着，但是没有等到代表们出来，人事部经理却被放了出来。最后被打的工友也放出来了。她说她已经不追究人事部经理。可是两位工人代表仍然没出来，问警察，只答复说要录口供不能走。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很着急，都已经不追究公司打人了，还要什么口供？这其中必有蹊跷。为了表示对工人代表的支持，也为了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放出来，十多个工人轮流在派出所门口守着，一直到第二天。

4月4号，晚上7点多，有工人看到两个代表被押上警车不知道带到什么地方去。媒体的记者来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过来。后来听说是老板要起诉两个代表“非法禁锢”，所以代表们被关到拘留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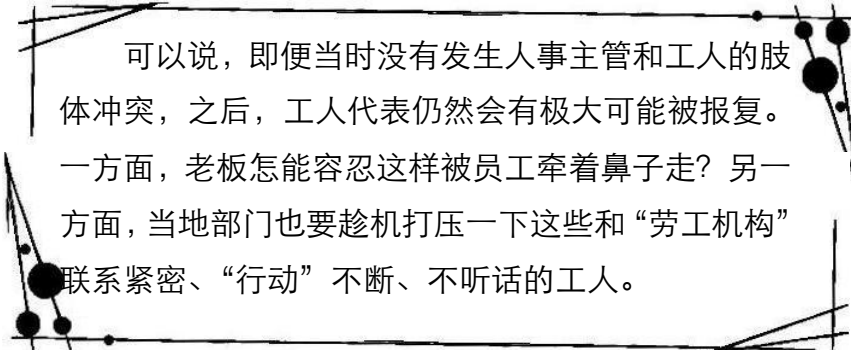
工人们慌了。本来一切都还算顺利，公司的答复也已拿到手，可工人代表现在却成了“嫌犯”。剩下的几位代表赶忙联系劳工机构，看看能有什么办法帮两位工人代表尽快回家。同时通知代表的家人，让他们知情，避免过分担心。

劳工机构迅速联系了两位律师，代理两位代表的案件并准备提供刑事辩护，也找了相关人士提供法律建议。当工人们听到说他们补缴社保的事情有可能因为代表罪名的成立而变成非法，而最终拿

不到社保的时候，倍受打击。要用什么办法挽救现状呢？几位工人代表深知现在绝不能放弃。他们马上联络当天参与行动的工人，搜集所有人的照片、视频，可以用来证明工人没有“非法禁锢”人事经理，两位代表没有带头闹事，没有对人事经理进行攻击的证据。同时写请愿书，发动所有工人签字，证明工人代表无罪，要求释放工人代表。

事后，工人代表回忆说，这次行动，工人的准备还是太不充分了，只是简单计划着围在办公楼，不给答复就不走。怎样轮班，怎样应对突发状况，并没有仔细讨论。这也和前几次行动相对平稳有关。工人们以为只要自己不主动发生冲突，不损坏公司物品，这次也不会有什么意外。并且，之前了解到其他地方的工人有过类似的行为，大家认为自己这样做也不会有什么问題。

公司方的反应却很快。见到工人聚集，公司保安马上到位，报警，上报相关部门，一切按部就班进行。至于后来工人代表被抓，极有可能是工人聚集之后，公司便和当地派出所沟通协调好的事情。因为当时，人事主管几次尝试走出办公大楼，同时安排保安摄像取证，想要录下工人拦截他的证据；并且多次用言语挑衅工人代表，要他们说出“你不给答复就不能走”、“我就拦住不让你走”一类的话，用作“非法禁锢”罪的证明。



可以说，即便当时没有发生人事主管和工人的肢体冲突，之后，工人代表仍然会有极大可能被报复。一方面，老板怎能容忍这样被员工牵着鼻子走？另一方面，当地部门也要趁机打压一下这些和“劳工机构”联系紧密、“行动”不断、不听话的工人。

## 公司反攻不断，工人终得结果

两位代表被抓之后，公司立即开除了他们，并且没有停止报复，甚至想报复想得太急了，还闹了笑话。有一个代表明明是公司发了通知书让他放假，两天后却以“旷工”为由开了辞退书，拒不支付经济补偿金。还好有人拿到了这个代表的放假通知书，可以作为证据申请劳动仲裁。听说公司人事部的职员因此被骂得狗血淋头——连是不是旷工都没搞清楚！

4月20号，公司又想出新的办法整治那天参与行动的工人。4月2号、3号，有部分工人没有放假，他们打卡但没去上班，而是一起到人事部讨说法。公司于是说他们是旷工，而且原本公司是连续旷工3天算作自离，临时改成2天，目的就是为了处理这些工人。虽然算作旷工的工人人数不多，可是对于急红眼的公司来说，能咬掉一个是一个。

由于工人代表被抓给工人们带来很大冲击，大家此时已经没有足够力量再进行集体行动。面对公司的反攻，也只是通过打官司等个人途径去抵抗。还好，补缴社保的大局已定，公司也只能靠着在这方面惩治工人来出气。

4月26日，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定罪，两位工人代表终于获释回家。所幸他们的社保没有受到影响，已经和其他人一起补缴了。

至此，永宝工人争取补缴社保的行动告一段落。



## 附录：工人请愿书

### 〔附录一〕工人的书面要求

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

我们 38 位工人，于不同的时间段进入公司的起版、倒模、验金房部门工作。

公司存在以下违法用工行为：我们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公司至今没有给回我们；从入职以来公司迟迟未帮我们购买社保，直到 2010 年 7 月，经公司起版部门全体员工的努力争取，公司才肯为我们员工购买从 2010 年 9 月至今的社保；没有依法给与我们法定的年休假待遇和高温津贴。

现我们 38 位工人共同向公司提出四项基本要求：

**第一、公司分别追缴我们 38 位工人从入职之日起至 2010 年 8 月的社会养老保险。**依据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现在我们 38 位工人愿意承担个人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用。

**第二、依法给予我们 38 位工人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年休假。**我们 38 个工人当中，就有 20 个人累计在公司工作已满 10 年以上，最少的也有 5 年。依据《职工带薪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年休假 5 天；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年休假 10 天；已满 20 年的，年休假 15 天。且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不得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第三、依法给予我们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0 日**



内的高温津贴。依据《关于公布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粤劳社〔2007〕103号）中明确规定：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为：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5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00元。经济欠发达地区确需降低标准的，可由地级市人民政府在下浮20%的范围内确定，并报省劳动保障厅备案。高温津贴标准在每年6月、7月、8月、9月、10月发放，在企业成本费用列支。用人单位在其他时间安排劳动者从事高温工作的，除应按行业规定向劳动者提供劳动保护用品外，也应不低于上述标准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第四、拿回我们的劳动合同。**我们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公司就把我们的劳动合同全部收回，至今未给我们。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以上是我们38位工人的共同要求，我们38位工人要求公司于2011年6月7日前给予我们正式的回复。在此期间公司不得对员工作出无理解雇放假调动职位等情况。

特此书面要求！

2011年5月26日

签名（略）

---

## 〔附录二〕请求书

广东省总工会：

某市总工会：

某市某区总工会：

我们 128 位工人，是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员工，于不同的时间段进入公司的起版、倒模、执模、镶石、配石等部门工作。我们中的员工工龄最长的为 19 年，最短的有 5 年，超过 10 年工龄的员工有 70 人。

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存在以下违法用工行为：

1、我们与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至今没有给回我们；

2、从入职以来，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迟迟未帮我们购买社保，直到 2010 年 7 月，经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起版部门全体员工的努力争取，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才肯为我们员工购买从 2010 年 9 月至今的社保；

3、没有依法给与我们法定的年休假待遇和高温津贴；

4、没有依法发回劳动合同文本给劳动者。

2011 年 5 月 25 日，我们中的 38 名工人向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提出了《工人的书面要求》，2011 年 6 月 8 日，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在我们 38 名员工的主动交涉下口头答复为：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没有为员工购买社保，政府、公司和员工都有责任，之前，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一直都是按照政府给与的配额购买社保的。如员工对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的行为有意见，建议员工按照法律途径处理，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遵从政府或法院的处理意见。

2011 年 6 月 10 日，我们中的另外 51 名工人向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提出了《工人的书面要求》；2011 年 6 月 14 日，我们中的另外 28 名工人向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提出了《工人的书面要求》，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都是作出如上的答复。

经过我们讨论，确定我们 128 位工人四项基本要求，具体如下：

第一、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分别追缴我们 128 位工人从入职之日起至 2010 年 8 月的社会养老保险。依据我国《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现在我们 122 位工人愿意承担个人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用。其中，我们中的黄丽凤、邱素珍、冯卫娣、练琼、陈笑媚、钟利祥等六位工友从入职以来至今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我们要求公司立即为这六位工友缴纳社会保险。

第二、依法给予我们 128 位工人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年休假待遇。我们 128 个工人当中，就有 70 个人累计在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工作已满 10 年以上，最少的也有 5 年。依据《职工带薪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年休假 5 天；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年休假 10 天；已满 20 年的，年休假 15 天；且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不得计入年休假的假期。因此，我们工人要求享受年休假待遇。

第三、依法给予我们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0 日内的高温津贴。依据《关于公布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粤劳社〔2007〕103 号）中明确规定：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为：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 150 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 100 元。经济欠发达地区确需降低标准的，可由地级市人民政府在下浮 20% 的范围内确定，并报省劳动保障厅备案。高温津贴标准在每年 6 月、7 月、8 月、9 月、10 月发放，在企业成本费用列支。用人单位在其他时间安排劳动者从事高温工作的，除应按行业规定向劳动者提供劳动保护用品外，也应不低于上述标准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第四、拿回我们的劳动合同。我们与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就把我们的劳动合同全部收回，至今未给我们。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以上是我们 128 位工人的共同要求，我们 128 位工人要求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0 日前给予我们正式的回复，

否则，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集体行动。在此期间，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不得对员工作出无理解雇、放假、调动职位等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 6 条、第 22 条、第 25 条规定，我们 128 名工人特向广东省总工会、某市总工会、某市某区总工会求助，请求工会组织维护我们工人的正当权益。

特此书面请求！

2011 年 6 月 21 日

---

### 〔附录三〕关于永宝公司 2011 年 11 月 17 日《放假通知》的异议书

广东省总工会：

某市总工会：

某市某区总工会：

岭辉镇总工会：

某市省劳动部门相关领导：

某市劳动部门相关领导：

某市某区劳动部门相关领导：

岭辉镇劳动部门相关领导：

我们是某市某区永宝饰物有限公司的工人，经过工友们的集体讨论，我们一致反对永宝公司单方面的放假通知。我们一致认为永宝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行为：

1. 员工自 2011 年 5 月 25 日开始，向厂方提出补缴入职之日起至 2010 年 8 月的社会养老保险的要求，但厂方至今未予缴纳。

2. 2011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单方面贴出长期放假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现在公司单方面进行放假，并未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并且我们工人反对目前公司放假通知中的内容。因此公司的放假安排是不合法律程序的，是无效的。

3. 目前第一批放假员工中，84.3%都是要求厂方补缴社保的工人。我们认为厂方涉嫌对这部分工人进行打击报复。公司将这批工人放假，赶出厂门，引起了工人们的极大不满，造成工人情绪激动。我们认为公司这样做等于是把本应该在公司内部解决的问题，推向了社会。很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影响社会和谐。公司这种行为是对工人、社会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们向各部门说明以上情况，并提出如下诉求，希望得到支持。

1. 要求永宝公司对已提出社保补缴申请的员工自入职之日起到 2010 年 8 月期间的社会养老保险进行补缴。

2. 在厂方没有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的情况下，工人不允许公司单方面做出长期放假安排。在厂方和工人协商出具体的放假方案以前，已放假的工人要求复工。

如果工人的诉求无法得到及时的回应和恰当的处理，我们不排除会采取其他方式解决。

2011 年 11 月 21 日

永宝公司工人代表:



## 大事记

### 2010 年

7 月，起版部的部分工人集体签名向厂方提出购买社保的要求。

8 月，公司公告，同意为自愿申请购买社保的员工购买社保。

12 月，起版部 7 名工人被厂方以合同到期为由辞退，仅获部分补偿金。工人们找当地某劳工机构咨询，决定起诉，追讨补偿金并要求厂方补缴入职以来欠缴的社保。判决结果只支持了补偿金部分。

### 2011 年

5 月 25 日，受 7 人诉讼事件的影响，该厂 38 名工人向公司提出了《工人的书面要求》，要求补缴入职以来的社保、年休假和高温津贴，并要求拿回劳动合同副本。

6 月，陆续又有 79 名工人向公司提出《工人的书面要求》。公司态度强硬：工人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社保问题；年休假、高温津

贴是公司福利，并非法律强制规定；劳动合同副本可以发还工人。

6月23日，128名工人向省工会、市工会、区工会提出书面的《工人请求书》。工会接到诉求几天后到公司调查。

6月27日，工人选出13位工人代表，集资13000元用于维权。

7月4日，镇工会组织工人代表座谈，无果。

7月13日，镇工会又一次举行座谈，答应帮助工人要回合同。支持工龄超过十年的员工补足年假。不支持工人高温津贴的要求。有关追缴社保的问题，建议工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7月26日，131位工人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递交了《劳动监察投诉书》。

7月29日，镶石部某员工辞工时要求补回带薪年假遭拒。十多位工龄超过十年的员工直接找老板协商年休假问题。公司于一周内贴出通知，公布了十年以上工龄员工享受年休假的具体方案。

8月15日，5位工人代表先后到区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劳动局就补缴社保的问题上访。

9月7日，工人拿到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书面回复。公司称将在10月前按《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为相关员工补缴。

10月13日，135名工人一起到公司人事部追问补缴社保的进展。

10月19日，135名工人有2人被公司解雇。工人代表和一些工人找人事部讨说法。

10月20日，上午，公司和135名工人开会，提出分期补缴社保。工人拒绝。下午，一名工人被公司以无货可做为由放假18天。工人集体写了声明书，要求公司不得无故放假，遭人事部回绝。

10月28日，工人代表再一次向厂方提出社保、放假问题的相关要求，人事部拒绝签字。

11月1日，镇政府约一位工人代表去谈话，在工人的坚持下，最后有3人一起去谈话，但无结果。

11月3日，第二批追缴社保的工人到社保局立案。

11月4日，一位工作了11年的追缴社保工人被工厂辞退，离职时，公司只支付了2000元的离职补偿金。

11月7日，镇政府及相关部门、公司、工人代表三方会谈，无果。工人决定不再和政府部门进行无效果的谈话。

11月11日，社保局表示补缴社保要按程序走，让工人们继续等待，并且第一、二批的要一并进行，时间会比预期的更长。

11月14日，厂内下班前共有89名员工收到放假通知书，其中绝大多数为追缴社保的工人。工人们滞留在公司大堂向厂方讨说法。厂方报警。劳动局主任出面调停，偏袒厂方，无果。工人多次拨打各媒体爆料电话，无人回应。

11月15日，被放假的工人到区政府上访。16日，区政府派人到政府和工人代表、厂方就放假问题进行协商。另外一批工人代表赴社保局询问进展。公司提出从2004年开始补缴社保。工人拒绝。

11月21日，工人向省、市、区、镇工会和劳动部门发送了《关于永宝公司2011年11月17日〈放假通知〉的异议书》。机构联系了媒体进行报道。

11月28日，135名工人又到区信访办申诉，后返回镇政府的信访维稳中心。最后厂方口头答应工人最早从1998年7月补缴，要求工人30号下午两点半到厂方拿补缴通知书。

11月30日，下午两点半，工人们到达公司拿通知，发现被骗，厂方最早只从2004年补起。工人全体拒绝签字。

12月5日，工人们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区政法委书记出面承诺解决工人问题，将工人劝返。

12月9日，厂里同意给141位（包括2010年12月被解雇的）工人补缴从入职之月起的社保，但要求工人必须在3天内将个人缴纳部分交给厂里。工人力争后改为30号前。放假问题仍未解决。



## 2012 年

2 月，原本承诺春节前解决的社保问题一直拖延到年后，地税和社保局相互推诿，地税又回复说 2004 年之后永义公司注销，改名叫永宝，社保只能从 2004 年补起。工人重又搜集证据。

4 月 1 日，工人按照社保局的要求于 3 月 27 号将补充材料交给厂里，但厂方一直没有上交给地税。

4 月 2 日，一百多名工人要求厂方给出补缴社保的具体日期，否则不离开工厂，接下来和人事部经理在办公楼僵持了两天一夜。

4 月 3 日，下午 5 点，厂方终于答应做出正式的书面回复。但是在工厂名称问题上，双方发生争执。人事部经理和保安出手打人，工人报警。两位工人代表却以“非法禁锢”的罪名被拘留。

4 月 25 日，除个别工人，第一批工人的社保已经补齐。

4 月 28 日，在工人们的争取下，两位代表办理取保候审后释放。随后，第二批，第三批追缴社保的工人也陆续补齐。



## 工人代表及工人访谈

通过和永宝工人代表以及普通参与者的访谈，除了可以记录他们整体抗争过程，其中的很多细节，可以让人身临其境地体会他们面对的各类压力，理解在维权行动各人的态度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而这些都是更好地把握抗争节奏的基础——什么时候是工人最受鼓舞的时刻，什么时候是最迟疑的时刻，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该撤退。

### “首席代表” 崔明杰（起版部）

#### 崔明杰印象

崔明杰是某区本地人。在一般人印象里，这些本地人靠村里的地租分红、出租屋租金就能过得很宽裕。事实并非全部如此。他所在的村子人口和邻村差不多，但是土地要少很多。崔明杰家兄弟 4 人，算上父母一共才有一亩多点地，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宅基地，结婚后一直住在丈母娘家。而邻村一个人平均有一亩多。孟村到现在只有一些零散的机械厂，工厂规模远远比不上邻村。每年孟村村民出租地皮的分红每人两三千块，而邻村 2000 年左右的时候就有一万多，到 2011 年每个月发到 1350 元。当时某区工人的最低工资每月只有 1100 元。

崔明杰原本性格比较内向，每天两点一线上班下班，和朋友熟人说话还多一些，和陌生人在一起时比较腼腆很少说话。自认为口才不好，很多东西能理解，但是讲不出来。如果不是这次维权，他也从来没想过自己还有做“首席代表”的能力。做代表、当众演讲一类的，这在追社保之前是想都没想过的事情。崔明杰虽然不属于能说会道、叱咤风云型的代表，但却是善于思考、很有韧性、能够坚持到底的人。这也是永宝工人代表的总体特征。所以工人们每次重大决定，并不是某个人拍板，而是经过大家比较充分的讨论。

崔明杰刚开始时并不是最积极追缴社保的工人，是在起版部其他几位工人带动下才参与到追缴社保的行列中。崔明杰发生转变是在2011年7月，劳工机构召集工人去香港参加一个有关集体协商的研讨会。当时其他工人要么没有港澳通行证，要么不敢去。他有通行证。劳工机构说食宿全包。出于一点贪小便宜的心理，他想那就去吧，权当是旅游了。这次会议让他开了眼界，见了很多教授、专家、外国人，还第一次参观大学。至于会议具体内容崔明杰已经不记得了，只是留下一个感受——会议上教授、学者还有国外的工会干部讲集体谈判的技巧和经验等等，给了他一种信心和力量。让他感到还有很多人在关注、支持工人的这些事情。而且那些教授、专家听了他们厂工人正在追缴社保的事情以后，都一致认为他们能够成功。因为，一是他们100多人一起争取社保，人多；二是都是合法的要求。这些说法也给了他信心。所以，当工人们准备选出工人代表来和厂方谈判的时候，他靠着从香港会议带回的信心和勇气，站出来当了首席代表。回忆当时的精神状态时，崔明杰笑着说：“那会我们很信机构。有政府的人和我们说机构有问题啊，那个劳工机构是有问题的，我们都不信。因为他们一分钱没要我们，还帮我们。我们在那里学法律，和其他有经验的人学，怎样和政府打交道，怎样和他们说话……从香港开会回来的那个时候要我去哪里做什么，都有胆去做，什么都不怕。”

但专家教授名头再大、鼓励再多，要面对维权过程中的各种琐事、压力的，还是工人代表自己：要持续不断地在工人间进行宣传；遇到问题要及时开会商量；大家的材料要收集；要请假向各级政府部门递交材料，并不断地催促；还要参加机构的文娱活动。这些都要牺牲大量个人的时间。除了机构人员的一些零星建议以外，怎么做组织工作都要代表们自己去摸索。做工人代表的烦恼是崔明杰和其他很多代表始料未及的。

在和崔明杰接触的几年内，访谈过很多次，访谈的内容也见证了他做首席代表时、被抓前、释放后，再到后来回归正常生活的思想历程。这些经历，使他比一般参与的工人得到更多的历练，也因为他较为沉稳、谨慎的性格和喜欢思考问题的习惯，使他获得比普通参与者更多的收获。

## 打工经历

我是某区本地人，1991年15岁的时候开始打工。那时某区的工业刚开始发展，有电子厂，制衣厂，还可以做建筑工。也有人去做生意。

那时工厂的福利待遇都差不多。我没有特别想进的厂，别人帮我介绍到哪里，我就去哪里。我先在建筑工地做了几个月泥水工，工资一天10块，一个月300块，不多也不少。那时一顿饭花三四块钱已经吃得很好了。

### 第一家首饰厂的工作，本地人的工作态度

后来亲戚介绍我进了一家做黄金的首饰厂，100多人，当时算

是蛮大的厂了，也是我进的第一家厂。当时进厂挺容易的，很多人借别人的身份证进厂，或者弄一个假的身份证，把年龄改大了进去。我记得我进厂的时候没有收押金。每月底薪 200，加班费 1.5 元一小时，岗位是执模。



我们厂淡旺季分得不是很明显，一般都会加班，有时候一个月加班 30 多个小时，有时候 100 多个小时。一年最多有 3 个月不加班。一般没货做的时候会放假。

我在这家厂做了 3 年，后来觉得管理太严格，就转行和同学去做装修。

装修是做铝合金门窗，一个月三四百块，跟在首饰厂工资差不多。做了 1 年，觉得辛苦，没兴趣了，就不干了。

那时候都是休息一年半载再找别的工作，年轻人都是这样嘛。

1995 年，我进了另一家首饰厂。因为是熟手，一个月工资有 600 多了，这叫鱼不过塘不肥嘛。那时我听说我进的第一家首饰厂已经倒闭了，因为管理太差，工厂里很多人偷它的金子。

90 年代初首饰行业刚起步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那个值钱。我们刚进厂的时候，还拿那些金货扔来扔去。后来都知道金子值钱了，而且工厂外边也有人开始收黄金，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想办法偷。够胆偷的可以蛮快发财。我没有去偷，没胆。

现在很多厂都有安检，但是公司再怎么查，也有人想办法偷出去。难道要脱光衣服查吗？

1991 年我进厂打工的时候，某区打工的有 3 成是本地人，7 成是外地人。

1995 年以后，经济发展了。很多人是做一年歇一年，我 20 岁以前都是这样过的，对工作态度很随便，有点不顺就会辞职走人，不会担心找不到工作。

现在本地人连一成都没有了，随着那个经济发展，很多本地人就不愿意做事了，有家，可以吃可以睡。

我做了这么久，没存下多少钱来。玩的地方挺多，我没结婚以前经常去吃宵夜、唱卡拉 OK，每月 600 元很容易就花光了。

某区这边的治安比起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好了点。犯罪形式不同的。像以前我们出去在舞厅打打闹闹很平常了，现在就没有了。但那个赌博就多了。以前是乱，广东那些现在还不是很发达的地方就是我刚出来的时候某区的现象。现在某区有钱了，赌钱和吸毒变多了。我了解的情况最多的出来混的那些，就是叫年轻人吸毒，很好赚钱的，还有绑架。不过绑架是对那些有钱的老板来说的。一般对于工人最大的伤害就是赌钱和吸毒。吸毒以前是本地人多，现在本地人少了，外地人多了。

我们某区本地人呢，有一部分当老板，有部分是开士多店，有部分比我赚的还少，就是在村里做治安，一个月 2000 块工资。村民有分红，所以钱也够花。分红多少要看家里的地理位置。就像某区公安局隔壁的那个村，是这一块发展最早的村，早都城市化了。像我们怎么比呢？像我丈母娘那里，早几年就是和我们村一样，一个人一年分 2000 块，没有什么工业的。有一些路边的铺位出租，还有地租给别人耕，自己不耕。后来旁边大夫山一下子开发了，路搞好了，一下子一年就分 3 万了。有些人十几年前一次就分 5 万 10 万块，所以就看发不发展到你们村了。如果当时是征我们那个村，我们也可以 10 万块一年了。就看找不找得到老板来买地了。还有路，一通路，也可以等着收钱了。很靠运气的。

首饰厂买码的人普遍很多<sup>3</sup>。我很少买。因为我不喜欢赌钱。以

---

<sup>3</sup> 买码：90 年代以来在珠三角兴起的地下彩票活动。

前刚刚开始有码的时候，一些人可以把整个月的钱都买码，现在就好像吸烟一样，可能有瘾，但我不会用全部钱来买，就是玩一下，不会像以前那么盲目。因为是本地的，我认识一些坐庄的人，所以我以前在厂里都收过很多次码，打世界杯啊一类的，我抽 10%的水，但自己也买亏了不少，所以现在也不做了。现在很多人买码，但买的不大。不像以前下 3 千块的单，十来个客户就够了。现在差不多要找 100 多个客户才能凑到 3 千。普遍的都买小了，所以收起来就麻烦了，我就不做。只要找到客户下单，哪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庄家接的。所以有些外地人也收码。而且外地的在外面租房，附近住的认识的人多，直接就收码了，我还要回家，就没那么方便收码了。

村里因为征地的纠纷也有，但是搞不起来。听说过很多，村民围路啊，但一下子就有公安去阻止。十年前就有这些事了。大都是因为分得不平均，贪污的，但很少有闹得起来的。我们村也有。但地已经卖出去了，合同搞定了就退不回那个钱，最后大不了就是把那个村长搞进去坐牢。所以这个就搞不起来。不像我们买社保，还有一点作用。

我在看守所的时候，遇到一个干部贪污被抓，他跟我们说自己是冤枉的，他没拿村民的钱，拿了就是王八蛋。他说的很漂亮了，但人家给他钱他不要的吗？卖地的时候，他说的很光明正大的，卖地是 4 千万，但价格已经被压低了，开发商给他多少钱是人家自愿的。现在选村长，全部人的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的。选举的时候，都会请吃饭，有些吃得好的要 30 块一个人。选村长要请，副村长要请，选治安队队长也要请。全部村民至少一个星期不用煮饭的了。说是不吃白不吃，那顿饭难道不知道是谁给的吗？请客的钱是选举的人白花的吗？你去吃那顿饭，还不是你自己请自己的吗？最后出了什么事追究下来，所有那些村长都会说自己冤。其实吃饭的时候村民就该就知道了，——跟你拉票的时候难道你不知道我要贪污的吗？这是行规啊。

## 执模和起版

执模是把粗糙的首饰打磨光滑。起版是按照图纸做出样品。我开始是做执模，工资六七百。我没有去做起版，因为要做起版，先要当学徒，工资只有两三百，我不愿意。

执模学一个月就可以出师。起版做一年才可以通一点点，要做得精最少3年，什么都会做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打个比方，看到一个首饰的样子就能做出来，没有5年的经验是不可能的。

对于起版来说，执模就像是小学生水平。

首饰行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生手不管进哪个部门，每月都是200块的工资。刚进厂的时候执模的工资比起版还好一点，因为有打磨下来的金可以赚。而起版是用银来做，只能挣死工资。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工资差别就看出来了。

2000年以后，执模工资1000多，起版就已经有3000多了。起版是真正的技术活，那时做起版的人少，所以工资涨得很快，很多人都转去做起版了。有时金价不好，执模就赚得更少了。

我也从2000年开始慢慢转去做起版的，到现在做了10年了。那时有些首饰的某个部位需要我先用起版的方式做出样板才行，这样我就从执模转去做起版的。但现在起版工资就不行了，做的人太多了。

执模工人的工资差别很大，因为有的可以赚到金，有的赚不到。起版工人的工资就差不了多少。

2000年的时候首饰厂计件工资不多，后来首饰厂越来越多，才开始有计件工资。收押金也是首饰行业发展几年之后才开始的。开始的时候离职都会退押金，后来也有不退押金的情况。



## 永宝厂

永宝厂的工人很稳定，没人离职，很少招人。后来因为有两个工人离职了，经朋友介绍我才进厂的。一般好的工厂，很少有工人离职。

当时，永宝厂的工资待遇在首饰行业里算是中上等的。与别的厂相比，所有部门都是中上等的。所以，虽然永宝离我家有些远，我还是去了。



还有比永宝厂更好的厂，要有关系才能进去，比如元艺厂。以前，我们这里的首饰行业有一种说法，如果你没有技术，没有能力拿到 3500 的工资，就不要想进元艺。

我以前一直想进元艺，但是不敢进，怕通不过面试。元艺招人要求技术要很好才行。

现在元艺厂的工资待遇比我们厂还低。因为现在很多技术工作可以用电脑来做，不需要工人的技术了，工人的工资就降低了。比如，起版的工作，现在用电脑做，叫做制版。元艺厂，现在找 2500 的工作，随便进，要想在元艺找超过 3000 的工作，就要靠朋友和运气。

我老婆在首饰厂里是做镶石的。工厂在大罗塘那边，不大不小的厂，一百多人。工资有 2300 到 2400。他们收入最好的时候是在 1997、98 年。我老婆刚刚学镶石，她不加班工资就三千多，都不用怎么做事。镶石最多的就是计件的。现在就不行了，这个很怪的，那个工资很好，就很多人去做，工资就下来了。还有技术难度也下来了。以前手镶，后来蜡镶。很多部门都是这样的了。首饰行业式微了。

## 亲历首饰行业的发展变迁

最早就是元艺永义莱利东宝那几个厂，原来新大新那里都是首饰厂，1991年的工厂可能不到50个，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了，应该很多了。以前一百人的厂发展到现在可能有一千多人了。2000年工厂开始明显多了。有些厂是做大了以后，把部门分开，分成一间间独立的小厂；有一些厂是两三个老板合起来开，发展起来后，又各自分家；也有一些是原来厂里香港的师傅、管理人员拿到订单自己出去单干了。我知道的有很多小厂，十几个、一百人以下的，老板都是以前做组长、师傅、主管起来的。没多少家人数特别多的大厂。

个人开厂的话，需要和上面的人打交道，要认识客户，要会说话会做事。这些对于像我们普通打工的人，脾气比较直的人就难一点了，没那个资本，也不认识那么多人。平时想的是怎么把工作做好，升高一点的工资。

到现在首饰加工发展得饱和了。有些小厂被别人抢了客户倒闭了。因为他们就只是靠一两个大客户来维持。客户找到另外一个更好的、收钱更少的厂，就不给他做了。开小厂的老板认识的大客户不多，有一个大客户就出来搏一下，所以死得也快。我第一次进的工厂是例外，是因为管理得太乱被偷倒闭的。

一开始有首饰行业，就有珠宝行业协会了。那里面的领导就是开始那些首饰厂做大了以后的老板。

我做过的厂，产品有一些是做美国的订单，也有做欧洲、日本的。大都是香港老板，台湾、日本很少。如果是日本、台湾的厂也都会与香港那边有点关系。

刚开始厂里全部师傅都是香港的。后来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学会了，工厂就开始用大陆人。有的香港师傅被淘汰，有的香港师傅出来开厂。以前认识的师傅有一半后来都做了老板开了厂。

全部香港人都讲粗口，是他们习惯那样说话，不是针对大陆人，

只是看你做的产品好不好，做得不好就骂。他们地位高一点是肯定的，毕竟技术高。有个别态度极端的，看不起大陆人。我没有遇到过每说一句就你们大陆人怎么样的那种。

我是 2004 年进永宝。永宝厂里老板的同乡是我见过的厂里最多的，没见过它这样的厂。其他厂老板在自己厂里可能有个表弟啊，一个两个亲戚啊，在里面照顾一下。

首饰厂开始招人的时候，打个比方，广西一个什么镇，当地政府和这边联系好，学生毕业的时候整车拉过来，在这里干起来，做熟了，再回乡下找人来做熟。还有一些人做到管理，然后介绍家乡的人，可能半个厂的工人都是他介绍的。做管理的，都希望自己的人多一点，在厂里站得住脚，好管理一些。经常会形成哪个部门是广东派，哪个是广西派，哪个是潮州的，哪个是四惠的。

我进厂很多都是靠人介绍。每个厂福利待遇不一样。遇到好的就有年终奖。年尾可以吃饭，有些就没有。有些厂是计件的，有些是不计件的。这些规矩进厂的时候就知道了，能接受就没问题了。他是计件的还是按月的都会说清楚。有没有年终奖都会说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你的工资合不合理。我就是看他给我多少，然后我自己再决定去不去。打个比方，这个厂没有年终奖，但是每个月比别的厂多两百工资，那就等于是年终奖了嘛。或者没有伙食费，但是比别的厂每个月多一百块工资，也相当于伙食费了。这个账是自己算的。自己要多少心里有个底。很多都是介绍的，都知道里面的待遇。好比我知道没有年终奖，我就写 3500，他同意就来不同意就算。他有年终奖的我就写 3300。永义当时算是比较好的厂。我是算过的，把上下班车费算进去，我在那里可以拿 3000，在市桥这边只能有 2500，我就还是过去永义做了。

以前很少听说过什么罢工。我感觉大家对这些知道的少。要让大家都知道的罢工，也要有一定规模吧。我听说过的维权，有一个两个，像三和首饰厂把人事经理杀了的那个，都是个案了。大规模

的人数多的都是这几年才有的了。金融风暴之前，人的意识都没那么高。拿什么维权呢，劳动合同法都没有出。以前也就听说 2009 年旧水坑卡西欧罢工，还是听我们厂在旧水坑那的一个本地人说的，这类事情很少听到的了。

我就跟我们部门的人打麻将，去吃饭什么的。以前有人让我做组长，但是〔我〕不想做。我不熟悉，又觉得组长是不同的，是管理那一块的了，夹在中间被上面还有下面的人骂，我的态度就是不如还做员工不被别人骂。我又不是那么凶，也怕管不来。我的心态就是不想上，就是不够胆吧。在每一家厂的心态，我做的事情就是不比人差，也不用比别人好很多，都是不上不下就行。

我没进过管理很严格的厂。我自己有挑拣。因为管理严格的厂的福利都不太好。我追社保之前，有个朋友在元艺，要介绍我进去，那里就比我们工资低很多，但是严很多，不让带手机。我就避免进那些厂了。

90 年代开始我们车间就有空调，一直以来都有，每间厂都是有空调的。这和工种有关系。金粉是钱，吹风扇的话会把金粉吹走，我要收集那些粉才有的赚。就算是一个人走过那个风就把我的钱带走了啊。

现在工人做事的方法都不同呢。以前就是随便搞出来，还拿检出来的产品你扔我我扔你闹着玩。现在就不同了，先把那个湿布放里面，做完一个就把手擦干了再去做别的。现在每人一台抽风机，里面有条布沾着油，把那个金粉沾上去。这样金耗就低了。以前我们就懒得理，搞快一点就行了。现在不仅要快还要细。要赚得多就要自己想办法了。

加工首饰的技术改进了很多。刚开始起版全是手做，给一些图，给一些银，自己打出来。后来改进了，先用蜡雕出来。现在就是电脑起版了。还有镶石，以前都是很死板的用钳，现在变化很多的，什么围镶啊无边镶的，以前都没有的，只是爪镶。蜡镶也比以前快



很多，但是质量越来越差，越来越快。执模的工具上没有太多的变化。我们不比电子厂，我们手工很多，就是方法改进一点。

现在工人之间的关系呢，感觉是有一点不如以前的亲密。这个可能关系到社会的问题了，可能以前刚出来的人思想比较单纯，容易交朋友。现在的人精一些，交心的比较少。也不只是首饰行业工人的问题，我觉得是社会在变的问题。另外，岁数大了，结婚以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交流也没那么深的。我们一起做的同事，都说遇到什么问题了说一说，但是给什么实际的帮助就是没有的嘛。你打个电话给认识的人帮介绍工作，这个是有的。但是有什么困难要借钱，除非是老乡或者很熟的人，工友之间就没有帮的了。

访谈时间：2011年11月

访谈背景：在崔明杰和其他工人被厂方全部放假后，崔明杰和其他各位代表找各种途径想办法应对。我们在参加完机构组织的会议后，讨论改组工会的可能性，以及中秋活动风波。

## 改组工会

问：你们有没有想过补缴社保之后怎么办？

崔明杰：做完这件事肯定会被炒鱿鱼了，也要找一个退路，但

是下一步做什么还不知道。

问：如果要不想被炒鱿鱼的话，把厂里现在的工会变成工人自己的，通过工会继续在厂里坚持，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崔明杰：这个我也有想过，但这是很长远的事情了。比如说追完社保，这个厂会不会倒闭？因为老板已经在外地建厂了。如果工会搞成了，这个厂关了，有多大意义呢？如果只是一个很小的厂里，建一个工会又有什么作用呢？都是很难说的哦……

而且从香港开会回来我就提议改组工会。他们（教授专家）也说改组工会能有很大帮助，就可以用工会名义来搞，不用什么工人代表，但我提了这个意见，大家没人支持。

问：其他人没这个想法？

崔明杰：是呀。我在香港听到的那些话感觉有道理，但是做起来就不同了。像我跟其他人说建立工会，他们感到工会这个事好像很遥远的，没有兴趣做，他们也就忘记了。这样的话我又能怎么做哪？没有其他人响应，整天提议也没有用。

大家就看工会对我有没有利益。看起来没利益嘛，那改组工会谁来做？追社保，我们不是有代表了吗？再搞工会，有什么用？比如我们现在搞职业病、加班费，这些对大家还算有实际利益的事情，都有人不想搞。搞工会没有直接利益，当然更没人同意。

这样说吧。我都跟大家说了，如果要改组工会，我有那个气概站出来，你们去追社保，我申请改组工会，来做工会主席。我就有这个工会主席的名义跟机构学习，我会更有动力。但其他人没有什么响应的。我知道现在以首席代表的名义做事是有风险的，像那个时候厂里说，抓就抓你们带头搞事的。但是工会改组之后呢，我是工会主席，我为工人做事天经地义，你抓我干什么？没有理由抓我。这就是很实际的东西了嘛。我从香港回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了，但是他们不明白。

还有，那会我们第一次和区政府谈，我们提改组工会的事情。区工会的人说：“你改组工会干什么？现在你们厂有工会。你知不知道要交会费的？厂里现在没收你们的会费，都是老板给的。老板的人做工会主席那不是很正常的？”那时候他们其他代表就愣在那里了，这才知道，改组工会要钱的，那就更没动力改组了嘛。

那个区工会主席就说要交会费的，他不谈改组要怎么办，他只说你们愿不愿意掏那笔钱，是工资的百分之几的。这样就间接告诉你你要改组工会，你的工资就低了。但是工会，说真的，工会有什么意义呢？工人不知道，改组它干什么？而且改组还要钱。现在不是有工会了吗，但是工会帮我做什么了呢？改组了就一定有用吗？我交钱可以帮到我，我就搞，但要是交钱都不能帮到我，我不是自找麻烦了？所以这个心态我们也搞不成了。我那个时候都提到了，但那个时候他们就说要花钱什么的，我就不敢再提改组工会了。

## 中秋活动风波

问：听说你们要做活动被镇政府的人威胁了？

崔明杰：那会我们让小云（劳工机构职员）帮我们申请中秋节在镇广场搞联欢活动的事，一直没有批下来。有一个工友的房东在镇政府里做事，那个房东给他们出主意说，让他们给镇长发短信问这个事。慧芝发了短信，大意说“我是某某厂工人，我们某某时间想在广场搞联欢，为什么不给我们审批？”结果镇长怪罪下来，负责这件事的人就找到了慧芝他们，说：“你们不要乱发短信。怎么能说我们不批呢？我没有说不批你，活动要经过很多部门审批，文化部门、维稳办……你们这样说我就是诬告。”后来，又安抚他们说：“我们大家是老乡，这件事就算了，我不想搞那么多东西，希望你们也不要搞。但是以后你们以后做事呢小心一点，不要搞那么大的

动作。你们怎么争取社保我是支持的，但是不要太过激。”

问：慧芝那边是不是压力很大？

答：我们也没感觉到压力，是和她谈话了，但也没有调查到公司里去啊。那个负责人问她什么工作。他说你们不要搞那么多事。镇政府里的那个谁跟你们很熟的，替你们求情，也不知道是真话假话。

问：除了你和慧芝，还有几个代表是本地的？

答：还有几个是岭辉镇的。其实我们代表真的做事的，没多少个。很多人的身份是在代表和联络员之间。他们是代表的身份，却只做了联络员的事。联络大家他们是会做，但是实际行动呢就不行了。没有真正起到代表的作用。

访谈时间：2012年3月

访谈背景：永宝工人在2011年11月份去某市政府上访后，某区领导出面承诺将会负责他们社保补缴。工人在2011年12月底陆续上交了相关证明和费用，但公司方的费用却一直没有上交。崔明杰谈了从行动开始到现在遇到的诸多问题。

## 追缴社保的起源

问：最早是怎样发起追社保这个事情的呢？

崔明杰：我从头跟你说。大概是在2009年，我们起版部有一个主管，好像是海关的人介绍过来的，有一些背景。他不用做什么事，拿好几千块一个月的工资。他做了四五年，后来金融风暴的时候，



公司把他炒掉。那人请了律师告公司，拿回来十万左右。我觉得这个就是导火线了。后来呢，他一个表弟，也是我们部门的，讲他怎么怎么厉害，让公司赔了钱，里面包括社保的钱（公司欠缴的社保，折算成现金赔付给他）。我们一听，哎呀，社保还有的赔？我们到现在都没社保，这不是太亏了吗？我们就气恼啊，就这样在我们部门搞了个集体签名，去找人事部买社保。那时人事部也不愿意买，还吵了一架，但公司应该也知道不买不行了。后来发了个全厂公告，说谁愿意买就给买。

那时候刚刚是八月份。我们每年八月份涨工资。公司让我们自己选买或者不买社保，不买工资就涨 100 元，买就涨 20 或 30 元。所以我们要买社保的人涨的工资就变少了。后来到底那个经济一直不好，订单没有那么多，公司就裁减起版部的人，让师傅挑出那些做不出要求产量的那些人，炒掉。被炒掉的几个大都不是带头要社保的。所以在我看来不是针对社保带头的人。其实带头的慧芝呀，宏强呀，他们都没炒。

后来，被炒掉的那些人里面有人通过老乡认识涛哥，又听说有个什么机构，说如果被炒掉了不合理，可以要赔偿。就有几个人去机构问，又发觉不止追社保，还可以要年终奖什么的。再后来被炒掉的几个人的仲裁书下来了，我们看到上面还写以前的社保要怎么处理。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要求买社保成功了，有些勇气了，我们就立刻像上次一样整个部门都签了名，签了名就给到人事部。但是呢，工厂没有理会我们，意思就没当我们什么。后来呢，我们问了劳工机构，教我们联络更多一点工友才可以啊，我们就回去跟别的部门的人说。



当时其他部门其实也有炒人的，但那些人没有去追呀。

问：其他部门的人知道七人仲裁书这个事情吗？

崔明杰：他们不知道。我们自己部门的人有联络才知道的嘛。就像那炒了的那个主管，他表弟不说，我们就不知道啦。原来都是我们一个部门签下去，仲裁啦，也没有组织别的部门一起来搞啊。后来呢，大家感觉厂方没有什么动静，我们成不了威胁，后来就发起多一点人，就 100 多人啦。

问：你们是怎么联系到其他部门人的？

崔明杰：打个比方，我是你表哥，你是我表姐，或者老乡呀，同学什么的，进厂你分配到这个部门，我分配到那个这样的，彼此之间有联系。

问：从你们一个部门到其他部门都知道，用了多久？

崔明杰：2010 年 8 月份我们要求买社保，11、12 月的时候就炒掉我们起版部的人。差不多 2011 年 4、5 月，被炒的几个人收到了仲裁书，我们 5 月份就要厂方补我们的社保。拉锯了两个月，到 7 月份左右了，我们就又联络了 100 多个人这样子。

## 有关代表选举

崔明杰：那时候也不说什么代表，起码每个部门就要有一个联络员，做了联络员，就算是代表了。我们的代表都是从联络员（做起）。宣传社保的事情，还有就是从劳工机构那里知道的事情，转告给本部门的同事们去说一下。

问：开始选代表是劳工机构建议的还是工人自己觉得应该选呀？

崔明杰：其实那时是因为工厂有一系列动作，要把我们两个员工炒掉呀，开始准备放假呀。我们看见厂方可能要行动了，那时自己也明白应该要选代表了。毕竟我们几十，一百多人，没有代表的话就很难做，很难搞下去。那时候劳工机构建议把我们的代表名单（公布出来）。之前谁是代表，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只是没有说出来。劳工机构讲，我们代表表明身份以后，如果工厂对我们有什么行动的话，就不能像对待普通员工那样，法律上会给代表一个保障。我们去政府或者工厂谈，亮明我们代表的身份，谈的时候也可以知道是哪几个，也好说一点。以前工厂只知道这十几个人比较踊跃，比较难弄，但是不知道到底该跟谁说。后来我们去政府那边信访什么的，政府要求我们五个人进去谈，我们就意识到明确哪几个人是代表会更好一点。

问：首席工人代表，跟其他工人代表有什么区别？

崔明杰：其实这个工人首席代表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只是感觉到选出来一个比较有号召力的人吧。首席代表这一类的称呼都是劳工机构那边帮我们起草的。在他们心目中最勇敢，尽最大力量去做事，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他们看我最勇敢，就让我填到首席代表里，我就填一下而已。

我原本都不是代表，就是后来呢，劳工机构服务部那边说要去香港，参加学习呀什么的。那时候我去了，去了以后，看见那么多人帮助，那些律师呀工会的人呀，学习那个经验什么的，那时感觉了解到了很多东西，打起了我的勇气。

去了香港，其实只是一个引子而已，也不是马上得到了什么。主要是回来的时候学的多。像涛哥他们就是给我们讲解怎么样做，说话大声一点，策略什么的。

问：你们厂第一批的 128 个工人都去过劳工机构吗？

崔明杰：没有，一直都是代表、联络员那十几个人经常过去机

构。其实很大部份人都是在等待，认为他们签了名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想法。

问：代表里有没有班组长之类的管理？

崔明杰：没有。只有一个联络员是组长，让他亮明代表身份时他就不亮明。后来他被厂里撤职了，所以后来一些组长只敢签名不敢出面了。

## 做代表受到的威胁

崔明杰：其实出面跟不出面，还是有一点分别的。你只是签个名，没做多少事，也没那么显眼。你出面了，厂里就知道谁在搞小动作。

像我，怎么说呢，过年的时候，工厂叫了我们村黑道上的一个人，那人也是我的同学，跟我说了一次，叫我不要搞了一类的话。其实我的那个同学也不是说有多大能力，他背后的那个人才是个头目。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带头做点什么，还是不做。如果我不继续带头呢，他们也不会对我做什么。如果再带头呢，就有一点可能会搞我。

其实我是外地人还好，不怕事嘛，如果有什么麻烦我离开这里就行了。但我家人都在这……其实现在我也不敢跟工友们说。如果说了，做得不那么积极了，就怕他们会说我怕了。但是如果我做下去呢，我也了解过现在黑社会（的运作）。黑老大是本地的，下面养一些外地的打手。黑老大跟几个老板，给他们当保镖。老板给他 50 万，让他搞定什么人，他就拿 10 万给那些外地的打手搞，打手做完事走掉就行。本地的那个黑老大没事，雇凶的老板也没事。我就怕这个。



问：之前黑社会做什么？

崔明杰：以前的黑社会呢，就是开一个赌场，开一个舞厅，吸毒，喝酒，还有赌钱，在里面赚钱、打架也最多。现在就没有那些吸毒的，吃摇头丸的了。

问：其他本地工人有没有遇到威胁？

崔明杰：没有听说。我感觉因为我是总代表嘛。

其实说真的，如果我不做代表了，第二批可能就难一点了，因为第二批的那些人还没有选出代表，还没组成一层一层的那个架构，还没有那种团结力。他们都是直接打电话问我，怎么搞啊，怎么还没有动静呀，什么什么的。所以呢，现在，我就着急，感觉到第二批的人还不算团结。看上去就好像他们就是看着我，只要我勇敢一点，他们跟着冲。如果我不带头呢，他们就不敢冲了。我就怕这个。

第一批的人思想就比较积极一点，因为其他代表知道的也蛮多的，就算我下来不做代表了，如果按正常程序的话，他们应该也可以做得到。但我也看到，他们也不想搞那么多事情了。现在好像是被逼着干代表一样的。因为如果你做了代表呀，就有那个责任感。好像劳工机构有什么要大家去商量的，就算你有事也要去一趟，尽那个职责。如果你是代表，每次都不到场的话，说不过去，对不起那个责任。但如果没做代表什么的，有那个时间就可以去，没那个时间就可以推掉，但是既然做了代表，就尽力把第一批的完成，但是可能就不管第二批那么多了。

看见他第二批的人还像一盘散沙一样，如果要我带起来也是很费力的。

问：第二批人一盘散沙表现在哪里呀？

崔明杰：要叫他们做代表呀，要做多一点事，这个可能就难，他们的心就难催一点了，就像我们去走这个部门走那个部门投诉那样，他们就很不愿意，就有很多人说没去过，不知道怎么和政府的人说话一类的。

问：你开始做代表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以后会被威胁呀？

崔明杰：有。其实很早以前呢，涛哥、劳工机构那些人也说了，厂里可能会运用政府呀，或者什么势力来搞我们，但那时没经历过这些。我一来机构学习，就是跟他们去开会呀什么的。我那时候兴奋起来了，就什么也不怕。

我去了香港，有些人说我就好像是被传销洗了脑那样（笑）。其实有一点，我想了想，我那时听到他们说，我们做这些是维护自己权益呀，还有什么什么的法律规定，就勇敢很多。可是后来呢，我那个黑道的同学他最开始不是直接找我，而是找我兄弟呀什么的。他跟我兄弟说：你的这个弟弟，现在出事了，得罪了一个老板，下了江湖格杀令了什么的。就说这些，弄得我全部家人都知道了。我哥哥听了以后打电话给我，叫我跟那个黑道同学联络。我去谈了，我也讲明了我的态度。但是我的哥哥呀还有我的什么人呀，关心我的事情，他们就劝我不要搞了。他们的意思就好像我去劳工机构，是上了传销的课。他们不了解我的情况呀什么的，就知道我得罪了人。这样说吧，如果那些麻烦只是我个人的，我可以自己做主，但是我继续下去，我的亲人呀也劝我。这边让我进，那边让我退，两边声音一起来我就很烦了嘛。

问：你怎么回复那个黑道同学的？

崔明杰：老板跟他说，你们那边的那个人很麻烦了，意思要搞我啊什么的。他也跟我说：你好好的一个本地人，为什么这样搞呢？我也知道你是在厂里打工的，不是出来混的，也没有在黑道上去搞

什么麻烦。我就跟他说了：是厂里不合法啊，还有就是他的管理问题，他没有把我们社保的事放在眼里，我们才会做这个事。就算搞定我，我不做代表了，也还会有别人上来。还有我们的工资那么低，我们怎么吃饭呢？我就跟他说这些了。他说他去跟老板聊，后来就没找我了。现在我就不怕了，但是又不知道还带不带头，如果带头了，说不定又找我了。

那天我也跟涛哥说了这件事。他也是说，我们不是去搞什么事去威胁谁，我们只是要回我们自己的东西，老板是违法的一类的。

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如果没有了我，我们的追社保呀什么的，还可以达到，只是时间可能比较长了。因为我现在做总代表的话，我感觉我说的很多话，工人都听得进去，如果别的人说就不一定。我看到这个现象了，就看到我的作用比较大了。就好像去区政府开始，我亮明了总代表，别的工人看见我签了名，做总代表，就看着你怎么做。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怕，说真的，就像迷了魂了，什么也不怕。我也带头去区政府，市政府什么的，每次谈判我也去。就好像搞革命，我站在那里喊话呀，通报什么事情下去。就好像以前搞革命站在台中间，你站过几次了，他们就知道谁重要了嘛，就看着我的头了，另外的人站上去就不同了。

去市政府以前，我们在岭辉镇那边的球场号召人，先开一个会说我们明天去。那时候我也在那里讲了我们明天去哪里呀，什么的。我就站在那里，那个名就出来了，那个领导能力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说了，他们就响应了。看见他们响应了，我的心……我就想做更好啊，就这样。大家也支持我，我也更大胆了。我更大胆了，他们就更加信我了。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其实改组工会是很重要的。改组了工会，如果身为工会委员，我发一下言、跟他谈判什么的是正常的，做少很多事情的，我就明白这个道理。现在的情况就好像每一次都是农民起义一样。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身份，就给威胁了。

追社保的这些人，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去过劳工机构服务部，其他都没去过。他们不知道改组工会这个作用的。（劝他们）追社保我们回去都要花费很多口水，改组工会就更难了。职业病我们也了解过，跟他们说，他们也不了解，吊不起他们胃口，别说改组工会了。他们会说改组工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吗？改组工会，真的，对我们做代表有用，对他们，其实，作用大到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就算我说服了你，说服不了别人，很难搞。所以我很想他们去学习，去学习了就明白了，这个才可以改变我们工人的那个思想的。就算经过我们这一次追社保，做过代表，如果以后有什么经历，去别的厂有什么维权的，那 200 个人，我想以后如果再被欺负，就算他们知道怎么做，也许还是不敢去追。但是我们这些代表，经过了这些东西，以后打工啊，或者以后出来给人欺负啊，可能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所以我感觉到，如果你没有去学习，就算你追过，也好像对你以后没有什么用。

## 和工厂、政府的交涉

问：厂里那时出了个方案，说从 2004 年补起，是想分化工人吗？其他人有没有担心你的符合条件了，就不做代表了啊？

崔明杰：我感觉那也不是分化。厂里说 04 年，就是想减轻它的负担。其实那时候，100 多个人，只有 20 多个人符合，代表里就我符合条件。就算我肯，其他人也不肯。怎么说呢，就算我想答应，100 多双眼睛看着你，也不敢答应，做了叛徒了。那天去拿结果的时候，政府那个人知道我符合要求，他说：你就符合了，你的心就定下来了吧。那时候我肯定很开心了。后来回去，其他代表还有一点意见，说我开心也不要表露出来啊。虽然我不能同意这个方案，但是还是会高兴一下子啊。



问：厂里和政府的人都和你谈过吗？

崔明杰：厂里没有跟我们直接谈的。我们也从来没有跟厂里谈。厂里刚换了人事部主任时，他暗示我，跟我说可以和他私聊啊，可以和工厂谈。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那时候我的心很红啊，真的，我的心没想过为了自己。

政府的人非正式地跟我们谈过一次。我们后来都不跟政府谈了。因为政府每次谈，都是要我们放弃一点东西的。我们的要求就是全部按照工龄买，政府就是谈 2004 年才买。他只是劝，他不让步，我们也不让步，就不谈。

现在想起来第一次去劳动所和他们谈的时候，觉得很搞笑了。他问：“你们追以前的社保，你们知道是怎么算的吗？按哪个规矩？哪一条？你们知不知道？”就这样跟我们说。我们当然知道了，我们那时只去学习过一两次，只听劳工机构说可以追以前的。按哪一条啊，怎么算的，哪个部门管，我们都不知道。不过我们当时回复他说我们当然知道了，法律规定有的，难道法律不给的吗？我们就是说这几句了，然后他就说：“是，你们是不是看了新闻上，很多人可以追怎么追一类的？我是劳动部门的，我跟你讲啊，你看新闻的，你知不知道他们符合什么要求？你们也想追？但要符合条件啊。就算你们符合条件，还要经过地税局啊，社保局啊，一步一步来。



不然还要找律师啊，打官司啊。现在在社保这方面，我跟你讲白了，就算是你告到去某市政府，现在哪一个部门给钱，哪一个部门管社保，现在政府也才刚刚有人在处理这个事情，具体哪个部门也没定下来。就算你们去闹，这个事情也是被放在一边的，不会处理的。现在法律条文什么的都是刚刚出来，刚刚起草，你们符不符合的还

不好说。这个事一时归社保局管，一时归地税局管，上面区政府也不知道是哪管，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的。前面是政府管的，后来又去税务了，权力文件还没有转交。以前你们那的人追了这么久是政府管的，政府要给多少钱，现在是地税了，又给多少钱。这个比例呀什么的，上面还没开会商量。上面的还不知道怎么算这个数。”

问：那你现在怎么理解他说的这些话？

崔明杰：现在就知道怎么算了。那时候他们也知道我们没了解多少。原来政府跟我们谈，后来又是派出所教导员什么的跟我们谈。派出所的就跟我们说：“你们搞这个社保每次是不是都开什么会啊？你们知不知道这是非法集会啊。还有什么宣传的，你们说的话要负责任的，如果你们说错了一点，你们就麻烦了，我们就不客气了。”吓唬我们。意思就是如果你们追社保不合法跟别人说是合法的话，你是带头的，就要负责任，就要抓你的。

问：当时他们这么连哄带骗的，会不会对你们那会行动上有影响？

崔明杰：是。刚听他们这么说的时侯，是有点怕的。有一次我们3个人去镇政府谈了。政府的谈完，派出所的人就进来，就留下我一个，跟我私下说：“你是本地的，搞那么多干什么。说好听点是老乡，说不好听，老乡都没有面子给的。我知道是谁帮助你们的，是不是李主任他们啊。你知不知道他们帮你们有什么目的，知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我现在是跟踪他们的。你想想，他们为什么那样帮你们，没有目的地帮你们。你想谁会这样做。现在你们搞得还好还好，搞不好麻烦的是你们啊。我们是老乡，劝你们一句，你知道他是律师，他明白的，他教唆你们，你们去搞什么了，抓的是抓你们。我们也不好意思抓老乡啊，但是你们这样搞，就算是老乡也没有面给。有一次有个领导还和我们说，占领华尔街什么的，这些都是搞煽动的，是不是有人瞄上我们中国，教唆你们搞事什么的。”

问：那他说完你们当时心里会不会想真的会是这样啊之类的，机构利用你们做不好的事情？

崔明杰：没有啊，很奇怪啊，很信劳工机构的。那个信任真的好像撞了邪一样。因为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但有一个重要的，他们没要过我们一分钱。还有开会的时候也真的学到了东西，主要讲的都是法律一类的。都是说维权了，也没有别的啊。看到别的个案都是维权了，也没什么，就很信机构了。

问：那你们这些跟镇政府的谈话，有没有和其他工友说过？

崔明杰：实际的情况没有详细说过，就说他们想吓唬我们，我们不怕。因为感觉也没什么可说。每次去谈都是那几句话，说来说去都是那样。实际谈什么我们难道还每一句都翻译吗。后来劳工机构的职员她们就说：他们经常叫我们3个人去谈，会不会耍什么花招？会不会中他们的计？每次去谈也没有实际的东西，到时候再让工友说我们被收买了什么的，不如不去。后来我们就没有再谈了。其实他们每次都是谈那几样东西，让我们收手什么的。我们每次都是说不答应，

第一次政府叫我们的时候，我们肯定去的了，因为我们的想法是政府让我们去我们敢不去吗。后来主任说叫你们去你们就去吗，可以不去啊。第二次再叫我们，我们就说不去了，要谈就来厂里谈。然后他强硬一点，就大声一点说，现在你们追社保啊，不是要谈的吗，不谈可以的吗。我们就又去了。后来第三次我们都不想去，他又叫派出所的打电话给我，很严厉地跟我说：“你来不来啊，我们十几个人等着你们三个，我们那么多工作不做，等着你们过来，谈论你们这些事情，你们说不来就不来的吗？有什么事你们负责啊。”这样我们就又去了。机构建议我们：以后没有实际的东西，没有给明确的议题，不管什么领导啊区长啊，要他们给一个公告，有话题的才去。没有实际的东西我们就不去了。要让我们想一下可不可以谈，

我们才去。因为每次都是厂里通知我们去谈，我们就跟厂方说了这个意思，后来政府的人就不再叫了。

问：你们每次去和政府谈，有没有厂方的代表？

崔明杰：没有啊。我们问过，为什么不找厂里一起谈？他就说他们是中间人做协调，今天听我们的，然后再跟厂里说，厂里有什么答复再和我们说。不然，双方坐在一起谈，有不同意见的肯定闹起来了，那还怎么谈呢？所以开始，我们都没跟厂里谈过的。后来去了区政府以后，才有厂里出席。但是谈来谈去，都是我们一方对他们两方，都是这样。厂里说一句，政府的都帮他们说好话的。

问：跟他们政府的人谈的时候有没有录音？

崔明杰：以前没有，不敢，后来才有。

## 劳工机构的作用

问：有个工友说过，要是没有劳工机构，你们早散了。你怎么评价机构的作用？

崔明杰：这行动是我们的行动。就好像是打仗一样，机构好像是参谋部一样的。很多东西我们想不到的嘛。打个比方，好像我们以前去劳动局，他就让我们去调解啊什么的，就没有下文了。我们向区政府提出的要求，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没有答案，现在应该去找哪个部门啊，怎么谈啊，我们的底线在哪里。这些都是要咨询他们的，我们不知道的。后来我们去政府之前就先到劳工机构那边开一个会，问一问，我们进去谈判底线是什么。他们会告诉我们，至少要政府给个受理的报告给我们，要写明期限，一个月后或者一个星期后给我们答复。如果回复说正在调查啊，等消息啊什么的，这类

回复就不要了，没有用。这样就比你自己去 10 次都好。他们就是给我们出主意。不然没有机构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去找政府，肯定是踢皮球的。

我去了香港以后，每个星期都去劳工机构一次。那个时候我们学的很多，学法律啊，学别人去追社保的例子，别人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就选取可行的那套方案。我的作用就是去打仗不怕死，够胆去。机构教会了我们，我们自己去冲。

如果没有去学习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没去听课，那个思想出不来，就不够胆。我激动起来才够胆的。如果我没去过的话，你叫我走在前边我不敢，说真的不够胆。去听了，特别是听到别人是怎么做的，心里就有底。就好像第一次派出所找我们去谈话，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都很怕的啦，都是一步一步（转变）的。

我第一次去镇政府，也不会说话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说，打结的，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都是一步一步来。第一批人，很多人都是身经百战的，也可以够胆去要求什么的。但第二批没有这样的人，还没有去打过仗。

像劳工机构这样的，我感觉是很有必要的，对我们工人是很有好处的。特别是去学习。为什么我进步那么大呢？我跟劳工机构去了两次香港，去了一次深圳，见识很多人。如果不出去的话，就看不到那么多东西。我感觉很多工人的意识都上不去。像我去多了，看多了，就好像明白多一点，其实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去劳工机构，也是学习，去香港去深圳就更好，因为那边都是大律师，大学的教授。

问：你是觉得他们说的话更有权威，还是更在理？



崔明杰：很奇怪，我感觉到他们没什么用。每个都是什么大学的，法学教授啊，什么工会的主席。但是他们说的话好像跟我们没关系（笑）。那些人说的话太高层次了，他们说体制内，体制外。我都不知道什么是体制内体制外，我只知道我们工人有什么可以追，有什么不可以追。但他们说的那个学术论文，什么马克思的什么思想啊，还有法国的什么名字的，说的什么话啊。他是谁我也不知道，怎么知道他说过什么。他们说的太外了，说的那个是大道理，就好像我们只知道自己的东西。说白了，他们就是不了解基层的东西，我一说我们的事情，他们好像很惊讶的，每个人都问我，你们多少人追，怎么追呀。他们只知道什么国营的，什么养老金的，已经搞得那么好，搞的那么普遍，难道你们都没有？广东人不是很有钱吗？不是先富起来吗？

法学教授，律师什么的，如果说怎么谈判啦，他们也教不了我们，好像断了层。如果我们直接跟劳工机构联络，劳工机构跟那些人联络，这样可能就好。我感觉到他们也帮不了我。他们不知道怎么争取的。还有一个法学教授还跟我说，这个根本是你们政府的无能。我当然知道政府的无能了，问题是我怎么能买到社保啊。

虽然和他们谈不来，但是我知道他们想帮人，但是他们找不到人。如果自己（指工人）做多一点，做的轰动一点，他们可能就知道了。

但是那个眼界是开阔了，这个是真的。如果我跟劳工机构学多一点，可能就明白怎么跟他们沟通了。有一些人我也知道他是真心的，也想了解我们基层的情况，可能他也找不到人问。就好像他在政府的屋子里，什么统计局啊，别人给他数据，他看那个数据，签一个名而已。就好像一个皇帝没有下过来看过民情一样，总是什么人给奏折他看。那里有一个律师说的一句很好，就是大家一起旅行，如果在沙漠里面，死的最晚的就是那些统计局的人，因为他们水分最多啊。就好像我们下边没有社保的事情，搞到区政府那里抹去一

点，到市政府那里再抹去一点，到省长那里，谁知道没有社保吗。

像我去香港呀，我不明白那些法学教授呀，还有什么领导呀在说什么。但知道他们是想帮我们的。我们这样走下去是有人帮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学到什么法律。我们追社保是按照第几条呀，但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年龄呀才可以追，社保呀这个五险一金什么的，哪部法律里有加工资呀，第几条呀这个详细我们真的不去研究，最重要的是那个勇气找回来，所以去学不是学别的东西，就是去打气，看到别人都是怎样做的。

但是很怪的，像我去劳工机构学习，知道法律规定是什么，但就算我回来给别人说几天都没用的，没人听我的。我只要说什么律师，什么人物，说可以追（社保）了，说是合法的，大家就信。

我们信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详细的東西，而是我们觉得他们说的什么是对的，对我们是有用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去听了那个勇气就出来了。

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以前为什么那么勇敢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了劳工机构，打官司不要钱，我们怎样都不会亏钱。

之前很多工友包括代表都把劳工机构当成是工会呀、律师事务所来看的，其实很混乱的。那会机构的人也说了很多次他们不是工会，不是律师，只是一个 NGO 啊什么的。但我们都不知道 ABC 的事，你说 NGO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

就说涛哥，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敬重他。他知道怎么追呀什么的，敢出头，就这样。我们就佩服他，就相信他啦。在我们的心目中呢，涛哥的地位可能比主任的地位还高一些，因为涛哥也是珠宝工人，贴近我们嘛。

主任就没有那么敢做。我想，也可能是地位的不同呀，主任他是一个机构的负责人。涛哥就不是呀，他怎么冲也不会连累那么多人。涛哥，他每次都是叫我们勇敢一点，说话狠一点。主任就说相信政府呀。可能主任经历那么多，可能有些顾虑，也说不定。

问：开始时给厂里写要求都是工人自己写的，后来就改成机构的人写了？

崔明杰：是的。原本我们就我们写的，以前就写我们要买从入职的社保呀，但是如果看到文件里要写年月日呀按照什么法律第几条呀，我们就不会写。

我们一步一步谈判下去就怕写错什么，给他有了把柄呀。但是如果我写的正规一点，感觉就有法律效力一样的。我们乱写呢，就怕他们会不理。还有，后来要写的材料越来越多，我们就感觉到写那个东西要包含很多法律的词语，不知道怎么写。

后来我们有些依赖机构的人了。机构的人可能也意识到了，就又叫我们自己写。我就叫你帮忙一下，要是写大白话，我们自己会写，那些规范的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写了。

问：你们之前有没有因为自己写的不规范被对方真的抓住把柄？

崔明杰：也没有啊。可能就是我们的态度，机构的人写的好。就好像那个是高级的人写的。

问：你们有没有和律师直接联系过？

崔明杰：从来没有联络过律师，只是我去开会，去香港呀去深圳呀，接触那些律师才是真正的律师。主任叫过一次本地律师来给我们讲解。就是我们遇到什么法律的问题劳工机构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他们才叫那些律师。还有一次，劳工律所的律师给我们讲解的一次，你也在场的那次。

## 第二批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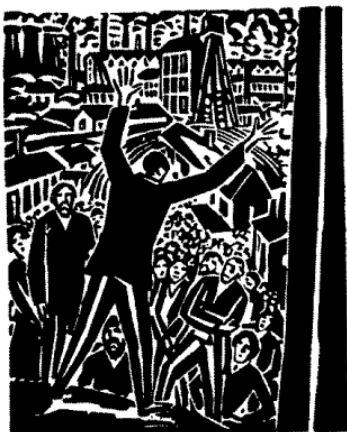
崔明杰：我说白了，放了假，很多人都找别的工作，赚外快。



只是我和另外一个代表在跑这些事情，想多找另外一个人都没有，这样很泄气的。如果我们第一批搞定了，第二批的还没有冲锋过，还要带着他们做事，很累的。我们的心情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还没搞定，一半为自己，一半带着别人，所以还在做代表。可以这样说，我搞定了，我还带别人干什么？那个劲头都没有。看见别人还在赚钱，我自己还在跑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正义感啊什么的，其实我也是要吃饭啊。

如果要我们尽力帮他们的话，下边的也要给我们表现出来啊。他们够胆了，他们已经谈过了，也不要我那么费劲了，我才做的啊，人都是这样（笑）。劳工机构其实也是这样的，一边教我们怎么冲，冲好几次，我们就知道冲也不怕。原本我们都是怕的。如果我去不了劳工机构，叫他打官司，把全部事情都交给他们做，他们也不想做，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他们都想把事情交给我：你崔明杰肯定会搞定的嘛。一说让他做代表，做多一点，联络啊什么的，他们就说“我都没试过，你要我怎么去做呢？又没有口才”。我就说，你对我说的话，对政府啊，对工厂照说一遍，问他们什么时候搞定就行了。

还有第二批很多人打过电话给我，问我不是说两批一起的吗，你们说的不算的吗？



问：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给第二批承诺过，会和第一批一起？

崔明杰：当时我们承诺就是我们会帮他的。他们就以为，什么都帮他们。但是他们没有代表出来。其实我们第一批的代表都想做第二批的顾问，不用去冲，少很多事。我可以什么都告诉你，你叫我去（替你）冲，那个就累很多了。大家就

是这样。做了那么久，我就明白是分几层的嘛。第二批就脱了架，没有代表。就好像一个班，有组长、班长啊，我们第一批的战斗力就是这样形成的。我是组长，劳工机构是老师，其实架构是这样就行了。第二批的人，第一是怕，第二是不想动。第二批没人去过劳工机构学习。最主要是多去几次，去过一次两次，第三次你就不怕政府了，说白了就是这样的，只要那个经验就行了。

过完年，现在我的心态有一点转变了，也不要那么冲动了。第一批基本上是搞定了。有工人也劝我，不要太过突出了，要不会麻烦的。那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其实第一批的如果出头了，就适可而止。如果你什么也管，管了第二批也要管第三批，就好像你一个人，你是总代表，你什么也要管，老板肯定针对你的。我那个工友的想法很好的，厂里那么多人，我就佩服他，他就好，他就不出面。其实他不出面也有他的好处，就是这样。这样生存得久一些。如果太出头了，肯定死的。劳工机构还说加班费呀，职业病什么的也可争取，但是其实很难做工作。我们社保搞的有声有色，还搞不到第二批的人过来接力，别说加班费，职业病啊。

问：是不是很多人拿到社保了就不想再争了？

崔明杰：很多人是这个想法。我都担心，第一批搞完了，第二批没人上，何况是第三批。现在追社保，没人再起来，我们的士气也一步一步退下去了，我们有些代表就想搞完社保算了。就好像我们以前追社保都跑那么久，代价那么大，如果加班费、职业病这些事还是像以前一样，代表没有什么回报，还是只给一点车费啊什么的，工作量又大，没人敢提，谁提出来肯定谁要多做事。

问：你们附近有个摩托车厂，那些人也想找你们学习怎么追社保呢。

崔明杰：我也看到很多人想追。其实我现在的心态就是想帮那些想追的人，我跟他说怎么做，但不用我带头，这个很好做，也有

意义。像带我们的厂，第二批的，如果他们愿意做，我带他们也可以。但是第三批，都没有人问，我也不想做那么多。

慧芝被放假后，她在外面打零工的时候又给工作中的同事宣传社保的事。然后那些人也去机构学习，就像我们以前一样。

其实就是这样的，很奇怪的，没有看到成功的例子，你怎么劝也很难跟他说。你跟他说我拿到了多少钱了，他才动那个劲呢。

现在我感觉很多厂的维权的意识也增加了，电视宣传啊，工人之间宣传啊，意识是强了。

这一路走来，像以前我们没追社保不知道的，不是不敢。我们每个人都没买，也没所谓啊。以前有些人能买，比如领导的弟弟啊，他给那个名额，他肯定能买了。我们去问的时候，他说没那个名额，我们也就走了。那个心态就好像现在第二批的人不想再进一步一样，怕他其他地方为难你，不想搞那么多事。每个人的心都是这样。

我们打个比方，那时候我们第一次签名时，那张纸最上面写的是要求，挨着要求下面是签名。他们带头的就签在上面，有一个胆小的就签在下面，然后再有人签名也就签在下面，中间空着一块没人签的。就分两批的，很明显的。这就是人的心态的问题了。如果没人在最下面签呢，他就跟着在上面签。如果有人在下面签呢，他就跟着在下面签呢。

## 代表的工作和分工

问：代表之间有没有分工？比如谁做宣传？谁管财务？

崔明杰：财务有个专人做。其实钱我们是有的，加上第二批，总共有 20000 块了，现在就花了 6000 多，不敢花。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结果。现在没有给代表钱，只是报销车费。一直以来，就给了我 100 块电话费，我一个月就花完了，真的亏很多啦。我自己有

车，有时候自己去问一下情况，也不好意思去报销油钱什么的。

你给钱，人家才有动力嘛。没有钱收，你叫我去跑，我跑一天两天没事，跑多了，你们每个人都在做事挣钱，我又没有钱收，就亏了，就不想了。有人提议过，除了报销车费，再给钱。打个比方，今天我们代表要去政府问情况，就报销车费，再给 50 块。因为别的工友都在另外的厂在做工啊。就算我没事做，每天在家里睡觉也不用出门跑这些事啊。这个事情大家轻轻的讨论过几次，有一部分人就说要补，像我们就说要补，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很多啊。有一部分人就说，如果要补，这个钱很快就用完了，就不补就算了，也没实际探讨下去。我们每个人心里最怕就是社保还没追来，钱已经花完了，怎么叫他们再给啊。所以也不敢花。

问，开始捐钱的时候还是挺顺利的是吧？谁提出来要集资的？工人吗？

崔明杰：顺利。那时候我还没有做代表，可能是主任提的吧。因为那时候是主任叫我们找多一点人，找多一点部门。然后该怎么办，我们就问劳工机构的了，都是他们教的了。

问：你们有没有公布过账目？其他人有没有质疑过你们有没有乱花过？

崔明杰：这个数我们也不是太多公布，会记账。我们公布过一次，花了多少还剩多少，但是每一笔账我们不公布。他们也不会质疑，其实 100 块对他们来说，也不太会质疑。他们也不会问你具体怎么花，没有人问过的。

如果钱花完了搞到社保了还是值得的，但是要是钱花完了社保还没要到，再让大家给钱的话，很大一部分人会给，但是肯定有人不给的，那样就不公平了，就怕这个。但我们花得也太小心了。我做到现在就报销了 300，但其实我真的再亏 300 进去也是有的。我打电话打了 300 多都不止了，才充了 100 块。放假的时候，于航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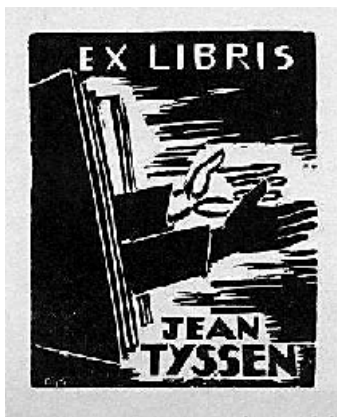
们提过几次，但其他代表就是不给。长远看来，又没工作，一边还要自己掏钱，掏时间，我现在……好像……想做事是想做，现在学了那么多，要是像劳工机构那样给别人一点意见，最轻松就是这样的，我很乐意的，这个是真的。上了那么多课，学了那么多东西，做了代表那么久，这个（给别人帮忙出主意的）心是有的。

问：我看你们一直说自己是永宝啊，但是厂服上面是永义，是改过公司名？

崔明杰：是。可能是因为，那时刚刚引资建厂，税呀什么的比较低。几年以后，没有免税资格了，2004年又改个公司名，那个税又可以优惠多少年，就是这个意思。

问：你们提要求的时候，提的是永宝还是永义呀？

崔明杰：我们就说永宝公司，但后来公司说也不全是永宝的责任。那天于航他们被放假，去问人事社保的情况，厂里就贴了两张出来，一张是130多个人是永义的，有108个工友是永宝的，反正就是分两段了，前一段永义负责，后一段永宝负责。厂里就要赖皮，叫我们出证据（证明永宝、永义实际上是同一家公司）呢。这个打官司要费很多力气。



其实政府已经表态了，要买社保。但公司现在就是拖，能少交一个是一个。因为公司统计说，如果全厂全都补了社保要一千多万。

唉，所以我就看后面那些人 不报名，他们报名我们当然帮他追的，但是发动不了他们，如果他们自己不做多一点，后来可能又怪我们。其实很多都是这样，

问：平时跟政府或跟厂里谈的结果，怎么跟大家通报？

崔明杰：现在我们很松散的，没有什么通不通报。有什么事都是我们几个代表研究一样。重大的结果会宣布。打个比方，我们去市政府是要求全部人去的，当然全部人就知道了。后来那几次谈判，什么时候给我们答复，我们就按照那个答复，约大家到广场，一般都是我来宣布现在的结果，说说下一步怎么走。

士气最高的时候就是厂里放我们假的时候，我们那个火就来了。那个时候每次去区政府是 100 多人，去市政府也是 100 多人，后来他给答复的日子，我们也带 100 多人去广场（镇政府旁）。我们在里面谈，要大家在那里等。我们收到消息立即过去通知大家，那时候的士气就行。后来政府给了答复，我们也把（个人补缴）钱给了工厂。那时候那个士气就开始沉了，（大家认为）钱都交了，就等消息了。如果问最新的消息，一般的工友就好像认为也不一定要他去啊，代表去就行了。这个说没时间，那个说没时间。就是这样的，（士气）上的快，下的快。

后来过年我们要求厂里把资料交给政府啊，很多人都说叫我去，我又没有时间，后来我就找了两个有时间的去问了一下。我想叫多一点人去，很多人就说没时间，我就很没心情。所以就在我们的 Q 群那里说一下就算了。

问：有没有代表中间退出的？开始很积极后来就因为什么不想做代表了？

崔明杰：有一个代表的老公在家里养猪，让她回去一起搞，她就辞职了。怎么说呢，有的代表一直以来都是不温不火，他也想做代表呀，但他是不想做那么多。以前很积极的，但是后来不积极的代表，就没有。他原本不积极的到现在也是不积极，就是比别的人好一点，很多都是这样的啊。以前不积极现在积极的就有。

访谈时间：2012年5月2号

访谈背景：崔明杰刚刚被释放后，我们联系到他，了解4月份集体行动的前因后果，工人和人事主管冲突的经过，以及他后来被审讯、关到看守所的经历。

## 工人决定去找厂方讨说法

工人补缴社保的钱交上去之后，公司方迟迟未动。我们想了一些方案。第一步是催X书记。因为过年前是他拍板决定我们的事。所以先给他压力，让他拿主意。

我们几个工人轮流给他打电话。他被打烦了，说我们骚扰他。于航对他说：“我在你工作时间给你打工作电话谈工作的事情，怎么能说是骚扰呢？”他被我们问得不耐烦了，又没理由拒绝，就跟一个工友说把资料给他。我们就邮寄了每个人交了钱的收据、每个人所面临的问题给他。

他收了材料还是没消息。我又打给他，他一会说去湖南公干，还要等几天，一会又说去北京开会。后来他又推脱说你们的钱是给了工厂，有什么问题去找工厂。我们找政府也总是没结果，就想到还是去工厂。毕竟要上交钱的是工厂。可能真的是工厂不愿意给它的那一部分呢？

我们那会还有一个提议，就去更高级的省级地方。但是想到冤有头债有主，给钱的还是老板，还是要找工厂。以前也是找上面上访，最后还是要下面的政府来办事。再找也是现在这个X书记负责，所以只有去厂里了。

后来我们就到劳工机构那里商量，怎么做，达到怎样的目标，怎样做到合法，怎样让公司写那个回执，不写就不让他走。还要他

们知道我们的厉害，把我们所要的给出来，同时还不能太冒险。当时没有想过会在公司待那么久，只想着公司给了回执我们才走，所以太详细安排的没想过。

当时劳工机构的小云已经走了，有事找主任又不是经常在。毕竟我们的行动要有一个人商量什么的，就靠涛哥，但涛哥也要工作。那天他是请假跟我们谈的，就谈了一个下午，也没有谈那么详细。如果多一个人参与，记录下来可能就好一点。就好像我们开会没有一个秘书长什么的，就没那么好的效果。我们那次说了这个想法给涛哥，问他行不行得通。其实涛哥对法律的了解也不是很多的，就是比我们敢作敢为一些。主任啊他们可能就理性一点，有些工友就觉得他是怕死。但其实他理性有他的好处。如果我们就只是靠冲动呢，做下错事也不一定。

我们只谈了一个中午，大概聊了一下框架，底线、要求一类的。我们商量的时候就说的女的在前面，不要动手，因为一般他们也不敢冲女工友。其实这个有点难度。经过那天晚上，我看到经理、保安动手，工人也有动手。实际操作起来有些人就控制不了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也有些不对，这个是真的。

原先讨论的时候，没想到会持续这么长。后来因为我们在那里已经过了一个通宵，还是看不到有结果，如果全部人在里面，一直不休息，我们可能也熬不住，才想到轮班。为了轮班第二天意见已经有不合，有的想白天在这里晚上回家睡会觉。不过还是许多工人一直在坚持。因为马上是清明节，我们也打算坚持。

照相录像这方面安排得也不够好。只是给大家说，记住拍照，谁有空就拍。没有具体安排到位。

我们最开始提了三个要求，第一让工厂保证地税局通知他交钱的时候，他们在几天之内交钱，给我们一个实际的日期。第二是第二批工人的资料送去地税局核实，让他交钱，跟第一批一样。还有一个，把第一批工人补交的资料马上发到地税局，不能再拖延。第



一天我们看到何经理没走成，就觉得势头在我们那边，就提多一个要求：这两天都要算我们上班要发工资。我们提这个要求，也是为了让那些还在厂里上班，担心会被算旷工的人都下来办公楼。但何经理对出粮（发工资）的要求理也不理。不过前两个他不能不回。

因为有的工人还在上班，我们就要求他们下来，和我们一起。师傅就要求他们上去，否则当做旷工。我们就说，他们虽然在上班，但是也有知情权，我们搞的这个也跟他们有关。我们说，你给答复就立刻上班嘛，是你故意拖延才上不了班嘛。师傅就让工友把手头的货退了，说你们下去就下去，别影响这里工作。像马昂那个部门的师傅是比较松的，他先提出来我们部门不能当旷工啊，然后就每个部门都没有事了。

当时没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是否会被工厂报复。只想到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如果几个人去呢没作用，只有一大群人一起去，才有效。有的工人也想到，社保是最主要的，就算又被工厂放假或者开除了，只是牵扯到几千块，社保更重要。那时候就觉得肯定可以拿到社保，我们代表的心中就觉得是合理的。因为以前我们做错的地方就是没拿到厂里的凭据。厂里那会也口头答应什么的，但都没兑现，我们这次就要求是书面的盖公章的回复。



## 去厂里要书面回复的经过

开始何经理很坚决地说没有义务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补缴，也没有义务给我们回执，他们一切会按照法律去做，让我们去找政府部门解决。我们一去何就报警了，劳动所、镇政府也有一些人到场，但是警察没动手，他们像保安一样只是站在那里。我们心就定了。我们就感觉到没事，我们这么做是行得通的，那个时候就更加有底气了，所以又提多一个要求出粮（发工资），保证我们工人能齐心。

我们没跟何经理说我们已经找了地税局，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录入完我们的材料。我们只是告诉他说，你们老板、政府没时间跑手续，只要你们答应了我们就帮你们跑。我们这样讲，搞得劳动部门的人也没话说。后来劳动部门的人跟何经理说：“写给他们工人一个回复也没关系。”何经理说：“不写，我没这个义务，要找你们解决。”

后来何经理就叫我们几个代表进去，亮了一张证明（地税局交资料的回执），说“不是我们不买，我们把资料给了地税局，他们没核实清楚，是他们的的问题，不是我们的事。我尽了我的义务，资料都交过去了，他们不核实。”他的意思是地税拖我们，我们什么都交过去了，地税还没算完。

我们说：“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回执是给你的，不是给我们的，我们也不要那个回执。”

后来他又亮出来一个东西，说本来是不想拿出来给我们看的，是工厂给政府的一个东西，内容是问地税局、劳动局，工人需要交多少，厂里要交多少。他说政府不敢接这个东西。我们说：“那你可不可以写给我们，我们可以替你去政府里问？”他想了下，那个东西可能是挺机密的，就写了一个东西，签了名。我们就让他盖章，后来他又改了主意，不给了。我们又陷入僵持，就什么也没谈了。

第一天上午就是这些。下午也没谈什么。何经理开始搜集一些证据，偶尔走出来，叫保安拿着相机跟着他。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他

是要搜集证据，我就有一些拿不准了，我们这么做是不是违法了。不过我没和工友们说。他一出来工友们就那样堵住门口不给他出。他就诱导工人说话，问工人“是不是不让我走”。我怕工人说错过，就说：“不是不让你走，是要你快点给一个答复，大家一起下班。”我就怕一些工友会说，不让你走，我们要把你怎样怎样一类的话。

之前没想到要提醒工友不说这类话。只是自己心里有数，但是没通知下去。后来才意识到，我当代表的是没说错话，但是有一两个说错过就麻烦了嘛。陆香就说了。她说话就尖锐一点，还骂了何经理，说他是“公公”、“走狗”，喊口号。我知道不行，但是如果当时制止工人，又说不过去，怕搞得好像我站在厂方一边了。后来说的尖锐的东西多了，有人喊口号，惹火他了，他就出来搜集证据。他就有意地问了，直接找陆香走过去“是不是不让我走？”亚美还大声说“不给（走）就不给”。我就心里怕，就说：“不是不给你走。让你给一份答复。”

何经理后来心态也平和了。后来就熬着。大家的心态就是你等我也等。他就故意去抽烟，去引导，故意在门口停留一下，让工人去堵门口什么的，他也没真想走掉。那段时间是最放松的。还有工人在一旁说说笑笑。

这期间我们一直打电话找媒体，中午就打了，给今日关注啊，DV现场啊，一直没人来。《南方工报》没打，觉得他没影响力没作用。夜里媒体来了。工友的心态就是，出镜上电视的话影响会大一点，报纸没人看。我一直没报太大的希望，就是魏小妹一直说要打。后来是DV现场记者过来的。记者问我们是什么事，他要请示领导啊，后来又说没空了，车坏了。小梅说你来吧，我们帮你报销车费。到了天黑，记者才来，我们给记者报了车费。记者先在大门口，拍了一下。但是保安不让进，我们让记者从侧门进来，这样采访了一阵。我们很多人魏小妹马昂都去了。我们对记者把该说的都说了。

原本那些记者说要去厂里采访的，何经理不批。后来保安又通

知说何经理让进了，记者就去采访何经理了。何经理把资料已经交地税局的回执，给记者看了。何经理说没买社保是一个历史问题，很难解释，不是厂里拖。他几句话就把社保问题推给政府了。我们在外面刚去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公安，用对讲机说话，可能是他们通知的镇领导，后来来了一大堆镇领导，刚刚好和记者碰在一起了。我们想，坏事了，搞住我们的新闻不让放。白天是镇级的人跟我们交涉，夜里就是区级的人和我们交涉。不过还是播出来了，4月3号播出的，

后来，过了一个多小时，何经理放出风声，说12点以前有人接他。12点真有人来了。区级的领导进去跟我们说，打圆场，让我们快点走。我们当然不走。只要我们几个代表进去和他们谈，何经理让保安摄像，我们用手机拍，领导说他们是职能部门，不许拍。大家就没有拍。

后来何经理就拿出来那张他说政府不收的那个材料，对那些领导说，“现在不说也不行了，你们也不做事”。说：“不是我们厂方的责任，我们已经要求买了，我给你们政府部门，你们没有接。”他当着那些领导的面说的，那些人立刻就黑面孔了。有一些人就说：“你有交上来吗？”何公公说：“我是要交的，是你们不敢接，不然问一下梅姐，她也看过这张东西。”梅姐是副镇长。然后梅姐就说：“可以呀，怎么不可以交呢？”何公公说，“那我交给你了”。政府的人又说，“现在不是上班时间，怎么收你的材料啊？”后来那些领导有人就说要小便，后来其他人没说一声也就走了。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是政府有问题。但这个问题也不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以前一些工友包括我自己一直觉得是工厂在拖欠，搞鬼，不愿意交钱。怀疑政府工厂他们之间互相帮，这个肯定有怀疑的。但是我看到何经理拿出那张东西，就看到他挺有力的抓住政府的把柄。意思就是你让我死，大家一起死，拉着政府一起。

那个时候我看出来是和政府态度有关。但是社保问题我们肯定

要解决的。所以我当时的态度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追社保，你们之间的事情自己搞定，给我买就是了。”但当时只是几个代表进去，外面的工人不知道那么多事情。那个时候我感到这个事有一点麻烦了。

我以前的观点，也认为是公司不愿意交钱。但当他拿出那张纸，我看到涉及到政府的态度，我就有一点怕了。我那时候就想会不会出事啊？因为很多人说，跟政府作对，没好下场。那时候，我就怕我会承担责任。但政府现在既不帮我们，也不帮厂里。那我们大家耗着，就继续堵下去，是没问题的。

后来到夜里三点，我们就跟何经理谈了一些事情。何经理知道没人救他。早先还说有人救他出去，但还是救不了他。他报案报了几次，区级的政府也帮不到他。他开始和我们谈心，当然很大一部分还是废话，说大家都是打工什么的。

何经理说：“大家都在这里，我们都是受害者。政府不管，老板不管。老板也不救我出来。他们还在外面风流快活。”他还说政府黑暗，他过去在政府里做什么职位的。他还说：“我是做了十多年劳资问题的，读了那么多书，劳动法研究了那么久，我做的事情都是按照法律做的，也没犯法。我吃老板的这碗饭，我就该这么做。如果你们追不了，也是法律不支持你们，我也是根据法律说的。”这些话以前也听他说过，那时候我们当他是屁话的，都没放在心上。

也可能是他在做我们的工作，可能是想让我们同情他一点，大家把他早点放出去。反正他报警也不把他搞出去。何经理是个很狡猾的人，他想的点子很多。很多对付工人的办法都是他想出来的。如果没有他，我们就没有那么难搞了。

再后来我们也困了。他睡醒了还用手机放歌吵醒我们。那时候是最和谐的，大家彼此还有说有笑。他也知道出不去。我们也知道老板没下那个命令，让他写给我们回执。那我们没办法。他一直不给，就一直耗下去。

其实我们之前看到老板开车进来。他一见到我们这么多人在办公楼，他就直接去他自己的宿舍了。我们也想过要不要去围老板。但是考虑到宿舍是私人的地方，因为我们找这个是公事，去他私人地方找他合不合理呢？如果万一他说私人地方什么的不可以去，违法了，我们行动就失败了。所以他不来厂我们也不敢去搞他。



## 与人事主管发生冲突

到第二天下午四点多，他给了一个消息出来，可以写回执给我们。他说老板去政府那边谈的，可以写的了。老板让司机带那个回复给我们。但老板写的没那么详细，有一些字眼问题，我们要求改。何经理有些生气，说：“宏强，你那么多意见，你自己写，写给我。”但是我们一写上去又不太流利，就又改。改来改去，何经理就有一点愤怒。其实想一下，他被关了那么久，有一点愤怒也是应该。30多个小时没睡觉，他声音也沙哑了。大家的精神都有一点问题，脾气都比较暴躁。改到后来何经理真的发火了，不改了。主要要改的是那个回复上写着“我公司”，没写永义还是永宝，大家为了那个东西吵了一个多小时，让我去问。我不问也不行，就问。何经理就说不改。那时候我觉得我再要求也没用，就没说话。难道要为这个“我公司”打起来吗？我知道他写清楚当然好的了，但当时我就觉得90%他不会写的，而且感觉不写应该也不会再有什么变数了。

但是大部分工友不明白，认为一定要写上。那个时候，因为工厂答应写回复了，有些工友就觉得自己占上风了，只要大家齐心，

让何经理怎么写都行了。但是怎么按住其他人的这种想法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要是坚持说不用写，可能会有工友说我是帮厂里还是帮工友呢？就好像对不起大家，我也不敢说。有个工友叫我不要问了，我就不想问了，站在其他人后面。

现在说起来，有的工友该执着的时候不执着。一些事情之前表现的不是很团结，好像我们凑钱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找那些人集资。到了争这个永义、永宝的问题上，不用他团结的时候又抓住不放，就那么容易团结了。

后来何经理要冲出去了，打了我们工友。起冲突之后两边都报警了。现在看来，打架的事情肯定有一点预谋了。

其实他半夜和我们说过，要我们不要中计，如果他冲出去，一报案，我们告他他也告我们，被政府利用起来，对大家也不好。其实他也不敢负那个责任。如果我们告他打人，他也告我们拘禁，都伤不起。他也不想陪我们玩，他自己出去也可以，就怕一不小心触到那个爆发点，他自己也卷进去。

我知道一打架就麻烦了。毕竟我是总代表，心里有一点慌，想着会不会捉到我。我当时就什么都没做，又没阻止他们打架又没打人，不想被抓把柄。我以为这样自己就没事了。

他们打架的时候那个回复被撕碎了。之前何经理把回复给了我，很多工友都拿去看，就好像是拿了战利品。每个人都要看，不知道传给谁去了。打架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找那个回复在哪里。厂里的人看到那张回复就撕掉了，一了百了，不然打了架还给我们？宏强他们也知道这样要有麻烦了。宏强那边就跟何经理说：“这样了，大家也没什么，虽然是一点冲突，大家也知道是都有火气，私了就算了。”他们谈了，何经理也肯把那个回复重新写出来。我就又进去，拿了那张纸，我当时的心态也是私了。但是魏小妹、马昂他们就抱着那个态度一定要追究到底，那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我不在场又不好，我拿着那张回执就交给别的工友让他先拿走，过两天再

找他。后来魏小妹、马昂说报警了，告了。那时候我心里就有点没底了：“你告他，他不会告你吗？”

那个时候工人分两派，一批人说告一批人不想告。有人说，不要再争了，何经理写了回复就算了。当时事态其实是要告的人占了上风，人多一些。被打的陆香要告，我们要是说不告又好像说不过去。后来我们打电话给涛哥，他也支持我们告，说告了也没事。

要告与要和解，所说的话肯定不一样了。如果是要告他的话，肯定是针对他去说的了，如果打算和解我还针对他的话，就要搞我了。

## 工人被带到派出所录口供

后来派出所来人，带陆香上车。我们原本都跟到派出所，想进去作证，派出所门卫不给我们进，要我们先把人给撤了，不要围那么多人在派出所。

后来没多久就传信我进去，就说哪个是崔明杰，里面的人叫你进去录口供。我那时候还很威风，很高兴进去，想着是要告他。但是一进去，我就见到陆香那间房子，当时她录口供已经录的差不多了，已经到了后期了。那时候，录完口供了再读一遍让她签字，口供内容是不是属实。你们是不是打架，有没有受伤，要不要控告他。那时候我就看到陆香说算了不告了。我想那就算了。这样的话，那个口供就不能太针对何经理了，太针对了不好。他们动手的时候，我一直在后面，我可以看看到了，也可以说看不到，所以告或不告本来是可以任我发挥的。

当警察问到我，困了他多久，有没有说过不让他（人事经理）走之类的话的时候，我当然回答：“我没说，也不知道谁说了。”他说有没有听（别人）说过，我没回答他，只说我没有说。他又问我



在里面多久，我回答从头到尾 30 多个小时都在。问我有没有进去问过何经理。我说有啊，我进去问过他，他也叫我进去商量，因为我是代表。原本是问这些的。最重要的是问到有没有看见打人了，我就推说我在后面，很多人挡着没看到，我也没在那里谈判。我说我知道他们为了永义、永宝发冲突的，但是谁先动手谁打谁我就知道了。打完了一散开，我就看到陆香倒在地上，被人抓头发被人打。他问我站在后面怎么看见呢？我说看到她倒在地上了。第一份口供就是这样录的。如果那会我听见陆香说要告，我肯定说是何经理打人了什么的。

陆香先在外面坐，我们也就在外面坐。我看见她说算了，以为和解了。我还安慰她，说没事了。我们说的话也没什么，都是正常的，应该会给走的了。后来坐了很久，还没放人。心里就觉得麻烦了。

第一次进派出所录口供，心里有点怕，毕竟跟以前政府书记谈话不同的嘛。派出所这种地方，我们有句话是“生不进官门，死不进地狱”。你说去区政府什么的我也不怕，每个人都是最怕进派出所，因为牵涉到坐牢。就好像我刚进看守所的时候都有一点怕了，整天晚上都睡不着。现在经历过也就不怕了。

后来又传第二次录口供，他先传陆香，我就听到里面大声骂她。可能就是威胁她，说真话，什么的。录完了出来，一下子就放她走了。那时候我还见到何经理，我问他是不是和解啊，他说是和解。我还发信息给魏小妹说没事，和解。第二次录口供，我看到他骂陆香，要威胁她，就知道有点麻烦。又叫我进去录，但是我说的话还是跟第一次一样，可能第一次有点怕，话还要多一些，但是也没说错什么。我第二次坚定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录了之后就在那间房子里，有保安和辅警看着我，在那里等等等。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出去啊，怎么关我那么久。他们说他们也做不了主啊，上头下命令才可以放啊。那时候我就有一点觉得工厂要反告我们的意思。那

时候我就心里打鼓，怕陆香她们说错了什么，是不是说我组织啊，是带头人之类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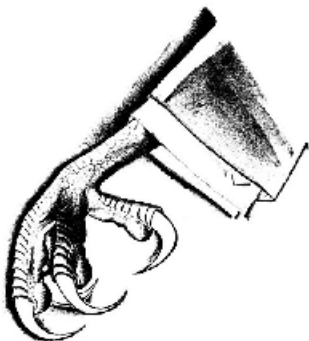
一共给我录了三次口供。第一次是晚上 8 点多进去录口供的，关到第二天凌晨 3、4 点又录一个口供。扣留我到上午 10 点多，录第三次口供。那时候就更麻烦了，我看见那个警察带着一张纸写着问什么问题，我心里觉得麻烦了。因为白天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放啊，上了班几个小时，可能他们心里有底了，研究好了要问什么。

他们问我谁是主谋，组织者是谁，是不是我啊。我当然不认啊。又问我怎么去的厂里，没有人组织怎么会 100 多个人呢？我就答他，大家都是一传十传百，你让我说谁是组织者，我真的不知道。他们问谁通知的我，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是有一个人问我是不是星期一到工厂去找问一下社保的事情怎么解决啊。我担心我不去的话，人家都搞定了就我搞不定，所以才跟去的。但是要说谁是组织者，那我难道要说他吗，如果他也是听另外一个人说的呢，那我不是冤枉人了吗，我不肯定的事情肯定不能说了。所以 3 次口供都差不多，都是说我们的经过。后来就说多了一个陌生人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那天要去，说多了这个细节。

我觉得他们最想要的口供是，问我们有没有说过不让何经理走。这个事我不承认又不行，毕竟有人说过，但我自己肯定没说这个话了。如果说我没听到，又怕这个算不了真。

## 工人代表被关看守所

到了下午 5 点多有个人带我出去，搞那个手续。我问一个保安，他说我们可能是要放出去了，其实是进去给我搞那个看守所的手续。那会我手机没电



了，魏小妹还打电话给宏强，跟宏强说，应该放了，可以出去了。手机没有没收，只让关机。其实也可以跟外面通讯，他不管那么多，只是有一个辅警看着你。除非是罪名很严重的抢劫什么的。我们又没有罪，他们也感到我们是冤枉的。但是问他打电话就不行，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跟我说了很多。所以后来给我们办了手续之后，又要验指纹了，又弄棉签验我们口水，我就觉得麻烦了。如果是放我们出去的话，说一下什么的就可以出去了。但是他们做了很多功夫，又叫我们去派出所的牢房了。我就知道麻烦了。以前我们不是进牢房的，是在询问室。那个牢房就不同了，有铁窗的。把我们东西都放在台面上。有一个人专门看着。那时候就不可以联系外界了。做完那个按指模什么的，过了一个小时，就给我们一张拘捕证，写着涉嫌非法拘禁，以及我们有什么权利，要不要请律师，让我们签字。

没多久就把我们带到看守所了，就更严了。所有东西他包住，衣服什么的放在一起，走的时候再还。然后发给囚服，还有日常要用的也发给你。所以如果有些人突然被抓，在里面断了联络，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在看守所第一天，最大的想法就是让家里人知道不用担心。

到了看守所，又问我们请不请律师，我们就说请了。既然都进到看守所了，我们还能不请嘛。

一进去看守所，里面的犯人都问我犯什么事情进来的，然后就研究会判多久啊。因为大家在里面没别的话好说，都是问案件的问题。他们都说没事啊，因为他们好多都是抢劫打架进去的，会判到哪一步他们心里都有底。问我很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打人，给他饭吃？我说没有打人，也给他饭吃。然后他们就说1个月。给他有吃有喝，我构不成非法禁锢。就算是构成禁锢，我们请了律师，我们以前是良民，还可以说我们无知了什么的，打完官司还是会放出去，最多就是3个月。

我也知道肯定是政府打击，给我一点教训，我十多天以后才见到李律师，心里也没有太慌。在里面他们（犯人们）都给我算好了。最坏的就是九十几天。因为案子也不大，肯定会缓刑的。所以我在里面的时候第一天可能想多一点，后来就没什么了。我自己都知道好的话就是一个月。有的人还问我，看你来这里好像没事一样，很轻松。我就跟他说，那有什么呢，天天哭也是一样的，要坐多久也不是我说了算，就看外面的人怎么搞，都是等外面的消息。吃睡都没问题，就是苦一点。在里面最大的就是挂念家里人。里面的人都是，就算是小偷也是，想家里的老婆孩子老人。因为家里人不知道，就是互相担心。每个人都有同感，不管犯了什么案，第一时间就是想家人，哪怕是带一个口信出去，最重要的是带一个口信，我在里面没事一类的。

吃饭当然不是很好了，吃白饭就能饱，菜是没盐没油的。吃起来就是没菜也要吃饱饭。一天两餐，十点钟一餐，四点钟一餐。四点钟吃不完就是自己挨饿，没东西买。新兵餐，一个星期买一次。我进去的时候有钱。里面的人很好的。有一个是销赃的，他有钱，他买了一辆赃车，他有3万多在那里，他可以买了请你们吃。但是他有钱也买不到。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买的话，他可以出钱给你买。他也很大方的。他一个月才买一些。就是面包饼干榨菜那些副食品。还有当值，两个人值班，怕里面搞事什么的。如果有人搞事就按警报，还要操练，学习。

外面看那些人当然是坏的了，在里面其实一些人本质也不是很坏。像我们同窗的一些绑架勒索也有，进去以后和我们一样有说有笑。他绑架勒索的时候，因为他毕竟是出来混的，他做那行，就看见你是老板什么的想做你，他不做你的时候当你是朋友，跟你说话的时候一样的。说得难听一点，谁让他是干这行，绑架找钱的，你又让他看到你这么多钱，只是对那个人来说是坏人，对社会是个威胁，在里面跟我们没有关系。他进去以后也是担心家里人、后悔什

么的，都是跟我们想法一样的。他会不会再干这个也不敢保证，但是在里面他肯定是盼出来了。在里面有大哥，原来是做老板销赃什么的，他们有的是钱，他们买东西吃，大家也可以吃。但是没有好的东西，就是饼干一类的，我们原本刚进去没有东西吃的，方便面沙琪玛在里面都是好东西。他们买了，我们随便吃。有一些因为受贿被关的村长镇长，出去以后还是大把的钱。有的人说你花完那个钱再出去，他还骂你说要我关到什么时候，没有好东西买，一次只能买几百块。外面一顿饭要几千块，他可以吃一年了。没有开水，泡面就用早上的白粥。或者泡点凉开水，第二天一早吃。

里面有管仓的，自己人管自己人的，就好像一个班的有个班长，要带我们，教我们纪律。他也有一定的话语权的。打比方有人操作得不好，那人就骂他。但我是本地人，对我稍好点。

在里面很多人都说我愚蠢的，做什么带头人，为了一百多人，枪打出头鸟，人家还在外面风流快活。我没怪过别人，反正进就进了，怪谁也没用。但是我自己心里有一点不舒服，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为了这个事是不是牺牲了太多呢？我一直做代表家里也不是很支持。我老婆知道我是什么人，她肯定支持我。但是我哥，老爸都反对。其实过完年，我老爸问我有没有搞定啊，我就说搞定了。问我有没有上班，我就撒谎说上班了。那时候进去了没有怪谁，就是怕家里人听说了会骂我。我最怕的是，政府和工厂已经站在一边了，那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继续做代表，肯定就有麻烦的了。如果对手是工厂的话，我可以，但是我要和政府（作对），我就怀疑我的能力。再搞下去我有没有麻烦啊。在牢里面那些人枪打出头鸟，和政府作对没好结果。以前我也知道这些，但是没放在心上，但进去了，就不得不想了，还会不会有下次呢，我心里也说不清。

我出来前两天，有人跟我谈话，应该是一些公安，问我的态度。其实我心里也有底，我的表态就是继续追。他说：“大家都是本地的，我也知道你很为难，现在问一下你坐了那么久，有没有想到什么，

什么态度。”我说：“反正大家都是本地人，我知道为什么抓我进来，我错的一点就是做了带头人。出去了我可以跟你说我不会带头的了。”他就说：“就这样吗？我也想早点放你出去，但是你就这个表态叫我怎么答复呢，我也要向上面交待嘛，我怎么说得过去呢？如果我放了你出去，你还在外面搞事，那我不是要给上司打嘴巴了？”我经历过审讯了，就知道他说



这个是诱导我的，这个肯定是假的。他还说：“你出去了有什么困难，就不要再做这些了。如果你有困难打电话给我，我可以帮你找工作什么的。你那个买社保呢，我去看一下看可不可以帮你买了，你就不要搞了。”他是穿便衣的。他不是领导，都是小人物。领导不敢跟我说这些话的，因为领导表态要承担责任，他也怕我后面报他名字出来嘛。只是让一个小卒跟我说，他答应的事情可以不算，这样领导好开脱嘛。就好像当初 X 书记过来，他说的话实现不了，我找他，他就麻烦了。

这些（怎么应对审讯）劳工机构没有教过我们的。如果我报了别人出来，那他也麻烦我也麻烦，这个我也懂的。我们培训也不是很多，就是我们可以争取什么。但是涉及到法律太多深的地方，我们还学不到。我在里面就怕他们（其他工人）说错话，说是我组织他们的。因为是我提出来像深圳那样搞，说深圳劳工律所他们这样做过，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做。我就怕他去问宏强，去问别的工友。因为在里面学的法律就是 3 个人同时指证你，就可以定罪了。如果没事最多我就是 3 个月，比方说，如果再下一步，问的人多一些我们就麻烦了，有些人不知道说错话，那些警察很会引导你的。

不该说的就说不知道，警察不会打。比方说我就怕陆香她意志

不坚定。像警察要是说“没关系的，我们只是问他（工人）有没有说过，他说过了你怕什么，你再说一下就行了。”但是你真说了，那不是他也麻烦你也麻烦？再搞下去呢，我就怕承受不了那个压力。其实我当时心里想到了，在那些工人之中，如果像马昂进去可能会说错话的，那就麻烦了。

## 走出看守所之后

毕竟到现在都进去了，多少有点阴影，知道我的对手更强大。以前我都是相信他们劳工律所那些律师才会这样走过来。我以前不理别人反对，家里人反对也不理。但是和政府对手的话，他保不保的了我呢？我有一点怕了，做起事来也就没有那么勇敢了。

我不太担心工人会因为我们被抓而散掉。我在派出所的时候，虽然不是全部的人，但是至少有一些工友一直在外面等。我去厕所的时候，都看得到。那些保安也说，你们的人还没走。其他工友在门口守着，我知道我有什么事他们肯定会告诉我家里人。

我从来没害怕什么。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可能会继续下去，但是听太多反对声音了，我心里就没底了。我老婆以前是支持我的，我现在被抓进去了，就变成不支持了。我在里面的时候，家人也一直和段律师在联络。我出来的时候，我堂哥去接我。他第一句就跟我讲，不要那么快答应段律师帮我追国家补偿一类的事情。他是我的亲人，肯定是为我想，他们也知道再追下去可能没什么好处。这次被抓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下次更严重的东西。那天晚上我出来的时候和段律师他们吃饭，我听到他们说国家补偿什么的，挺想再告的，因为一听他们说的，就好像是给我上了课一样。但是因为家里人也担心，每一个人都叫我不要再告了。所以我这两天都在想，最重要的是有多少人支持我，我可以做到哪个程度。如果可以做得

很大，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就没人敢动我。如果我事情大了，他动我一下子很多人知道。如果没什么人知道，没什么影响力，就完了，让我消失也很小的事情了。

这边不少工人要求公司给买社保，但很少人追以前的社保。所以我们是标杆，追到了是个英雄。如果我们成功了，很多人去追，政府会有很大压力。这样我就越想越怕了，我们被抓，有可能是厂方和政府行贿受贿啊，也可能是牵扯到整个行业的话，我就是跟整个行业的老板作对了，而不只是永义的老板。那就更麻烦了。我们那个人事经理多少有一点暗示给我，他跟我老婆说我后期不是带头的，也不是起那么大的作用。还说“我不是要搞你老公的，是别的因素让你老公进去的”。不知道他是说真话还是给自己开脱了。他说的也可能是真的。他整我不怕我找人打他吗？

之前劳工机构说，做首席代表是保护我们的。那时候我们就以为动了代表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做代表就没人敢动。但事实上现在工厂动了我们，也没见他们有什么后果啊。

宏强跟我讲，我进去的时候，宏强就让那些工友一人再出两百律师费，他问李律师是有6千块交给他的律师事务所。上庭的话还要8千，我们两个人就是2万8了。因为之前募集的那些钱还有上万元在我手上，但我不出来就没办法用。宏强让他们再集资，有些人就不愿意再集了。我听了这个，心里很不舒服。我出来做代表本来很大压力的。我牺牲了这么多，5月份开始做这个代表，真的亏了很多的，包括我的工作没有回报啊，就是一些路费电话费。但是他们还不愿意集资，当然也只是小部分人。后期我们的花销很大，那两天在厂里，我们的工友包吃，花了3000多。这个工友也不理解。我们只有哑口吃黄连了。

其实现在我谁也不相信，包括段律师说他一出马，我很快出来了什么的。我知道的原因是我的案子太小。像我堂哥说：“段律师说的那么大，要追究政府什么的那个责任。就算告赢了，政府说你没



罪，赔你因为冤枉坐牢的那个国家补偿也不过几千块。去告政府，像段律师说的那样，还你的清白，什么都可以还得到。问题是你要不要得起？”

我既然做到现在了，我的贡献也可以说帮助了不少人。到现在停下了也不是什么坏事。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维权这么久，正义心有，我也蛮想做一些义工。毕竟帮助过别人，那个心态是很好的。助人为乐，有一点成就感。这个我可以肯定，不然我不会做那么久代表。这次被抓进也是一个磨练，我也没怪谁。

像于航他也在背后支持，但是他和那些代表不同的地方就是，那些代表会在谈判的时候出面。

我们代表做的事可能引导方面有一些差错也有。团结方面，像我们组织第二批也有很多怨言的。主要的还是骨干太少。他们很多都抱怨什么事都是几个代表在做。如果有 10 个人，像我和宏强这样，就可能事情不会搞到这样。工厂知道我们只是几个人，搞定我们这几个人就完蛋了。我今天和宏强聊了，我进去的时候我们工友在外面是怎么样。他就说只是他和马昂在跑，其他的人很多就是精神上支持。这个我在里面也想得到的。过年前我都跟你抱怨过了，只是我和宏强去某市，其他人起作用的还是少。如果他把宏强也捉去了，可能今天我们就散了。于航可以出主意，但是他没有出面，他那个凝聚力就不大。所以我觉得我在工友心中的重量，最少要三分之一。我退了，他们的力量最少要少三分之一。如果宏强马昂也退了，完全就没有一半力量了我们。

我今天和何经理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呢，厂里说我旷工，把我炒掉了。他就跟我暗示是外力，政府还是什么的原因。说这方面他也没做什么，不是他的原因。我也想得到是有外力搞。因为在何经理心目中最针对的就是陆香和宏强。他们骂他的那些脏话我都不说的，我跟他从来不吵。他也跟我说：“你坐这个位，我坐这个位，谈判起来是对立的，有什么问题，私下里说什么也行。”我感觉跟他，

除了在这种事情上以外，没有个人恩怨。我在牢里想，肯定是老板要搞我。我是首席代表，让他亏了那么多钱。

是吃一堑长一智。对我来说，经历了这么多，处理问题的经验肯定有提高的。以前就是打工什么的，想问题单一一点，有一些东西不去想的。比方说，我看一个问题比以前准了，直觉上就知道这个是对是错，比以前聪明了一点。那天我们和何经理聊天的时候，他说在我们工友里面我的悟性高。何经理说的那些也有他的道理，为什么他做官不做了，是看到做官的黑暗。他出来做生意，做亏了也是当官的黑暗搞到他亏的。那些人就笑他，你为人做了坏事当然受到惩罚了。其实他说的是真的嘛，政府是真的黑暗，只是他没有说得没那么明白而已。宏强他们就知道挖苦他。他那天晚上说的也有一些道理，他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各顾各的，你别怪我我也不怪你。大家在这里谈心，你被出卖我也被出卖，都是一样的，大家谅解。你没有多想的话，大部分工友都说是他搞出来的事。但是你想多一点，要是我们不搞这些，怎么会搞出（事来）。因为大家也有，谁对谁错很难分辨。他说的也有道理，大家分开，站在我们的立场当然是要自己的东西了，但有的事就觉得不要做得太绝。

矛盾出来了，就是大家针锋相对。我们去香港学习，那些老师也提过，我看了那个达格南制造，其实他们提过，那个协商不一定是以某一方面的胜利来解决的，协商也是一个让步的，你让一步他让一步，事情解决得更快一些。就像电影里他开价要升 100%，后来是 80 几 90 几。就好像我们在永义、永宝那方面，做事按照大方向就行了，不要按照一点点的百分之几，那个字眼，就为了那个。后来想那个就为了那个永宝还是永义谈不来。



所以我那会和便衣警察说，我不带头，但是社保肯定要买，要是追别的我也会跟着后面。你说要带头我不会带头，我也怕会有第二次（再被抓）。

## 其他代表被骚扰的情况

我今天和宏强见面谈了下。宏强他被那些人找过，但是他不在家，就是以查户口查计生的名义到他住的出租屋那里查。以那些名堂，直接抓人也不行了。那几天都很多人过去找他。其他的工友就不知道，宏强只和我说过。

宏强跟我一样，两夫妻要养小孩，他跟我一样都是为了那个心做出来。看他走了那么多，我也跟他说了一点点，暗示他不要带那个头。我们做的最不好的，就是以前我们想法就是你不做我不做，（追社保）这个事完了，然后自己做了别人那份（其他代表该做的工作）。我们犯的**错误就是把自己推高了，所以他就针对我们这几个人就行了。如果我们把代表的责任分散了，外面的人肯定没有那么容易搞到我们。**打个比方，不要像我一样一个人，一个总代表做事，他抓你一个总代表就行了。如果你分散责任了，就分散风险了。我没有对宏强说的很明白，我只说：你现在走的那么辛苦，也让别人分担一下，也不要全部自己做。我看那个电池厂女工的情况，就算前面带头人走了，后面还有人来接替嘛<sup>4</sup>。现在如果他退，我也走了，会不会散了呢？所以如果大家分担了那个责任，我也可以再继续做下去，不然，不扛那个责任又不好，自己一个人扛又扛不起。

但是现在召集他们开一次会也蛮困难的。为什么开那么少的会，因为毕竟，我也怕，过了年其实我出面不是很多，我都是在背后。其实年后我的态度都退了很多的了，在工厂里就是陆香带头闹。我

---

<sup>4</sup> 指的是广东某市另一家工厂的维权女工的状况。

在工厂里不跟管理们争，在外面起个带头作用。我想如果老板恨我，可能就是我不带头（做首席代表）让他吃亏，如果政府整我，就是那个便衣往上面报告的。因为毕竟放假以后开什么会，都是我来总结，我来说，开会太张扬了一点。我就想如果我不太张扬，就不会这样搞我了吧。

访谈时间：2012年5月8日

访谈背景：我们在结束对永宝工人的大量访谈之后，来到崔明杰家补充一些相关的文字、照片和视频材料，又问了一些以前聊过的话题。

## 再谈第二批工人的问题

问：有些第二批的人在想第三批的人能不能跟上？

崔明杰：我想就没有了，你们想第二批的人都起不来，还第三批的人？除非有人教，有人带，那谁来带呢？其实第二批的那时候我们很冒险带他们出来的，那时都是我一个一个人发信息问他们来不来学习呀，现在谁会做这个呢？

那时候第二批的会去追社保，主要因为那时候 X 书记见了我们吧，交了个人补缴的钱给工厂。他们就感觉到有机会了，就立刻去人事部那里，签名要求。人事部就跟他们说：他们（第一批的人）搞定了，你们肯定有了，不用急，到时候厂里会安排的。

那时候我们才发那个信息问他们想不想要追社保，要就教他们怎么做。我们让他们先把劳动合同要回来，他们不敢的，还要我们和他们开个会，打完气他们才敢去一步步做的。不然他们第二批也

站不起啦。有一些虽然让他去拿合同，但还是不敢的。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先去社保局给他们报了个名，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写了个补缴社保申请书，把所有的人名报上去，把工资单、厂牌自己手里有的东西先拿过去。这样之后我们跟他们说，劳动合同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前面就白费了，但后来还是有些人不敢去拿。所以原本报名是九十多个人，实际真正拿资料全部交齐全的只有五十多个人，有一些人一直不敢去拿合同。

问：当时劳工机构那边有没有建议你们怎么带第二批呀？

崔明杰：像我们如果开会呀，就尽量叫他们过去多学一些。那时候他们就想报名就跟着来，我们就让他们选代表。其实我们找那个代表已经找了好久了，我们一直在找谁有做代表的那个能力，找到后来才找到几个。（劳工机构建议他们过来学习，他们很多人也不过来。）

问：那些人不愿意出头你估计是什么原因？

崔明杰：很多原因的。怕被厂里炒，怕麻烦。怕麻烦是最重要的，他们知道第一批的代表做了多少事，打个比方，每个星期都要去劳工机构学习、参加活动，自己的私人时间就少了。像陆香曾经说的那个话，很多都是代表心里的话：我这个月都去了几次了，平时每晚加班，回去小孩都睡了，星期六、天如果不加班，她就想跟我请假说这星期不去了，要带一下我的小孩。陆香做得好的就是开始每一次都去。如果真的坚持每一次都去，也不是每个人能做得到的。去做代表呀，要开会，没有私人时间的了。其实他们也看到我们这样做，也可能也怕这个。



## 再谈工人代表

当时第一批里面，签字表态做代表的十几个人，好像这个向月去年就辞职回家了吧，其余的人里，慧芝、王时义后来找工作很少露面了，魏小妹与郑元可以说已经退出了代表行列，黎敏从头到尾也是挂名的。陆香跟马昂一样，做的比较好，但是她和马昂不会提意见，想不出主意，有什么事让他们做，很乐意去做。所以这边马昂跟宏强是主力，还有高国权、于航。

原本第二批的我们找到几个人了，谭梅与何家强，但是现在他们又怕了，所以说这个就难做了。我们现在，比最开始刚刚十几个人那会，虽然学多了一点知识和经验，但是那个我们在人上面吃亏了嘛（指自己和另一个代表被抓）。现在再找十个代表出来，也不知道找不找得到。我们4月份去厂找人事部的那时候，第二批的冒出几个，那时候我真的看到希望了，团结了。但是现在可是说是我们失败了吧，信心也被打了一点。虽然拿到了社保，就是自信上面有点受挫。如果再搞，再联络，再安排，人气可以再补一补。

所以我看不足就是，代表的人数我们也不比那个电池厂的人数少，但人家每个代表都发挥作用到位，比我们还要好。其实方法做法大部分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行动成功和失败就差一点点了。我们做的跟她们很多都是相同的，做法呀什么的，也有罢工呀。我想她们谈判的能力可能要比我们强，虽然我们也经过那么多的部门去谈判，但是得到的结果不是很好。其实我们够胆冲的有很多，但是谈判代表只是那几个，要多两个的话也选不出，可能我们比那个电池厂不好的就是这个。

另外也有男女的分别。那些女的，陆香她们为什么那么勇敢呢？如果要是我我就做不到。女的认定你是坏的，什么也敢做。那些男的也是有点怕的，但是男的做事就是比较理智，想的就多一点，女人其实勇敢起来呢做事要比男人还要好，男女均衡就是最好的了。

女的就像魏小妹呀想的方法都是激进的，其实她们想的真的没有我们那么深入，那么理智的，想的那么多的。但是我们不敢做的，那些女的就敢做。

比如我们说这样的办法可以做，她信你的话，那个执行力度肯定比男的好。就像那个母爱一样，如果你儿子受欺负，那个做母亲的行为肯定比父亲做的过激。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她们想的不太多，就需要跟她们说清楚，比如我们商量好，围何经理的时候如果打起架不要还手，你倒下来就行，那时候她们就坚决执行了。

这次她们被打倒下来，如果报警之后，和解了，没人去派出所，可能就没有后面这些事了。所以我就想，事前（应当）多想一点，组织好一点。

像那些环卫工人就和以前的我们一样了<sup>5</sup>，申请表寄去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有答复，他们不知道要不要去问呀。宏强说去问呀，第二天就去问。我们其他人建议说应该想清楚怎么个问法，想好了才去问不是更好吗？给他们先培训好，打好底，再去谈也好一点呀。但工人方面很着急的，先去问，行就行，不行回来再说。所以大部分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那个话事权，就很难说服他们的。就好像有一个人说明天去吧，可能那些环卫工人就说那就去吧。如果我说等一下，想清楚之后再，没人听的。

那个从众的心态也有一点。我研究炒股，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个羊群的心态嘛，很多人说好的事情，虽然你原本说他不好，但大多数人说他好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呢。就像你看到那个股票，可能会升的，但每个人不要它，你还敢要它吗，就停在那里了，不敢去做了。这个事情其实每个人都有的。

还有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是，有一些提议提出来，谁提出来就

---

<sup>5</sup> 编者注：当时永宝厂附近的环卫工也在追缴社保，她们通过劳工机构得到了永宝工人的一些维权经验。

要谁执行。我们现在就是谁提出来就是总指挥。别人不明白，就是你来解释。

就好像我也说以前于航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很激进的，他够胆提嘛，但如果换个位置呢，我就不一定够胆提。万一我指挥了，你倒霉了，或者出问题了，我就要承担那个责任。于航的提议都是好的，我可以肯定，但是到现在，有些人对于航有意见，别人可能觉得，你提议很激进呀，但是到时候出了事，你又不负责，你在一边看着。知道你提议是好的，但是说多了，光说不做。

现在我就担心他们第二批不够胆，可能他们争到了，还会有第三批。但是像他们的心态有一些就是快一点，我现在提的意见就是想好一点才做，对他们来说就是保守了。

其实第二批肯定比我们容易，跟何经理说或者跟政府说，跟着第一批走，但我了解的情况就是，第二批的代表很多人看见我被抓进去了，有些人就退了。第二批的人想让我们第一批的人表一个态，还要坚持帮他们。

那我们怎么表态呢？难道我好不容易出来了，还要搞你们的社保？我就不想表这个态了。我的意见就是，他们第二批怎么组织，如果来问我，我会教他们一步一步怎么走，但是起码他们要找出几个骨干出来，他们没人够胆做代表，难道我够胆吗？

我经历过这些事，我肯定会给一些提议，是可行的。但是我已经离厂了，你还要我干什么，我就有一点为难的。我的心态就是我知道什么就尽量跟你们说，叫你们尽自己的力，这个我肯定做得到。但他们要先把自已组织好。

结果那一次大家讨论的结果，就不用选谁是第二批的总代表了，有问题大家一起问，大家都不说谁是代表就行了。



## 再谈和劳工机构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很多人，有时候出去也不是谈我们的事情，也让我们介绍给别的工友，工友让我们介绍一下。但主任让我联络，今天找一些人来开研讨会呀。我们代表去的那个心情，就是去学东西，怎样解决我们的事情。去到了，就有很多个工厂的人在那里，有些做的比我们还要迟的，说起来还要我们教他们，倒是我们的问题就没有谈多少。我们去开会有一半都要跟别人交流我们的经验。其实我们去的都是想学东西的嘛。去劳工机构还有一半时间是做别的活动，要我们男的穿高跟鞋走路呀<sup>6</sup>，时间是白费的，给劳工机构撑场面。

不只是我，他们其他代表对这些也有意见，好像每次来都没有谈多少自己的事情一样，很多东西还不知道怎么做。

我就肯定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但其他人就有意见嘛：我们是过来问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还要我们教别人怎么解决。都想着赶紧把机构的会开完，让我们腾一个小时讨论我们的问题，其实后期都是宏强呀，于航呀，还去服务部那边嘛。原本我们每次都可以号召十个人去机构，到后来就只有五六个。除非我们真的有什么行动了，要研究什么，开讨论会什么的，人才会多一些。

像五一节，要我们那么远跑过去看一个表演，其实有些人是有意见的，又不是谈我们社保的事情。那个文化街区呀什么的，哪里有人去搞文化街区？我们都是没文化的，找一些有文化的人去嘛。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维权，跟自己利益有关的。每个人都是这样想。其实他们开的那个文化街区呀，什么志愿者呀，可能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了，那时候才有心情参加。其实我是很累的，但是不去又觉

---

<sup>6</sup> 编者注：珠三角的某些劳工机构推动“性别平权”意识，有时会举办相关活动，要参与的男工现场穿女用高跟鞋，“体会女性的不易”。

得不好。

## 再谈地方政府官员

我们去市政府上访的时候，区政法委书记和我们谈，那时候感觉他还是一个好官呀，觉得他说话也蛮有力。毕竟他说他是政法委的，说话什么的当然严厉。并且他那时候还说：“我现在来了，有什么事找我呀，给电话我，搞的定搞不定就是我一句话。”这个肯定对他有一点信心的啦。那时候感觉他很干练，但是后来，他就没有再出面了，都是和他打电话，问他什么事情都是推脱的。后来，我们给厂里交了自己补缴社保的那份钱，他让我们一起去吃饭。那时他就暗示了我一句说，去市里上访，一次就够了。他还说，一个什么村的人，去上访了好多次就没有结果，也把他們搞事的关起来了。我们去某市上访呀，搞的那么大。这个事现在已定死了，一次就够了，不要再有第二次了。我当时也顶了他一句，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合法的，反正我们现在钱都交了，也已经搞定了，哪里还会有第二次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但是脸色也不怎么好看。

可能那时候他就知道要拖我们的了，现在想起来他的意思其实是有下文的。他可能就是请我们吃一顿饭，有一个底，但那时我们还看不出来。所以我们等到三月一号，然后不停打电话给他，他就开始推脱了。可能他以为我们不会有第二次了。

## 再谈律师

现在是李律师（一个某区本地律师，和劳工机构有合作）做我这个案子，其实李律师他也不敢接，这种要跟公安局打交道，接都

不敢接。

之前，有一次主任带我们带华师大去跟学生讲课，介绍我们的经历什么的，李律师也去了。那时候我们没见过李律师嘛，我们有个工人坐在他旁边，就问他有没有名片，他说没有带。后来呢，有别的人问他要名片，他就给了人家。那个工人就跟我说了这事。我猜那时候他的心里都有一点怕我们，应该不是怕我们出什么事情，就是怕我们老板。他也给很多公司做代理，不敢得罪很多工厂老板的。个人的劳资纠纷，他可能敢接，他看到我们一百多人，还是一个这么大的厂，他可能就不敢接了。



## 工人代表王时义（起版部）

——我很佩服他们能对自己那么残忍，对老板那么好。

王时义是个聪敏机灵、很有自信的工人。不仅技术上乘，也很会与人相处。但他又不是那种会阿谀奉承上司，获取个人好处的人。在永宝表示会从 2004 年补缴社保之后，他被其他代表增选为“后补”首席代表。后来他被厂方找了借口开除，最终通过打官司拿回了非法解雇的赔偿。



我 1997 年第一次出来打工，因为年龄不够，才 16、7 岁，所以没进到工厂里。那时刚读完书，出来学点手艺，就跟人学了首饰起版。真正进厂是 98 年了，一进去就算是熟手啦，当时工厂在某区，就在这里隔壁，以前是东宝。我是自己找的厂，当时大概有 200-300 人，因为市场经济的许可问题，算作挂靠的东宝，就像现在挂靠莲花山一样，但其实也是独立的老板。

### 在东宝厂

刚进去是底薪是 750，加班很厉害，而且加班费还低。7、8 两

个月，连续加班到 12 点。星期天都很少休息，那两个月也只是 1000 多块，我们几个老工人已经拿到三四千了。加班费应该是七、八块，750 按 26 天算，再乘以 1.5，周末也是 1.5 倍，平时正常上班时 8 小时。

刚开始有食堂，是收钱的，后来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只做了不到半年就走了。刚开始住宿舍，没钱嘛，好像是要扣钱的，几个人一间宿舍，挺杂的。我直接辞工走的，退了押金，但是领不到工资，工资有 800 多，比押金多。

东宝老板是香港人，跟永义老板是老朋友。那时候东宝的厂已经倒闭了，没有订单。他们原来是大陆的，移民香港，现在要移民去加拿大，还有个老板移民去了美国。

与永义相比，东宝管理还算可以。聊天说话可以，上厕所也没问题。我们农村出来的，吃苦惯了，觉得加班到 12 点其实也还好，比做农活轻松一些，而且收入比别人还高一些。

我刚进厂的时候就能按照图把版做出来。大概 03 年发展成电脑起版，不过当时电脑技术不成熟。现在电脑绘图容易上手，都是学电脑的了，手工起版很少了，没有新人加入了。不过有一些复杂的不规则的，比如动物呀花草呀，就替代不了。电脑起版和手工起版成本差不多，工资也差不多，但是他们要快一些，画完图后用机器去做模型，直接喷蜡。

## 在永义厂

我出了东宝之后，有天是无聊到处走，看到永义厂。他们没有贴招工表，但我还是去问了问，他让我上去问厂里部门的师傅。师傅说收人，我就去试工了，试了一天，就进去了。当时我身上没钱，也怕被炒鱿鱼，还好那些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进去的工人也不会排斥

我们这种自己进去的，我也不会觉得因为是自己找到的工作就有优越感。那时底薪是 1600 元，1999 年的时候。比在东宝高了一倍。表面上看我们部门比其他部门的底薪高了很多，实际上，其他部门也会赚很多钱，因为我们只有工资，没有其他的。像执模，有损耗，如果损耗少，自己就会赚多一些。

起版这个技术在首饰行业算比较关键的一步，但我就是感觉自己挣不到钱。1999 年 7、8 月份加了工资，加到 2500。当时拿 2000 多的做得都没有我好，我就跟老板谈。虽然工资是保密的，但是大家熟了就都知道了。01、02 年的时候，搬了厂以后加班多一些，底薪是 3000 多，旺季的时候加上加班最多能拿到 4000 多，从来没超过 5000。我还是觉得不够花，平时也没怎么出去玩，主要是家庭生活上的开支。2001 年的时候在老家盖房子，我是最小的，谁有钱谁出，大家都是兄弟嘛。我哥哥们之前做水电的，工资非常低。我刚开始进厂时，找试工需要 400 块押金。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在佛山，他们都没钱借我，最后还是问平常住的地方的老板借了 400。后来，我一出粮就把钱还给他了。我有到珠海那边找过其他厂，不过他们发不起工资，如果给得起我就去了，那边说是有 3000-4000 左右。那时候建房子借了钱，需要还钱。05 年建了房子，结婚。08 年在肇庆那边买房子，大概是 20 万，贷款 15 万。所以觉得没什么时候是有钱的。我和老婆一个月要还贷款一千多，08 年的时候也不算太贵，现在贵一点了。孩子在那边读书，每个月也需要学费生活费。一租房，什么钱都没了。

永义加班不算太多，最多有过 90 多小时。以前在东宝有过 100 多小时的加班。在永义最后的底薪有 3500-3600。金融危机的时候有降低工资，我们部门是损失最大的，因为我们开始时底薪很高，一下降到 1000 多。之后，我就没有加过班了，不喜欢加班了，自己接一些零活做，管理也没意见，习惯了，而且很多活也用电脑代替了。年轻人在家学两三个月就进厂，进厂几个月就能拿几千块。我们珠

宝大部分都是手工的工人来追讨社保，起版的大部分都不敢站出来，只有我们几个，到现在都是这样，怕丢工作然后找不到了，都要养家糊口。工作也不是说那么难找，珠宝厂很多的，只是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出去就会觉得很危险，怕变动，要搬家，要找工作，很辛苦的。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干了5年以上的老员工。

02年的时候已经有人要求厂里买社保了，不过那时候我没有发言权，也没轮到。那时候都是厂里说了算，他说没有就没有。那时候工资才几百块一个月，买社保也不划算，很多人都不愿意买，把名额让给别人。

04年又补了一次社保，也是限量的，有名额的。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名额。

厂方有组织一些篮球赛、羽毛球赛、足球赛，在厂外的场馆去打，不过没有固定的队伍，都是临时挑一些人参加。还有举办过联欢会。

做我们这一行的，去很多厂都有老乡，肇庆呀广陵呀。这个手艺主要是熟人传递，比如我会了，然后教我兄弟，一两个月就能进厂了，花费不是很多，在外面看来，工资还比较好，所以主要都教熟人，可能一家人、一村子的都做这个。做起版的就肇庆的多些，其他地方的可能不太喜欢，或者找不到人教。

我们部门跟其他部门是一样的，工资待遇日常福利全是靠进厂的时候跟老板谈，后面就不会再增加了。跟老板讨价还价的底气也是看个人的。做的人太多了，就算你不干了，厂里能马上找到替换的人，不过真正能做到事的也不算太多。

选代表时的要求是只要愿意出来说话就可以了，能力可以慢慢培



养。我也是什么都不懂，慢慢总结出来的。做错了没关系的，要包容嘛。

我对 X 书记的印象就是他说啥事都帮你搞定，后来却啥事都搞不定。其他工友都感觉他说话算话。政法委书记是管治安方面的，带头监督厂方跟我们。当时已经去了人大了，没有人站出来带头。我们是想解决问题的，既然有人出面解决事情，那我们也要信他。他也口口声声说帮我们搞这个事情。我们一百多人，全部知道他电话，他说有什么事直接给他打电话。所以我们也不怕他糊弄我们，自己又回来了。

X 书记跟其他官员相比，正气一点，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他说要负责就一定会搞好。其他官员都是耍太极，说什么你们不要闹了，回去，我们会帮你们调解的。X 书记不说这样的话，他说一定会帮我们处理，一定帮我们拿到，后来还请我们吃饭。当时还觉得他是真的在做事，吃饭的时候也是开心地聊家常，没有聊这方面的事情。说话客客气气的，还有点尊重我们。毕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补交的社保钱也有一万多嘛，收了我的钱，不可能把我的钱吞了吧。如果吞了就更有理由去找他了。

人事部经理奶妈，她跟我们员工就是完全对立的，很嚣张，好像自己的话就是代表了厂方的话，她说不给就是不给，完全不讲人情，不讲情理。何公公呢就比较有手段，一开始他是笑眯眯的，但他知道我是代表，之前明明通知的三号回去交钱，三号我回去厂里补缴社保，他不收我的，说财务忙。我就打电话给劳动所，劳动所又打电话问厂方，厂方说最早要四号，到四号早上就收了。不过这都随他啦，最终四号还是收了。有一个最少的一千三百多的没交。现在应该差不多都补交了。现在很多工友要去地税那里追。如果厂方全部补交，就要追去地税那里了。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我感觉第一批已经没有问题了，第二批的人就是怕，想追又不敢追的样子。我觉得第二批是没问题的，如果第一批都能拿到了，就不用追厂里



了，直接拿第一批的人当例子问社保局跟地税局，为什么第一批的可以拿到，我们为什么不行，如果拿不到，我们就去告。就没问题了呀。

我个人觉得有人怕是正常的，不可能所有人都不怕，有的人可能怕人太多，花钱太多，不好团结，厂方负担不起呀各种担心，我就不担心厂方的经济能力，几百万对老板也不算什么，主要看我们工友团不团结，我反而比较担心这个。人心是最难控制，最难统一的。所以现在我出来之后，阿顺也出来了，接着崔明杰和亚美被抓，第二批工友就更加害怕了。我那天就跟他们说了，如果你们是这样想的，那我们就约着一起出来吃饭，解释一下，会不会受到厂方的影响。我是想让他们不要太担心这个事情，放心出来搞，别怕，拿出自己的能力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我被解雇了其实是好事，对我不算太大损失，反而不解雇才是损失。但其他人就觉得我们被整了，觉得害怕。其实我就是想解释这一层关系，我不是受到厂方的压力出来的，而是为了自己的官司。工友们怕厂方炒鱿鱼，但是我不怕的，我没有太多的心情在那里做了，而且如果认定他要赔的话，对工人也是一个鼓舞。这个官司我希望能赢，赢了可以给工友一个榜样嘛，而且我还要赢得漂亮，不然很多工友就会害怕。厂方也希望跟我打下去，因为可以影响到后来的工友嘛，今天早上他就是想方设法弄我的入职问题，说我旷工两天，满两天就说我自动离职了。原本是旷工三天算作离职，自从我4月24号申请仲裁，那之后就变成旷工两天算作自动离职了。很多工友2号、3号在人事部，他们都是按旷工两天算的。我没有旷工三天，他们要找个出处说我自动离职。我有提供病历，证明我是病假，不是无故旷工的。问题是他不批，厂方不批我也要走呀，你又不接受我的病假。他后来又说我没有跟他说，我是5、6号旷工，回去上班的时候，他已经炒了我鱿鱼了。现在要等结果出来。去年就是11年的9月20号，那时候就说明了是旷工两天。一直以来放假通知单上都是2天以上满3天的

才算自动离职。厂方变来变去的，自己都矛盾了。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厂方有很多动作是针对我们的，我已经预料到了，只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招数。我想这大不了就是炒我鱿鱼呗，最厉害的就只有这个了。我感觉崔明杰跟亚美都是因祸得福，如果不是这次无缘无故被拘留了 20 多天，厂方可能就是一直给你放假，放到你自己走了。现在还可以追讨一些补偿金，毕竟我这样的算下来也有几万块钱呢。他们的情况跟我的一样嘛。我跟厂里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即使不签合同，被解雇，也应该是双倍赔偿。不过他们的可能比我的麻烦一些，毕竟是刑事案件。最多就是拖时间咯，不过时间不是问题，这几个月可以找工作，几个月之后再回来，都没关系的，不用太担心，担心也没用，我现在就是打散工，还是要生活的。一年多了，亚美、崔明杰是代表，特别是崔明杰，是首席代表，跟亚美他们经常一起出主意，毕竟一年多的训练，出来都没问题的。他们都是福气人，现在不仅有经济赔偿，还有工友的支持，最关键的是工友会站在你这边<sup>7</sup>。你有能力，进去拘留也是福气。如果那时我在厂里，估计也会被缉拿。他们围人事部那时候我正好回家了。当时有工友给我打电话，这个行动我是知道的。一开始都让工友保持克制，因为如果上马路马上就会被拘留的，但是在厂内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是劳资双方问题嘛，自己解决。当时 2 号晚上我也有看新闻，看到了基本情况。

之前我在这里的时候都有商量过，就说各方面都考虑一下，但是始终有些思想比较难统一，集体思想很难控制，人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商量的时候可能还能统一，现场就很难控制了，有些人听不到你说的话。厂方又用了一些手段吓工友。崔明杰他们出来的那天，我也过去了。我一开始就觉得定不了罪，因为当时有报案。厂

---

<sup>7</sup> 编者注：王时义最终拿到了补偿金。但是厂方在亚美、崔明杰被刑拘期间，以刑拘为理由开除了他们两人，没有支付经济补偿金。他俩觉得打官司要回补偿金很麻烦，因为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触犯刑法，就放弃了。

方报案了，现场有警察，有地税人员，有辅警，有政府人员，都在，怎么禁锢你呢。如果禁锢你了，现场的警察早把我们抓了。

十多年前对社保问题没有觉悟，现在去追的已经有一点觉悟了，就怕有一些知道了还是不去追。上次我回去领工资的时候，还有一个工龄十几年的，问我怎么追，我都被搞懵了，他好像到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电金部门的。电金部门整个部门都没有追社保。他们部门人不多，师傅压得严，但都是老员工，他们好像就是怕被炒，天天加班，从年头加到年尾。我都不知道他们怕什么。我们放假的时候他们也在加班。他们可能更在乎工作，更在乎加班费吧。我估计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如果采取激烈一点的行动更容易成功，毕竟他们那个部门总是加班。那个部门请不到人的，有一些工位是有毒的，比较危险。刚开始，第二批也有人让他们加入，他们没有人加入。我很佩服他们能对自己那么残忍，对老板那么好。



## 工人代表慧芝（起版部）

——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想，镇政府可能会向着我们，会帮着我们。但是说多了，谈多了，说来说去都是一样的话，以后就没拿他们的话当回事了。

慧芝是起版部门的代表，是某区本地人，也是社保维权的最初发起人。她热情积极地参与了前期的维权活动，也常去劳工机构学习。直到被公司放假后，她到一个商店打零工，还和新同事宣传社保的事情，并带他们到机构学习。

## 选代表、筹款和经费管理

问：“从这件事情开始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多了，开始你想到过自己会做代表吗？”

答：那时候我想过我自己肯定是要冲在前面了，因为追社保的主意是我提出来的，那些人也都是我去找的。如果我不做的话，你叫别人，别人肯定不愿意站出来了。就是这样的。

问：那咱们之前选这个代表，其实也不算选，就是自己站出来去做代表，对吧？

答：对啊，就是通常比较积极那些，会说话那些。其实好像就

是被逼出来的，也不是被选出来的。

问：是机构那边建议的要有代表才出来做代表的，还是咱们大家自己觉得该有几个代表？

答：是那边给意见了，我们再选了。就是平时比较积极啊，做事比较多的，就问他愿不愿意。

问：那如果机构那边不建议的话，你们就不会正式选代表了吗？

答：那时候的情况是，每次去谈的话，也不可能全部人都下去，就是谁站在前面的，下去和厂里谈了。也没有特别明确谁是代表。代表的名额也是后来服务部那边建议的。

问：筹款的事情，是自己想出来的吗？还是机构那边建议的？

答：也是那边建议的。就是说你们请假出来办事，那个请假的费用啊，收费什么的，要给一点点了。主任那边建议是 10 块钱。我们说 10 块钱肯定不够了。不能每一次不够又再筹，不如一次收 100 块这样了。

问：机构这边不建议你们筹经费的话，你们就不会想到这些了吗？实际上有没有经费的需要？

答：那时候也会想过。每次我请假去办事，大家就支持那个请假扣的工资给我嘛。那时候也想过的，有提出来，但是没有做起来。那时候一些人也不想出钱。怎么说呢，成不成功还是个问号，要是拿了钱又做不成就亏了，顾虑的比较多，心态上也不一样。

问：那怎么又转变过来想法，愿意了呢？



答：我们就叫那些人过来机构这边了解一下。那个时候他们不愿意过来的。后来我们就说谁交钱就收谁的资料，如果不交钱的不帮他拿资料到主任这边来了。

问：会不会有人说交了钱你们才给我办事，会有意见？

答：没有。他们也觉得，人家去给你拿这些资料啊，去复印啊办事啊，人家也要付出啊，给钱是应该的。但也有些人觉得，出了一两百，他坐在那里等结果就行了，什么也不用做了。一说就是找代表啊，去哪里都是代表去啊，都要代表做，他们就都不愿意站出来。一些很简单的事，去饭堂开会啊，或者谈什么事情啊，都不是全部人来，都是一部分。其他人不愿意来，下班去听一听他们都不愿意。

问：他们交钱之后和之前对你们代表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

答：没交钱之前，好多事情他们不明白或者没有弄明白的时候，代表又没有拿他们钱，为什么给他们跑那么多趟呢？有些事情就他们自己去做，自己去问了。他们那时候有些人更愿意动。交了钱，很多人就不愿意动了。

问：那代表怎么想？

答：是啊，有些代表说，你们放假了可以在家里看电视带小孩，我还要跑到机构学习，还要送资料啊，还要干那么多的事，我要浪费自己的私人时间了。

问：谁交钱就给谁递资料的主意是谁出的啊？

答：好像是王时义他们说的。那时候有些人的资料自己不愿意送到机构，想给我们几个人一起送。我们就跟他们说，你又没拿钱出来，我们白给你跑腿啊。就是这样了。

我们现在人是多了，还不如以前人少的时候心齐。好像这次发放假工资一样。发工资的时候呢，那些人挺积极的，一百多个人全

部一下子涌过去。我们那些代表还站在后面。有代表都说应该我们先拿钱，才轮到他们啊。

等拿了工资，叫大家轮流去地税局去问一下什么时候补社保，那些人一下子就闪开了。真的。刚才拿钱的时候还那么多人呢，现在一说要轮流去地税局，那些人就走掉了，最后 30 个人都不到。真的。

问：经费都用来补助代表什么费用？

答：就是拿那个车费，或者吃了饭了拿那个饭费。其他都没有。

问：经费怎么管理？

答：三个代表管理这个钱。一人拿一部分。

每个人去一趟机构补 20 块钱，因为他们从岭辉镇那边过来，比较远嘛。之前是实报实销，应该是 15、6 块钱。后来他们就说，我那么远跑过来，那四块钱，还要还给你，有意见。那时候也问了其他员工了，拿了一张纸叫其他人签字，其他人也同意了。我们没拿那个钱的时候，是经过其他员工的同意才这样做的。他们同意做了，我们还觉得这个也不是实报实销，还报多了几块钱，也不太好。别人就说，买一瓶水喝，还是要的啊。现在这些钱主要是用在车费啊请假啊这些上面。

如果很多人去上访或者去哪里，开支比较大的话，就是自费，因为人太多钱会很快用完的。现在还剩那么多钱，但是去多几次，钱很快就会花完了。

问：其他人交了钱以后关心过经费的情况吗？

答：不关心的。从来不问你现在还有多少钱，用了多少钱。

问：那你们几个代表之间会关心吗？

答：他们不问，我们几个管钱的也会说给他们听。

问：你们代表从开始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会不会有一些矛盾什么的？

答：有时候会有。好像我们就说马昂，在 QQ 群里说的话比较多，真的去做起来的话，又没那么积极。比如有一次，他跟我们一起和政府的人谈话，他又不发表意见，不出声。有些人做了代表又不积极了，叫他联络几个人，去哪里哪里，他又不去了。

还有些人自己不愿意做代表，但是意见很多。好像亚美，开始要她做代表，她说请不了假，晕车坐不了车。但是我们做了代表，去谈判了，回来跟他们解释，她又会说你们怎么怎么样（谈得不好）。我们就跟她说：“下一次你去和他谈。”她真的去谈了，又总说她自己的事。她好像是那种如果她的自身利益没有受到什么大的触动她不会站出来的、比较现实一点的人。我们这里一群人，很多都很现实，既不愿意付出又想得到结果的人。

问：代表中间有人退出也有人加入吧？

答：也有的。有人叫他去开会，或者做哪些事情，他都不愿意做或者站出来，那就退下去了。另外一些人主意办法比较多的，就站出来了。

问：那是你们代表商量一致说这个人不行，才把他退掉，还是他自己退？

答：他自己退。他自己说我不做代表了。我们在签那个代表名单（授权书）给厂方的时候，很多人就退出来了，就是怕。

问：你当时签名做代表害怕吗？

答：厂方也知道我是代表，不写上去他也不知道你是代表了。写出来就是明确一下我们这几个人是代表。

问：那你们做了代表之后，厂方的态度对你们有没有变化？



答：没有代表之前，公司有事就发一个公告出来啊。有代表了，就让我们去问其他人的意见，让我们代表通知其他人啊。

问：其他方面呢？会不会更针对你们一些？

答：好像也是更针对一些。比如放假的时候全部代表都放假了，没有一个代表没放假。还有比较积极那些也都全部放假了。

问：首席代表这个是机构这边建议你们选的吗？

答：是。当时讲，要有一个首席代表，作用是：谈判的时候主要由他提问。

问：首席代表说话的分量是不是比别人更重？

答：也不会的，还是都一样的，每个人都会发表意见的。

## 工人代表和厂方、政府的交涉情况

问：开会之前有没有想要和对方谈什么？有没有什么分工？



答：临时叫我们过去的时候，没有进去谈的时候，我们几个代表也商量一下怎样提，怎样讲。但很多时候就是商量好了，到跟他们谈了，又不一样了。

开大会的时候我们就提前写好、说好，怎么谈怎么谈。

主要是崔明杰跟宏强说的比较多，提一些问题。我们其余代表补充说。

问：之前镇政府怎样通知你们去谈话？

答：镇里面叫我们代表去谈都是通过厂方。之前是那个镇劳动部门的主任跟我们谈的。他说了一大堆的话，好像他说的也挺有道理，好像在帮我们一样，不是站在老板那边的。

他说：“你们这样如果买够2年，社保就没法追了，所以你们现在再不追就不行了。你们在厂里做了那么长时间了，是要有社保。我也有朋友在跟你们一起追。我就告诉他，别人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你的那份肯定也有，不用出头。”

问：他的意思是不是你们不要这么多人搞事？

答：是啊。他说：“你们去上访可以啊，不要拉横幅啊，不要走到马路上啊。只要你们不违规的话，其他部门也拿你没办法。”还有我们和机构去公园广场搞中秋活动的事情，他说：“你们在厂里搞什么，我们政府部门也管不了的，但是你们到外面去，那么多人聚在一起，也不好啊，也要经过很多部门申请啊。”

问：厂方怎样通知你们去协商的？

答：厂方会有人过来通知，让我单独过去，说是去财务处，然后等去了财务处又说让我去人事处等着。估计想给别人造成一个印象，把我叫到财务处去了，说不定是要给我钱什么的，但其实去了那里又把我叫到别处去。

问：他们叫你去财务处，其他工人会不会起疑心？

答：不会啊。他们会说相信我们这些代表啊。一般我们谈完以后，员工都下班了。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再跟大家说昨天和厂里谈了什么。

那次我们100多个人一起去找厂里问社保之后，厂里说不让我们这么多人去，只让去几个人谈，谈完回去再和其他人说情况。我们回复厂里说，之前几个代表去问你们的时候，你们说过几天给答复的，可是这么多天过去了没有答复，我们这一百多个人当然来找

你们了。

但那以后谈判的规矩还是定下来了。每次去跟人事部谈的代表不能超过3个。代表要去必须通过部门同意才能批准出车间。如果谁要是擅自离开车间，部门丢了东西就有可能赖在谁的身上。

问：那你们后来再通知什么事情就没以前那么方便了？

答：是没以前那么方便。以前我们可以去其他部门。但是文员可以出去到其他部门，我们就通过文员传递那些资料。那些文员都不追社保，但有些人会帮我们的。

后来是下班的时候去饭堂商量，12点钟的时候在饭堂聚在一起，谈一下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下一步怎么做之类的。各部门代表说，其他员工有感兴趣的就在旁边听。

问：管理会去那个饭堂吃饭吗？

答：管理和我们是分开的。我们食堂按照职位分高中低档的，我们是低档的。

管理开始不会进那个饭堂。后来可能是他们发现我们总是一大堆的人在饭堂里开会，以前饭堂里没有保安在那里看的，后来也派保安在那里看着我们。以前人事主管都不在这个饭堂吃饭的，后来她也过来吃饭。但她离我们比较远，不会离我们很近的。我们也不管她，她听到就听到了。其实那些保安没有什么的，他们也是打工的，他们也有家属在追社保。只是管理叫他这样做，他就这样做了。实际上我们做什么他不管的。

问：在饭堂开了几次会之后，厂里派保安去盯的？

答：开了好几次会以后了。

问：那厂里还是反映比较慢了？

答：管理觉得我们搞不出什么事。他们一直认为我们没什么的。

## 中秋活动风波

问：之前最早的时候，是你们自己觉得该多叫一些人一起追社保呢，还是劳工机构那边建议你们多叫一些工友？

答：本来之前我们是 30 多个人嘛。劳工机构就说，你们厂里有 1 千多人，你们占的比例也不高，肯定是越多人越好了，容易办事，聚在一起力量大了。跟老板谈的话，人少的话对他没什么压力的。

那时候我们在追社保的时候跟每个员工讲，跟厂方搞对抗，他肯定炒我们啊，或者调级、放假，我们都有准备的了。

问：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们的集体行动会不会被安一些罪名？有没有过这方面的担心？

答：就像我们中秋节那次想在广场做活动的事情，开始镇上一直不给批嘛。后来我们厂有个人的房东就在镇政府做事的，就说让我们打电话问一下镇里负责这方面的局长，如果问了他说不行的话，就投诉到镇书记那说他行政不作为嘛。我们也把那个人的电话给了机构的小云。后来我们等不及了，也没问机构那边有没有给局长打电话，以为他们还是不批准我们的活动，就直接发了信息给镇里的书记，说我们是永宝的员工，想中秋节在镇广场那里搞一个活动，你们文化局长为什么不批？就这样说的。听说那个书记当时在开会，开完会以后就叫那个局长留下来问这件事情，好像是说了他一顿。那个局长说没有人打电话给他，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是被人诬赖的。

他被书记说了一顿，他也不服。后来有天上午，那个局长直接带镇政府、公安局的人来我们厂了。厂里知道肯定是我们搞社保的人弄的这件事了。那个时候就叫了我和崔明杰两个人上去。后来那个局长就说了，说我们诋毁诽谤他，制造不好的影响，说我们制造社会混乱了，说我们这个影响他的人生了，说我们是犯法了，可能

要拉我们过去那边去拘留啊，要立案留案底的这样说。

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想那么多啊。他问是谁发的短信。我就说是我发的（其实是另外一个女工问我之后发的）。他就让我留下来，说这件事情现在搞到他头上，被书记骂一顿他心情也不好，他要是被降级了，想不开的话，都会赖在我身上了。还说如果你们去那里搞活动有什么问题、纠纷，都会赖在我们两个代表头上。对我和崔明杰说，我们两个是本地的，跟我们村里哪个书记啊，谈过话，我们的家庭情况他们都很了解。就是在吓唬我们一样了。

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处理好，没有先问清楚机构那边，又没有打电话问，就发短信。

问：你们和其他工人说这次谈话内容了吗，他们有没有什么担心？

答：我们跟镇政府的什么人谈，都会和其他工人说的。今天晚上谈了的话，第二天中午就会在饭堂里跟其他代表、工人他们说。那时候我们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压力。我们知道他们说那些话是在吓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也没有做什么违法违规的。因为镇政府或者什么人，他们每一次跟我们谈的时候，我们都问他们，我们追这个社保犯不犯法，他们都说不犯法啊。

问：你们跟政府官员谈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人挺好的，谈完之后挺安心的，让你们回去等消息吧，又没结果了的情况？

答：是啊。他跟你说一套做一套啊。你要求他做什么事，他应付你啊。反正现在就是应付你。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想，镇政府可能会向着我们，会帮着我们。但是说多了，谈多了，说来说去都是一样的话，以后就没拿他们的话当回事了。

有一次去那个镇政府一起和厂方说好了，按我们的要求（1999年开始）补齐社保，后来我们那些人去厂里拿那些通知的时候，却是从2004年补社保。甚至有的做了十几年的还是从06年算。一百

多个人去那边拿通知，就 20 个人符合，其他人都不符合。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给骗了。那时候让我们签名，好多人通知都没拿就走了。政府在口头上说的，没有在纸上写的，没有用。

我们几个代表早都想到厂方哪有那么容易同意啊。我们去了厂里拿通知的时候，之前我们猜到厂里会拉拢那 21 个人去签名的。因为那 21 个人签了名，社保搞定了，剩下不同意的人拿到仲裁那里再拖。所以我们去拿通知的时候，提前说好了，如果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全部不要签名。

## 在外参加会议、学习感受

问：你感觉听专家教授们讲课，对你们有用吗？他们都有什么建议？

答：他们跟我们说了很多以前成功的例子啊，就是那些案例是怎么做的，也是给我们一种心理上的鼓励吧。

他们说我们要找到厂方的死穴在哪里啊。（被厂里放假以后）我们也没有找到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很被动。厂方那些人是不管我们在外面怎么搞，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他就不理我们了。那天下午放假之后，我们第二天也回到厂里，要厂里给一个解释，为什么厂里其他的人都在加班，我们却放假。他说他们就是没货做，有权放我们假啊。那时候我们有 100 多个人放假了嘛。我们那会也想在员工下班的时候堵在楼梯上，不给他们下班。后来一想我们堵在那里也没有用啊，放假就已经是放了，你也没有什么办法。厂里又不让我们进厂，不让进车间。我们在那里闹，对他没有影响的话，他也不理的。



## 为什么没能罢工？

问：代表们开会时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怎么解决啊？

答：听哪一个讲的有道理。好多时候大家意见都挺统一的。个别的时候有一两个意见不一样的话，他都会给其他人作说明啊，解释啊。

问：有段时间不是有些人提出来想罢工了，但为什么没有罢起来？会不会因为之前威胁过你们两个代表，所以会有一些担心啊？

答：也不是怕威胁。当时我们都是跟其他的代表一起商量的，看他们同不同意。因为怕也没有用啊，要做什么都是一起去做嘛，又不是我们两个单独去。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怕不怕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个部门都是只有一部分人追社保，其他人不参与。比如执模部几百个人，如果只有几十个人罢工，担心对厂里产生不了影响。

而且有些人在怕，不敢站出来。他们觉得，要饭碗也要社保。到了后来被放假没事做、没工资的时候，大家又觉得不一样了，因为这时候，所有人的自身利益都受到损害了，肯定会站出来了。

问：这些都是大家讨论的结果吧？

答：是。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办法，大家都说出来讨论一下。也讨论如果我们做了这件事，结果会怎么样，都觉得结果不好的话，也就不想做了。

## 行动中男女工的差别

问：厂里男工多一些还是女工多一些？去政府谈判的时候呢？

答：厂里女工多。谈的时候男代表多。但女代表话也不少，想到什么就说一下。

女工都不愿意站出来做代表的，比较积极的都很少，就两三个。

但是叫大家去哪里（集体行动），还是女的比较积极，男的还懒一些。男的每次都是去那几个。但是那些女的有时间的都去了。

## 代表们和第二批补缴社保工人之间的关系

问：第二批补缴社保的人现在是什么状态？

答：第二批的人也不积极啊。我们要他们去催一下社保的事，他们说不是有你们代表去做了吗，有你们代表去做就行了。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做事，还总是催着问我们怎么解决。

问：第二批和第一批的人有什么矛盾吗？

第二批的人不积极的。所以我们有些代表不想管他们的事。当然，第一批不理第二批也不好，毕竟人多力量大嘛。但是要是我们把他们的事全都揽下来，太累了。第二批当然乐意把这些事情全推给我们做，他们什么都不用管。

好多人都这样认为，我们第一批的，就算我们不去催，肯定有一天会行的，就是时间的问题。我们不用那么急的，就是为了你们第二批才总是催催催的了。但他们第二批的总是在问，第一批的钱交了那么久了还没有结果，他们第二批还有没有希望。就这样想的了。他们就觉得好像那些第一批的都不愿意帮第二批的。

问：他们也交经费了吧？

答：他们也交了钱了。第二批的钱我们都不敢动，因为万一要是不行的话，我们要退给他们的。



## 女工代表陆香（执模部）

——“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人家说这个行得通，我们就去做。不犯法的，我们都会去做。”

陆香是当时积极参与补缴社保的工人代表之一。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属于典型的在外任劳任怨工作、在内辛勤操持家务的女工。这次对永宝工人的访谈也是住在她家里，由她来张罗我们每天的食宿和帮忙联系工人。陆香最早想要社保是因为感到社保对自己的生活很有用处，一直想买，却一直买不到。陆香虽然对于补缴社保的行动并没有提出过什么策略主张，但只要大家决定了的事情，她就会认真去做。按她自己的话说，不知道要用什么办法去追，就是要追。

在2012年4月3号，工人们为了要书面回复聚集在办公楼的时候，因为最后时刻和人事经理发生冲突，陆香被推倒在地。工人们报案后，她作为“受害者”进了派出所，在不到10小时的时间内，却先后被“审讯”了两次。对于一个常年工厂、家庭两点一线生活的单纯女工来说，生平第一次进派出所便被警察们态度蛮横地盘问了两次，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可是她却能挺起胸膛和警察对话。因为她心里坚信，工人们补缴社保的要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她看起来没有多么聪明机灵，也没有被培训过任何应对技巧，但当意识到警察在诱导她说一些话时，出于保护自己和其他代表们的本能，给出了机智的答案，也很细心地发现了口供笔录上警察故意添加的一些词句。她表现出的勇敢、机智、细心，除了她本身性格特质，也是在与其它工人配合行动中，在劳工机构的交流学习中，以及和官府的反复交涉中锻炼而成的。

另外，从警察的态度和提问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不但明显



偏向资方，而且不停地给工人代表“挖坑”，搜集、制造工人代表的“罪证”，协助公司报复。

## 打工经历

我是 1999 年 19 岁的时候从广西老家来某市打工。我姐姐在某区这边做首饰，一个月工资有两三千。当时他们厂不招人，我就自己进了东方首饰厂。那是个私人小厂，只有十多个员工。我交了 600 块押金，在那里做打磨。我去做了两三天，但我姐姐说那个工作要把手泡在凉水里，对身体不好。我就找主管辞工，扣了我 50 多块，说是一餐伙食费 7 块。

后来去了友利玩具厂的装配车间，大概有几百人。管理不怎么严格，不迟到就不说人。车间环境不太好，很多胶皮，味道很大。我们车间还算好的，别的车间更臭。第一个月工资拿到 400 多。早上 8-12 点，中午 12:30-17:30，晚上不上班。计件工资，做的时间长的老员工有 1000 多。可能有好几百人。上班不怎么聊天，都自己做事。我去的那段时间。餐费一元一餐。住宿一个月要扣 120 元。

我在玩具厂做了一个多月，堂哥叫我去某市一个酒楼里做捧菜（负责上菜的服务员），一个月 450 元工资，工衣 200 块押金，辞工的时候退还。虽然酒楼里包吃住，但员工餐很难吃，早餐吃前一天的剩点心。住宿费一个月扣 120 元。老板经理另外坐一桌吃好饭菜。过年的时候有的客人会给红包。站着上班很累，钱也不多，半年后我就辞工了。

## 在永宝厂的工作

2000年赶上永义招工，那时候都是招18-23岁的人。我7月4号正式上班。进来以后干了半年的杂活，才到执模部。加班多的时候一个月加160个小时，或者170个小时，工资能有3000多。但我们品质查得很严，经常要求返工，有人都被管理骂哭了。

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工资还是3000多，加班少的话才1500多。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公司放长假。回来上班后，我们的底薪降下来，奖金加上去，看起来工资总额没有变化，但加班少的月份工资就会少一大截。还取消了年底双薪。

我结婚的时候，请了一个星期的婚假。管理是批了我的假，可是发工资的时候，只给了那几天的底薪，全月的奖金都扣完了。名义上是给了假期，实际上还是把钱扣掉了。那时候我去问管理，我说早知道就不休息了，婚假和请假还是差不多。他就说“哪里差不多，请假你有钱吗？现在不是给你底薪了吗？你都休息那么久，还想要奖金啊！”奖金可是一分都没有发啊，几百块就这样没有了。

刚在这个部门做的时候因为掉货扣了我两百多块。就是在做货的时候，要在石头上打洞，没有拿稳，石头飞起来了，掉到别人那里去了，找不回来。因为这个我被扣了好几次钱。

公司有一个医疗室，感冒发烧去那里看病，药钱会从工资里扣。

现在因为追社保被放假，只给底薪1100元的80%，就变成880元。

## 为什么想要追缴社保？

最早在2002年听说可以买社保的时候，没有我的份，是师傅指定的名单才可以。一个部门很少的名额。我那时也还没有想到要买。

后来是因为我生孩子的那会，听别人说买了社保就有钱补，生育保险可以补几千块，没买的话就不能补。当时我们生完孩子，工资只拿到几百块。我就觉得，那样子的话，肯定买社保好。像我怀我女儿的时候，产检的钱都用了几千块钱。但还是一直买不到。所以后来听他们说可以追，我就很想追了。

其实就算没了永宝厂的工作，我也一点都不留恋的。我一直在想，如果有哪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追，我一定会去追。我就一直有这样子想的。

一开始，是听我们部门的人说有人在追。我说那肯定要去追。但那会他说只能追回五年。我说，怎么做了那么久，才追回五年啊。我听到这个就不想追嘛。再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半个月之后，我老乡跟我说，她部门有人去追，已经追到了。那时候他们有人给了一张劳工机构名片。我一听说可以去追，我就跑过去劳工机构了，把我和老乡的资料都带过去，找李主任看。那时候，我们部门只有我一个。我也问过其他的人，都没有人愿意追。但我想，我们部门没有人去追，也无所谓啊，其他部门有嘛。那时候听李主任和涛哥他们说，如果我们团结，人比较多的话，可能追回来的胜算会大一点。那我也回来宣传一下嘛，可开始就没有人愿意。偶尔有人说也去追的，但是真正要去人事部那里报名，说要追社保，就没有人肯去。

## 补缴社保的经历

刚开始的话，我也不知道要用什么办法去追，就是想要追。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人家说这个行得通，我们就去做。不犯法的，我们都会去做。我就是这样子想。因为涛哥他们也给我们举了很多案例说，别的厂有追到的案例。我想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怕追不到。讲了一个例子是保安公司的，说他们只是去投诉了，就可以帮

他们买了。也经常去听一下他们说追的经验。涛哥也给我们这个平台，去交流，这样子嘛。就比较感兴趣，想快点把他追回来。刚开始不说是代表，李主任跟我们说是联络人。那我就说，我们部门只有我一个人去，那我就先做联络人了。

我回到厂里和别人宣传后，刚开始我们部门就我、小雨、还有小罗三个人愿意要。开会的时候说，第一步要把合同拿到手。可是去人事部找公司那份合同书，就没有人肯去。

我们部门的于航（和陆香同一个部门，他已在老家缴纳社保，不用在永宝补缴，但一直很积极帮同事出谋划策）也帮了蛮大的忙，在部门里宣传，开会出主意。第一次我们和其他部门的人一起签了名，去人事部拿合同。然后，有些人看到也心动了。第二次我们部门就去了十几个。再后来，一点一点加进来，一共有 37 个。

很多人是想搭顺风车的，反正有人去追，他只要报一个名。如果要他们去克服困难的话，他们就不愿意。我们后来收钱，很多人问我说“是不是交 100 块钱，就有人帮，什么都不用我做了？”我说：“我不知道啊。”那时候，李主任那边是免费帮我们嘛。他们就说，有这样好处啊，那就去追。有人甚至名字都不敢写到联系簿去。去拿那个合同书都不敢，很多人都不敢。

我们以前不怎么懂法律。公司说让签什么就签什么，让按手印就按手印，自己把自己卖了都不知道，还在帮他们数钱。就是因为追社保，才在当中学了很多关于保护自己的法律的一点知识。之前即使看了有关于法律的书，看了也是白看。反正我们厂也不会实行，就是一纸空文。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想到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也不会做。就是到机构那边，跟涛哥还有李主任他们聊天。在他们那里学回来，用法律保护自己。

## 4月3日冲突及派出所笔录经过

因为亚美坚持要把“永义”的名字也写上，何经理不写，他们吵了起来，我帮亚美说话，后来何经理把我推到了地上。其他同事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就把我和何经理带上了警车。本来我不愿意去的，其他人说：“去吧，没事的，我们都去派出所等你。”我就去了。进到派出所之后，警察问我想怎么办。他说：“让你去验伤你又不去验，那你想怎么样啊？你又没有什么伤。”我说：“不知道啊，我只知道被何经理打了，怎么知道怎么办啊？”他就说那先做一下笔录，就带我去一个房间里做笔录。

### 第一次笔录

第一次是先给何经理做笔录，再跟我做的。警察问我怎么发生冲突的。我说因为追社保。警察说：“你追不追社保跟我没关系，我只问你们怎么跟何经理发生冲突的。”我就把经过跟他说了一遍。

他问了很多问题，似乎想证明是我们（工人）有错。他老是问：“他为什么打你，是不是你挡住他，如果不是你不给他走，他怎么



会打你呢？”他问我：“你站在哪个位置？”我说我站在最前面。他就说：“那就是你不让他走了？你不让他回家是不是？”就围绕这个问题反复问。我说：“我们没有不给他回家，我们只是有一些疑问要他给我们解答。”警察说：“他已经给你们解答了。还说如果不行的话，近期再回复你们。他都这样回答了，你还不给他走？”然后一连串的问题问我“为什么不给他走啊？如果是你家里人，你该怎么办啊？你老公有没有来啊？如果是你老公两天一夜没有得回家，你会怎么想啊？”

跟我聊天那个警察，是很凶的那种感觉。我就说他太凶了。他说：“我凶吗？我对事不对人。”我说：“你这是对事吗？那么凶！”他说我的表情不好所以他态度才不好。我说：“你还要我什么表情啊，我现在都被人打了，难道你还要我嬉皮笑脸的？”那警察说什么话都是把责任往我身上推。

他老是问我“你想怎么办”，“他打到你哪里了，伤到哪里了，你哪里不舒服”，问这些问题。第一个做笔录快做完的时候，外面的工友打电话给我说：“你跟何经理的（纠纷），不跟他追究好了，怕到时候追究下来，社保那边麻烦”。我就对警察说“我不追究了”。警察说：“那你们两个签好协议。”因为一直被他们问问题，脑子已经一团乱了。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那么多工友在外面，可不可以让她们进来一下？进来陪一下我也好嘛。”他说：“你要她们进来啊？可以啊，打电话给他们，叫一个人进来了，只可以进来一个，你想要谁进来？”我一下想到叫亚美，因为亚美那时候也被何经理打了，她进来应该也是有用的。这时候另一个警察说：“亚美啊，亚美我们调查她很久了，她是搞事的，不可以让她进来。”让我再叫另外一个人。当时我也没想到叫代表会连累到他们，就说崔明杰。之后就叫了崔明杰进派出所去。

## 第二次笔录

第一次笔录是晚上九点半左右就做好了。第二次是等到晚上十二点多，崔明杰做完才让我进去做。我做完已经是半夜两点多了。我进去做第二次笔录时，警察一上来就跟我说，在这个事情里面，不关我的事，我只是被人利用。他让我把事情再说一遍，不要说假话；从什么时候到厂里去，谁组织我们去的。我说没有人组织，是我们自己去的。那个警察说：“你们平常都跟谁谈社保问题？”我就说跟家里人聊了。他后来就问是不是有人带头，我说没有。那次本身也没有组织，是大家说起来要去。大家也没有真正的组织的。这些话，他一到，我不用想就回答得出来。

他又问我怎么认识亚美。我说早就认识亚美了。他说：“你们不给他回家，他才动手的。”之后就围绕亚美来问，几乎每一句话都围绕着亚美：“你们发生冲突的时间，亚美在你的哪一个位置？”我说：“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她在哪里啊，她在不在我身边我怎么知道。”他问亚美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我说：“你怎么老是问亚美呢？这跟亚美有什么关系。”他说：“肯定跟她有关系了。你第一时间要找人证，你都说要找亚美，肯定有关系了。”我说：“我们是朋友啊。”他说：“她是你一个部门的吗？不是一个部门的，你干嘛不叫别人要叫她？”我说：“我们都是朋友，我早就认识她，认识她几年了。我进厂就认识她了。我不能找她吗？”

第二次做笔录好像想从我口中问到对亚美不利的东西，但一点都没有提到崔明杰。第二次做笔录的时候，其实亚美和崔明杰已经被叫到派出所里了。

第二次笔录的警察问我话的时候语气也很重。他说：“你是个女的，要你是个男的我就打你了。”还说“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要不要带你去做一下鉴定看你是不是有问题啊？要不然怎么问你什么都不知道啊？”这类的话。我说：“那你就打啊。”如果是以前的话，



可能会被问得哭起来，但是我就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我不想哭。如果哭起来可能还不会答他那么多话，不跟他聊那么多事。我看他那么凶好像要把我吃掉的感觉，我就拿手机在手里玩，看着要录音的样子，想吓一下他嘛。其实我手机快没电了。谁知道他真的很认真哦，说：“你在干嘛？”说着就要抢我手机。我说我在玩手机，他说这里不允许录音。我说：“如果你没有亏心的话，这样子对我问话是很正确的话，就是我录了音你也不怕啦！”他说：“就不许你录音。如果你要记的话，记我的工号，到时候你再去告我。最好你告得我不得坐这个位置，我到时候还请你吃饭。”他还拿我的手机去看。我说你看了。他说：“等一下我把你的手机没收了，拿去扔掉。”我说：“你为什么把我的手机没收呢？我又没做什么，我又没录你音，也没录你像啊，你干嘛没收我手机。”

第一次笔录只有一个辅警，第二次就有三个。好像看你怕不怕那种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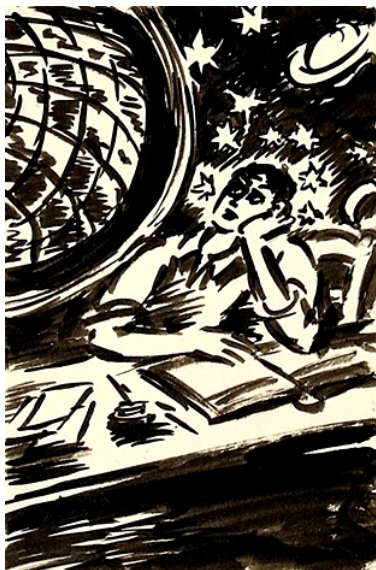
最后他们把笔录给我看，说哪里要修改的，让我再看一次，看完要按手指印、签字。上面有一句话“我们不给何经理回家”。我说这句话我不认同，把那句话划掉了。他说：“那是你自己这样答。”我说我没有这样答。那个警察被我气得满身大汗，很想打人那种感觉，在那里喳喳跳。他说：“你把那句话划掉，那我一个晚上不是白折腾了啊！你为什么又说没有？”我说：“我们没有不让他回家，只是在厂里面找他要一个答复。我们怎么不给他回家了？保安警察一晚上都在那里啊。”最后他就换了种说法，就没那么直接。我当时想算了，反正被他们问了那么久，心里也很烦，就签名了。跟他对着谈，心情真的很差。当时也不知道，什么都不回答他们就好了。

第一次我做笔录没做完，亚美已经进去了，可能紧跟着崔明杰的后面进去的。我是做完笔录坐在外面才知道的。我也没想到崔明杰也要做笔录。我在外面等了一个多钟，后来他出来了。我就听到亚美的声音。崔明杰出来时，我说我都不知道亚美也进来了。后来

我跟崔明杰说，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伤，不如不追究何经理的责任吧。崔明杰也认同，说不追究就不追究了，怕会对追社保的事有影响。后来亚美又出来了，我们坐在那里聊天，还可以啦。我也跟亚美说不追究何经理的责任了，她没有说什么。后来又叫崔明杰和亚美进去做第二次笔录。亚美没进去几分钟，就出来拿水喝。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她说：“可能被他反咬了。”第二次做笔录的时候就已经被何经理反咬了。那时候我好像还没签不追究的协议。

何经理出来，说要打电话，他手机没电了。那里面的人（派出所前台）就叫他去打。他就打电话叫司机过来，以为他们很快就可以出去了，他叫人送东西给他吃。等他打完一阵子，有电话找我，我手机也没电了。我也要求打电话，前台就说不可以打。我心想，何经理在那里打电话，那些人就那么温和，我去就不给打。

我做完笔录以后，政府的人就去了，书记什么都去了。老板去的时间是第二天 11 点。我没看到，因为那天晚上两点半我出来，还有很多工友在那里。他们叫我先回去收拾，我就回来了，也不怎么睡得着。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去派出所门口那里，那时候于航还有慧芝和制版部的一个人，一共三个人在那里等。他们说还没出来，后面有同事睡醒了再来派出所换班等。之后我大概 10 点多回去的。



## 工人积极分子于航（执模部）

——“有时候也感觉很被动，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和厂方闹的时候，厂方就会报警。这个是劳资纠纷，与警察无关，警察就不应该来。”

于航可以说是永宝工人维权队伍里的“军师”角色。他本人并不需要和其他工人一样需要补缴社保，而是同在一厂工作的妻子需要。但他仍作为联络员加入了工人代表的队伍。有人质疑过他，毕竟他和其他人不同，不是真正的“当事人”。不过，于航一直积极参与工人代表的讨论，机构的学习，出谋划策，几次重要的集体行动他也参与其中，最终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

## 个人经历

1995年8月我从河南老家出来打工，到现在差不多20年了，做过保安、帮厨、服务生。2001年4月份进到永宝厂。那时的工作不太好找。服务行业用工比较少，工厂有需要的时候用工量才会大一点。

2001年的时候需要人介绍才能进厂，现在大部分工厂还是需要人介绍（才能进）。当时（进厂）还要交押金，几年后才退。

2001年永宝厂大概有2000人，在岭辉那边。当时厂里所有人都是熟人介绍的，要不然不招。进厂需要三证：身份证、未婚证、

劳务证。很多厂招工时要这三证。劳务证是在老家开的外出打工证明，要 30-100 元，属于变相收费。我有个朋友在这个厂，先把我老婆介绍进去，后来我想跟我老婆在一起上班，也介绍进去了。进厂还需要面试，一般有人介绍都能过。当时进厂不需要学历，除非工作需要。



工厂的工人，湖南、广东、广西比较多，还有本地人也比较多，一直都是这样。以前很多人想进来这里工作，350 元的工资都肯做。

以前我们厂主要做金（首饰），也有做其它的，但比较少。现在是什么单都接。2009 年开始接银（首饰）的订单，铜是 2011 年开始接的，但铜的单比较少，银的多。

## 劳动条件

刚进厂时试用期 6 个月，没签劳动合同，生手底薪 250 元，医药费 10 元，餐费 66.6 元，还有全勤奖（是一天的工资）和奖金。进厂后每三个月加一次底薪。包住，不包吃，每顿饭扣 1.5 元，后来有了餐费补贴。工资是计时的，2008 年把底薪改成了岗位奖金，所以加班费就少了。以前是没有岗位奖金的。

开始不知道要签合同，后来政府宣传力度加大了，才知道要签合同。我是 2007 年才签的合同。

这两年才知道有最低工资的规定。以前只知道别人厂的工资高，我们厂的工资低。2008 年政府扩大宣传了，才知道有最低工资的事

情。以前工作每满一年，工资会上升 50 元钱、100 元钱，有时也要看关系的好与坏（工人与管理人员的关系）。2008 年的时候工资底薪不等，有 350、650、850 元的，有时候同级工资都会有一些不一样。也有个别人和师傅关系好，就多涨几十元钱，以前没有标准。现在才有了最低的一个标准，新人是这个价钱，老员工也是这个价钱了。

工资是透明的，有工资单。就给你这个工资，你干就干，不干就拉倒。现实就是这个样子。干的话就忍，就只有这两种选择。

现在永宝厂的全勤奖、医药费都取消了，也不包住了。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行业有工人的黑名单。我觉得黑名单没那么重要，除非你影响力很大才不会让你进某些大厂，小厂一般不会不让你进去。

## 工厂管理

我进厂的时候岗位是制模。工厂的分工很细，没什么技术性特别强的工作。那时工厂管理都是高压状态。工人不能出声，不能反抗。到现在这种情况也没什么改变。

罚款是经常事。宿舍的东西坏了罚钱；厂牌丢了，补办要花 100 元，相当于罚款了；上班没打卡也会罚款。一年内，第一次没打卡警告，第二次扣工资。刚开始扣钱是扣半个钟的工资，后来是扣半天的工资。打不到卡的事经常会有。2011 以前如果没打到卡，找师傅证明后，只扣半个钟的工资。现在有人证明都没用了，还是扣半天的工资，就是说上一天班只能拿到半天的工资。

穿拖鞋不让进厂，上班一定要穿工衣，天再冷也要穿，把工衣套在外面。2012 年以后好像没有了这项规定，穿自己的外套都没事了。带吃的东西被保安查到会没收，进到厂里就没事了，车间里没

人管。厂里的保安不凶，他们有时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安都是湖南的，也是经熟人介绍招进去的。

这个工种没什么机器设备，主要是靠手工来做，技术方面也没什么改进。以前做金的（首饰），厂里怕损失，扣钱很利害的，工人会有心理压力。现在做银、铜，会比较快，觉得没关系了。

工伤不是很多，就算有也看不出来。职业病看不出来。没听说有人因为工伤与厂里打过官司。

2009年以前工厂人员一直都比较稳定，工人流动性很小。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对厂里没什么影响，有些订单还会外发。2009年人员开始流失，是人为造成的。有人说企业不行了，要放长假，而且没有工资，放四五个月的都有。有些人就这样自离了。其实当时放长假的时候厂里是有很多订单的。今年，因为社保的事情，走的人挺多，有个部门已经走了五六十人了。

## 追社保对当地的影响

我们厂工人追讨社保这件事，连工厂门口卖水果的老太太都知道，影响比较大。

我们工厂附近有小厂，也有大厂。以前没有看到有别的厂的工人去追讨社保。他们可能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的厂的员工流动性大，做一两年就走了。有的厂的员工工作几年后，工厂给员工一点钱，把工龄清零，很多人愿意接受这样的方式。

我们厂追社保的事情传出去后，有其他厂的工人找我们来问，就会告诉他们。所以附近很多厂的工人是知道我们厂发生的事情的。

后来我们听说有别的厂工人也想去追讨社保，但是没有看到有人行动。也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只是听人提起过。

## 劳工机构的作用

2009年之前我们厂没有发生过任何纠纷。员工要想买社保，必须做满两年。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做满两年也不给买。

后来有一天，厂里突然贴出公告，上面只说可以给员工买社保了。后来向老乡打听，才知道起版部有几个人冲在最前面，去找厂里，要求买社保。他们（起版部）做了这么多事，之前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听起版部的人宣传了我们才知道，还可以追以前的社保（补缴），但开始不太相信能追回来，没有多大的信心。后来又知道，起版部的人是从劳工机构获得的信息。

刚开始以为劳工机构是一个工会组织，后来才知道不是。起版部的每一个人都去过劳工机构。后来我们也去，不断学习，才开始建立了信心。那些政策法规经过劳工机构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也是最近才知道，我们厂里也有工会，工会主席是老板的亲戚。

我们刚开始去劳工机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又不用花钱。从接触劳工机构，到真正向厂里提出诉求，大概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那时觉得这份工作丢了都无所谓，才能坚持下来。做这些事情，要先想清楚，如果瞻前顾后就不要做了。我们觉得把社保追回来对我们以后很有用，所以就坚持下来了。

劳工机构指引我们在不触犯任何法律的情况下怎么做，该强硬的时候他们也会提点我们要强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同时又达到我们的目的。如果没有劳工机构的话，我们在法律方面可能就不会把握得那么好，说话也会没有分寸。心里有个底，知道下一步怎么做，就有信心一点。如果没有劳工机构，就算我们想争也不知道怎样合法地去争。做极端的事吧，又没有那么多有胆量的人。不做极端的事吧，很多事又没那么好解决。

## 选代表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工人们心不齐，没信心做成。后来因为代表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去宣传，就坚持下来了。

选代表是机构提出来的，首席代表也是机构提出来的。当时是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有分工，才会选代表。当时我们相互认识的人之间会交流，但没想到要去选代表，也不会想到做代表之后会经历那么多的事情——要去谈判，跟老板沟通，有事情还要第一个站出来——这些是没想到的。以前以为代表只是负责联络。

当时崔明杰很积极，所以就要求他做首席代表。

陆香是我们部门第一个追社保的人，她和起板部那边有联系，经常会去劳工机构。他们也叫我去劳工机构，但我刚开始没去。我去了劳工机构之后又叫了马昂去。马昂以前胆子是很小的，现在可以了。不同部门的人，了解的多了，说的多了，认识的多了，就互相认识了，彼此还是比较认同的。

## 我个人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



我本身不是代表，但会在背后给代表出主意，然后互相联络一下。我在老家已经买过社保，是我老婆有需要追社保。我不担心厂方知道我在背后帮忙，因为早就不想干了。如果还想做的话就会老老实实地干活，不会去追社保了。

我对社保了解得比较早。老爸以前在村里工作，大姨也在县里上班，他们都有社保。当官的我也了解。所以一些



现实状况我都清楚。当官的也要顾全大局的，不可能因为你一小部份人的利益而损害大部份人的利益。不可能因为一二百人而关停一千多人的大厂，这个是事实。

我虽然不做代表，但说出来的东西有理有据，大家也会听。很多时候他们意见不合，自己会去给他们中和一下。不可能总是站在主观的立场去说问题，也要客观地去分析才行。我在整个车间一直比较活跃，有东西说给大家听。我们车间现在追社保与不追社保的比例差不多一半一半，因为来了很多的新员工。

现在很多追社保的工人都被放假，也面临熬不下去的问题。很多人辞工去其他地方找工作。

## 法律、罢工、政府

追社保、被放假，这些事我们都不能仲裁、打官司，理由都不充分，拿不出相关的法律（依据），我感觉很无力。

我认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可以团结起来去要。但最主要的是要给厂里施加压力，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坐下来沟通是有必要的，出钱的毕竟是厂方，给厂方压力大的话就容易解决。

但同事们就做不到，很多人的思想还是停留在对工作的留恋上，好像离开了这个厂就没法活一样，所以很多人不想与厂方冲突太大。然后就会想着去找政府，而不去找厂方。但是，这些事情不是某一个官员能帮我们办到的。

宏强前几天打电话给那个保证解决我们问题的（区政法委的）X书记，他还怕得罪那个书记。

前几天我打电话给书记。书记说：“你们每天十几个人打电话给我，我都要告你们骚扰了。你们不要再打来了。”然后就把手机给挂了。

后来我又打电话过去，我说：“X书记，我在你上班的时间，打你的工作手机，聊我们工作的事情，这哪里是骚扰你了？”

他又给我说好话：“我也是人，我现在在北京开会。”

我说：“在北京好啊，可以直接汇报汇报这样的事情嘛。”

他说：“我每天都接到几十个电话，天天很多人打来。我已经骂他们（下属）了，会帮你们解决的。我在做事情，我不会不做事的。”

其实一个区委书记也做不了什么事情的。当时他拍板说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就半信半疑。可能当时他是（要）把这个事情压制下来，但还是解决不了。如果这些事情有理有据，通过打官司可能解决，也是一个好的途径。假如法律能在3个月内能把事情解决，那大家就都不会去罢工了，不用撕破脸皮了。但在我们国家人情大过法律。

有时候也感觉很被动，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和厂方闹的时候，厂方就会报警。这个是劳资纠纷，与警察无关，警察就不应该来。昨天厂方就以扰乱工作秩序而报警了。如果要我们国家劳资关系更加和谐，警察的手不要伸得太长。政府适当可以过来一下，事情就可以很完美地解决。厂方报警就报警，过来一两个警察看一下就行了。我们怎么搞不要管，只要不打架就行。但现在他们的手伸得太长了，会压制我们往前走的决心。昨天警察来的人不多，大概就四五个，每次警察过来都有点威慑作用。再加上有时候还帮厂方说说话。这个是大家都会担心的一个问题。

## 对罢工的态度

我自己觉得打官司讨社保不太好，耗时耗精力。罢工的事情是涛哥提的，我也坚信有些事情是通过大家的团结才能解决的，不是通过某一个科长、某一个区长去解决。我一直赞成罢工，觉得是最

终解决问题的出路。不可能他欠你的钱，你却找另外一个人要。最终要解决是厂方与工人之间的问题。政府（应该）只是来协调的。也不知道其他的代表清不清楚这一点。

我一直有提罢工的事情。趁赶货的时候，不管人多还是人少，搞个一两次的罢工，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但其他人下不了决心。大部份人不同意罢工，我觉得一是怕厂里针对报复，二是怕公安。

首先不管违不违法，政府的手都伸了过来，说白了（工人）就是怕当地政府。比如两个人的事情，只要不打架，怎么解决都行。但是现在政府不管有没有打架，过来就说你（工人）没理。如果政府的手不要伸那么长，我们（劳资双方）努力去解决，事情就好办了。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再来充当一个调解的角色，不能太管闲事。

有时候感觉很失望，搞来搞去，没用一样，没什么意义。我感觉经常是在给政府挠痒痒，给厂里挠痒痒，你挠一下他就动一下。要挠就挠破脸，要来就来狠的，这才是最终解决的办法。

大家（虽然）在一起做事，但是想法不一样，（有些人）到现在还留恋这份工作。现在都骑在你头上了，你还忍气吞声地在那边默默地做事，辛辛苦苦在那边做事。没做的被放假，做了还是被放假，何必呢？现在大家的思想都统一不了。有些事情要通过大家愿意才行，比如说罢工，我自己愿意。但是只有几个人愿意，是成不了事的。至少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同意才行。

## 参与集体行动的情况

我之前和（总代表）说，哪怕是被拘留 15 天，也要把这个事情给拿下来，我有这样的决心。

开小会的时候，也有过关于罢工的交流。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在厂里闹一下。有些人就是不敢，害怕，就没干。

有些人去政府门口的时候也要看去的人多不多，如果人多的话就敢去。去的时候也都是站在后面，不敢站出来。有时候有些人答应了要一起去，但后来又有很多的理由不去。我们那个部门还好一点，其他部门的代表叫不动他们部门的人，自己有时候也不来。我们有时会旷一天工去找政府，有些人要放假的时候才敢去。

昨天让大家交钱交资料的时候，个个都很高兴，很快过来交资料，但平时让他们去开会的时候，个个都叫不动。有一个第二批的人还说：“你们哪个帮得到我，你们帮了我什么？”当时就有几个人跟这个人吵了一架。

现在这第二批的人，就是等（结果）。他们也和政府谈过好几次了。但是每一次都上当受骗，总感觉人家说的合情合理。那些（政府的）人天天讲话，怎么会讲不出道理来呢？

## 现在的思路

现在我们的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就两步。

第一个去找厂里。冤有头，债有主。当时拍板说帮我们解决，我们现在已经把钱交了（厂里），过了这么久，你还不给我们办事？

第二是找政府，只找那个书记，其他不用找。找其他部门，他给你端茶倒水，拿凳子给你坐，服务态度很好。但问题是我们是来解决问题，不是来喝水聊天的，也没那个精力和时间陪你聊。去社保那边，他们服务态度也很好，说：“我们是按程序办事的，按正规的程序，按法律法规……”跟你讲一大段没用的话。所以没必要找这些政府部门，他们只是办事的，上面一句话，把事就办了。这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我现在觉得方向就是这样。但是，其他代表就想找政府部门，一直在等那些部门的消息。等来等去还不都是坏消息。那些部门是

解决不了问题的。它只是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

这一次就被那个 X 书记给忽悠了，他说“这个事情春节前帮你们搞定了。你们有我的电话号码，直接打那个电话。你们该交钱的就交钱。”

当时就被糊弄了，因为有一个关键问题，工龄还没有确认，就交钱了，就上当在这里。

## 跟政府谈

以前和政府谈判我没有去过，但每一次谈都知道。在谈判之前代表们准备得不够充分，代表之间的意见不太和。每次谈的事情太多、话太多，谈判的目的不够清楚。每次的目的应该只有一个，谈工资的时候就只谈工资，谈社保的时候就只谈社保。有时候就混淆了，一个说这个，一个说那个。那些官员讲话都是很利害的，代表是讲不过那些官员的。有时候人家很生气、很有气势地和你讲，有时候人家又很和蔼地和你谈。我没去谈过，但是也想得到嘛。他们（政府部门的人）说话是有方法的。一会儿把你吓一跳，一会儿又好声好气地和你讲。代表这边要知道我最终是来解决哪些问题的，就不要混淆了。

也可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一直是在幕后，如果到前面去谈，说不定也把握不准尺度。

我第一次去区政府那边和他们谈的时候，谈了一下子，对方就想拍拍屁股走人。当时我让工友都站到里面来，我们不走，看他怎么走。后来那个人又回来了，又谈，谈到四点钟，再也谈不出什么来了，他就说，我不可能代表政府，我派人过去。我们谈了半天都还没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人。当时太冲动了，忘记了问他的来历。

每次谈判之前都会有一些分工，谈判的时候录音，还有交通安

全，不要堵塞交通。

我觉得吧，这些事情（拖）这么久，是这些代表团结不到一起，这些工人其实好带动，关键是代表有多大的动力。很多的事安排好，然后代表之间如果没有一个沟通，达不到一致的话，这个事情也很难去做。



## 工人代表宏强（镶石部）

——你说工人没有这个权力，  
你收了我们工人的一百多万，为什  
么我们没有权力过问？

宏强是广西人，个子不高，比较瘦小，却是几位代表中最刚毅的，也是崔明杰的好搭档。崔明杰被关押后，是宏强带着其他几位代表想办法营救，联络其他工人、劳工机构、律师，度过维权中最危急的时刻。

2010年之前我对社保不太了解。以前工厂只给部分人买社保，都是跟工厂关系好、工资高的那些人。工厂给他们偷偷买，都不让我们知道。有一次听说有一个买社保的名额，我因为不清楚状况，就没买，后来想买的时候，工厂不给买了。

厂里刚开始给全部人买社保的时候，我请假在家，同事打电话问我要不要买社保，要买就签名，当时我让同事帮我签名。签名的时候也想到厂方可能会针对我，但是觉得无所谓。开始有很多人签名，后来厂方说要拿劳动合同，很多人认为厂方会报复，就退出了。

后来选代表，每个部门选1到2个。其他部门都已经选好了，我们部门没有人敢做。开始我以为代表要懂法律，后来其他人说不用懂法律，只是负责联络，我就主动站出来了。那时大概是5、6月份。7月份的时候有了代表授权书。

我之前和起板部那些人不认识，平时见到了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后来在追社保的过程中熟悉起来。

我刚开始对劳工机构不了解，知道他们不是政府的机构，所以

一直有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劳工机构帮我们又不收钱。有些工友怕它是传销。后来劳工机构组织大家去清远漂流，逐渐对它就了解一些了。

我们部门的人交钱、签名都很积极，但让他们去劳工机构学习的时候就不太积极，会找理由推脱。但是其他行动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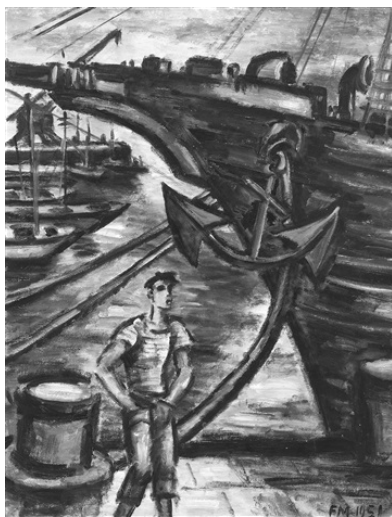
我开始去劳工机构之后，了解到其他厂的事情。有个厂有六七十个保安，通过直接找政府上访，追到了社保。这些在劳工机构分享到的经验，我们回去后会跟其他同事讲。

我做了代表之后，车间的师傅会特别注意我，但不会明目张胆地针对我。有一次，师傅通知我们，说人事部叫我们去谈话。

当时我们就跟师傅说：“追社保是我们跟老板之间的事，跟你没关系。”

师傅说：“这个事情是跟我们没关系，但是你们不要在工作时间讨论这些事情。”

我们部门的师傅没有换过，有一个师傅，只比我早进厂一个礼



拜。平时师傅不敢对我们男工怎么样，但是会吓唬女孩子。他们给女孩子规定了产量，对我们就不敢，师傅也是看人的。以前我跟一个师傅吵过架，之后被他调到了其他岗位。

我们部门追社保的人也分成了两批。当时人事部给我们出了一份补社保的通知，那些一直在观望的人看到我们有了成果，就想加入进来。有了成绩，就更多的人愿意参加。



当时第二批的人虽然愿意签名，但还是不太敢行动，还是需要我们第一批人带着。

第二批人想和第一批的一起去争取，但第一批的人会有一些担心，就没有让他们加入到一起。后来第一批人有一些后悔，觉得还是人多一点好一些。

开始的时候，第二批的人总是让第一批的人去帮忙办事。第一批人当时觉得比较烦，很多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第一批人和第二批人是社保局那边分开的。第二批人开始追社保与比第一批人晚了三个月。社保局的人说，因为已经开始给第一批人办理了，如果把第二批人合并到一起办理，会拖得更久。所以第一批人不愿意跟第二批人合并办理。

我们在行动之前一般都会通知第二批的代表，他们一般都会过来。每次去行动，第二批的代表都不敢走在前面，一般是第一批代表走在前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跟第二批的代表聊聊，没事情的时候说话比较少。

去地税之前，我们第一批和第二批的代表坐在一起谈，主要是确定每个人的入职时间和补缴时间。去了地税，拿到了明确的补缴时间表。后来我们去找涛哥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两批代表都有去。

当时去地税的时候，大家商量清明节之后去找厂方。没想到去地税之后第二天就去找厂方了，去的时候也没抓住机会，清明节会有人回家，也不知道老板会不会在。厂方一直没有给我们定补缴的时间表。

去找厂方之前，我们讨论我们的要求，以及大致的分工，但不是很具体。当时讨论决定不把地税给的答复（补缴时间表）给厂方看，因为想让厂方给我们一个早于地税的补缴时间表。当时我不同意，我觉得应该让厂方知道我们已经拿到了地税的答复。去找政府部门的时候我都参与了。

我们去找厂方提要求，何经理说：“工人没有权力过问这个时间

表。”

我说：“你说工人没有这个权力，你收了我们工人的一百多万，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力过问？”当时在场的劳动局的主任说：“对啊，对啊。”他比较赞成我的看法。

何经理又说：“那就按地税的时间表来补缴。”

我说：“你去年就收了我们的钱，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补缴社保，按程序来说应该是工厂先缴，工人再给钱。按程序走我们也是对的，现在只是让你给个时间表。”劳动局的主任又跟着附和：“对啊，对啊。”

劳动局的主任和其他政府部门的人先开会，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然后才和我们一起谈。

谈的时候，厂里有拍照，我们也有拍照。当天晚上也有记者来采访。但是厂方一直不愿意出一个答复。

我们跟厂方谈了三次，每次政府部门的人都在场，很少跟何公公单独谈。

我们围住办公楼的时候，有工友跟何公公聊天，会问他厂方什么时候给答复。何公公跟我们聊天，聊了很多个人的经历。他说自己以前开过矿，老爸和姑丈在政府工作。那次从晚上12点多一直聊到凌晨4点。当时觉得他出来与我们聊天是因为一个人在办公室烦。

我们把他围在办公楼里的时候，镇政府的人也来了，他向他们发过火，说如果政府不帮他，他也不帮政府之类的话。当时我说：“这个是他与政府的事，与我们工人的事无关。”政府的人没什么反应，之后就走了。他们走之前，我们要他们给个答复，他们就让我们解散。但是我们不理他们，双方都还照样僵持。

当时人被抓以后，各部门的代表分别去做思想工作，号召大家每人再集资200。有些人不愿意交钱，说：“之前已经给了两百了，为什么这么快又要交钱，等抓进去的人出来之后再交钱。”

我们解释说：“之前的钱在崔明杰手上，崔明杰被抓了，现在钱

都拿不到，又急需用钱。”

管帐有专人负责，之前的帐目一直有公开。开始是慧芝管账，后来慧芝要去找工作，就交给崔明杰管账，后来崔明杰被抓之后没办法公开。

公开帐目是重要的，之前是说把每次公开的帐目发在 QQ 上。那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提议好，但后来就没怎么做到。有些人觉得帐管得有点乱，有人怀疑代表乱花钱，拿出去玩。

集资的钱，开始只用于补贴交通费。后来又收了 200，加了一条，补贴代表请假为大家出去办事被扣的工资。大概是 3 月中旬左右，开始有工资补贴。没有听到有人当面提意见，但是背后应该会有人说闲话。

我们包围办公楼那两天的行动，有四五十人参加，如果厂方按旷工处理，到时候我们只能去仲裁。

行动过后也没有进行详细的讨论。

现在第一批人基本已经处理完了，冲在第一线有点不可能了，因为厂方就会有理由找第一批代表的麻烦。第二批的代表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忙指点。

两个代表被抓后，厂方是在 4 月 9 或 19 号的时候宣布他们被解雇了。两个代表放出来后，我们大家去接他们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没有记者来，饭后李律师来了。饭桌上主要谈了一些工人需要团结起来的问题。

听劳工律所那个段律师说话感觉还可以，比李律师那些底气要足一些。

## 工人代表亚美

——她劝我不要争社保，我没理她，心想这么多人在追，你劝得了我，劝不了别人。我怎么可能会输呢？

亚美是第一批补缴社保工人中唯一一位文员。她很坚持，也敢于和管理、官员理论。但是性格较为急躁，说话比较冲，很容易和管理层发生冲突。在和大家开会讨论问题时，习惯于讲自己的事情，和其他工人关系较为一般。

## 打工经历

我 1998 年出来工作，进了某区东宝的一家金首饰厂。东宝是当地村民开办的企业，实际类似“工业园”。有很多老板承租它的厂房地皮，开了一批小厂。我进的那家厂有几十个人，老板是香港人。我跟工厂签了两年的“内部合同”，也不正规。在那个厂，我做统计文员。当时文员的职位也要找人担保。我的底薪是 450 元，有加班费，但我很少加班。车间员工加班多，能拿到 1000 多块。

## 永宝厂的情况

2000 年，我进了永宝厂，一直做到现在。当时这家厂恰好在搬迁，我被安排在验金房做“收发”文员，跟的是整个部门的单。刚

进去时，员工生手的底薪 250 元，文员底薪 450 元。我是熟手，一进去就拿 600 元底薪。厂里每年加一次工资，加一百或者几十块。旺季赶货最忙的时候，员工一个月要加一百多小时，一年大概有三四个月是旺季。不过，收发文员一般不跟员工一起加班。

永宝厂的老板，他大哥还有两间类似的厂，规模不知道。有时候，我们的单会外发给两三间厂，老板跟他们有合作。

永宝厂的待遇、工作不太理想，我一直想换个工作，但又有点安于现状。这家厂是发了财的，2008 年时，一个月利润也有两亿元。就算金融风暴的时候，也在生产，不会亏损。我在厂里又做“开单”，又做“收发”，见过有时一个月有四五十万件的单。工厂的利润很高，但是也没有给员工分一杯羹。刚进去时，三八节有半天工资，后来三八节的待遇没有了，也不通知大家，说没有就没有了。刚进厂第一年，中秋节有两个月饼，搬厂后，中秋节搞过一次自助餐，现在啥都没有了。文员的工资靠部门师傅来加，跟他关系好，就加多一点，关系不好，就加少一点。师傅加工资没什么规律，取决于他个人的决定。

2008 年金融风暴的时候，工资下降了。底薪减了 300 元，奖金给加了三百，但是加班费少了。当时，我们就算有意见，也憋在肚子里了。因为年龄的关系，我没想过辞工另找工作。我是整个部门做事最多的，因为工作性质，我也从来没有放过假，直到因为追讨社保，被厂里强行放假。

我的部门全是文员，技术含量不高。文员工资比较低，就算是我们组长，比起其它部门的组长，工资也要低一点，所以我们部门留不住人。



老板的乡土观念很重，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我们部门，10个人里有8个是老板的老乡，他们有特权，加工资加得高一点，比如一年加300块，其他人只加50块。另外，老板的老乡能分到比较轻松的活，老板暗地里还给红包。

我们部门的经理，特点是阿谀奉承，欺上瞒下，各种坏词都可以用在他身上。这个经理是跟我同年进厂的，以前是部门的师傅，后来把当时的部门经理赶跑了，自己成经理了。以前的经理还好一点，处事比较公正，给我加工资的时候，比较公平。比如给他老乡加150块，给我加100块，我也可以接受。那个经理是老板的老乡，后来被降职了。我对那个经理的印象还不错。

我对人事部门主任的印象也不好，找不到夸她的词。她是老板朋友的妻子，能力不够，做事站在老板的角度。她的管理风格就是帮倒忙，很凶，经常说风凉话，不帮员工。

这次集体追社保之前，我已经想过社保的问题。这家工厂一直有社保配额，但没给我。我去人事部问过，听其他人说，名额全给了老板的亲戚。老板的亲戚在社保问题上自由度很大，想退就退，想买就买。我们部门的老板亲戚就是这样，有的人想拿钱出来，就退了，退了以后后悔了，就又买。所以这次集体追社保，我们部门只有我一个人参与了。

在平时，我们部门和倒模部门接触的多一些。我本来已经想辞工了，听说倒模部门开始追社保，觉得很高兴，一心想买。当时老板的某个亲戚跟我讲：如果你们这个样子的话，厂都要被整垮了。她劝我不要争社保。我没理她，心想这么多人在追，你劝得了我，劝不了别人。我怎么可能会输呢？肯定要坚持到底。

我们开始追社保以后，老板就让我们走法律程序解决这事。我们就去政府部门沟通、请愿。一开始是以书面的形式，后来去市政府请过愿，我是员工代表。后来也去区政府信访过。当时老板对我们说：“政府让我给你们买，我就买。”听了他这句话，我觉得他在

忽悠。我都不信他的话，因为他经常忽悠人。就说加工资这件事，我觉得我做好分内的事，不需要给你拍马屁什么的。虽然加工资需要老板批准，我没有讨好过他。这几年老板似乎一直在做假帐，说工厂亏损。他怎么可能亏损？生产成本一直在降低，好多订单外发了。大家一直怀疑老板说假话，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

2010年12月，我们补缴社保款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人事部新来的经理。他来这个厂上班的时候，我被工厂放假，所以没见到他。听同事说过这个人针对我们这些追社保员工的所作所为，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不好。

2011年3月5日他奉资方的指示，放我的假。因为我的放假单上工资计算方式比较含糊，跟他第一次正面接触。我要求他改得清晰一点。他说：“你好特别啊！”他不肯改，我就拒绝接受这张放假单，照常上班。晚上下班，我打卡打不了，去找他理论，要拍照取证。他不让我拍照，把我的手机打落在地，还威胁我，说什么要找人打我之类的。我就跟他说：你最好去告我了。我当时报警说人事部经理恐吓我，派出所的人才肯过来。但是我没拿到出警回执。派出所说这是劳动部门的事，跟警方无关。经过这场风波，人事部经理才给我换了一张放假单。不过，给我强制放假之前，虽然我是工人代表，厂里并没找过我的麻烦。

3月29日，我们十几个被厂方强行放假的人回去上班，结果被叫到厂里的卡拉OK室，让我们“学厂规”。当时我说：“让学厂规，你先学好，我们都学几年了，先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再说。”说到请假，我说：“有父母的员工，父母病了，肯定要请假。没有父母的，当然可以不请。”经理就叫我不要讲话，我就不出声了。当时他念了一遍厂规，似乎是为了证明我们知道厂规了。他念厂规的时候，有一个保安在场，还有人用一部摄像机录像。

过了不久，我们在服务部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当时大家提了几种方法，包括去政府请愿。但是最后觉得请愿不太可行，因为政府

已经答复了嘛，所以还是直接去厂里行动，效果比较可靠。有人提议堵车间门，后来考虑到可能有法律问题，就否了这个提议，考虑不要跟厂里发生冲突。

当时我觉得一旦行动，可能老板会叫保安打工人。以前我们的代表上楼找老板谈的时候，在场的保安就扬言要打人。这个厂，负责厂区的保安是“内保”，负责厂区外面的是“外保”。内保有10个左右，外保有10多个。听说他们的工资、加班费是不一样的。内保跟着厂里的员工一起加班，有加班费。至于老板的那帮同乡，就算我们把车间门堵住，就算老板下令他们打人，我估计他们也不会动手，大家都是打工的嘛。

4月2号那天，人事部经理刚开始很冷静，显然设了一个圈套给我们钻，感觉他在配合我们演戏一样。这个圈套就是先取证，然后把我们把整垮。他说是想帮我们解决社保问题，其实一直在拖延，想把我们拖垮。那两天，早上他起来跑步放歌什么的，是故意骚扰，想激怒我们。后来地税的人来了，不收他的文件。他显得有些愤怒，



似乎觉得政府部门没把他放在眼里，那个感觉真假参半吧。我不知道文件内容，应该是和缴社保有关。地税的人计算了厂方应该补缴的金额，据说因此还加班了。发生冲突的时候何经理有些焦躁，急着冲出去。

那两天一夜，虽然人事部经理不能办公，其他文员都是照常上班。那些文员听他指挥，不跟我们交流。那段时间，大概有四个保安、四五个警察从头到尾在场。



## 被抓的经过

当时我们一群工人到了派出所，警察喊我们两个人（我跟崔明杰）的名字，让我们进去。因为有一个同事在里面，我以为是协助调查。第一次、第二次做笔录的时候，我问警察：我们只是协助调查的，你怎么问那么多？在派出所还可以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给区政法委副书记打了两次电话。他说不清楚是什么情况，要先调查。

在派出所的时候，问了我三次：刚进去的时候；凌晨四点；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左右。三次问的问题有些不同。第二次审问，问了什么时候厂里给我强制放假，放了多久。我就问他：放假（和我们被打）有什么关系？他说：想了解多一点。每次审问，只有一个人边问边记录，还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似乎在旁听。每次问话，有时一个多小时，有时两个小时。那个问话的警察看到我是外地的，就说他也是外省的。

问话的时候，我说过4月2日警察从头到尾都在现场，但是发现审问者并不记录我的有关证词。他问：这件事是谁组织的？我说：不是我组织的。他问：那是谁？我说：不知道。我只跟警察讲了事情的大致经过。我说：我看到很多工人在现场，问他们怎么回事，然后我也有一样的诉求，所以就参加了。审问人员说我“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来可以轻判，但是我这份口供会加重案情，会重判什么的。他也不解释为什么会“重判”。每次做完问话记录之后，就让我签字。签字时，我发现内容跟我说的有出入，我说“几十个人”，他写“三十个人”，我跟他说：我不明白，我怎么可能挨个数有多少人？他就说：这个问题不大。凌晨四点问话的时候，我问警察：为什么不让我走？他说：我们看了你在现场的录像，叫什么非礼啊，不准经理走啊，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当时我想可能有点麻烦，就打电话给熟悉的服务部工作人员，她说：不用怕，最多是民事案件，扣留不超过 24 小时。后来我被转到看守所，家里人都不知道，因为我以为只扣留 24 个小时，没必要让家人担心。去看看守所的时候，戴了手拷，警方出了一份书面通知。出发之前不知道转去哪里，问警察，也只回答“等消息”。

在看守所的时候，听狱友分析案情，似乎有点严重。当时无法接触外界，就开始考虑后果，担心给家里惹麻烦。因为需要姐姐签律师委托信，她知道之后非常激动，哭得厉害。我感觉特别对不起家人，让他们担心。姐姐也是打工的，知道我在追社保，也支持，但是不想我出事。

关在里面的人，肯定都想尽快出来。我在里面的时候，也没考虑这么干值不值。事情已经发生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后来见到律师，我的情绪才稳定下来，还有那么多人帮忙，都说罪名不会成立。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件事，感谢应该感谢的人。

从看守所出来时，警方通知我，说过些天会给我打电话。在看守所，只问了一次话，都是问事情的过程。后来也没有其他人找我谈什么，也没说不让离开某区之类的。不过，律师建议我回避，所以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尽量不去厂里那一带。

4 月 19 日，厂里出通知把我开除了。5 月 2 日，我去交社保钱的时候，见了一次人事部经理。他查看了电脑记录，核对我该交多少钱，然后给我盖章。公事公办，没交流。当然，我是不想回那个厂上班了。

我跟崔明杰被抓之后，好多一起追社保的工人都有些犹豫了，不知要不要追下去，会不会被抓？大家的心态发生很大变化。

因为工人追社保，据说厂方做了很多假帐。有小道消息，说厂方应负担的社保缴费部份，以后由政府来出。是否真的如此，我就知道了。

## 工人代表高国权（倒模部）

——现在没追社保的人去人事部拿劳动合同都不敢去，追社保的人去人事部就比较大胆，骂人都敢。

### 个人工作经历

我是广东河源人，家里有个哥哥还有个妹妹。哥哥比我早一年出来工作，在工厂做手袋之类的工作。妹妹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永宝，后来嫌工资太低，做了六七年后走了。

2000年6月快19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和表哥出来打工。表哥的朋友的妹妹介绍我进永宝。开始是生手，做普通员工，工资底薪是250元。刚进去时就开始干活。第一个月每天加班，工资有700多，寄给家里了。那时每天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有时候加班到半夜两三点。

那时候没有淡季，一年到头订单都很多，很兴旺。以前很多厂做K金，现在很多都做银。

2005年工资底薪大概500



多，加班少了一点，每月工资一般在 800、900 左右。

以前旧厂有四五百人，搬到岭辉镇后有 1000 多人。当时搬厂时老员工有补贴。在岭辉做够三个月的每个人还加 100—150 元左右。

我是做倒模，计时工资。可以申请去其它部门，但一般调换部门需要关系。有些部门需要熟手，所以即使申请了一般也不让去。

只有一个部门的主管不是香港人，其余都是。香港主管经常骂人。2005 年香港主管的工资有八九千。主管的技术还可以，每个工序什么都能做，也要干活。

金融风暴前，2007 年的时候工资只有八九百块，那时候晚上一般都不加班了，一天下来所有的活白天都做完了，晚上没有事情可以做。工资减少，岗位津贴、底薪都少了。那时候自己没有想和公司争什么，已经有一两年没什么加班了。没加班的话，一般都是去网吧上网。

## 关于追社保和做代表

2003 年左右我结的婚，老婆也是永宝的，是老板的老乡。她 2005 年的时候买的社保。2011 年她辞职回家带小孩了。那时候买社保是有名额限制的。名额会派给师傅，师傅想派给谁都可以。名额大部份是给了老板的老乡。我们的师傅很凶，不敢和他吵架。

知道能补社保的事。当时也知道老板不会同意，觉得会很艰难。不过我早就不想做了，工资太低，2010 年的时候工资只有 1000 元左右。当时我在周围收码，卖六合彩，一周收三次，收入在几十到几百元不等，比工厂的工资还高，也比较稳定，所以没有辞职。当然也有风险，如果被警察抓，会被罚几万。

2011 年 5 月，一个工人代表，也是我同事，问我要不要参加追社保。我是 2010 年买的社保，觉得能追是好事，就参加了。那个同

事后来慢慢退出了，我就站出来做代表了。

做代表主要是商讨、跑部门、联络、去劳工机构开会、通知其他工人，等等，这些都是代表在做。工厂知道我是代表之一。十多个代表都有授权书，表明我们是工人代表。写这个授权书主要是为了保护代表。通知厂方之后，工厂就不能解雇代表。之前代表没公开，有人被抄掉，后来就写了授权书给厂方，方便保护代表。授权书劳动站那边也有一份。

代表里面有五六个比较积极，其余不那么积极的可能是在做炒根（临时工），也可能有害怕相关部门找麻烦的。我觉得代表个个都希望被抄掉，这样可以拿经济补偿。

争社保两批人共有 400 多个。我们只是找公司和各部门追社保，不会去做妨碍生产的一些罢工，觉得那样会被抓。而且劳工机构教我们不要妨碍生产，建议先去各部门投诉，违法的事先不要做。

我是最早一批被放假的人，一共有 80 多个人。

被放假之后，我们就很想能够罢工，但是只是放假的愿意，没被放假的不会参与。一两百个人罢工没用，而且是淡季，罢工的话直接让你放假。工厂里的人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老板的同乡，动不起来。还有三分之一是师傅的同乡。

老板的老乡一般是分配到好工作，他们也能享受各种福利。但这几年老板比较刻薄，想尽各种办法减低工资。所以老乡对老板印象不好。当时我们争社保的时候那些老乡拍手叫好，但他们不敢一起争取，怕老板回家乡说长道短。

劳工机构那边不支持我们堵厂门。我们商谈的时候，涛哥也建议我们不要堵门口，不要妨碍交通。

去年争社保到现在有很多人辞工，包括追社保和没追的。辞工后也还继续在追社保。有些代表是偷偷地辞工，之前不和大家商量，打了个招呼就走了。代表辞工后就没有选新的人上来。现在还剩六七个代表愿意跑腿办事。其他人都在炒根挣钱，我感觉别人看我们

代表是：吃饱了没事干，白痴，自己受苦。

代表里男的多一些，争社保的人女的多一些，珠宝厂女多男少。经过争社保的事情之后，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不会再害怕管理层了。经过几次行动之后（去了几次政府部门）大家会更团结了。现在没追社保的人去人事部拿劳动合同都不敢去，追社保的人去人事部就比较大胆，骂人都敢。

厂方对待争社保的手法就是拖。奶妈不懂法律，不会讲话，对那些胆小的女性就是骂人。男的去不了，奶妈只会说“会给你解决的”。何经理是在我们争社保的时候被高薪请来的，之前在政府部门工作。法人代表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何经理处理了。我们找他谈事情，他就说“只按照法律程序走”，明显感觉到与奶妈的不同。

老板太狡猾，他总说“追讨得到就给你，追讨不到就不给”。

我们一开始追社保，找了很多部门都没用。后来召集了一百多人去某市信访，被 X 书记拉回来了，答应帮我们解决。去信访的时候，因为有代表顶着，大部分人当逛街一样，心里没什么压力。我们代表就要做很多事了。

## 4.2 事件

我们商量怎么做的时候，想到如果去找公司要回复，将是一个持久战，但当时只想到不答应的话就不走，没想更具体应该怎么应对。

开始的时候没想到公司会算旷工。我们叫其他工人参与。人事部说，公司里还在上班的工人也到办公楼来就算旷工。后来我们叫劳动部门的人过来以后，人事部就没再提出这个问题了。但后来两个代表被抓之后，这个问题又被公司提出来了。

我们评估和保安不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平时他们也不管什么，

出了事职责所在，会装装样子。

我们讨论的时候认为这样做不会构成犯罪。在行动之前看过相关的资料。劳工机构的书，相关报导都有看过。主任那边是希望我们做，但他们不会参与进来。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

当时本来的目的是找老板，但老板一直不出现，只能去堵何经理。很多人觉得应该去宿舍围老板，但有人说那个是私人地方，怕违法。我们有人骂何经理，但不会去恐吓。我们只是把门堵住，不会打人，不会去恐吓人，只会是他们来侵犯我们。维持工人秩序方面是代表在做。

我们那天一到办公楼，派出所警察就来了。何经理联系了很多区里的，市里的部门，但没人理他。有人看到他和老板联系，跟老板抱怨政府部门的人。

何经理后来与我们拉家常，经常说政府很黑暗。

何经理说：“上面的人没让我怎么做，我拿材料也不知道怎么办。”

当时相关部门的人都来了之后，谈判代表出来之后没什么结果。

连续撑了两天一夜，后来听说何经理和两个代表都进了派出所，我以为何经理要倒霉了，却没有想到代表会有危险。当时都以为代表被关不会超过 24 小时，没想过其他问题。

代表被转移到看守所之后，有人建议再去市里上访，但很多人不同意，担心有更多的人被抓。崔明杰被抓之后，工人的情绪当天晚上有些恐慌。大家在那边议论，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当时担心政府可能会找我们麻烦。

第二天我们其余几个代表去了劳工机构，在那里商量好给崔明杰他们打官司，找律师，如果有费用的话就所有人来平分。当时每个人收 150-200 元左右，收钱的时候有些也不是很顺利。有 90% 的人愿意交律师费。

当时崔明杰、亚美两个被抓了之后，社保方面也还一直在跟进。

## 工人代表魏小妹

——那时我还觉得不可能，哪里斗得过老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

魏小妹是个性格活泼的女工。代表们开会时，她的笑声最大，鬼点子最多。大家在商议去市政府上访时，她不知模仿哪里看来的新闻，提议，一人举一根苦瓜去抗议，表示工人很“苦”。小妹受了家人的影响意识到社保的重要性，从开始的“不相信”到积极参与，小妹在集体行动中发生了自然的转变。作为工人代表，小妹很在乎其他工人对于集体行动的配合度，也自发地用了各类方法向一些“不守纪律”的工人表示了压力。

## 打工经历：制衣厂



我 2000 年出来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从化的一个制衣厂剪线头，老板是哪里人我不记得了。我表哥在厂里做管理，我跟着他出来打工，就进了这家厂。进厂的时候没有收押金，但是要看身份证。

那时厂里有一千多人，挺大的厂。早上 8 点上班，每天加班到半夜两三点，没有双休日，计时工资，加班费



1.5 元，一个月工资五六百块。管吃住。因为厂里四川人多，全部是辣的。我是广西的，不习惯。

我们主管是四川的，很凶，总说我们做得慢。我那时候刚出来，年轻气盛，有一天就跟他说，你怎么不来做，我不做了。

我才做了三个月，就实在顶不住了。每天加班到凌晨两三点，你说怎么熬得住？我表哥叫我不要走，我就说这不是人干的，天天加班到两三点，我不要这个工资了。

工厂不批准辞工，我走的时候，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都没有拿到。

制衣厂的工作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要加班，我表哥也没办法照顾我。厂里很多都是外省人，很少讲普通话。我自己刚出来，讲普通话，害羞不敢说，感觉不适应。

## 在永宝厂

离开制衣厂之后，我进了市桥一家酒楼，包吃住，伙食比工厂好一点，还有宵夜。工资一个月 450 左右，服务员五六百，没有小费。做了半年，酒楼倒闭了，酒楼经理说，她跟永宝厂的老板比较熟，想进厂就跟她一起去。我们几个人就跟她进厂了。她进厂后做人事主任，我们做普工。

酒楼经理有个外号叫奶妈，但是我们跟她也不是很熟。她说这个厂有全勤、有奖金、有带薪假。我那时候没地方去，也不想再去酒楼做了。听她说这个工厂很好，就去了。

这个工厂也是一样要加班。新员工是生手的，底薪一个月 250 元，然后慢慢升。

这个厂加班不像在制衣厂那么晚，最多到晚上 11 点。那时候刚出来，看在钱的份上，辛苦也无所谓，还受得了。说真的，只要不太晚，那时候还是很喜欢加班的。

底薪 250，连加班费、奖金算在一起，最多 600、700，没有 1000。

永宝的以前的管理不太严，有种自由的感觉。比如上厕所很自由啊，做得慢也没人说。现在不行了，以前没主管的，现在有了，做得慢就要被说。主管记得你这个组做什么、做多少，和其他组比一下就知道做得快还是慢了。总之，前几年有了主管以后就没那么好了。主管每天要给我们计数，看看有没有达到每天规定的数量。我又不是计件的，你给我计数，我就有压力，感觉心里面不舒服。

2008 年以前，每天的标准产量是 700。新主管来了以后，说我们很懒散，都不知道有没有在做事，然后就开始搞计数，说做得多的加薪。有的人就开始拼命地做，做到 800，主管就夸奖他做得快。他又拼命地做，又做到 100。后来越做越多，现在都到 1300 了。我就说，做得多又没有奖金，而且说加薪，后来也没有加。那时候就相信主管说的话了，所以我说压力都是自找的。我就觉得我们员工笨，你追我赶，做得很累，唉。

我从 2001 年开始在永宝厂一直做到现在。以前过年有年夜饭，八月十五聚餐打过火锅，还发过月饼，这些后来就都没了。回家车费是不报的。不过有“双粮”，就是年终奖。

年终奖不是一下子取消的。开始给一半，后来给 30%，再后来就没有了。那时候应该是很大意见的，但是没有说出来，个个都没办法，不懂维护自己的（利益），就是心里抱怨一下。

2008 年之前，底薪涨到 1000，加班费按 1.5 倍计算，我一个月已经能拿到 3000 多了。2008 年金融风暴，调整工资，减了底薪，全厂都减了。大家虽然都在议论，意见很大，但是没人说。其实那时候应该提出来的。

厂里员工流动性很大。人往高处走啦，各方面的压力都有的。打工的都是这样。

我家里穷，为了挣钱，就在这家厂一直做做做。后来结婚了，我老公在我们厂附近一家模具厂工作，是技术工，坐办公室，用电

脑的，比我们轻松一点，一个月工资将近 4000 块。两个人在一起比较好。而且我们厂相对自由一点。不像有些厂，比如那个正泰，上厕所都不行，还要上夜班。我就不想换地方了。

## 追讨“社保”

### 2004 年申请买社保失败

大概是 2004 年的时候，有一天我请假没上班。第二天，我同宿舍的同事跟我说她买社保了。我说你怎么不叫我。她说你不是请假了嘛。然后我去找人事部主任，就是之前酒楼的那个经理，那个奶妈。我问是不是可以买社保了，我也想买。她说：“你以为你想买就买啊？！”就这么一句话。我听了很气，就走了。对我们这些当时从酒楼跟过来的人，奶妈一点也没有照顾。后来听说要有名额才能买，厂里有人走了（离职），其他人才有机会买。

我那个同事当时买了房子，就是 2004 年的时候，交了 3 万定金，在建的房子，1 平米 1000 多，很便宜了。我开始还以为买了房子的才可以买社保，那时候不懂。

那时我老公也跟我说，打工的买社保有用，以后有保障。我老公买了 10 年多。

我们家现在才买了房，在我老公老家那边买的二手房，20 万，150 平，1000 多一平，算是很便宜了。我老公是广东梅州的，不是大城市。

买房子不是为了回去养老。现在钱不值钱，存银行里就贬值了。买房就当保值吧，反正房价不会跌。钱是我老公的姐姐借的，不用利息，慢慢还喽。

## 我是怎么参与追讨社保的

开始我不知道我们厂有人在追社保，过了几个月我才知道的。有一天在食堂吃饭，听到有人说追社保的事情。那时我还觉得不可能，哪里斗得过老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我都不相信。

回家我跟我老公说这件事。我老公上网查了一下，说有可能的。他说你们工资这么低，别人追（社保），你也有权利追。然后我就想，我也要追。

## 我们部门其他人的态度

我们部门有一个香港师傅，他说：“你们这些人真笨，飞蛾扑火。要追，也要看别人追不追的到。”他真的是这样说的。

我说：“这是我自己的权益，我一定要追。你们香港人买了，肯定就不想追了。”

他跟我说他没买。我不管他，我说我就是追。他说，你要追就追，但是不要在车间里搞，不要影响工作。

我们部门五六十人，大部分人都都在看戏，看你行不行，看谁先死，就是这种态度。



## 选部门代表

我们部门最后有 18 个人参与，但是没人愿意当代表，肯定是怕麻烦，也怕老板，个个都这么想。

有一天在篮球场开会，每个车间要选社保的派代表参加。我们车间没人站出来，他们就让我去当代表。我就说我这个代表是被逼出来的。

我也想过，当了代表，这个工作可能就做不了了，但是我想要是能追到这么多年的社保，打不打这份工作都无所谓了。

待遇最差就是现在了。2008 年开始，底薪就开始一点点地减，从 1200 一直减到 860。底薪那么低，加班加死都挣不到那么多钱了。

我老公对我工作的事情无所谓，能追到社保也值了。

## 代表的职责

代表要收钱，通知其他人去开会，要经常去劳工机构那里。我晕车，每次都吐。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一般不去。

我们车间收钱很快。大家都说代表不用交钱了。其他车间，好像执模车间就不行。他们说代表也要交钱，因为代表也有份的嘛。

我们车间，一开始是我提议说，既然大家没有人愿意做代表，那代表不用交钱了，因为做了代表出钱又出力。大家就同意了。后来我做了代表，还是交了钱，因为不想因为这点小事被别人说什么。

## 第一批和第二批

我们部门第一批选社保的有十多个人。后来才有了第二批人，也是十多个人。我看不惯第二批人，没怎么跟他们沟通过。

有一件事情很明显。劳工机构要我们的社保清单。说好了我们一起去社保局打印，然后我送去劳工机构。清单都打印出来了，有一个人的老公打电话来了，说问过一位律师，律师说追社保不可能的。她就信了，当时说不追了。一起来的几个人，跟她关系好，听说不可能，都不追了。

那时候我脾气很暴。我说，怕什么，大不了再找工作。真的，那时她老公离她那么远，一个电话，听说不可能，几个人都不追了，气得我一肚子火。我说，以后什么都别问我了。最后我就不管她们了。我们都很反感这种人。

还有一件事，那时去劳工机构开会，劳工机构让我们签名。有人一听要签名，立刻就滚了几个。现在她们又跟着第二批人一起追，我都懒得管。

开始的时候，不管是去劳动局还是去找厂里的人事部门，第二批人都不跟我们一起。后来看到我们有成果了，才开始慢慢积极起来。那时我们就把那些不参与我们行动的人的名字划去，这样严格一点，不要他们（跟我们一起）追了。

## 老板表态与政府谈判

老板给我们全体工人开过一次会。老板说：“如果社保局要我买，我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去社保局，我派人跟你们去。”

跟政府谈判，我也去过。开始去的时候，我也害怕，不想进去，大家让我进去，我就进去了。我进去都不知道说什么，我没读过书，崔明杰和宏强他们说的多一些，说的细一些，大道理我不会讲。去了几次之后，我就不怕了。

我们提出（诉求），写出来（诉求）的那种，他们（政府）回答。我们不同意的，就会反驳的嘛。有时候我们还会跟他们拍桌子，宏强就跟他们拍过桌子。谈判嘛。

去跟政府谈的时候，我们有分工，有第一发言人，有第二发言人。开始崔明杰和宏强说的多一点，不能每个人都说的嘛。后来我们都会说话，会补充。

那时做代表，跟大家用 QQ 群联系，很方便。在车间里，大家一排排地坐着，也很方便。

去政府的时候，有的代表也有不去的。有说不舒服的，有说要带小孩的。有的人是因为害怕不去的。

我跟他们说过，每个人都要去，不能不去，这是你们自己的权益。反正我说过，总是不去，超过几次，就不要你了。虽然这样说，但有时还是很多人都不去。他们觉得有人去就行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思想。

## 组长的态度

我们听说执模部门也有人在追社保。我们车间的一个组长说，我们去人事（部门）问问（他们的）结果吧。我们就签过名字，完了要一起去人事部。组长就怕了，不敢去了，还发火了，把签名的资料都撕了。后来他都没有再参与了。我们都对他说，再来我们也不要他了。

后来，凡是参与了的组长，都被厂里降职了。上面这个组长的事情是降职之前发生的。

## 派出所外守夜

崔明杰他们是代表啊，被抓进去了。我们都是一伙的嘛，应该在外边声援的嘛。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外边还能看到他们在里面坐着，没有上案子。我想，他们看到我们在外边，心里也有个安慰。

在里面肚子饿了，让我们在外边的买东西来吃，也方便。要是一个人都没有，心都凉了。

第一天，守到凌晨4点，听说不可能放出来了。大家商量没有睡觉的回去睡觉，早上再来。我就回去睡觉了，睡到早上8点。我怕没人去（派出所），就又跑出去，看到有人去了，就又回去睡。10点，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又跑出去。我老公说，你真忙啊，饭都不用吃了。

我自己守了两天。有两三个人中间跑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走。他们就顶不住，有人又说年纪大了。我说，就你年纪老，我们还不是都三十几岁。我就想，这些人平时听组长的话，现在我是代表，是不是也要听我的呀？第二天守夜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第一天有跟我们一起守夜的人，我就说，我记得你，你昨天没通宵，今天晚上不准走。他说他眼睛疼。我那时气呀，我说我一直守着，还不是眼睛痛。最后他还是走了。

## 4月1号的行动

4月1号的行动，我就是听说要搞个大的嘛。他们说了，我们也觉得有道理。我没有去劳工机构。

那天，我们把何经理堵在了办公楼里，就是要一个结果嘛。我对那个何经理个人没什么意见。在我的立场，我感觉他有一点点站在我们工人的立场上。

他被我们堵在办公楼，还叫我们坐下来聊天。何经理说他也是打工





的，也不想跟我们发生冲突的。他说老板让他冲出去，他不想。他说他也是打工的嘛，冲出去肯定要抓人的。他说我们都不要冲动，一冲动，警察就会抓人的。

有 4 个保安一直都跟何经理在办公室，保护他。他们一直都有拍照（拍我们）。

### 我老公对我们维权的说法

代表们被抓进派出所，我们肯定也怕，紧张啊。我那时饭都吃不下。但是我老公说没事，不用紧张，这个构不成犯罪的。他这样说，我感觉他好像什么都懂。

我们的行动，有的我会跟他说，有的不会。我老公跟我说不要冲动，不要打架。

我老公好像很懂政府的样子。他一直跟我说，政府是很黑暗的，派出所特别黑暗。他说你进去，白的变成黑的。

他坐办公室，用电脑编程，具体我也不懂。反正学历比我高，什么都比我懂。

那时我做代表。我老公说我是很傻的那种人，打麻将连一块钱都会算错，怕我做代表被连累，让我不要做，说我们是乌合之众。我老公就说我不行，傻傻的，什么都不懂。反正我老公说我什么也不行。

### 为被抓的代表凑钱

两个代表被抓之后，我们开始凑钱。我们部门每人 200。后来在饭堂，有人问不是 150 吗？我说我们部门都是 200，我问到底是多少。有人说最低 150，看你良心。我就说良心值多少钱，他们两

个为我们（才被抓进去），要多少就直说，不要为了这点小钱，内部闹翻了。我部门没有意见，但是我有意见。

我跟我老公说了这件事情。我老公说我这样说不行。人家给150，你说人家没良心，不要为这些小事闹翻是不是，集体的事，给150，就说没良心，说不过去嘛。

第二批那些人，好像有的都没有交钱。我听到一个消息，他们说老板准备宣布破产，第一批的给补，第二批就没有了，所以那200不是不给，要等事情搞定了之后再给。真的有这样的人。

第二批那些人也有代表，我很少跟他们沟通。他们之前不积极，我懒得跟他们说话，反正就是跟他们合不来。

我们有的代表经常去跟第二批那些人沟通，我就没去过，因为后来我上班了嘛，真的没时间。

## 对政府和工厂的关系的看法

我们都是乡下出来的，什么都不懂。政府和有钱人勾结，以前听说过一些。但是这次是亲身经历的，太黑暗了。

那天何经理被我们困在里面。他说来之前，厂里原来的人事部主管就给政府送过钱，意思就是（让官府搞定）我们这些追社保的。他还说，他来了之后，又给了一份。具体送了多少没有告诉我们，反正是送礼了嘛。何经理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困住他的第二天晚上，何经理都跟政府的人翻脸了嘛。我们通宵堵何经理那天晚上，政府的人也来了，但是不管他。何经理就说，搞不好，大家一起死。他说他手里有证据（送钱），说要把那个什么书记拉下台。

何经理，我感觉会一点阴谋。不是冷静，是一点头脑阴谋的。前天我们去交钱，我坐在他旁边，他跟我说他要跟崔明杰说对不起。他说他跟警方还有陆香说了不关崔明杰的事，只针对亚美。崔明杰

的老婆来了，他也跟她说不要担心。

何经理之前跟亚美有矛盾。他第一个放她假，她就拿手机录下来了。何经理说侵犯了他的肖像权。

后来我们放假，何经理让我们去学习厂规，有些员工就很激动，顶撞他嘛。他就跟我们说，现在你用什么态度对我，以后我就用什么态度对你。

何经理告诉过我们，说千万不要冲动，到时候不是你能控制的。反正我就知道政府是很黑暗的，

## 珠宝行业黑名单和未来打算

厂里现在还是放我们假。要是厂里愿意给赔偿，我就愿意走，另外找工作。这样拖我，我就找兼职，反正找不冲突的工作，只是弄得我现在很忙。肯定的要买社保的，已经买了十一年了嘛。我不担心找不到有社保的工作，就算进了珠宝行业的黑名单，去商场做也可以呀，有社保买的，所以就是上黑名单也无所谓。

我是不知道黑名单的作用有多大，我没遇到过。我听说，有的同事见工的时候，工厂会查身份证，如果在黑名单上，不可能进珠宝这一行。很小的厂肯定就没有这个事情了（黑名单）。很多厂没有挂牌子，都是小黑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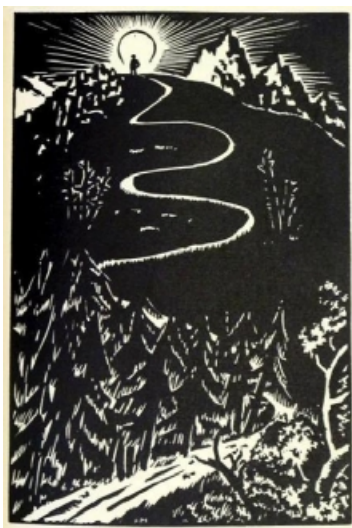
进黑名单的人主要是因为偷了工厂的东西，因为罢工进黑名单就没听说过。而且这个黑名单是珠宝行业协会搞的，没有加入协会的小厂，就见不到这个黑名单。所以，只要愿意做，随便都可以找到工作。实在不行还可以转行。女孩子好转行。男的，尤其是技术工，就难一点。但是还可以进黑厂啊，然后自己把社保买完。

我没想过做组长。我那个组长就坐我旁边，还不是跟我一样。他拿底薪和加班费，我还不是也按底薪算加班费。我家有一个小孩，不用我带，没有压力。现在厂里放我假都无所谓。我们买了房子后

压力大，就没有再生小孩了。家里老人肯定要我生，但我老公也不想要多生了。房子还没有装修，而且还欠几万块钱。

工厂里发生什么事情，尽快搞定就可以了，然后就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无论是什么事情，都要去告它（工厂）才行。像什么节日呀，假期呀，不去搞它，就没有。太黑暗了。搞完社保的事，我可能就要转行了。作为一个打工的，哪有精力时间去搞这些。为那点小的（利益），就付出了那么多，划不来。

我做够十年了，但是没签无固定期限合同。我们几个人寄了一份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书面通知，结果工厂没反应。我们去问，法律规定是七天之内没答复的话，就是默认，所以现在我也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了。我觉得老板不会炒我们。他要赔那么多钱，怎么会炒我们呢？



## 工人代表范哥

——我们没犯法，不应该被抓，我们没犯法凭什么要抓。要证明我们的清白嘛。

范哥是追缴社保的工人中在永宝工龄最长的几个人之一。他们见证着永宝从最初几十人的小厂发展到两千多人，工人的汗水如何一点点转变成老板的财富。访谈他时，范哥还在放假。他希望厂里能不再放假，他能够在这里继续做下去，买够 15 年的社保就好了。后来范哥未能如愿，离开永宝去外地谋生了。

## 打工经历：台湾鞋厂

我是湖南人，1992 年十七八岁时跟一个亲戚到某市打工。开始是种树，一个月二三百。当时，进厂比较难。我有个老乡在鞋厂做管理，我们就去厂里修房子，修宿舍，是临时工。一个月以后，就安排我进厂做工人了。开始做普工，后来做了两三年电工，一个月五六百。

加班都有加班费。我们做电工好一些，普工就没有休息日。我为了挣加班费，也很少休息。

鞋厂车间里，那个胶要用烤箱烤，又热又臭。但是我一般不在车间。工厂里没有空调，有风扇，但是有的不能用。工人流动性比较大。夏天热的时候一个礼拜有一次凉茶喝，还算不错。工人大多数都不是广东省的，讲普通话。

工厂老板是台湾人，是跟大陆合资的，有六七百人。台湾老板好多都当过兵，他就要我们做早操。那些组长、课长，骂人很凶，但都是骂流水线的普工，不会骂我们电工。有时候要整条线集合，课长一骂就是一个钟头。我们厂有句话，说是不会骂人的干部不是好干部。屁大一点事都会骂。做错事会罚款，但是迟到不罚款。

厂里有食堂，伙食还可以，收费，2块钱一天。厂里有宿舍住，有冲凉房，有很多水龙头。有段时间我租了一间平房，就是某市那种老瓦房。一间房两三百，六七个人住，每个人二三十。

我在厂里做了2年，工资也涨过。1994年辞工的时候，算上加班，一个月800多，加班费一个钟9毛多。赶货的时候一天要上十五六个钟。不赶货的时候，就是基本工资。

那时没有年底聚餐，也没有双薪。只有一年过中秋，厂里搞了一次晚会，所有员工都参加，有抽奖。奖品是相机、随身听一类的东西。

那时也有受工伤的，但是不懂法，没有要过赔偿。一点小伤就在医务室处理一下。

做电工跟拉长关系好一点。机器坏了他们要赶紧找我们修。要是跟我们关系不好，修得慢，他们就要加班。

我们厂女工多，一般都是女孩子。我们车间楼上就是那些管理人员的宿舍。有些管理半夜12点多了还叫女员工到办公室去。听说有一个女孩子不愿意去，后来被抱上楼了。厂里的女工都不敢出声。我们厂的经理在工厂后山建立一个小花园，让我们给他在房子里搞了一个茶室，有事没事就叫女工去喝茶。大家都不敢去，但是不去他就给你穿小鞋。

没有高温津贴。立功了就奖励一件衣服，没有奖金。奖励和罚款都会贴通告，还是罚款比较多。过年只放两三天假。

我们没有签什么劳动合同。厂里当官的炒人很随便，让你滚，你马上就滚。

那时有一家厂叫万宝电器厂，厂里的保安都是武警，其中一个人跟我们厂的一个女孩子好。这个女孩子在厂里被台湾人欺负了。那些武警有一天就冲到我们厂里，见到保安和当官的就打，但是不打工人。后来我们厂的保安，联合隔壁厂的保安，一共 40 多人，去万宝厂堵人家大门口。



当时的治安非常差，经常有抢劫的，晚上一个人不敢出去。有一次我和我老婆出去玩。有三个人，两个对付我，把刀架到我脖子上，一个抢了我老婆 40 块钱。他们没有敢伤人，一喊就跑了。他们跑我还追，追到我们租的房子附近，我们老乡都出来了，他们就怕了。我的一个老乡还把钱帮我要回来了。

后来我们厂在花都开了一家新厂，我就去了那个新厂，但是那个厂一年就倒闭了。我又不愿意回总厂，就辞工了。没拖欠工资。

这两年在鞋厂也没有赚到什么钱。

后来我回老家呆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某市，1997 年进了永义厂。

## 在永宝厂

我一个朋友在永义厂做保安，就介绍我进厂了。工厂只有不到 100 人，其中工人只有四五十个。我的工作倒模。进厂交了 400 块押金，底薪 250，一直到 2000 年还是 250。加班费一个小时 1.85 元。加班不多，一般到晚上 9 点或者 10 点。旺季加班也不多。淡季没有加班。工厂包住宿，吃饭一块一顿，伙食还可以，因为工厂人

少，有汤喝。天热时有凉茶。

但是这个厂本地人占多数。他们讲白话，我听着就有点困难。

厂里香港师傅心情不好就骂人，不准你顶嘴。你越反驳他越骂，不管你有理没理。有时候你去请假，他乐呵呵骂你一阵，第二天还跟你说笑。刚来的员工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乖乖听话。

我也被罚过一次，500多。有一次，1克黄金找不到了，值几千块钱，整个部门的人赔钱，一个人几百块。一个月扣一百，扣了几个月。还有去年，有个人弄丢了两颗戒指，一个月扣几百，现在还在扣。

丢东西，可能是丢了，也可能是被人拿了。比如，一个人从上边拿了50个货做，给下一个人的时候，发现是49个，搞不清楚是丢了还是被谁拿走了，就会吵架。

后来工厂搬迁，跟着搬过去就加工资。

我们厂2001年就开始有人买社保了。都是那些当官的，还有一些有关系的员工才有。一个车间就几个名额，哪里轮得到你啊。

后来这家厂福利越来越差。以前住宿不要钱，现在要扣住宿费。以前过节有月饼之类的，后来没有了。

上班比较自由，说话也没人管。上厕所拿个报纸，也没人管。别的厂跟我们工资也差不多，但没这里自由。做得久了，没有压力，就不想离开了。

厂里可以打羽毛球、篮球、桌球，每年都有篮球比赛、足球比赛。但没人去玩。大部分都在外租房，下班之后要回家。

工厂发展很快，很快就有2000人了。开始招聘是要人介绍，后来需要的人多了，就开始直接招聘。金融风暴以前，一直都很挣钱。听管理人员说，我们厂一年挣几个亿。



## 追社保

我是我们厂第一批追社保的。我做了这么久，什么也没得到，出去找厂也困难，能买到社保是最好的。

当时也没想过追社保会和工厂发生正面冲突。后来我介绍一个人到厂里上班，一看到是我介绍的，马上就不要了，等于是把我列到黑名单里了。

追社保时，我们部门收钱比较容易。对我们来说，100 块也不算多。代表去跑这件事情，路费我们总要出一些，也是应该的嘛。

去年 11 月份，厂里开始给我们放假，我就想厂里在针对我们。厂里说是没货做，放我们的假，但又找别人去做。我们去找劳动局，他们说不归他们管。找劳工机构问怎么办，我也去了。劳工机构的人说这样不行，还有个李律师给我们开会，他讲的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

放假之前已经是淡季了，没那么多货做。上半年没货做，我们就在那里趴着睡觉。本身就没什么货做。我们追社保的只有那么一点人，罢工罢几天也没影响啊。如果我们这些人把厂门堵起来，工厂肯定会有压力，但肯定会找保安。

我们有 100 多人。老板的同乡不敢来打我们，给钱也不会。他们对老板也有意见，因为他们福利也没了，而且没事情做。执模的金损耗标准越压越低，赚不到钱了。老板的同乡走的很多。

我们每个部门都有代表。平时通过打电话和 QQ 联络。行动的时候，有人有事就不去。

我觉得我们部门的代表还是能办事的。谈判的时候都是代表进去，我们没有进去。

围工厂办公楼那次，我也去了，不过只有一个晚上。我看到何经理还嘻嘻哈哈的。他也有他的难处。老板不赞成，他也不敢贸然答应我们的要求。

当时大家都嘻嘻哈哈的，跟经理说话都笑着说，没有工人骂他，大家好像聚会一样。保安也不管我们。我们就像请愿一样的。

当时崔明杰和亚美被抓进去，我感觉没什么大事。我们在派出所坐了一夜，觉得关 12 个小时就会放出来。后来他们被转到看守所之后，我觉得是中了他们的计。他们设了个圈套。

然后就觉得有理没地方讲。老板势力大，不比外国（民主）嘛。

人被抓后，又集资。我交了，有一两个没交，我不知道原因了。我觉得应该交。我们没犯法，不应该被抓，我们没犯法凭什么要抓。要证明我们的清白嘛。

当时好像有几个人有点害怕。但是觉得不会影响到我们追社保。只是下次不能这么搞。

工厂给我们放假就是想逼我们离开。我们不走，也不敢炒掉我们。我们就在想有什么好点的办法不让厂里放假。找劳动部门都没有用啊。我是想在这里做到买够 15 年社保。如果真的做不下去，就再说。

我老婆也在这个厂，但是刚来不久，她没有追社保。

我老家盖了房子，花了六七万。有两个小孩。



## 工人积极分子阿红

——那时因为我们是出来打工，感觉好像是临时工，以为社保是那些有工作有单位的人才能买的，感觉好像很高大上，离我们很遥远。

如果不是追社保的事情，阿红应该还是在厂里老老实实在地做事，不会主动和管理发生冲突，自己也不会提什么要求。正是因为集体行动的带动，才使这些平时在公司里像个螺丝钉一样没有声音的工人，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成为行动中的参与者，代表们的支持者。

## 打工经历

我是第一批倒模部门的员工，跟高国权他们一个部门。

我是广东清远那边的人，1994年就出来打工，那时才十六七岁，刚初中毕业吧。我姐姐带我先去了东莞，她比我大三四岁。那时家里条件不是很好，一般都是初中毕业就出来了，没有钱供我们继续读书。

我第一份工作是和姐姐在东莞的钟表厂里做电子表。老板是香港人。厂里有几百人，规模不小。当时那个厂到我们那里招工，我只有一张临时身份证，没有卫生证、劳务证，但是我报名填了个表就可以了，也没有介绍费、押金。我们几十个年轻的老乡包了车就跟着他们去了，两三个月之后还有人来厂里看我们到底习不习惯。

他们是跟地方政府合作的，政府的人送我们过去。所以我们也怕他们把我们拐卖了什么的。可能政府也需要政绩，请工厂过来招人的。

我和姐姐进厂之后签了合同，包吃包住，也不扣钱，吃的也还过得去，一个青菜、一个肉、一个汤，也不算很好，但跟现在很多厂比起来，算是过得去的。逢年过节有加菜，但是没发过粽子、月饼，时不时煲一些糖水给我们喝。过年的时候会包车送我们回去，不管回哪儿都是报销单程车费，回来就需要自己出钱了。比如有些四川人，他们不可能包车回去，就自己买票回去，然后回来再给他们报销单程车费，他们也是工厂直招的。

我们没有搞老乡会，也不会跟外省人保持一定距离。宿舍都是随便分的。我们一起去的就分配给两三个宿舍，全部是女生，男生比较少就分开住。

基本工资好像是 380 元，加班费另算。正常工作时间大概是九个钟或者九个半钟，之后才算加班。周日休息，一个月休息四天。但是那时我进的那个部门都不用怎么加班。其他部门，比如我姐姐那个部门就要经常加班。我的工位是组装做手表用的机芯。我们厂机芯和外壳都有做。我做机芯挺轻松的，都是坐着做，偶尔小声聊天也是允许的，只是赶工的时候他就会说，不要说那么多话了。管理不算太严。要求戴工帽，衣服也是像太空服一样的那种，裤子和衣服全部连着，因为装机芯需要进无尘房。房间里有空调暖气，做配件没有冷气不行的，太精细了嘛，手不可以出汗的，所以也需要戴橡胶手套。

我们那个部门有五六条拉，每一条拉都有一个拉长。拉长不用怎么做事的，他只需要看着我们，只有我们上厕所休息时，才需要他来顶班。我们是流水线，速度不算太快，可以调整的，不会跟不上。有些岗位也不是固定一个人的，如果做不了就会多安排一两个人。

拉长上面是主任，主任上面是主管，主管都是香港人。我们请假一般都要跟主管说，如果主管不在，才可以主任说了算。拉长没有权力批假。不过请假都很好请。那时我看见天气好，想跑出去玩，我就找时间跑出去玩，但是我们部门好请假，我姐姐那里就不好请了。每个部门都不一样，但都不算太难请。老板有时会来巡查，我们有在厂里看到过他，他隔着厂房的玻璃门在外面看我们。老板是两个人，两兄弟，我们叫他们为大老板、小老板。老板没有在全厂开会的时候来讲过话，一般开会都是主管讲，讲生产之类的，不过也很少开这种会。那时候也有保安，进出门会安检，怕有些人偷表出去。在宿舍那里还有两个保安。不过都没有因为偷电子表而被开除的事情发生。

那时候也不用上晚班。加班很少，不会每天都加，一次可能就两三个钟，加班还有夜宵吃。我去的那个部门比较清闲，其他部门就比较辛苦了。不过没有押我们的工资，上个月的工资这个月发。我有钱都寄回家里了，没有存钱。家里也没什么钱，有钱就寄回家补贴一下。

我休息时间多嘛，有时候就几个老乡出来玩，逛街，没钱的时候就是闲逛街了。东莞的治安听说很差，我们晚上都很少出去，即使出去都是几个人一起出去。那时候太小，很多东西都不会留意到，所以治安队来查暂住证之类的事情都没有注意到过。厂里有卡拉OK，有一个投影室。我们晚上不加班了就可以免费去看。但是没有打球啊、看书啊之类的设施，

后来我为什么辞工了呢，是因为有批货，由于我的部分原因，把它搞得不行了，厂里就把我调离了那个岗位。虽然还是在那个部门，也没有罚款，甚至都没怎么骂我。但我就是不想做了。他们很快的批准了我的辞工，没有拖，不用提前一个月，工资在走的那一天全部结清了。还挺正规的。

我辞工之后就去了某市，找了个在酒楼当服务员的工作。因为

之前在东莞都是工业区，没有什么地方能去，就觉得某市比较好玩一点。

在酒店做服务员做了大概两年，也换了好几家，收入都是五六百左右，不包住，需要自己租房子。我们都是几个人一起租那种比较旧的、要拆但是还没拆的房子，所以房租就不是很贵。平均一个人两三百了，将近一半的工资。我是负责端菜上桌的，没有什么小费。过节的时候会有加餐。三八节就是多给一天工资，后来就改成半天，再后来就没有了。放假也不行，因为它卡着一个部门，不可能女的放假，剩下男的干活。



后来，99年没做之后就跑回家住了一段时间，因为身体不是很好。

## 永宝厂

2000年就到了这里，经老乡介绍进了永义厂。当时我在佛山跟另外一个女孩子，两个人一起找工作，想在一起做。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同时要我们两个的，结果两个人都找不到。后来天气比较闷了，住在别人那里不方便，我嫂子在这边，我就问她有没有事情做。她问了一个我的老乡，正好这里有招工，所以就过来这边了。那时我们刚进厂才两百五一个月。

我们四五月份进的厂，六七月份就开始加班了，一直到十月十一月份。那时我身体已经好很多了，因为之前会做一段时间的工，回去休养一段时间。那时过年是分批放假的，所以差不多有两个月的假期。放假我就回家。

每个部门都有香港师傅。他们不会怎么为我们着想，也没有说太凶。但其实他们凶不凶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的联系一般就是请假。请假是可以请的，只不过就是好像不怎么敢请。

我是做倒模的，因为有时候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做，有时候会有一些争吵，可能是因为质量的原因，比如说你说我做得不好，我说你做得不好，不是我的责任，你的责任之类的问题。不过都没什么，大家都是年轻人嘛，不会往心里去。

当时刚进厂就觉得这边福利不算太好，比如吃饭是扣一块钱一餐，厂里再补一块，等于是两块钱一餐。饭堂太小了。宿舍也不好，不单是远，而且条件也很差，二楼四楼是宿舍，一楼是冲凉房，冲凉房不仅门是坏的，还会堵上很多水，因为水流下去比较慢，冲凉要垫几块砖头才行。水是在一个大概有一米多长的大锅里烧的，都不太热，因为一边烧，一边装，冲凉还要排队很久。不过我进来那时候，2000年年尾，他们就搬过这里了。这边要好一点，12个人一间宿舍，相对来说更暖和一点了。有冲凉房、厕所和阳台，冲凉的水是用太阳能，也有热水房可以给我们提水。一个热水房有十几个淋浴头。头几年还好，后来几年天冷的时候就没有热水了。喝的水可以在饭堂装，那里有几个水龙头，我们可以打开水过去自己用。过节在最初几年有月饼，但是没有粽子，冬至的时候也有，有一点水果，这一两年都没有了。

## 罚款

我有一次因为厂牌丢了被罚了一百块，就是放在口袋里，出去外面，别人可能以为是钱包，就被偷了。当时我第二天就要拿钱放假回家了，马上补办了一个，被罚了一百块。不像以前，捡回来就行了，现在是就算你捡回来了，被他知道你掉过，还是要扣你钱。

上次我们部门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她的厂牌在厂里面丢了，然后她去上班，我们要打卡的嘛，没厂牌就打不了，只有让她记一下她的厂牌丢了。后来有人找到了帮她放在了保安处，打电话叫她过去拿。她就跟厂里说厂牌已经拿回来了。但是他们说，不行，你的厂牌已经丢过了，还是要扣五十块钱。这是前年的事情了。

抽烟也要罚款的，我们部门有人在厕所里面抽，被抓到过。打瞌睡也要罚，趴着睡就算。我们部门有人打瞌睡时被保安照了相，当作证据拿到人事部，人事部决定罚不罚。保安拿部相机巡查，偷吃早餐啊都会拍下来。不过偷吃早餐没有真正罚过，因为我们也会相互提醒，看到保安来了，马上提醒在吃早餐的人。特别是加班的时候，因为特别累，很多人都想多睡一会，就没时间吃早餐，只有带进去吃了。如果带早餐被保安看到了，就会被没收，但是不会罚款，就只有饿肚子了。保安天天都会拿着相机，频繁的时候一天十分钟走一次。以前没那么严格的，从我们追社保开始，就拿着相机到处拍了，以前只是会经常走动。保安在走动巡查的时候如果看到有抽烟的，如果不严重，就叫去人事处写一封警告书，如果觉得挺严重的，就直接罚款五十元，不开单，直接签名，之后贴出公告，发工资的时候扣。从零二年开始就已经有人扣五十块的了，后来也都有。

我们没有储物柜，什么都可以带进去，钱包、手机、钥匙、打火机这些都可以，只是不可以拿袋子，只能拿在手里。我记得零几年，天冷的时候穿了外套，有个湖南的男孩子因为不脱外套（外套也有袋子），差点跟保安打起来，还被拉到人事处去了。后来好像没有没有罚款，也没有开除，就是训了一顿。

保安在我们厂就是帮凶，经理是主谋。大家都是来打工的，说得不好听保安就是看门狗，但是他拍照抓到人了就会有奖励。说是抓到贼了有奖励，但是我们厂白天被人撬了一二十间，保安都没有捉到。那时候还以为厂里会给我们赔偿，结果什么都没有。我的宿



舍没被撬，但是东西也经常不见，比如钱呐，贵重的东西，新买的衣服啦。小颖给她爸爸买了个外套，一百多块，还没寄回去就不见了。这些应该是内贼啦。我们就去登记下，然后也没人管。我怀疑是打扫阿姨拿的，虽然我们宿舍有柜子，但是很小，很容易被打破，师傅那里也有钥匙，阿姨一个星期过来打扫一遍，那些阿姨看到她喜欢的就直接拿走。她们都是有关系介绍进来的，反正保安不管，随便她拿。

## 员工自杀

之前，我们厂里还有几个人跳楼，总共有三个，05、06年的时候吧，好像是因为岗勤问题，工作压力大。都是女的。最开始有一个在四楼楼顶那里跳，后来厂里就用杆子焊住了不让人进去。但是后来又有一个人跑上去跳楼了，好像是因为请不到假吧，那时候请假都比较严，我们工人都不准请假的。后来厂里给了8万左右的赔偿吧。这几个女孩子都不大，十多二十来岁的样子吧。最后一个是割脉，是我们部门的，好像是因为感情问题，家里压力大，她就割脉了，不过自杀未遂抢救过来了，没死。后来跟她玩得比较好的，守护她的女孩子精神也出问题了，好像中邪一样，在上班的时候一个哭一个叫。后来家里就来人把她们接走了。

厂里什么都没提，就跟没发生一样的。宿舍暂时就空出来了，后来住了一些保安进去。二楼最开始是住女孩子的，后来就住男孩子了。有人提出要换宿舍的，也可以搬。老板是惠东人，很信鬼神之类



的事情，他有找人来给房子驱邪。我们听说，每次出了事，他都会找有很大法力的人来驱邪。

## 金融危机

08年的时候，我做了八年了，工资就一千，一千零几的底薪，加班费比较少。那时候加班比较多，有一次加了两百个钟。我们那个师傅还买了巧克力来，说加两百个钟的奖两个巧克力。就是加满没有请假，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请假，加班太累了，就会跟他说休息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师傅还算不错的，他说累了可以请假，没关系的，可以休息一下。不过有时候我们一个星期都没有休过一个晚上。

09年金融风暴过后，我们放了比较长的假，淡季就放假。好像我是十二月份放假，放到五月一号，但其实我三月一号就回来上班，上了一天班。那里不是有张工资单41块吗，一个月就上了一天，他就要我放假。那时候，有八个打磨部工友到人事部里去问，说我们不愿意放假。他们说你不愿意放假你就回来，我安排事情给你做。那几个工友又说为什么你安排我做，我就得做啊，我就不做了。后来大概有五个也找过劳动部门。我记得最后他们只赔了几千块钱。他们因为这件事就不做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也跟他们一起去跟那个奶妈谈，后来她说你要放假就放假，不放假我就安排个地方你在那里静坐。

我这两个月就去正泰打工了，可是只做了两个月就跑了。他们是一个玩具厂，五六号发工资，比较随便，没什么压力。我做的工作就是做好了车子打包绳子，把纸皮放在车子上，我用绳子绑在纸皮上。是计时的，工资好像有一千，加班不多，一天就一两个钟。后来要上夜班，我就不做了，那个老板也很快就批了。虽然他们不好招人，但如果是主动离职，不是被炒掉的，下次还是可以进去的。

但是呢，他们做事还是挺严格的，对玩具质量要求非常严格，因为是小孩子玩的嘛，有一点点边会刮手都要返工的。流水线速度很快的。我那个岗位两个人做都来不及。别人的都有两三个人和一两机动帮忙，我们就只有两个固定的，就会很累。他本来需要三个人，可他只有两个人，所以我们就很累了。后来我被调到另外一个部门，那个部门的组长就很凶。

这两个月我分别拿了 1000 和 900，因为第二个月没满一个月。

## 追社保

在买社保之前我差不多干了十五六年，都没有考虑过社保的问题。那时因为我们是出来打工，感觉好像是临时工，以为社保是那些有工作有单位的人才能买的，感觉好像很高大上，离我们很遥远。那时没有想过社保的事情。我们厂是有名额的，或者师傅想给谁买就给谁买。我进这个厂那时都很少有人买。

我们老板的惠州老乡挺多在我们厂的，不过我们车间没有，因为不是技术活，就很少安排他们来我们这儿。他们可以预支工资，我们就不行。

我对奶妈的印象就是，你有事找她，她凶巴巴的，她有事儿找你，就笑咪咪的。口才还是可以的，就是说话不太流利，有点结巴。社保这件事，我是去年开始搞的时候才知道的。



## 配石部门代表邱氏珍

——当时听到两个人被抓进去，我觉得很害怕，睡都睡不着觉，害怕他们在里面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配饰部门不是珠宝加工厂的主要部门，在起版部的工人宣传之后，才逐渐参与到追缴社保的活动中去。这个部门的员工绝大多数为女性。邱氏珍是在上任部门代表离职之后才做的代表。在和她的访谈中也能感到，由于工人整体十分缺乏有效的组织、动员技巧，所以即便作为部门代表，她对于整个事件的认识和收获还是十分有限。能够支撑她坚持到最后的，是劳动者朴素的感情、工人在几次集体行动中建立起的集体观念，以及工人之间的情谊。

## 第一份工作

我是清远人，1999 年出来工作，当时 18 岁。进的第一家厂在顺德，是亲戚介绍进去的，是一个本地人开的十几个人的小印刷厂，几个老板合伙开的。（厂里）外省人比较少。我在那边做了大半年，要三百元钱押金，离职的时候退还了。印刷厂包吃包住，工资 300 多。很少加班，一般赶货的时候加班。当时分印刷和手工两个工序，我做印花。厂里很大的气味。当时进厂需要就业证、毕业证、未婚证。就业证是搞未婚证的时候一起办的。有一个男主管很差劲，对员工很苛刻，只要工人停下来就骂人，也不让打瞌睡。厂长还挺好的，不会骂员工。过年会一起去吃年夜饭。老板请过员工吃饭。在里

面做了半年，不加工资，刚开始进去 250 元，半年才加一次工资，加到 350 元钱。有一些老员工熟手的话，工资大概有六七百。我嫌工资太低就走了。辞工比较好辞。走的时候没有结算工资，后来让同事帮忙拿的。

## 在永宝工作

从印刷厂出来之后就进了永宝。进厂时工资也是 250 元底薪，但是表姐、堂妹在这边，有伴。进厂第一个月拿了 500 多元钱。之前 3 个月涨一次工资，涨了两三次之后就 1 年涨一次。涨工资涨得很少。

进来时是配石，做了一年多，后来才转做其他的。配石就是找合格的石头，配颜色一类的。工作时需要用放大镜，不过很少用，除非是很严的一些货。我天天看石头，视力下降得很快。

2005 年的时候，我们部门大概 500 多人。一个月连加班费的话能够赚到 1500 元钱（加班厉害的时候）。我们部门没有加到通宵。最后那个工序的部门才会有加通宵的状况。每个人的工资状况不一样，高的会多五六百左右。部门全部是计时的。

普通员工最多只能晋升做到组长和主管。这两年才有员工被提上来做主管。以前没有主管，只有师傅。我们部门有两个香港师傅。一个管钻厂，一个管金厂。

师傅是香港的，对员工不是很好。数错数的时候会被骂。他们一个月大概几万元钱，叫他们“师傅”，但其实都没有教过下面员工技术。

组长对员工还挺好的。我没有想过当组长。组长其实很受气。组长做得不好的时候，主管会骂他们。员工有时候也会骂组长。我有时候也会向组长发发脾气。我们部门的组长什么事情都要做。

人事部之前那个女经理“奶妈”比较凶，一点笑容都没有。对何经理的印象是很狡猾。他有时候很凶，又有时候嘻嘻哈哈。他骂人的时候会让我感觉害怕。

我们公司大老板在国外拉客户，小老板在这里帮忙打理工厂。老板对我们争社保的态度是越来越不好，主要是拖延。这个小老板不是很会说话，一般都是回避，感觉没什么学问。让他站出来和大家说两句话的时候都会脸红。

我是前几年结婚的。结婚时放了7天假，会扣津贴。现在婚假只有3天了。产假连一个月都不到。

2008年全厂工资下降，工资下跌了一两百块。当时很不开心。但个个都降了工资，也就没人再去问了。公司下调工资是贴出通知出来，贴出来后也没有人去反对。贴出通知后还让我们把合同上的底薪改了。不改的话就自己走人。有人因为这个事情走人的。2009、2010年那会挣的钱大概有3000多（加班很厉害的时候），一般的时候大概有2500元左右。我感觉工厂的待遇越来越不好。以前本来有年终奖，一年一年减少，现在没有了。以前三八妇女节有一天工资，后来半天，到现在啥都没有了。

在我们这里，被发现偷东西的话就开除了。我们都是老实做事，没有讨论过怎么偷偷带东西出去。

## 追缴社保

2010年以前没有想过社保的事情。当时不知道有社保的事情，对社保不太了解。有些人已经买了社保，但不会跟其他人讲买社保的好处。2002年买社保的那些人都是组长、老板的亲戚。起版部追讨社保的时候，大家都想要买，买一天算一天。我们部门2008、09年有一百多个人，现在只有几十个人了。

当时追社保时听了其他人说的情况，觉得可以追得到。当时是

想着就算老板会炒掉自己也无所谓，在这个厂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态。在这里做了太多年了，出去之后再不想进这一行了。

当时代表说要集资的时候，觉得这个钱是需要给的，没什么其他的想法。刚开始我们部门代表不是我，后来那个代表辞职了，其他人也不愿意做代表，就让我来顶。在工作的时候师傅盯得很紧，在车间里根本不敢说社保的事情。师傅时不时会走过去第二批代表那边聊一聊。师傅不太清楚我是代表。我当代表了，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代表的职责。在部门里只是联络一下其他人。我们部门在集体行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愿意去，第一批的人大家都很团结。第一批有 15 个人，第二批人有 8 个。第二批人有代表，平时联系不多。第二批人里，有一些是第一批的时候因为害怕，中途退出来了，又参加第二批的。第二批里面的代表也挺积极的。

因为我不太会讲话，没怎么去过劳工机构学习，很多人去行动的时候我就会去。我去了几次政府部门，当时也没有害怕，可能因为人很多吧。有些人可能会害怕，但没说出来而已。在行动的时候，我看到过有人害怕就躲到附近公园里，离得我们比较远。

我因为追社保，过年前被公司放假了。过年的时候公司因为赶货，打电话让我回来上班，我没来，后来货赶完之后又让我放假两个月。

我没有想过要放弃，因为已经在开始追了。我老公不是这个厂的，他以前也追过社保，现在在老家。老公也很关心并支持我追社保的事情。

我觉得当时我们去办公楼围住何公公应该能达到目的，因为大家都说能。我们在办公楼待了两天一夜。不过最后他们被抓的时候我没在，正好回家轮班休息去了。当时听到两个人被抓进去，我觉得很害怕，睡都睡不着觉，害怕他们在里面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后来代表们又集资 150 元钱请律师用，我部门的人都交钱了，大家也愿意交。

## 工人积极分子刘超任（执模部）

——一般是代表们去劳工机构学习，通知到我的话都会去。我去过三四次，参加的都是法律培训，觉得学了有用。其他的文艺活动就没有参与。

### 打工经历

我是广西平南人，1996年15岁出来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和堂哥、亲兄弟在家附近的工地上做泥水活。一般是搞外墙，刷墙。一起在那里做事。我们自己买米，自己做饭。有些老板会拖欠工资，但还不会不给。

后来跟着堂哥一起做豆腐，挑去别的镇上卖。卖豆腐也没挣多少钱。不是因为做得不好吃，是顾客买的时候，都会找熟人那边去买，不会因为我们做的好就买我们这一份的。几个月后，我就去永宝了。

### 永宝工作

我是嫂子介绍到永宝的，和她在





同一个部门。2002年的时候嫂子就买社保了。我那会还没想到买社保。

我刚进去时做执模，每个月工资底薪 250 元。第一个月的工资有五百多元。那时候工作时间很长，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车间里一直有空调。以前都是做金（首饰）的，车间会有很多金粉。地板上有铺一层地毯，把地毯烧掉，里面会有掉下来的金。

我们部门的工资最低，靠耗金（注）挣工资。耗金（所得的价差）一个月可以赚到几百块，加起来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大概有 2500 元左右。后来耗金从 0.8 降到 0.6。加上做银饰多了，银子不值钱，损耗挣不了多少。

以前有一个 50 多岁的香港师傅很好，大家都一致认为他是为员工说话的，后来管理上被人找了一些漏洞，被人冤枉地炒掉了。他走了没多久就发病死了。

在这个厂工作几年之后就过得且过，没什么能挣钱的办法了。有几次想走但没走成，去找过几家厂，有的因为试工不合适，有的因为别的厂里的规矩不一样，不习惯。

我是 1998 年结婚。老婆原来也在永宝厂，后来为了带小孩子就出厂了。老婆生孩子的时候休了产假，但没有给足假期，怀孕后一直工作到快生孩子了才放假。

我们部门以前女工多，现在男工多。工作都是靠手，不需要太多体力。起版部门男女都差不多，是真正的技术活。

## 关于社保

我们厂社保还没有搞起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有说能追社保的新闻了。嫂子虽然很早就买了社保，但也没有跟我说过什么。

当时买社保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买一天算一天。很多人买了社保，

社保卡还没拿到就辞职走人了。

我们部门 2008 年之前有 300 多人，现在 70 人可能都达不到。金融风暴的时候有一批人走了，现在又走了一批。第一批追社保的有些人找到好一点的工作也走了，但走的不多。我学历低，也不是很会说话，做不了代表。不过，我和本部门的三个代表之前就很熟悉。

一般是代表们去劳工机构学习，通知到我的话都会去。我去过三四次，参加的都是法律培训，觉得学了有用。其他的文艺活动就没有参与。

崔明杰他们被抓之后，很担心他们出不来了。但我还不担心政府会抓更多人，因为如果抓那么多人的话，会很轰动。

刚听说崔明杰被抓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恐慌，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在里面和何公公（人事部主任）吵架的时候，我站在人事部门口附近。

## 工厂管理

老板总说“能补缴的时候就会给你们补缴”。我是不怎么信的，感觉老板在忽悠。

从头到尾我们都不相信何公公，说一套做一套。比如他答应下午接收资料，但下午去找他的时候人都不见了。欺骗员工太多次了，都不相信他。他经常说：昨天的事今天不说，过去的事现在不说。何公公口才很厉害，听说在政府部门做了很久。崔明杰被抓后大家都不敢有更多行动，害怕帮倒忙（怕往两个人身上扣更多的罪名），等律师来处理。

妈妈和何公公相比差远了，办事能力不强。何公公是说得头头是道，是个很冷静的人。一般很难激怒他。

当时我们感觉，何公公是故意激怒亚美。亚美是文员，平时比较突出，和何公公吵过几次。他应该是想抓到亚美把柄，时不时故意激怒她，有时候故意去找亚美说两句话。

第一批处理得差不多了，已经走出一条路了，第二批应该也不是大问题，也都在政府那边立案了。

不过，第二批人少，不够团结，比较胆小，也担心他们能不能拿到社保。如果工厂用放长假的办法对待第二批人，第二批人肯定拖不起。第二批人里大部分是女的，男的不到十个人。第二批代表里就只有一个男的。

注：耗金是指在加工首饰成品时，无法避免的原料消耗。师傅会根据经验设置一个百分比，比如加工 100g 金，允许的损耗是 0.8%，0.8g 金，如果员工熟练只消耗了 0.6%，0.6g 金，那么之间的差值 0.2g 重量的金相对应的价值就可以算作员工的奖励。但是当员工的技术熟练，耗金所得到的收入普遍提高时，师傅就会降低允许损耗的数值，相应降低员工通过损耗拿到的奖励。



## 工人积极分子李秀英（执模部）

——老板跟师傅说过：“对员工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 五金厂工作经历

我是广西人，1998年出来打工，17岁，连身份证都没有。那时候老家已经有很多人出来打工了。

我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找工作，就跟着到我们老家招工的人出来，进了一个小五金厂。老板也是广西人。厂里只有几十人，小的10来岁，大的有40来岁。这个厂专门招那种年龄很小或者很大的人。

这个厂做空调配件，都是又脏又累的活。车间里很热。招人的时候什么都不需要填，身份证都可以不要。当时没有听说查身份证、暂住证。

那时候一个月几十块到二百来块的工资都拿过。加班很多，9点10点回到宿舍都是早的。一个月偶尔有一天会休息。加班多一点工资就多一点。有一次拿了三百多，自己觉得还有点多。每月工资要扣几十块钱水电费，还有几十元伙食费。那时候自己花钱比较大手大脚，一个月下来也存不下钱。

工厂会在外边贴招工启事。一般押一个月工资，自离的话，工资就没有了。有些人工作了一个月，在厂里吃住，然后自离，没有人去要工资，在厂里没有人敢闹。

我在这家厂做了一年，走的时候拿到了工资，但应该是有扣掉

一些钱，也不太清楚是怎么算出来的。

## 在永宝的工作

我找家里要了点钱，2000年又出来找工作，5月进永宝厂，刚满19岁，是靠老乡介绍进去的。老乡说这个工厂还可以，比较轻松。2000年的时候首饰厂比现在多，比较集中。

永宝厂招工要熟手，有工作经验。熟手会当面试工。生手一定要人介绍才能进去。招工的时候会问你有没有担保人，有的话去核对并询问愿不愿意做担保，愿意的话要签字。进厂交400押金。进厂时写入厂招工表，没有签合同，很多年之后才有合同。有伙食补贴，质量一般般，但比之前的五金厂要好一些。

有的老乡在外面租房。房租很贵，很差劲的房间也要一百多，还是几个人住在一起。

我的底薪250元，周围的厂差不多都是这个价。听说2000年的时候，永宝最高的底薪是650元。

我进了执模部，正好是旺季，天天加班，一个月加100个钟，加班费全按1.5倍计算，没有2倍这一说。

厂里的师傅大多数是站在老板那边的。我们部门只有一个师傅。现在这个做了3年，算是比较久的。老板跟师傅说过：“对员工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有些师傅为员工说话，很快就会被老板炒掉。比如，有师傅向老板反映员工有一些要求，比如空调坏了要修，这个师傅就做不久了。有一个比较好的香港师傅，没做几个月就走了。

我们车间很热，有空调，但是坏了。车间里偶尔有一个风扇，一般会被组长拿走。师傅一般都在办公室，有好的空调用，所以跟他们反映也没用。2011年，有人和工厂打官司，高温津贴，工厂才

给换了新空调。

厂里有一个部门全是女工，产假只有两个月。后来追讨的人多了，就给了三个月。

有时候一天做的事情让我们半天做好，没做出来的话就不吃饭，一直加班。

有个师傅的固定月薪过万，加班对他没什么好处。但是员工加班，他也要加，所以他就让员工赶货。后来把这个师傅换走之后，加班就比较多了。

货做不完的时候，厂里会拿给外面的人做，外面的单价比厂里要高。

师傅对几个组长或自己熟悉的人，会好一点。有一年工厂发月饼，员工没有，只有师傅有，师傅把月饼带到车间，切开，一人一块。

跟师傅吵架没好处。不想做的时候就和师傅吵架。吵架后会让你去人事部拿辞工书走人。

我们部门的组长很清闲，不用做事，工作量很少，是师傅提拔起来的。和师傅关系好一点的被提拔，但也有些人不愿意做组长。组长的管理作用不大。

车间里的文员多过组长，有跟单和收发，和员工接触还挺多的。以前部门一两百人，现在只有四十多个人。以前文员工作量大，分几个文员来发货，现在工作量变少了很多。

我们部门没有文员追社保的。一般文员工龄都不长。追社保时，文员不看好我们，说“你们追讨不到的，老板不会给你的”。懂一点电脑的，都可以做文员。文员工资和员工一样，底薪和加班费都一样。工人加班的时候，文员也要加班。

客户给老板的损耗很高，但老板给我们的时候就压低了。要很小心地做，不然的话会亏损。在去年（2010年）的时候，我就做亏过。

丢了货要员工赔，按成品的价钱来赔。有一个同事丢了一个戒指，被扣了 7000 多元。车间有摄像头，但没多大作用。赔偿的时候一般是个人承担，除非很多人都接触过这个货品。丢货的事情很少发生，发生的时候会扯多一点人下水，一起来承担。平时都很小心，数目一定弄清楚。

2010 年 9 月 1 日开始，我们厂开始要缴社保。以前工厂有人知道社保的重要性，就去人事部问可不可以买，人事部会以没有名额的理由去推拖。偶尔也有文员去车间问谁愿意买，但有些人不愿意买。

起板部开始追社保，我才知道社保的重要性。

以前产假工资只有几百块。去年我们部门有一个人追产假，去打官司，后来工厂给她全补回来了。

我去年生孩子的时候，把资料交给文员，但被文员退回来了。她说我的准生证有问题（时间有出入），享受不了产假。



## 第二批工人代表阿英

——当时有一帮人去，我也没觉得害怕，也没有要闹事，就没觉得害怕。说真的，如果说是一个人，我就不敢去了。

阿英是第二批追缴社保的工人。她在1990年代就随着打工的工厂缴纳过社保，但当时只是因为工厂要求，她才被动缴纳，并不明白社保有什么用处。后来，在永宝，随着生活的改变，她又认识到了社保的重要性，跟随着第一批追缴社保的工人，重新缴纳了社保。

1990年我到深圳打工，在一个手表厂做了差不多七年。手表全部都是出口的。工厂的员工基本都是外省人，本地（广东）人才几个，四川湖南最多，江西的也有不少。拉长里面，本地人和外省人都有，也不知道怎么选的。待遇方面，有全勤奖，特别奖，每个人都有，差别不大。拉长的奖金比我们高一点。

伙食是一块钱一餐，早餐五毛钱，质量一般。

手表厂有事情就会开全厂大会，后来进了永义，从没开过大会。我在深圳进厂3个月就给买了社保，一共买了六年的社保，后来辞工就退保了，现在感觉很可惜。

## 深圳工厂罢工

我在深圳手表厂做事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大家觉得工资不合理，



闹过一次。那一天我们全厂人都不做事了，坐在那里。经理来了，问干嘛不做事。我们说工资不合理啊。闹了一天不做事，经理也很怕的。

当时我们觉得加班很多，工资怎么那么少，好像每人都少了一两百块。罢工是各部门的主管带头的，当时经理和老板的亲戚都来劝我们不要闹，说老板肯定会把钱补给我们。我们闹了一天，老板就答应把钱补给我们了。厂里后来也没有惩罚闹事的主管。

当时旁边别的厂闹得更厉害，有人发传单，还上街了，最后也是员工赢了。

1998年，我辞工回老家结婚，2004年又出来打工。有人介绍，我就进了永义厂的倒模部。那时候生手刚进厂，底薪是250。我老公也在这个厂，比我早了四年进厂。

2004年加班好多，我都怕了，哭都哭了几次啊。7月份进厂，正好是旺季，每天都要加班到11点、12点。淡季有事做，只是没班加。之前在手表厂一般加班到10点，最忙的时候才加班到11点。

倒模不难学，绝大多数都是女工，刚进来试用期三个月。加班多的时候，工资有600多块，加班费按1.5倍算的。

我们那个车间有冷气，也比较自由一点，工种简单一点，工作本身比较轻松，材料本身也不值钱，做坏了丢掉就行了。别的部门做金银的，就不行。

隔了那么多年没有做事，刚进永义厂觉得不习惯，好累。但也没有想过要换厂。

组长的工资比我们高，因为底薪不一样。他们加工资，一部分加到底薪里，一部分加到加班费里。他们工龄长，有的做了20多年，我们没法比。现在进厂的新员工比老员工划算些，一进来底薪就高。

平时如果做错事，组长肯定要数落。但是我们那个工种，很少会做错事。

我们部门里的师傅都是香港来的，2004年时有两个人，一个凶，

另一个还可以。师傅平时都很随和的，但你请假他就很凶。刚开始他不批你假，但如果你实在有事，他也批准，不是很苛刻的。

师傅的工资很高，可能一万都不止，而且他们拿双份工资，大陆有工资，在香港也发工资。

我们的工资，刚开始是一年调三次，现在是一年调一次。我挣这么点工资就是贴补家用。我在家的六年里生了三个小孩。我是农村户口，第一胎是女儿，就可以再生一个。第三个是超生的，2004年超生费罚了一万多，东凑西凑。读书要看户口，罚过钱就能上户口，就能读书。小孩放在乡下，让家婆带，我们把生活费寄回去。

我老公做电金，工资也很少。旺季一个月最多1200，要加很多班。我那时候一个月加了160多钟头才拿630，现在工资单还在身上呢。现在想起来，我就想说这样子我都熬过来了。

以前我们在这边租房子，130元一个房间，带厕所的，走廊可以做饭。后来房租涨到150块钱，但只涨过一次。现在好多房子的房租都降了，有些从170变成150或140，因为工人少了好多。

我们附近有个正泰厂，全部是流水线。它的员工做到9年就被炒了，不会让他们做满十年的。不过炒了有钱赔，我们厂炒掉就没有钱赔。正泰组织员工出去旅游，我们也没有。他们逢年过节有东西发，我们也没有。正泰厂没事做，又解雇了很多人。永义厂给工人放假，一放几个月，也不给生活费。



2004年刚来永宝的时候，过节发过水果，还有三十块钱。那时候有医疗室的，简单的包扎、感冒拿药不用钱。每周二四六有凉茶，一三五有汤水。三八妇女节放一天假，后来放半天，再后来就取消了。之前

我们待遇也挺好的，后来“祖爷”来了，“奶妈”来了，那一年好多福利都没了。就是“奶妈”他们几个人研究怎么对付我们这些员工，替老板着想。

奶妈（人事经理）凶巴巴的，我没怎么跟她接触过。我们好讨厌她。她欺负人，剥夺我们员工的福利。

2008年金融风暴到现在，永宝厂待遇越来越差。工资调整了，底薪一部分调成岗位津贴，年终奖也没有了。2009年，我的底薪690，没有加班，加上奖金一百多，也就七八百的样子。打卡迟到会扣钱，一个月加在一起超过一个钟就扣。以前有全勤奖，现在也没了。但是我也没想过走，主要原因是年纪大了，不想走来走去再换工作。而且这个厂不累，不会催你做事，比较自由。上厕所没有限制，还可以聊天。如果我们出了这个厂，就不做了，直接回老家。

## 首饰厂偷窃

首饰厂有工人偷东西，每年都会有一次被抓到的。我也见过偷东西被抓到的。有一个人，做一款首饰，要求50件，后来一看有51个，她说怎么会多一个，就拿走了。

## 追社保

2002年工厂给员工买社保，都是有指标的，关系好的才给买。当时“奶妈”就给她的亲戚朋友买了社保，有些关系户一进厂就给买了。有些人没特殊关系，在厂里做了17年都没有买。

厂里有些员工还是老板的亲戚、老乡，他们中有些都没有买社保。有一次他们签名给人事部要求买社保，奶妈就说：“你都是老板

的亲戚，你还要这样搞啊？你快点不要搞了。”

第一批人追社保的时候，征集签名。我当时请假回家，没有参与。她们都是秘密的，怕被厂方知道。

第一批人已经在追社保了，有的人想去找他们问一问情况。他们不说，除非签名交钱一起追，否则不讲。就是你要明确表示要追社保了，他们才跟你讲。

当时我们不知道搞不搞得到，所以想先等他们搞到了再说。

我老公也在厂里。他们那个部门十几个人，都是老员工，好像都很怕事，没有搞。我老公跟我说，你自己爱搞，你就去搞。他还教训我，说去搞了又能怎么样？！

我们也有点担心，第一批人补完了，厂方不给我们其他人补，怎么办？

我们第二批人是去年 11 月开始追的。当时我还是有点犹豫。

我们部门的香港师傅，说让我们不要闹了，但是不会为难我们，不得罪人。

后来去市政府请愿的活动，我都去了，请愿都是女工去的多。第一批的代表有我们的电话，通知我们，我们就去了。以前我没有去过政府，当时有一帮人去，我也没觉得害怕，也没有要闹事，就没觉得害怕。说真的，如果说是一个人，我就不敢去了。

去地税那次好像是 4 月 1 号。之后，代表们让我们回厂，要求厂方给我们答复。当时我们找何经理要答复。我也不怕厂里炒掉我，炒了就给我赔钱，我就是想叫他炒掉我。

何经理平时笑眯眯，笑里藏刀那种。出了事情就好凶，一下子变了一个人一样。等一下没事了，就又跟你说笑，讲他家里的事情。等到起冲突的时候又凶巴巴的。

我们去围人事部两天，后来厂里按我们旷工处理的。我们就围了两天，第三天要回去上班，不回去就是旷工三天，开除没钱赔。

第二天下午就把代表抓到派出所了，然后我们就到派出所等他

们放出来，有几十个人。后来听说不会放出来，大家心里都不好受，乱抓人嘛。还有一点紧张。

两个代表被抓，我们有集资，准备打官司。当时我们部门有一个人不愿意交钱。

再后来，厂里的香港师傅通知说，所有人都给买社保，不追的也给买，那些人就不想再交钱参加集体行动了。厂里通知都是口头的，就是稳住那些人啦，不要再闹事。

厂里大部分人不追社保，因为他们还想在这里做事的嘛，一追的话就炒掉了。不追社保的本地人多，小孩在读书嘛，怕丢了工作。

去年的时候，派出所的还找到一位本地员工的家里，跟他们的爸爸妈妈说，让他们劝儿子不要搞事情了。家属就以为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公安的人都来了。这个人是我们部门的男工，他是第一批追社保的。后来他偏不退出，他说既然走到这样了还退出干嘛！

有一次去区里信访，第二天，警察就找到参与行动的员工家里，要他们不要再搞了。他们也不怕，照样搞。



## 第二批工人代表何家强

——我对这个厂还是有些感情的。在这里生活了将近十年了，人毕竟有感情的嘛，如果工厂不是太苛刻，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走。

何家强的兄弟在永宝做保安。他的部门也比较特殊，是由另外的香港人单独承包并注册的。工龄算多久，社保能够追多久，比其他工人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对能否补缴社保信心不足。访谈时，他们的社保还没有最后定论，对第一批工人也有些牢骚。但对我们这些外部人还是很热情，忙前忙后地接待。

## 打工经历：佛山南海五金厂

我初中一毕业，就跟着老乡一起出来打工了。那时候男工找工作相当困难，我出来找了两个月找不到工作。那两个月，就是住在老乡那里，这个住一下，那个住一下。那时查暂住证，很严格。他查你就跑嘛，反正都是一片一片地查。什么时候查就不清楚了。运气不好被查到了，交钱就可以放出来。没钱的就抓进去，让人来赎。

那个时候，发现附近查暂住证了，我就开溜。没办法嘛，感觉有点像日本鬼子来了一样。

最后，我还是问别人借了钱，到佛山人才市场交了 130 块钱的中介费。他们包找到工作为止。如果你觉得他们帮你介绍的工作不合适，可以不去。这个人才市场倒是没有骗我们钱。我也有老乡在

当地的工厂工作，但是那些厂只招女工。而且我的老乡都是普工，也帮不上忙。

我当时进了一家五金厂。那是家 1995 年开的小厂，三四十人，生产自行车配件。老板就是佛山人。这家厂一个月工资 500 块，两班倒，10 个钟，那个机器也要休息 2 个钟。当年这个工资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太热，没有空调，都是吹风扇。厂里不收押金，但是押一个月工资。包吃住，因为五金厂工作辛苦一些，要用油和油漆。那时吃得还可以，两菜一汤，过节过年还有加餐。

这个五金厂一般不招人，招人也是通过人才市场介绍来的。当时一个月休息两天，算是不错的了。倒班有时候一个月一次，有时候半个月一次，看订单情况。倒班的时候可以休息一到两天。

工厂的生意还算可以，产品都是在国内卖。老板 1999 年的时候就买了好几台车。

工伤发生的话，医疗期有工资，给出医药费，还有些赔偿，就是赔的少。如果是小伤，就没有钱了。受伤了不想上班，可以请假。我没有受过伤，其他人有受过伤，最严重的是磨钻头的时候沙子进到眼睛里。我们工作时间不算太长，10 个小时，中间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实际工作 9 个半小时，不会打瞌睡。如果时间太长，从早上八点钟上到晚上十一二点，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我们这种小五金厂没有流水线，一个人一台机器。我是用那种小机器做螺丝，把铜片或放进机器，用手压一下，就变成螺丝了，也不太危险。

那时候刚出来工作，第一次自己挣钱，感觉相当好。拿到工资我先还钱，就是找工作那两个月借的钱，大概用了三到五个月才还清。

我在那家厂做了一年就离开了。这个五金厂在铁皮房里，很热的，而且还很脏，每天手都黑乎乎的，穿的衣服也是脏的。我们那时候十七八岁，喜欢干净一点的嘛。

当时我是将近过年的时候辞工的，跟老板说觉得做这个太累，而且太热也受不了。老板也理解，因为他也知道五金厂都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干的，年轻人少。

## 打工经历：台湾日用品厂

从五金厂出来，我进了一个 1992 年开的台湾厂，也是小厂，六七十人，生产洗衣粉。那时候很多台湾小老板跑到这里投资。我在五金厂做了一年，周围熟悉一点了，就自己找到的这家厂。

它的工资还可以，试用期一个月，将近 400 块，过了试用期就算是正式工了。工作时间有点长，一天最少 11 个小时。中午、晚上有吃饭时间，但不算在工作时间里。厂房是楼房，没那么热，工作环境相对舒服一点。

这个厂也是包吃住的。那时候我们找工作，都是找包吃住的，因为没钱去租房子住。现在不包吃住，几千块的工资都很难生活。外边吃快餐都涨价了，但主要还是租房子贵。

这个厂是流水线作业，都是分工来做，很简单，比如贴商标、封口之类的。工作比较轻松，就是时间太长。洗衣粉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散装那种，拿回来贴个牌子，搞个包装。据说这样利润才高。

厂里有些师傅是老板从台湾带来的，管理人员一般都是大陆的。管理很严格，不准聊天，上厕所要申请。

当时在厂里早上要做操，8 点开始，做完操，8 点半马上开工。我就说，我是出来打工的，干嘛要这么多花样，受到控制的感觉。如果是冬天的话可能对身体还有好处，但是夏天太热，受不了。所以我做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就离开了，工资没拿。因为试用期不做满一个月，不给工资的。

我当时进厂也没有交押金，要交的话我们也不敢进，怕走的时



候押金拿不到。押身份证的厂我就不进，因为我们出来唯一的证件就是身份证了，如果押了身份证，我去哪里都不行。

## 打工经历：做了一天的日本厂

离开台湾厂，我自己又找了一个日本厂。我已经在工业区生活了一年了，不像刚来的时候，两个月都找不到工作。这个日本厂只招年轻人。

日本厂简直太严格了，严到无法理解了。我进去做了一天就吓跑了。

招聘的时候都很严，问你这个问你那个。要求一切听上级的指示，不能犯一点错，犯错就罚款。

这家厂做衣服，织布料，再加工成衣服，机器很吵。厂里有几百人，女工多，女的好管理嘛。以前的企业招女工不招男工，男工难管。如果男工一多就起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工厂两三百个人，男工如果有两百个人，那两百个人都是老乡的话，老板也会有点怕怕的。

日本厂里的管理人员很多，有小组长，有班长，有大组长，还有拉长。日本厂里真的很多管理，我都很怕，真的。他们就在那里来回转，也不生产。

这些管理人员，上下班规规矩矩地排队。

这个日本厂的工资还挺高的，一个月七八百块，但是管理太严格了，像我这种年轻人肯定会犯错的，就不想做了。



## 在永宝厂

永宝厂好像是 1994 年开办的。以前我的很多老乡亲戚都是在这个厂工作。2000 年 3 月份，亲戚介绍，我就过来了。这家厂开始是在市桥，2000 年 10 月份搬到现在这个地方。我进厂时，交了 300 块钱押金。工资底薪 250，有 1.5 倍的加班费。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很满足了，因为我们毕竟是从农村出来的。有些厂，加班费 1 块钱 1 个钟，很低很低的。

搬厂的时候也有人不想过去。工厂就给加一两百工资。当时给我加了一百块津贴。不愿意过去的也没赔偿，算是辞工了。

刚进厂，都是我的亲戚教我做事。那时周六晚上不加班，一个月工资有五六百。搬厂以后，宿舍离工厂有四五公里，很远的。我住宿舍，因为那时住宿舍不用钱。

我在手链部，工作有一点技术含量。我跟着亲戚学，一两个月之后，感觉可以了，就自己拿货做了。

试用期过了，底薪可以调到 300 或者 350。一般一天上 11 到 12 个钟。相对来说这边熟人多一点，而且那时才 19 岁，也不觉得累。以前我进那么多厂都没有礼拜天，到这个厂我就体会到有星期六、星期天。以前在佛山，一个月休一次，现在一周休一次，感觉比佛山的工作要好。

底薪是一年调一次，250 调到 350、450。后来调到 500 多，加班的话就能够拿 1100 多。

我 2008 年结婚，老婆也是这个厂的，现在小孩都 3 岁了，也在这边，我们自己带。我老婆是 2004 年进的厂，现在也在追社保。我们是第二批追社保的，受第一批人的影响。

我没想过当组长。师傅是香港人，又是我们老板的亲戚，你做得再久也没用。

我们厂请的这些香港师傅蛮奇怪的。没什么能耐，有个香港身

份证，然后就拿高工资了，还看不起我们外地人。他们就是盯着你做事，你勤快就好一点，想偷懒就会被他发现。现在我们追社保，他们就盯得更紧了，上班下班都对着你，就是看你不顺眼，但是有法律保护，他不敢炒你，就是想让你自己走。反正让人感觉很难受。

2008年金融危机，老板减了底薪，本来有960的底薪，降到880，加班费就少了，我现在对工资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但是很多亲戚在这里，两个哥哥都在这个厂，也就不想走了。我对这个厂还是有些感情的。在这里生活了将近十年了，人毕竟有感情的嘛，如果工厂不是太苛刻，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走。

我们这个厂7月到10月是旺季，加班比较多。淡季都是一天8个钟，一个月休息8天。现在的工厂都是计件工资，我们厂还是计时工资，听说要改成计件。

我印象中，这个厂总体还算可以，只是现在这几年好像走下坡路了，越来越差。

## 追讨社保

### 讨社保前，工厂社保缴纳情况

我们不懂法律。我们部门旁边的起版部，以前跟工厂闹过，可能是这个原因，2011年工厂就帮我们买了社保。2011年之前，我们都没有买过社保，工作七八年了都没有买过。

以前我也想买社保，但是不懂这里的门道，只知道有的工厂给买，有的没有。以前我也问过劳动局，然后陆陆续续有其他人去问。劳动局说这是工厂的事情，工厂愿意给你买就买，不愿给你买就不买喽。

2004年的时候，我们工厂开始买社保了，当时厂里有2000多

人，好像只给几百人买了社保。其中包括老板的亲戚、老乡，香港师傅还挑出一些他们看得起的员工也给买了。

我们部门特别一点。我们的那个香港师傅 50 多岁，原来是大陆的，去香港后又回大陆。我们部门就是这个香港师傅承包下来的，有点像小老板这样的感觉，他就明说了不帮我们买。牛气哄哄的，有了香港人的身份就踩我们这些内地人了。

## 金融危机放长假

2008 年过年，可能是因为金融危机吧，放假到 5 月 1 号才上班，没给工资。2009 年 12 月放假，放了将近一个月，也没有工资。

放假这么长时间，有些员工就走了。这个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的。放长假我就回老家过年，那个时候正年轻，反正也无所谓。

2008 年放假那么长时间，没有工资。去劳动局问过，但是没用。他们说管不了，工厂没货做，不能白养你。很多人去厂里闹过，要上班，要么解雇。工厂就说，没货做，上班也没工资。

以前放假，工厂不会给我们开放假单的。现在讨社保，知道了这个法律，才知道放假还要发工资。

我们以前找厂里，都是找人事部那个女的，外号叫“奶妈”，脾气比较暴躁，动不动就发火。她来厂里至少六七年了，靠跟老板有一点关系才进来的。

请假要通过人事部，请假条要交给她。以前请短假，师傅批就可以，讨社保之后不行了。

反正追社保之前，她的态度就好一点，追社保之后，她就对这两百多个人看不顺眼了。

## 对第一批追社保的人的看法

我们部门的人追社保，都算是第二批了，我们没有跟第一批人一起。

第一批追社保的人是我们隔壁部门的。我们平时跟他们接触少，合不来，玩不到一起。说句不好听的，他们部门的人在我们厂里是很屌的。他们都是技术工，所以工资是最高的。没追社保之前，他们有的人底薪就有两三千了，加班的话，工资超过五千的有好几个人，一半都有4千以上。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有钱的看不起没钱的。虽然我们都是工人，但是说的也是实话。

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二批人觉得追到社保的可能性很小。听第一批的人讲过社保，但是没有头绪，还是感觉很盲目。为什么我们第二批后来又站出来了呢？因为老板答应给第一批的人买社保了，叫他们去签字。我们就觉得有头绪了，既然给他们130多个人买了，为什么不给我们买呢？

## 老板的打击报复

我们第二批人签名大概是2011年10月份左右。签名的有90多个，后来有人怕了，就退出了。签了名，老板就开始针对我们了。第一批那130个人，星期六星期天不让他们加班，本来星期六星期天加班是双倍的嘛，但是就不给他们加。

我们这个部门平时也会商量，但是跟第一批没有直接联系。第一批有什么消息，也不会跟我们说。因为我们部门跟别的部门不同，我们这里有小老板，也没有人参与第一批，所以就没有直接的联系。

我哥和我老婆在别的部门，但是也很少跟我们说他们（第一批）的事情。第一批怎么去签名的我都不知道。

第一批签名后被老板针对，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肯定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工厂做了这么久，老板也不会怎样。他们（第一批）有，我们就去追。不追，在这个工厂也没有什么发展。

我们也不怕老板炒我们鱿鱼。这个我们知道，如果他炒，就要赔钱。而且感觉这个厂已经走下坡路了，做不了很久了。实在不行就换厂，现在总没有刚出来的时候那么困难了，心里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工作也是好找的。我们有很多老乡，走过很多地方，所以只想把社保买了。说起来打工十几年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不怕没饭吃。

工厂从11月开始给第一批人放假了，我们部门也有被放假的。没什么害怕的，有保底工资，总好过以前放假没有工资吧。

## 对工厂违法的态度

放假应该发工资这个事情，我们是在第一批人签名之后才知道的。

我们知道，没追社保之前，这个厂克扣了我们很多，但是我们没有很强烈的心思去跟工厂对抗。我们这些打工的，心理是这样的，觉得这份工作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嘛。我们毕竟是打工的，也不想闹太多的事嘛。

开始我们不懂，到底有没有法律规定社保可以追以前的。后来知道中国这个法律是有的，但是政府执法严不严，也是个问题。还有，政府贪官污吏太多了，人家给一点钱就把他买通了。



## 第二批的代表

我们第二批人有 50 多个，选了 10 个代表，但是只有两三个积极的。

开始我们第二批人没有选代表，因为我们跟着第一批走了将近半年。每一次行动，我们也会一起去。

我们 10 月份签了名，然后第二年 3 月份选的代表。因为第一批已经买到了，我们就要靠自己了。

每个部门都需要一两个联络人，把消息告诉部门其他人。代表，事实上只是联络一下而已。他们第一批的人打电话给我，我再告诉我们部门的其他人。代表都是负责联络固定的几个人。

我是去年 12 月去劳工机构学习的。我知道第一批人去劳工机构学习。但是我们没签名之前，没想去学习什么的，就靠第一批人带头。我们的想法，就是等第一批有眉目了，我们再去了解那些事情。像他们第一批，开始的时候搞了半年都没有一点眉目，而且感觉他们懒懒散散的。

我们第二批很多都是跟着走的心态，不会努力去争取。现在厂里放假，主要针对第一批，我们第二批大部分人还在上班。

现在也没办法，因为有班上你也不能旷工啊，请假也难请。

别说开会讨论，现在我们第二批人都很难联络。代表之间，也就两三个人平常有沟通，但是没用。其他那几个代表，有什么事情找他，都是爱理不理的。换代表更加没用。

去年的时候，区政府、市政府，我们第二批的都去过。不过那个时候是放假，因为厂里没货做，第一批和第二批人全都放假。那次去围人事部，我们第二批也全都去了，因为也是为了大家的事情嘛。那时还在上班，算旷工。旷工一天半啊，肯定要扣钱，但是还不知道扣了没有。

我在老家 2002 年就盖房子了，那时两万就能盖，现在五万都不止。

## 工人活动家涛哥

涛哥因为自身的维权经历以及在官员前的强势气场，在某区珠宝工人中比较突出。他是劳工机构的理事，还把这个头衔印在名片上。工人都称他为涛哥，因其工人身份，很多工人觉得他比李主任还亲近一些。

我们访谈过他两次，因时间有限，一次主要是讲他在接触劳工机构之前的工作及维权经历，一次是讲他怎样看待工人维权和政府、资方的关系。永宝事件结束之后，他自己创办了一个劳工机构，介入了一些工人集体事件。

### 进珠宝厂之前的打工经历

30岁之前，因为孩子小，我一直在老家。种过两年地，也没学会，后来做点小生意，也很难做。在外边打工一个月还能挣一千，后来就出来打工。

我2000年出来打工，先去的深圳。没技术，想进工厂进不了，当时男的30多岁不好找工作。女的30岁还可以找工作，七八百、九百、一千的工作都能找到。

我在深圳呆了一年。做过几个月保安，一个月600块钱。工资低，想走，但是找到新工作之前不敢动。那时候查暂住证，抓人抓得厉害，所以一般都穿保安的衣服出去。

后来一个堂哥介绍我去一个工厂当装卸工，跟车卸货，一分钟3块钱。那时候骗加班，一个月能赚一千一二。没有签合同，也没



有休息日，就是一分钟3块钱。厂里一个月还扣我50块钱。不押工资，也没有买社保。我就是临时工。工厂里面有正式工，但我进不去。

## 珠宝厂打工经历

### 当学徒

我2002年到某区进了珠宝厂当学徒。交了3000块学费，学了半年左右，没有工资，不管吃不管住，免费给工厂干活。算上学费，我当学徒半年左右，自己总共花了1万多块。有的学徒学两年，有的学三年。

那个师傅看你年龄大，也不好教你。教你一点点，他知道你学不全就不会走……

听说1995年之前，这里都是广东人，到1998年之后，就有广西人、湖南人。广东、广西和湖南，就这三个地方的人比较多。

有些小孩子做学徒，都是跟着亲戚朋友，住在亲友家里，在厂里学两三年。

### 出师，当组长

学完之后，做了四五个月，就升我做了组长，管七八个人。

我们厂那时有500多人。每天加班4个小时，一般周日休息。算上加班费，一个月有一千一二。

工厂不管吃住。我在外面吃饭、租房子。当时房租不贵，180一个月，有卫生间。

住出租屋被人偷过。那时候应该买个保险柜，因为老是不想请假，东西放在屋里就去上班，结果就被撬了。那一次搞得我很惨。

后来，我当了组长，多了 300 块的工资，一个月能拿一千四五。但是组长也要做事的。

## 罚款、赔偿

珠宝做坏了要赔，要罚款。有的人做坏了很多，最后一个月连工资都没有。现在像我们做了十几年也未必不出错，但是一般我们都可以修好。

罚款标准是总公司来定。做的首饰达不到标准就罚款。比如说，厂里给你 100 克黄金，做 100 个货。规定交货时要有 97 克。如果交了 97 克，不赚也不亏。假如你才交上来的 95 克，那就在你工资里面扣钱。那如果你交了 98 克，发工资的时候会奖你 1 克的钱。这个标准总的来讲还可以，大家可以接受。赚和亏都是你自己的技术问题。

## 工厂管理

我当时的老板是香港人。主管经理级的全部都是香港的，组长有江西、湖南那边的，不一定是广东人。

主管安排工作，我就负责找人去工作。没有跟主管发生过什么矛盾。

厂里有计时的工作，也有计件的工作。计时的的工作难度大，比较复杂。计件的工作比较简单。但是往往计件工资



拿的高一些。

计件的工作，要看跟主管的关系。比如，我是管事的，你对我好，我就给你发比较好做的、赚钱的货给你做，一个月能拿到 6000。

我管的组是计时的，工作也不算太复杂。

## 福利

我们厂每年都有抽奖的活动，但是太假了。奖金 500 元以上的全都是主管经理级别的人。我就只抽到过一些小礼品，小雨伞一类的。

我们厂没有年终奖。春节过后回来上班，也不发红包，但是年底会吃一顿饭。

## 打官司

我们每天下班要交接工作，确定没错误之后，大家就下班。

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少了几克金子，厂里就叫我们部门每个人认罚 1000 块钱。我就说这不关我们的事啊，工人做完之后收工确认就 OK 了嘛！

其他那几个工友因为想保住工作就认了，同意罚款。我就不答应。我说要是答应了，就是承认我们做贼。然后工厂因为我不承认，就要开除我。当时我就想无所谓，反正现在也不愁找不到事做。我说你把工资给我算了，押金退给我，我就走。工厂什么都不给，就给我写了一个开除我的东西。

进这家厂的时候，我交了 500 块押金。每个工人都要交押金。没有签劳动合同。

然后我去找劳动局。劳动局的人说工厂在沙湾镇，要我去找沙

湾镇的劳动站。我就去劳动站，把我自己写的材料交上去。劳动站的人不收，说要打印的。然后我就跑去让人打字，交上去。他们让我等电话通知，等了解情况了就给我打电话。然后就一直拖拖拖。我打电话问他们，他们说正在处理，还是让我等电话。我去找他们，他们还是让我回去等电话。

当时很纠结，想去找工作，这个事情又没解决，不找又不行。后来我有一个老乡说有一个机构专门帮助劳动者伸张正义。其实我当时不相信，因为劳动局的人都那样嘛。

后来没办法，我就打了个电话试试喽。当时是一个女律师接的电话，说让我过去跟她谈谈。她说只要我按她的要求提供证据，马上就帮我处理。她说，像我这种情况，就不光是要回押金，还可以要赔偿费。算出来总共9千多，不到1万。

仲裁结果，除了社保，百分百支持我的诉求。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是社保，仲裁书里就清楚地写明社保与此案无关。

仲裁结果下来，工厂要15天内给我钱，已经生效了嘛。刚好第15天，工厂就打电话让我去拿钱。

这个过程我学到了很多。刚开始我被开除以后，工厂保安不让我进工厂大门。我去找劳动部门，半个多月，跑程序的过程中受了很多气，后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去一家公司做了个小管理。刚上班一个星期，那个律师就说找劳动局没用，找一百次都没用。那个女律师很专业，让我申请仲裁，仲裁必须7天内决定是否立案。她教我这个方法就行啦，刚好一个星期，劳动局打电话让我去拿开庭通知书。

仲裁受理之前，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受理，我就叫了记者去采访。保安问记者有没有预约。记者也很屌，说我不用预约，你上去问。

我们工厂的法人代表是本地人，因为我告他，他觉得很没面子。老板说：“我花多少钱也不会给他开这个先例。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

个。”他说从来没人敢告他，他要整死我。

当时我拿了开庭通知书之后就回去上班了。那个法人代表就叫他的一个亲戚带着人，到我工作的工厂里找我的主管，让我的主管1个小时之内要把我交出去，否则就让我的主管下不了台。

我是一个老乡介绍进的这家厂，我跟这个主管也很熟。我就把情况告诉他了，他就说没事。

我跟主管说，你让他们别走，我15分钟后就到，你让他们一个也别走。当时我也来气，我用主管的电话打过去，我说要是他妈你敢动我，我就把你弄死。然后等我去找他们的时候，人影都不见了。

后来我又打电话给那个法人代表，我问他是不是叫人来找我了，他不承认。

其实原厂的同事告诉了我了，当时来找我的人是谁了，是个看网吧的混混。我就问法人代表是不是让这个人来找我了？法人代表就承认了，他说有天晚上跟那个混混喝酒，说起这个事情，这个混混就说要了解我到底在哪里上班，是什么背景，住哪里。我说行啊，你现在过来，我带你去我住的地方。老板听我这样说，第二天又找我，他说：“算了吧，你就撤诉吧，退一半押金给你。”

我当时还退了一步，说今天把工资和押金全退给我，我就撤诉。他说不能。

后来他又约我到茶馆谈，说他老爸和劳动局的局长是战友。我说我不撤诉，我就要那张仲裁结果，输了我认。

有一天下雨，我骑摩托车，他开着大众。他说你不要搞事了，我说我这也算搞事吗？他说你告到哪里我买到哪里。

## 法律与集体协商

这里这个行业的大部分老板，就是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为了不给工龄赔偿，老板就要辞退员工，哪怕员工走了，下个月再来上



班都可以，但是工龄就清零了。

这种辞退员工，大部分都没有赔偿。要赔偿就要争取，要有策略跟他谈。如果不找我们帮忙，自己去劳动局，那里的工作人员就直接说这种赔偿是没有的。这个地区的劳动局很不正规，工作人员上班都不挂工作证。我们跟工人说，如果他推脱，就要求他出示工作证，或者要他把他说过的话写在纸上，签上名字。

我们和专家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中国现在不缺法律条文，只要按照现有的法律办事，就 ok 了。集体协商，前几年的案例就是工人选代表跟厂子谈，但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现在工人来找我们，我们就告诉他不要选代表，每个人代表自己，所有人都跟老板谈。前两年，我们试过 100 多人去罢工，去拦马路，去堵厂门，最终都是失败。08 年时，100 人把人事部、老板全部堵厂里，派出所来了十几个人，后来不了了之。选了三五个人做代表，政府就个个击破。

我现在有想法，要通过法院告劳动局的仲裁员。深市某区有个成功的案例：工人去找劳动仲裁，证据确凿，但是仲裁员有法不依，劳动法上有明确规定的都不判给工人。工人就到当地法院起诉仲裁员。工人后来胜诉，两个仲裁员被单位开除。这个案例给我很大鼓舞。据我所知，这应该是第一宗胜诉的行政诉讼，这边还没有，所以我想试一试。

集体协商也是一样。老板根本就不跟工人谈，而工人去劳动局申诉又得不到支持，明显合法的要求，也有充分的证据。所以如果能起诉劳动局不作为和枉法，并且胜诉，就能给它压力，迫使它依法仲裁，这样老板失去靠山，就不得不跟工人协商解决问题。有个案例，工厂以种种名义收取刚入职工人的押金，工人要求退还。仲

裁，一审，二审，全都不支持工人的要求。所以我说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迟早会逼着工人杀人。

## 一起命案

有政府的一帮人请我去吃饭。我就跟他们讲过一个事情。我是在厂里6楼上班，对面另外一个厂的5楼就发生过一个杀人事件。那是08年的事情。一个工人因为2000多块钱杀死2名高管。厂里改了工人的工龄，这个工人就去人事部质问。人事部的经理是鬼佬，印度的，很屌的，当场就打了这个工人两巴掌。这个工人当时很控制自己，就打电话报警。大家都知道，现在派出所出警，就会说这是你们自己公司的事情，你们自己处理啦，等等。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个工人就去劳动局举报，劳动局就说你们自己协商吧，都是不了了之。当时很多人看到鬼佬打人，工人也有看到，人事部有两个女管理也看到了，一个生产部的总监，一个财务助理。派出所来调查的时候，这两个女管理作伪证，声称根本没有过打人这种事情。

第二天中午，这个工人就拿了一把刀找到办公室，印度佬没在，他就对那两个女人下手了。那个财务助理躲到洗手间去，最后还是被拉出来捅死了。印度人不在场，就没有杀到他。后来保安报警，警察把他逼到楼顶。楼顶有80公分的围墙，他翻出去，拉住空调的水管。后来消防的也来了，可以说他们是见死不救的，因为连气垫都没有充气。很多工人看到。后来他拉不住了，就飘飘飘，掉下来，摔死了。

我就跟政府的人说，2000块钱，很简单的事情。如果这个人认识我，我就不会让他走这条路。如果司法部门老是这样做，谁都控制不了局面。像我们这个机构，上个星期政府就担心我们搞什么活动，罢工之类的。讲实在话，我们这个机构从来都不主张这个样子

的。

## 机构的作用

我跟他们说，这一年多来，机构一直尝试集体谈判，这样对三方都好，他们也认可这种说法。行政诉讼劳动局，如果胜诉，肯定对集体协商有好处。比如有的老板就非常吊，按照劳动法该赔 2 万的，他就给 5000，还说有本事去告吧。他知道仲裁、起诉要很长时间的，他有的是时间，而且，工人告到哪里，他买到哪里，20 万，30 万，他都买。告到那个部门，买的那个部门，告到哪个报社买到哪个报社。他就跟工人直接这样说。

总之，工人对法律层面就完全失去信心。03 年时，还没有劳动合同法，那时不少案例，劳动局还是完全支持工人的要求。现在法律更完善了，反而成功的少了。那些法官没有几个是正义的，就算拿到铁证，他都能够避开。

如果政府不作为，迟早控制不住局面。现在是企业绑架了政府。现在工人动不动就罢工，谁控制得了？我们现在就是集体协商，不行就走法律途径。我们的做法都是很阳光，很透明的。

你提到工会的问题，的确应该是由工会代表工人进行集体协商，同老板谈判，这是最好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的，这是迟早的，是时间问题。任何一个国家迟早都是这样。但是现在不行，如果我们说成立一个东西代表工人，马上就会被打压。其实我们现在就充当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不能说出来。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请问你是不是那个什么工会的？我马上说不是不是。我们还不敢戴这个帽子。

我跟政府高级一些的官员们建议过，可以给我个名分，可以不受薪，可以归在这里总工会名下，做个巡视员，我就可以堂皇地去以政府的形象出去，就有合法的身份。这样，要去找某个厂的老板，我就不用带 100 人，只要带三四个，跟老板谈。



对，工会在法律上是合法的，但是中国的法律都只是文字上有规定，实际完全不一样。比如，示威游行也是合法的，但你去公安申请，能通过吗？申请的人先就被处理了。03年时，司法还比较公正，现在就是政府控制一切。我总结这几年的案例，02年到05年，那时对工人还是比较公平一些的。05年到08年，劳动局简直是摆设。法院还好一点，一审还一些，二审更好一些。从08年到现在，到二审的案件基本都是维持一审原判。

以前劳动仲裁要收费，现在不收费了，案件急剧上升。可能也是法院态度转变的一个原因。现在我们也是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走法律途径看不到希望了。

工人，你要搞到他忍无可忍的时候，不要说我们，谁都控制不了。劳动法规定的清清楚楚，不能收取押金。但是，这一行，你不交押金就找不到工作。现在我们就建言一些专家学者把这些事情捅到中央。

所以现在 we 想帮，帮不了：腐败，枉法。

律师的压力很大。我就跟他们说，人家要走正当途径，你不给人家走，你要人家去杀人呀？工人罢工，集体谈判，渐渐形成不产生代表的方式，其实有带头的，但为了自我保护，在冲突中，老板厂方要求工人派出代表时，工人就说没有代表，或者每个人都是代表，这个经验也要研究，总结一下。

反政府一类的事情，我们当然是不做的。他们给我个职位，我还要高兴呢。有时候他们请我去吃饭，吃饭花的钱我不管，我不吃他们也是要挥霍的，但是给我钱物，我就不要。有时吃晚饭，他们就要请我去一个娱乐休闲场所，那里消费就很高，他们要给我一张付费了的会员卡，5000块的，放到我的包里。我说，如果你要这个样子，下次就不要找我了，我也不会见你。在一起吃顿饭无所谓，因为跟他们聊只能在饭桌上。但是收买我，不行的。说白了，我们也需要政府方面的这些资源。我们搞一些活动，可以得到许可。

政府也需要我们的资源。他们也可以从我们这里了解最底层工人的情况。用这些了解到的情况去给老板以约束。政府的人回到厂子里，对老板说，你们还敢打人，不要太过分。厂里不承认的话，政府就说，你敢说没有，谁谁谁的案子，还不是我们帮你处理的。骂了厂子，政府的人也有面子。并不想让企业家把他们当成脑满肠肥的贪吃猪。

地方政府担心企业撤资，所以一味偏袒。你没有反抗，没有压力给它，它就不动，它没事干。



## 邻厂追讨社保

欠缴社保是普遍现象。同在岭辉镇的某摩托车厂的几位工人通过老乡关系，找到了永宝的工人代表询问追缴社保的过程。当时永宝工人社保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工人们把自己那份补缴的钱交到了厂方。大家围坐在工人代表宏强家的小屋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讲述多少有些杂乱。但当一位摩托车厂的工人问追社保要先找哪个部门时，永宝的工人代表齐声强调——不要找工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劳工机构建议工人先去找工会，结果工人白费了力气。因此，几乎是条件反射一样地脱口而出。当然，这也说明工人并不把工会看作工人组织，而是当作政府的一个无用的部门。

我们访谈时，摩托车厂的几位工人追缴社保的事情才刚刚开始，永宝厂的进展对他们来说是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但同时，因为看到的只是永宝工人已经得到的结果，以及工人们经过将近一年的磨合而产生的默契，还没有了解到他们曾经做出怎样的努力，摩托车厂的几位积极工人对同事不积极、不配合的抱怨较多。

## 工厂情况

我们摩托车厂是私企，以前在石基，是个拖拉机厂，1996年搬到岭辉镇，开始生产摩托车。老板是江门人，据说早年在台湾打工，台湾厂老板看他不错，就支持他回大陆开厂，从经济和技术上支持他。

一开始，我们厂从台湾进发动机，都是组装好的，运到大陆，轮胎都是配套的，直接装好就可以。一台车很贵，七八千、万把块

钱的都有，很赚钱的。

那个发动机是很好的，台湾雅马哈。后来我们厂慢慢地发展起来了，一个台湾技术，一个日本技术，再一个我们厂的名声，现在的产品是中高档产品。一台普通的 CG 车，外面的卖两千多，我们的卖三千多，品牌嘛。主要是销往国内。

我们厂 2000 年以后就很红火了，人最多的时候是 2004 年到 2006 年。一条流水线一天最少生产 500 台车，加班加点地干。出口欧美一台整车，所有费用扣除能赚一万块钱。

我是 1999 年进厂的。那时工厂的生意已经很好了，在行业内名声很大，一般人很难进。有老乡在厂里，也要有个一官半职，介绍才能进去，而且还要用钱买。我们都是花钱进去的。当时厂里有七八百人，一条线最多的时候 130 多人。

我们厂男工多，现在一般都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像我们这种 40 岁的很少了。小孩子不愿意上学，到外边又怕变坏了，不如送到厂里挣点钱。厂里外地人多，很多都是父母在这里打工，把孩子送到厂里。

1999 年的时候，我进厂做普工，一个月 450 块的工资，还有绩效奖、工龄奖。那时一个月工作 26.5 天，周日有时还要加班。上够 26.5 天就算全勤。那时加班多，一个月加班费也有八九百。平时加班 1.5 倍，周六日 2 倍，一直都是符合法律标准的。

其他福利方面，工厂每个月都组织当月过生日的员工聚餐，跟老板一起吃饭。我是 8 月份的生日，生日聚餐吃过 4 年，在食堂吃，加餐，老板跟我们一起吃，一起聊天。感觉挺有人情味，感觉自己也是厂里一分子。老板会问你家住哪里，自己有什么想法。

2004 年到 2007 年这 4 年，每年都有 10 周年纪念奖，就是工作满十年的员工，工厂给奖励，奖品有戒指、手表、现金等等。

我们厂吃食堂有饭卡，九几年的时候，每个月补贴 120 块，就是四块五一天，现在还是 120 块，多的部分自己出钱。以前厂里包

住，水电费也不收，现在收钱了。

2008年之前还有年夜饭，很隆重，全厂人，包括搞卫生的，去宾馆吃大餐。去的时候租个车队，30多台车。那时我们厂很好，日报上都有报道，我们的摩托车出口30多个国家。那些老外，合作伙伴，都会来吃年夜饭，吃饭时还请明星来演出。从1999年一直到2008年，基本每年都搞。

2008年以前有年终奖，大概是一个月的工资。2008年金融危机那两年取消了年终奖，2010年之后又有了，但是标准不一样了：做满一年，一个月有150元奖金，工作满半年，每个月有120。每个人不一样，一年比一年多。我以前每月100，现在最少180。

2004年到2007年，还发过半年奖，那个时候生意好嘛。

我们厂2008年换过一个老板，正好那个时候金融危机嘛，老板说不妙，他就不搞了，要办理破产。金融危机的时候，主要是订单少了。那时候像法国、美国、巴西，特别是欧洲国家，基本上都不要了。

那个老板管理不善，把厂里的七八个部门都承包出去了。当时事业部最赚钱，一年能挣两千多万。老板什么都不操心，就是收钱，有问题他也看不见。

2010年换老板的时候，厂里还有三四百人。以前没有签过劳动合同，2010年的时候签的无固定期限合同。换老板的时候也没有给我们经济补偿，那时候不知道这些事情。

新老板以前是店里做副总的，搞销售。现在厂里还是做那个牌子的车，配件牌子也没变。合同上公司的名字也没变。

先前的厂在外面已经失去了信誉，很难采购到东西，于是新来的老板用了个权宜之计，用新公司的名义进行采购。

## 讨社保

### 我们是怎么开始讨社保的

我是做品管的。要说追社保，都想追，但是很多人不怎么着急，产线员工钱紧，追到了还要自己交一部分钱。

我们现在不同的车间，一共有 30 多个人在追社保。我们先是问其他人，看看还有没有人想搞事，到劳动局去投诉。反正就是闹，不闹的话老板也不会理睬你，闹了才会有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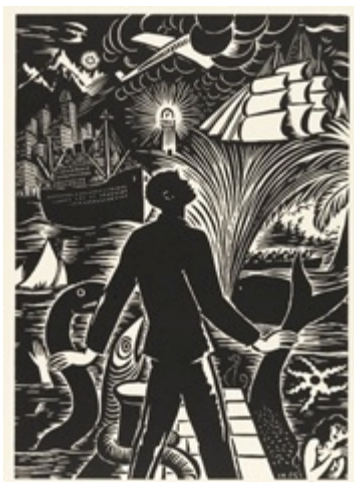
我们以前也不关心社保，是去年永宝的起版部开始搞，我们才有了这个想法。去年 12 月，他们有人来向我们宣传，讲这个事情要怎么搞。我们跟他们有联系过。

厂里不把我们去上访当回事，根本就不怕。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觉得我们肯定搞不下来。

我们去上访，政府让我们准备户口本原件。这种东西都放在老家的，很难弄。我们搞了两三个月才凑齐，然后政府那边又没有回音了。政府就是找借口。

### 收活动经费的矛盾

我们的材料都收不齐。人家永宝的起版部那边，互相之间都很熟。我们就只有四五个人跑来跑去，交通费都要自己出，收他们每人 30 块，那些人还觉得贵。现在 30 块钱坐个车买瓶水很快就花完了。我们



跑前跑后，那些人就是不领情，觉得我们做事是理所应当的，他们还不满意。这个就不跟他们计较了，他们都是些乡巴佬。

我说我们活动需要经费，要求每人 100，但是先给 30。他们问我们能不能搞定，我只能说尽力去争取，尽力去做。他们不知道这里面的艰辛，觉得这种事情 30 块钱就能搞定，所以我觉得挺伤心的。

其他人没有跟我们几个人一起行动过，他们说请不到假，走不开。我们几个有时候请假，有时候早退。后来请不到假是有原因的，社保局告诉我们经理，说我们老是到社保局去闹。经理就来说我们。

我们检验部门，没那么严格，不像生产部门，接到了死任务一分钟都不能走。有时候我们早一点晚一点下班都无所谓。

## 收集材料

整件事情，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收集材料。政府说，买社保必须要登记，身份证复印件之类的证件必须要齐。户口复印件就是要知道你的户口，还有要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进厂的，你必须要有证据。

户口就收集了 13 个人的，然后交给劳动监察。社保局态度还行，但是一问到事情进展得如何，就开始打太极，总说正在处理之中。

我们先去的社保局，他们也是要我们先把材料整理起来。比如那个时候进厂的，户口所在地，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有几个代表，代表确认签名等。之所以派代表是因为人去太多了不好协调，所以要代表先和他们谈。

交了材料，政府说只是走完了一个程序，还要看我们跟公司协商的结果。我们找老板谈，他就说没钱，没那个能力，要是有钱的话就协助我们办理。

## 去劳动监察投诉，去社保投诉，去信访，去人大

我们进厂的时候，每个人扣了一千块钱押金，后面进来的人就不扣了，但是这一千块钱现在还没有还给我们。我们就去劳动监察投诉。本来还有加班费，但是没人抱怨，就没投诉了。

一开始去社保局，我们看到期限是六十天。期限到了我们去找他，他就说是六十个工作日。然后我们等了六十个工作日，他又说我们差什么材料。反正他就是推拖，然后我们就去找了信访局。

三月份去了区里的信访局，投诉他们不作为。信访局说他们和社保是一个部门的，投诉没用，就这样把我们推回去了。所以现在很无助。

后来还找了区里的人大。我们去找人大的领导，还没找到，去的时候他在开会。我们把资料留在那，后来那个领导打电话说已经收到了资料，正在处理这件事。因为人大有监督权，其他部门不作为他们可以监督，也是走程序。

之前和劳工机构联系过，就是那个李主任，他告诉我们下一步该跑哪个部门。现在该走的流程都走完了，也没什么地方可跑了。

然后就没有再跑了，因为没信心。几乎政府部门都跑过了，没用。我们厂的那些人没有跟我们去找过政府，他们不会去的，他们就指望你能搞定了，这对他们就是最好，他们根本不想跟你去。

他们有些人可能想做到几时算几时，也没有说一定想要在这个厂再待下去。这个厂现在这个情况也不可能再待下去了。你待着也没用嘛，工资还这么低，什么福利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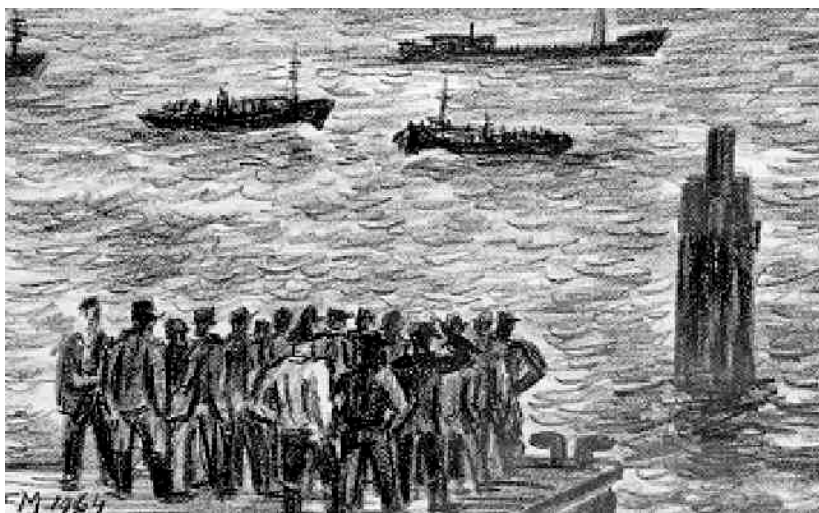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去找过的政府部门，什么答复都没有，反正他们总说在办理之中。



## 跟老板谈

上个月跟老板谈了一次。我们去了五六个人，上班的时候去找的老板。我们约过几次，过了4个礼拜，老板就是不见我们。后来我们有一个急了，说：你要是老不见的话，到时候我就去做出点什么极端的事情来。然后常务部的那个经理就跟我们谈了一次。谈了没用，他也不能拍板。他先来安定情绪，让我们不能做得太过火了。

厂里知道我们的情况，也知道我们的要求，我们给他们发过邮件。



## 公益律所指导记录

背景：公司贴出通告称，因经营困难从 2011 年 11 月 17 号开始放假。

一共有 89 名工人被集体放假。工人找劳工机构咨询建议。劳工机构介绍了邻市的公益律所过来给工人们讲解法律意见。

时间：2011 年 11 月 19 日

地点：某酒家会议室

人员：永宝工人，劳工机构职员秀红、小云、涛哥，公益律所刘律师、郑主任

（简单翻阅工人的书面材料后）刘律师：你们公司的放假通知，其实是停工通知。停工通知需要支付停工期间的工资。各地标准不同，本市是放假第一个月足额支付工资，第二个月起支付之前个人工资的 80%。

小云：因之前工人追社保，所以现在被放假的工友里 87 人有 85 人被放假。

刘律师：按照现在的情况，如果停工之前还是超负荷开工的话，那其实不符合厂里的说法。厂里需要证明确实因为订单不足才停工的。是否向劳动部门反映过？

工人：向区政府反应过。没有明确回应。

刘律师：有没有公司的信息？现在看，从法律上讲你们没有诉讼理由。老板不想开厂了，可以关厂，或者停工。这是经营自主权的问题。这属于温和的洗牌方式。

工人：如果停工 6 个月后，老板又炒掉，工龄经济补偿会不会很少？

**刘律师：**不会，应该是按照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工资标准计算工龄补偿。除非地方法官有什么别的解释。目前厂里有多少工人面临不合理的社保待遇？

**工人：**1000多工人，80%的工人没有社保。

**刘律师：**如果要谈判就要有筹码，也就是凑人头。哪个部门最关键？最有分量？

**工人：**起版、电金……

**刘律师：**具体工序是怎样的？

**工人：**一个部门做完，货物流到下一个部门。

**刘律师：**厂里到底有没有经营困难的情况？

**工人：**没有感到公司真的经营困难，但我们没有确凿的数据。金融危机的时候，也没有很困难。我们怀疑有一些单外发了，但是没证据。

**刘律师：**厂里在开工也有可能亏损。有可能是早先的订单，现在做就亏了。这些需要具体了解。何况只要公司需要还可以做出亏损（的账目）来。另外，是否亏损，这不是不给工资的理由。员工的工资和公司是否亏损没有关系。

就算是厂里拿真账，也可能是亏损。哪个工厂做账会是赚钱的？这叫合理避税。而且你们厂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从工商注册资料上来看，出资方股东是一个公司，不是个人。你们厂的挂名厂长说话不一定算数，可能就是挂名，决策权还是在香港那边。

**郑主任：**现在有无证据证明厂里是因为订单减少开不了工？这样的话，就说明大家认为厂方不是因为订单减少。之前工厂有没有过这样放假的安排？

**工人：**2009年之前有过，说是自愿放假的就签名。去年没有。

**郑主任：**现在可以说他现在是单方面改变劳动合同，需要通过员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同意。现在我们不管他是什么理由。他现在放假的方式就不对。程序上就不对。我们不用管它什么理由要放

假。现在要进行集体谈判。现在我们最有力的武器是，程序的武器。厂方的行为不符合劳动法、工会法规定，厂里任何大的变动需要经过工人的同意。我想大家也是希望通过理性的方式进行维权。厂里有工会吗？

工人：工会主席是老板的老表（亲戚）。

郑主任：如果企业的工会不管用，还有一个思路是，我们可以联名，把大家的要求写出来。一份交给上级工会，一份交给厂里工会。具体内容可以写：我们有如下诉求，希望得到支持，如果无法满足，那么工人会采取自主的方式和厂方解决。首先我们要建立在一个合法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法律依据。那么我们现在表达了一个比较守规矩的做法。先向工会汇报过了，是我们逼不得已的一个行为，使相关部门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方面。因为很多部门非但不帮忙，反而起坏作用。他们可能心理上想帮老板的，但是我们这样做，他们的地位就会比较尴尬。现在厂里工人涉及到社保问题的人有多少？

工人：厂里 80%的人都没社保。参与补缴社保行动的有 200 多人。第一批补缴社保的人里被放假的有 80 多人。

郑主任：工人的工龄构成情况？

工人：追社保的 200 人里，工龄 10 年以上的很多，最少也有 4、5 年。

郑主任：那为什么只有 200 多人追？

工人：大部分是因为工龄较短。有些是怕失去工作，有些是老板的老乡。

刘律师：那你们第一批是都没买过吗？

郑主任：这几百人是分散到各个部门吗？

工人：只有一个部门的人全部都没参加。

郑主任：其他人只是旁观吗？

工人：有些师傅说，他们第一批追到了自然有你们的份。

**郑主任：**具体是什么情况？

**工人：**最早的时候，找老板给我们买社保，老板说你们走法律途径。我们第一批人就给社保局写了投诉信，社保局回复说应该补缴，但要确定入职时间。第二批工人看到以后也就开始追。但是社保局的通知并不是说就能马上执行，要和厂内协商。现在和政府、厂方协商后，厂里口头说从 2004 年开始补缴。

**郑主任：**现在这个情况属于劳资矛盾。我们把政府拉进来，政府就给了这样一个态度。我们认为劳资矛盾，我们自己解决。

我们申市有一个日资厂，因为工间休息的 45 分钟厂方不算工资的问题，上个月开始罢工。厂里新工人不是很多，所以很多老工人就追要这十几年的每天 45 分钟的加班费。很多工人、保安、文员都参加了。这种情况下，老板就愿意和工人去谈。老板问一些去找他的工人，是不是代表。因为这之前有很多例子，政府把一些工人代表抓到派出所去了，工人就不敢说自己是代表。而日本老板，他们看到罢工造成的损失之后就愿意和工人谈，希望能有个解决方案。工人就找到我们。我们介入后通过一些技术上、法律上的程序，让工人可以站出来，又不受到打击。这样工人站出来以后，老板不应该打击我，而应该感谢我。

另外还有一个工人信任的问题，因为工人代表也可能被其他工人怀疑被老板收买了。所以工人代表不能只代表自己，要代表全体工人。打个比方。工人觉得能涨到 80，代表觉得可以涨到 100，那么谈的时候应该提出多少呢？不能脱离工人的整体意见。工人代表如果日后完不成任务，会丧失信任。具体在谈的时候，老板提出一个提议，员工代表可以说我们决定不了，需要问大家的意见。日后如果面对面谈判，谈判技巧也很重要。代表面临着资方和身后工友的双重压力。

现在说回日资厂，他们产生了工人代表，也有我们的介入，谈了好几轮。最后得到了一个高于工人预期的结果。这个案例成功的

关键是给了企业一个压力——罢工半个月，老板已经承受不了了，只能和工人谈。

你们的工人代表怎么产生的？

工人：我们一直比较积极的人，就把名单提出来，让大家签字表态承认我们是代表。

郑主任：员工签字的方式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签字以后就表明自己的意见了。现在最有效的方式是厂方和员工的谈判。

工人：现在厂方不和我们谈，要我们去找政府谈。

郑主任：现在为什么你们没有和公司形成一个谈判的局面呢？我们总结最有效的和厂方谈判的条件是，第一是工人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诉求。统一诉求，工人要团结。二是，让老板知道工人的压力。好比说本田，罢工 20 天，公司损失 20 个亿。开始工人也和老板谈过，老板说只涨一百块，爱要不要。后来工人有了一个大的行动造成压力，对企业生产造成影响，才有一个压力。刚才说老板不和工人谈，让他们和政府谈。其实就是没有给厂方造成压力。

刘律师：他通知里涉及到一个歧视，为什么只放了老员工的假，却让那些新员工做工。这是一个歧视。厂里要放多少人的假。

工人：具体数字不确定。只留 200 人做工。

刘律师：官方什么态度，说是无法核算工龄？

工人：可以核算，正在核算。

小云：现在我觉得是社保局的回复比较积极了。厂里不愿做，所以才进行放假。

工人代表：因为工资是 2004 年开始才从银行转账发的，才能证明我们的工资收入，和和工作时间。之前的怎么核算都不清楚。

工人 1：入职证明、工资单应该在厂方那里一直保存。

工人 2：厂方说只保留 3 年。

郑主任：现在是两条路。一方面是，打官司。一方面是和厂方谈。现在社保局是支持补缴的。和厂方谈是属于另外一种。不走法

律途径，不走信访途径。现在打官司不是好的选择，估计大家也不想打官司。现在这种集体性的诉求最好还是劳资谈判。现在是怎样给老板形成一种压力机制。工人越团结，老板越害怕。

**涛哥：**老板是看你们有多少行动。有一点行动了，就会有一些让步。现在就是让老板来找工人谈。

**刘律师：**老板为什么放假？有可能是因为老板迫于压力，怕给你们解决社保之后，其他人也会起来，所以利用放假把你们和其他人分离开来。现在设法把放假和社保联系起来，只有团结才能有力量，让老板坐到谈判桌上。

**郑主任：**团结表现在很多方面。1、大家诉求是否统一。2、行动中大家是否统一。行动中有些人会受到外界压力而承受不了。需要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签字、公开信，向社会公布。我们是否有活动经费？让大家团结到一起，而且要做的不是口头的团结，是真正的团结，能做到了，就不会说搞活动，没人去。比如说，工人代表要让其他工人及时了解进展，不要让其他人成为旁观者。而在工人代表受打击时，其他工人又该怎么做？详细方法不用我们作介绍，工人自己就会找到方法。比如，老板要开除工人代表，那么其他工人捐助工人代表维持生活、再找工作，并同时再选代表。这样老板意识到自己的办法没用，就不会再做了。

**刘律师：**团结的人越多，工人代表越安全。社保局的回复说明该补缴，那这份通知就该广而告之，让更多的人知道。

**郑主任：**咱们国家，咱们工人不能成立工人组织，只有工会，很难团结。大家都是个体存在，所以现在不太容易一下子团结到一起。所以会有很多人想法不一致。现在我们是小规模团结，没有这个就没有将来更大规模的团结。

**刘律师：**你们的团结也是有效果的。比如现在公司给了你们合同，放假的事情也给表态了。大家也看到了团结起来的重要性。现在大家共同的诉求是社保，还有停工，和将要被停工的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去问政府也不会有明确答复。现在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谈判的前提是团结。每个厂的具体情况不同，团结的方式也会有不同。

**郑主任：**现在厂方口头答应 2004 年开始补，那么工龄 5 年左右的就满意了。现在大家多和其他人交流，（这是）意识提升的过程。问其他工人现在的想法，可能有些人会提出涨工资，增加福利，等等，会有很多不同的诉求。咱们现在要统一诉求，最后可能有不同的诉求，那么，好比说，5 个人是这个诉求，5 个人是那种诉求，那么我们 10 个人今天一起去要求这个诉求，明天一起去要求那个诉求，这样不要分开。因为我们是一个阶级。厂里的其他工人可能今天社保问题和他们关系不大，但是明天他会遇到别的问题，那么他们是该站起来保持同一个态度还是怎样。

如果现在仅仅是按照“和自己无关的就不理”的话，我们是不希望达到这种状态的。我们今天帮他们了，他们明天可能帮我们。总之，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要向其他人进行宣传。

**工人：**我们能不能自己另外成立一个工会？

**郑主任：**工人不能随便成立自己的组织，不能成立独立工会，需要工会部门认同。也不一定非要工会才可以谈判，像本田里就没有工会的声音。只要你是工人代表，不管是不是工会的，老板就得给你们谈。沈阳 KFC 的案例里，工人提意见，老板扭头就走，根本不理。就是因为工人没给他们压力。

**工人：**现在就是老板没压力。很多人旁观。

**秀红：**你们也要看你们是怎么对待旁观者的？不能只是排斥。

**郑主任：**刚建国的时候，工人是当家作主的，有很高优越性的。再说到建国前，真正的工人也不多。所以那会都不能说是有一个有力的阶级。咱们历史上都没有这么一个团结的先例和基础，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身边的人不够团结是挺正常的现象。

**刘律师：**我的观点是我们要想办法团结扩大。工人团结起来了，老板就害怕了。老板就会主动找你们谈了。



工人：我们 200 多个人停工没多大力量。

刘律师：你们全厂工人都保持统一的诉求，如果大部分人都能团结到一起的话，老板就不会用这么无聊的手段了。西方国家对于集体行动有规定的。

工人：我们是 200 个人，但是这里面还不团结。如果周一我们 200 个人团结停工，算不算违法。

刘律师：我这个律师身份，不合适做明确的解答。

工人：如果要停工……

刘律师：你们都要被放假了，和停工有什么区别吗？你们现在都已经被游离到工厂之外了。你们再做什么还有什么用吗？如果说你们的行为第一没有结果，第二会对自己产生伤害。老板把你们从生产线上踢出去了，就已经是避免了这个问题了。现在的问题就是需要团结其他还在生产的工人。

工人：那些人都是麻木的中国劳工了。有些人已经有放弃的想法了。有些人害怕被辞退，想留在厂里。

刘律师：集体行动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阿针：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天时了。

刘律师：有一个开始罢工了 17 天，最后还是没达到目的，复工了。老板是有一个预期的。后来看到工人更团结了，才开始谈。

工人：那批想 2004 年开始补社保的，如果让他们先补缴了。这样会不会团结其他人？

刘律师：可能有作用。不过会损失一部分人。

郑主任：工人群体的问题还是要群体去解决。不要被分化了。那些人同意了，可能就退出去了。工人代表要代表所有人，要考虑各个年龄段的。

工人代表 2：我们昨天也是说，不给 2004 年的签。

郑主任：不要强硬地说，要解释清楚。

涛哥：要跟他们讲清楚要害。不然可能现在同意了，以后又变

卦。

郑主任：现在还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需要与其他人统一思想。

工人代表 1：一方面跟工人解释，要他们等一下。一方面和政府要书面答复。

工人代表 2：地税局的不可能只打 2004 年的，会把全部的都打出来。

郑主任：我们再写一个公开信，我们工人对公司放假这样单方面做一个决定是不同意的，要有怎样的结果。要大家签字。要（政府）出面让工人和老板进行谈话。就算是那些事不关己的人，也是能团结多少算多少。

涛哥：社保问题没什么好谈的，必须从入职补齐

郑主任：停工是无效的。

秀红：那现在应该具体怎样做？

郑主任：该上班就上班。

工人代表 3：现在已经不能打卡了。

工人：现在是不是算终止劳动合同？

刘律师：这不算。

工人：就只能打官司了？

涛哥：打官司只能是输。

工人：他现在说放假就放假，不是终止合同是什么？

工人代表 1：不是终止合同。

郑主任：大家是想恢复工作还是怎样？

工人：恢复工作。

郑主任：工厂是哪天的通知。

工人代表 1：第一批是 11 月 15 号开始的。

郑主任：今天我们是法律咨询指导的方式来参与的，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既然你们要求上班，那么你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去上班试试？

工人：工厂不让进。

郑主任：那我们写一个公开信。首先是我们不接受公司的安排，公司的安排不符合规定。我们和公司的问题不想扩大到社会层面，就是说，我们不想造成社会影响，但是保留我们自发进行抗争的权利。就是说在道义上声明我们的权利。我们交到上级工会，交到劳动部门、企业。我相信企业会有所反应。现在是厂方关闭大门，把工人赶到社会上。我们现在就是表态，我们是本来不想造成社会影响的，我们是为政府考虑的。那么我们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情况下，那么既然已经说明我们是不想闹的，先礼后兵。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可行。我们要商量好可能遇到的一些情况。和其他工人进行沟通。工人代表之间的分工要分好，谁去对付哪一方面。我们工厂里其他人，对于现在维权的人的声援。我们希望他们声援，说明，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明天也可能发生在你们身上。

我们劳资方面的问题就在内部解决，不扩大到社会层面。一方面争取政府的一些可能的支持。

涛哥：政府虽然无能，但还是要争取支持。

郑主任：现在就是说不让政府捣乱。让它站在一边。

涛哥：就像工会虽然没鸟用，但是把它拉出来，给它通报进展等等。

郑主任：包括媒体的作用。

涛哥：前两天联系媒体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有一些负面的言论。我们的QQ群是100%政府盯上的。明天有两个记者来某区。把那些图文材料都拿出来。然后他们再去厂里了解情况。现在确定省总工会的一个人会下来了解情况。你们先计划一下地点时间。

刘律师：因为工会已经介入了你们的事，那么每一步都要向工会反映。只要他不提意见就说明他默许了。书面反映情况。可以让员工们签字委托工人代表，然后工人代表就可以有权利代表工人。

刘律师：现在我们就是要先写联名信，快递给老板，注明不同

意放假的安排等等。

题目就是不同意公司关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的异议书。内容就是不同意公司的放假安排，保留工人追究的权利。寄给公司法人。寄给工会，如果不开回执的话。

**郑主任：**当面也有当面的好处。工会至少应该会有表面支持的表态。不表态就是默许。

**工人代表 1：**那我们还有没有权利和厂里要求谈？

**郑主任：**可以谈。我们没有解除劳动合同。

**工人代表 1：**我们想看全厂的工友愿不愿意一起签名，就是有关放假的事情。

**郑主任：**就是需要厂里的工人都知道，厂方的这种行为是需要经过大家同意的。

**刘律师：**企业里流行两种惩罚方式，一种是不让加班，一种是放假。谈判呢，就可能会提出高于法律的要求。合理的高于法律标准的要求也可以提出来。

**工人代表 2：**我们去劳动局要求解读厂方的放假通知，会不会对补缴社保的要求有影响？

**郑主任：**不会。

**刘律师：**厂里的这个通知，应该要有明确的放假时间、放假期间待遇、周期。

**郑主任：**总结一下，给政府的意见书切入点有三个。第一，厂方这样做，（针对？）补缴社保的行为，是违法的。第二，安排工人放假不让进厂的合法性是受到质疑的，厂方做出放假的决定是不合程序的。第三，工厂把我们这么多人赶出工厂，造成社会不和谐因素，本身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第四，给政府提出这些，能够比较好地解决，也对他们有好处。第五是尽量团结厂内的人，对工人队伍本身工作要加强。

**工人代表 2：**政府信访办要不要送？

**郑主任：**工会和劳动部门就可以了，信访和这个是两个渠道。

**工人：**第二批可以不接受公司放假安排吗？

**郑主任：**第一批也可以不接受啊。这么多人被放假，即便公司和工会商量了工会同意，只要大家不接受的话也不行。企业、工人的问题企业内部解决，希望政府过来调查情况，协调处理。我们觉得工厂这样做我们不满意。能发动全厂工人更好。

**工人代表 2：**代表都在第一批放假里，第二批没什么人愿意站出来。

**涛哥：**厂里就是要把你们这些人隔离出来。

**郑主任：**还是要做工人的团结工作。咱们说到工人代表的保护，谈判过程中会写到里面，但是还是工人对于工人代表的实际保护。很多工人选出来以后，都想我们把代表选出来，你们就去做吧。这样代表是没有真正的含义的，只是名义上的，这样的话代表出了事，别人就退到一边去了。代表选出来，别人不能撤，要能继续支持。这样，才不怕老板报复。有了支持，我们给政府、厂方的一些东西才有力量。

刚才那位工友提到打官司。我们劳工律师事务所，是全国第一家劳工律师事务所，只给工人打官司，不帮老板。我们已经打了好几千官司了。但是打的官司越多我们越发现，很多个人维权官司里面，官司只解决个人的情况，不解决全体的。因为一打官司，我们 70 多个人的集体诉求就变成 70 多个官司了，这样力量就分散了。一打官司两年多，个人精力投入很大。还不一定能赢，即便赢了，钱也不一定拿到。所以不管投入来讲，还是结果，都是吃亏的。所以我们发现官司不能解决全体工人的问题。打官司的话就把你们引入歧途了。

**工人：**为什么老板这么强？

**郑主任：**个体工人面对老板永远是弱的。为什么设定集体谈判呢？就是避免打官司，避免时间、司法上面的浪费。比如我们现在

支持的一起 1000 人的维权，如果是打官司就是 1000 个官司，要打上半年。会造成很大的司法浪费。所以说集体协商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而且现在据统计，个体劳动案件逐年减少，集体的增多。

**刘律师：**你们要是打官司，很难找到合适的诉求去（起）诉。社保已经通过行政途径解决了，法律不能解决。社保问题广东省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 会议后记

当天的会议是我来做记录。原定下午 16 点的会议，工人们早早就到齐了，聚在一起聊天。有 4、5 个面生的工人，其余几个都见过。打听了一下，有 3 个是第二批的，有几个第一批的工人以前没见过。一共有大约十五六个工人。秀红向我们介绍说，从邻市请来有集体谈判指导经验的律师，因为堵车，要晚些到。

16 点 50 左右，一个带黑框眼镜的胖中年男出现了，操着一口京腔。问清楚要开会的地点、要见的人以后，一边说他是郑主任的同事，郑主任马上就到，一边大步流星走到预留的位置上。

首先由工人大概介绍了一下情况。遇到工人的讲述和律师的提问对不上，或者工人讲的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机构职员秀红和小云会主动进行补充。律师一边讲，一边有人提出不同疑问。尤其一个叫阿明的工人，一直和律师提相反意见。秀红还有几个工人就给他打手势，意思是让律师先说。这个律师了解情况以后做出论断，有关放假的事没法上诉。边讲，边强调，他说的是邻市的情况，本市这边的不是很清楚，或者不知道某市这边的法官有没有什么新的解释。

又过了 25 分钟，郑主任终于到了。郑主任长得很白净，戴一副金边眼镜，说话语气听起来比那位刘律师稳重些。他看了那几份材

料，又了解了一下情况，开始讲话。不过他电话一会一个，开始都在屋里接，后来有一个说信号不好，到外面去接了。

郑主任讲的时候，刘律师时不时和他咬两下耳朵，让人觉得神秘秘的。两个人都在不断地强调工人要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并且他们劳工律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基础也是工人团结。然后讲到工人要团结确实会有困难，因为从建国之初起就……（此处略去 200 字）。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工人们一语不发，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太多表情。我猜是神游天外了。我叹了口气，也有人叹了口气，这时郑主任大概是意识到工人们不感兴趣，便自觉地将话题拉了回来。

开完会后去附近的大排档吃饭。20 个人大概吃了 200 多元。我开始以为是劳工机构出钱，却原来是工人掏腰包。难怪今天中午在镇上开会时，几个工人不再去饭馆吃饭了，而是自己做饭。大概集资款又用得差不多了，而现在很多工人放假，也需要节约着用钱，不然再找其他人集资就不容易了。

那个开始一直和律师抬杠的阿明，是第二批追缴社保的工人。脸长得比较有棱角，眼睛挺大，眼神有点发直，说起话来挺冲。吃饭的时候和他了解了一下情况。他和他老婆都在永宝厂，一个做了 11 年，一个做了 7 年。他在开会的时候一直和律师抬杠，说现在谈不拢就要打官司。他开始没去追社保，主动向我解释说是因为他之前是被亲戚介绍进厂的，亲戚和老板认识，顾及情面不好意思追。而现在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头了。我问他为什么要坚持打官司，他说他不是要坚持打官司，而是说如果谈判不成没结果，就只能打官司了。并说他对法律略懂一二。问他为什么懂法，他沉默了半天，很犹豫说还是不说的样子。我说，要是不方便说就不用说。他还是说了，他以前是学过法律的，亲戚在北京有家律师事务所。他在那里帮过忙，但是自己没有拿到毕业证。后来进厂做的普工。因为他之前老和律师抬杠，遭到涛哥和几位工人排斥，涛哥红着脸跟他说：“不要再讲了，下来单独跟你说”。他没听，还是抬杠，涛哥训他说：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后来他因为把住房公积金的概念说错了，又遭到其他工人耻笑。两个律师对他倒是比较有耐心的样子。京腔律师还总是略带调侃地对他说“清楚了吗，兄弟”“明白了吗，兄弟”。有工人问他干嘛老跟律师争。他说，当然要跟他们争。工人说，他们是来帮咱们的，又不是害咱们的。后来，于航又提到他好几次，笑话他说连公积金是什么都不清楚，还老和律师锵锵。

过了几天，问起工人代表事情进展如何，于航摇着头苦着脸，工人不团结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啊。

## 后 记

从跟踪事件、访谈永宝工人至初稿写成，用了6年时间。这是作者第一次接触、跟踪集体性的工人行动，也是第一次对参加集体行动的工人进行系统的访谈。要感谢工人对我们这些外围参与者的信任，也要感谢当时可以有这样一个网络存在，给我们提供此类机会，理解、记录正在发生的工人抗争。

稿件写作因为各类原因数次中断，又重写了数次。限于个人水平，仍然无法以最理想的状态将所有重要的观察、想法全部展现。

庆幸的是，在几年的整理过程中，作者有机会接触了更多类型的工人集体抗争，因此可以对永宝工人在抗争中展现的各类特点，与其他集体工人行动进行反复对比、思考，加深理解。

